

中国底层 访谈录

上 篇

廖亦武 著

目 录

哀民生之多艰	1
作者简历	4
01 食客迟福	9
02 江洋大盗崔志雄	18
03 百岁和尚灯宽	26
04 老右派冯中慈	41
05 多余的人高歌	49
06 酒鬼高马	57
07 演员高洋	65
08 嫖客耿东风	71
09 招魂术亲历者何老东	78
10 边缘学者洪声	86
11 被勒索者胡牛	93
12 偏三轮胡小松	100
13 吸毒者黄河	109
14 风水先生黄天元	119
15 乡村老教师黄志远	127
16 采购员霍海仲	137
17 上书者蒋朝才	145
18 盲流诗人蒋大器	159
19 神医信徒瞿曲	168
20 算命先生孔庆天	171
21 上访诗人老陆	179
22 风流穷人雷公	189

23	偷渡犯黎忆丰	199
24	梦游者之妻黎英	208
25	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	216
26	李敖读者李老皮	224
27	被收容者李明凯	234
28	同案犯李齐	245
29	色情狂梁寒	257
30	老知青廖大矛	265
31	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	274
32	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	282
	致友人岳建一的信	289
	书评会部分专家发言纪要	294

哀民生之多艰

流沙河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除了两位先生而外，我都不认识。本书作者从前也仅认识其中几位，且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感兴趣，更未想过将来会采访他们。这里说的从前，是指十年前的八十年代。那些年间，作者老威正在写现代诗，已具知名度了。年轻气盛的他，逞其狂狷之态，率其豪爽之情，跑到潜意识里去打捞沉船，摸些碎片，镶嵌成既难念又难懂的长长短短句，自己觉得快活极了，哪有兴趣去关心社会边缘的畸零人呢。必待身历一场惨烈的熬炼之后，看清社会真相，他才想起该去采访他们。他悟到，写他们，这是他的神圣职责。

因为那一场惨烈的熬炼，他成熟了。其中诘误囹圄的四年，比大学更大学，一如两千年前汉朝“培养”司马迁那样，如今又用狷狂大学“培养”出作家来。四年毕业了，毕业即失业，他成为“多余的人”，也算是与世不偶的畸零人了。畸零人访畸零人，好比俗话说的“流泪眼观流泪汉”，心有灵犀可通，宜其探幽索隐，得吾人之所不得，写吾人之所不写，遂成鸿篇骏著。他目前的身份是“在野的作家”。这个身份是某个混混给他订的，见本书“北京混混周二黄”篇中。在野者，不穿制服不领薪之谓也。惭愧，我虽然退休了，写文章也不必再穿制服了，毕竟还在领薪拿补贴，仍住公家房，算不得在野。本书作者叫我写序，蒙看得起，敢不从命。那就借几寸篇幅，写几行浅见吧。

首先，我认为本书开了我眼界，使我惊叹，使我不安。这种感受，很久没有过了。十年来，我厌读那些远离现实之作，藻饰浓疮之作，涂改历史之作，贩卖乡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更不用说瞎眼颂德之作了。这些作品，大不足以扬大我之声，抒大我之困，小不足以进小我之德，娱小我之情，根本不严不肃，却自命为严肃文学，真是笑话。本书则不然，堪称为严肃。兼且有趣，随便翻开一页，皆能引诱你读下去。用对话体写人写书，便有这点好处。记得

史坦倍克《人鼠之间》便是用对话体写的。

本书中这一群畸零人，大部份或荒谬或凄凉，仅有五位既不荒谬又不凄凉，可以说是奇特人物。他们是老知青廖大矛、老军人廖恩泽、朝圣者旺吉、同性恋者倪冬雪、藏书家冉云飞，就这五位。而荒谬的列举出来就太多了，有光着屁股在街上肇事的酒鬼，有狱中的妄想狂，有专门制造假象的遗体美容师，有雇佣的哭丧者，有京城娱乐圈的混混，有口称“共同致富”会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形象问题”的暗娼，有盼望成名的乞丐诗人，有迷信卜卦的女教师，有患梦游病的作家，有为爱情而毁了仕途的老右派，有风趣横生的老地主，有骗女色出了洋的无耻诗人，有滥得可怕的所谓民刊主编，有厉害而深沉的算命瞎子，有以垃圾养猪而发财的乞丐头儿，有说“知识分子还得从头学说人话”的愤懑的副教授，有在滥俗报刊混饭吃的清醒作家，还有信巫术的文学官员、骗子神医、神医的信徒小姐、死刑犯、嫖客，真够热闹的了。至于凄凉的就要少些了，有叹惋“世风日下”的琴师，有画家村里的穷艺匠，有拉二胡的盲丐，有跑滩的穷艺人，有崇拜高尔基的流浪汉。难得的是既荒谬又凄凉的那两位，其一为失学的流浪少年，其一为已故诗人海子。海子自杀身死多年，本书作者采访海子生前一位邻居，录其凭回忆的陈述，观缕细致，不时插一二句评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让我们了解到这位不幸的诗人很可能是名场上的牺牲品，可悲可悯。本篇还写到当年四川的先锋诗人群之江湖义气，近似旧时代袍哥跑码头，有一套特殊的联络方式。其间也不免带有虚伪性和使小坏的，彰显出名场上的竞争之激烈。这些记载，虽然一鳞半爪，作为八十年代现代诗运动的史料，甚有价值。

荒谬使人惊叹，凄凉使人感伤，本书除了这两点所谓的审美价值（这个说法实在可笑），尤以开人眼界、促人思考、导人觉醒为其旨归，倒不在乎文学上纯不纯啦美不美啦那些琐屑讲究。全书三十几篇，大半是“恶之花”，叫它怎样去纯怎样去美。关山难越，那样多的失路之人，本书作者凭着良心为他们写照，为他们悲哀。中国文学之一线生机正在此。我佩服他，尊敬他，亦正因此。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此杜甫梦李白所作也。愿本书作者平安。

作者简历

1958年农历6月19日，出生在中国四川省盐亭县海门寺的一所乡村小学里。

1960年，因饥饿引起全身浮肿，差点丧命。

1966年，因文革失学，一度成为流浪儿。

1976年高中毕业前夕，因在墙上书写“反动诗歌”而遭全校批判，并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

1977至1980年，四次参加高考，均因政治、数学等科不及格而落榜。

1980年底至1982年，在川藏线开卡车，两次几乎翻车。

1982年发表诗歌，并接触到朦胧诗，随后步入文坛，发表《儿子们的年代》《大盆地》《人民》等长诗，引起轰动，几年间获得20多个官方诗歌奖。

1983年认识周伦佑、周伦佐、蓝马等大批在野诗人，步入文学黑道，参与或主编过《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巴蜀现代诗群》《现代主义同盟》等地下诗刊，进入公安机关的黑档案。

1983年到1989年，写作了《死城》《黄城》《幻城》《偶像》《杂种》《天问》《挽歌》《大循环》等一系列反叛性长诗，名噪一时，成为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并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和围攻，曾一度被制止发表任何言论和作品。

1986年，参加抗议中国作协停办《中国》文学杂志。

1988年，参加中国新时期十年诗歌讨论会，却因姐姐天亡而心智凄迷，屡屡捣乱会场，丑闻传遍江湖。

1988年夏，受作家方推荐，免试入武汉大学作家班混文凭，三个月后被开除。

1988年至1989年初，受作家韩少功之邀赴海南“共创事业”，却因斗殴丑闻而离岛。

1989年4月初上北京，胡耀帮逝世时因“拒绝参加任何群众运动”而离京，在京时出席了由北岛主持的《今天》首届颁奖仪式。

1989年6月3日白天至6月4日凌晨，在涪陵家中创作并朗诵了针对天安门惨案的长诗《大屠杀》，制作成磁带，交给在场的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

1989年至1990年，在风声鹤唳中传播《大屠杀》，并筹备出逃。

1990年3月，组织、编剧、主演了《屠杀》之姐妹篇，诗歌电影《安魂》，并于同年3月16日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万夏等十余人。

1990年至1994年先后在重庆和大竹的收审所、看守所、监狱等地受审、坐牢和服刑，接触了大量的死刑犯、刑事犯和几代反革命犯。曾因违犯监规，被背铐23天，也曾因不堪肉刑折磨而自杀两次，诗人的身份几被忘却。

1992年5月之前，同案们被全部释放，“文化间谍”戴迈河也被驱逐出境，可廖作为反革命首犯，双手背铐着接受了秘密审判，获徒刑四年。

1992年冬至1994年1月，在监狱内重操旧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作品《活下去》，写完了卷一《汉人》和卷二《黑道》的初稿，并师从80高龄的老和尚司马，学会了吹洞箫。

1994年1月31日，因国际关注，提前46天出狱。

1994年4月，前妻阿霞要求离婚，廖光棍一条离开户口所在地涪陵，回到成都与父母住在一块。

1994年3月21日，春分，认识18岁的宋玉，稍后确定恋爱关系，并于1999年2月结为伉俪。

1994年至1995年，因衣食无着，持箫在成都各酒吧卖艺，与三教九流之底层社会厮混得烂熟，动了写底层的念头。

1995年至1998年，与宋玉一道跑推销、守茶馆，并在杂志和报纸打过工，曾自我推销地下音乐磁带《箫与啸》近1000盘。

出狱以来，参与多项人权、政治、改革方面的呼吁和签名。1998年5月，发出《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反对总统先生忌月访华。其外，也曾多次单独上书当地警察机关，抗议对其生存权的粗暴剥夺。

出狱以来，被地方当局多次拘留，数度抄家，文稿流失上百万字。1999年2月26日，国安警察甚至在新婚大喜之际以“非法采访”之名拘捕了他。

1997年和1998年，主持出版了地下民刊《知识分子》，共两期。

1999年，在国内公开出版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书中描述了民主墙的历史，多次出现魏京生、徐文立、刘青、刘念春等人的名字，引起广泛震惊。此书在被几十位专家、学者评为本年十大好书之一的同时，被中宣部列为本年十大禁书之首。

同年，以笔名“老威”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引起强烈反响，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随后被查禁。书商逃逸，印刷厂被封。

1999年6月4日前夕，冒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并为纪念六十四周年而朗诵了长诗《大屠杀》。

2000年春节前后，与《今天》派诗歌元老芒克一道，主演了由日本公司投资拍摄的地下电影《飞呀飞》，艺术重现了出狱后的生存处境，此片曾入围2000年的柏林电影节。

2001年，以老威之名公开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上下卷，引起强烈反响，50多家媒体报道并转载此书，几十名专家和几百名读者聚会北京国林风书店，展开激烈讨论。直至傍晚，移师京郊大觉寺，廖在会上吹箫并朗诵了《大屠杀》。

2001年4月19日，《南方周末》以整版发表了廖与著名记者卢跃刚关于《底层》的对话，引发了该报的人事地震，其主编、副主编及编室主任均遭撤职。接着，《底层》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查禁，勒令销毁，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

再接着，《底层》盗版泛滥，与海外种种禁书一道，流入地摊。

2002年6月，因耶鲁大学康正果先生的力荐，《中国底层访谈录》三卷全本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在彼岸文化界引起反响。与此同时，获得《倾向》文学奖。在颁奖仪式上，中国独立笔会主席刘宾雁和副主席郑义均对其创作高度评价。

同年，再次改定已写了十年之久的长篇小说作品《活下去》，分卷一《汉人》，卷二《魔界》，卷三《黑道》和卷四《证词》，约80余万字。其它还有1999年发行的地下诗集《古拉格情歌》（后更名为《犯人的祖国》）；地下随笔集《说谎的石头》；80年的诗歌集《死城》《长廊》也相继编定。

同年，开始了《中国冤案录》的采访与写作，并继连载《底层》之后，在《民主中国》上续载《冤案》。估计这项文字工程将进行两至三年。

2002年10月7日凌晨，父亲李德奎因肺癌在成都病逝，享年80岁；一个多月后，难友蒲勇也因胃癌夭亡，悲极痛极，鬓须为之添白。

12月18日清晨，因王力雄发起为“活佛爆炸案”要求司法公正的请愿签名，以及其它几项网上的人权签名，公安警察又一次突袭抄家并拘捕了廖。

2003年5月底，《底层》法文版面世，引起反响，首版了3500册，两个月间已售出2000册。《世界报》记者米福冒着萨斯，亲往成都采访作者，写出长篇报道。

同年，《中国冤案录》的法文版也在同步翻译中，将于2004年初出版。在法译中的还有《证词——从诗人到犯人》，将于2005年出版。

同年，申请出国护照遭遇挫折，这是他第四次申请护照，均因“国家安全”的原因被拒。

2003年7月，与刘宾雁、王力雄一道，获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奖，这是继1995年之后，他第二次获得此项奖励，理由是“面对种种迫害，仍以充分的勇气坚持独立的创作”。

除了文字写作,廖几年中制造并出版的地下音响 CD 有——《汉奴》, 2000; 《叫魂》 2001; 《大屠杀》, 朗诵, 2002; 《情兽》, 朗诵, 1989 年制作, 2002 年翻录; 《箫吟》, 2003。与此同时, 他对民歌民谣的追访、搜求怀有浓厚兴趣。

他今后要努力完成的文学作品是《活下去》第五卷——《传与记》。



01 食客迟福

采访缘起：迟福鼻挺口方，凭一根舌头在江湖上闯荡，居然有了不少追随者。“人心向吃的年代，”他说“除了吃，还是吃。”

我也是追随者之一，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和目标。1999年1月2日，穿堂风阵阵的成都西门某烂茶铺，我与迟福在麻将桌的包围中侃吃，渐渐，我气绥了。因为迟福的确见多识广，境界高超，我辈哪怕努力一辈子，也断难达到这种“万物皆可入口”的地步。

整理这篇文字时，我真想用一根大头针把迟福这厮的嘴缝起来，造孽呵。

老威：最近又享了啥子口福，老迟？

迟福：寡淡得很，拿《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话说：“口中淡个出鸟来。”

老威：不可能吧？一看你的气色就晓得，神清目朗，声若洪钟，脑壳上的油皮都在发亮。哦哟，连两鬓的杂毛也转青了！你没满50岁，我不好吹你“返老还童”。说实话，你到底吃了哪门子补药？

迟福：你学会看相了？

老威：前一晌，我看了台湾电影《饮食男女》，又把陆文夫的旧小说《美食家》翻出来拜读，嘿，我觉得与其亲自动嘴，不如看吃，久了多少会积累一点看（吃）相的经验，你笑啥子？

迟福：我没笑，我在咧嘴。电影、小说能吃么？看顶个屁用，只有沾舌头才晓得鲜。

老威：你的确比从前气粗多了。

迟福：那当然。我这段时间经常吃人。

老威：吃人？还凶杀呢。我说老迟，一把年纪，说这种话有啥意思？我又没得罪你。

迟福：哪儿的话呢？我是瞅着你人不错，才告诉你的。如果近来性子躁，想寻刺激，我介绍你去。

老威：你看上去没毛病啊。

迟福：你才有毛病。你靠近一点，这茶馆人多嘴杂，只要漏一点口风，就会传成恐怖片。你拿我的名片，抽空出去耍一趟，沿着涪江边一直走，有许多卖“球溪鲢鱼”的路边店。有个地方，停了一长串轿车，你凭感觉下车吧。傍晚时，有三三两两的人，沿一条河沟散步，你跟着走半里路，有一大片竹林盘，里头横七竖八几幢楼房，吃喝、棋牌、麻将、卡拉 OK 全包，一人玩一天 12 元。

老威：成都周围遍地“农家乐”，跑那么远干啥？

迟福：吃人啊。你找到老板张胖子，说要尝尝羊羔肉，人家就晓得了。递不递名片无所谓，一看你风尘仆仆的样儿，肯定就冲那玩意去的。那个鬼地方，白天清静，晚上爆满，不晓得从哪儿钻出来的食客。张胖子在方圆百里，烹调都算一绝，除了那独创名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他啥子都敢朝锅弄。我怀疑他的东西下了鸦片烟毒，毛毛菜都好吃。有时候，全部卖空了，总有不甘心的食客进厨房东寻西找，猎狗一般耸鼻子。张胖子莫法子，只好敲泔水桶叫唤：“喂，只有这喂猪的有剩，喂人的全光了！”我经常开玩笑说：“等钱赚够了，我就搬到张胖子家养老，把那唐僧肉天天吃，起码活 120 岁。”

老威：把人馋成这样，肯定有问题。去年《蜀报》揭露了“泔水油真相”，激起了成都市民的愤怒。因为新闻图片里都立着些一人多高的爬满苍蝇的大桶，桶里是泔水贩子从成都各餐馆回收的残汤剩水，经过熬炼，这些万人口水汤的油面被舀起来，重新出售给遍布大街小巷的“串串香”。原来，价廉物美，领导一代饮食新潮流的东西竟是一次次回收的食物垃圾，喂猪都不灵，人倒一串接一串，嚼得津津有味！随着泔水油事件的追踪报道，窝点一个个被挖出来，串串香的生意也萧条了两个月。但随着天气的变化，又很快回升，直到现在，串串香已经火透了整个成都。他妈的，人民不怕泔水油，人民的免疫排毒功能天生发达，人民永远毒不死。我敢肯

定，这泔水油里下了能刺激味觉的药，勾得大伙不见那满锅红汤就想。

迟福：火锅里下罍粟壳嘛，工商局一年四季都查，但从来没断过根。罍粟是提炼鸦片的原料，罍粟壳下锅一熬，就有异乎寻常的香，多吃一段时间，慢慢就成瘾了，你不做回头客也不行。

老威：你说的那地方，肯定是个毒源。

迟福：人多的地方都是毒源，俗话说：“吃个热闹。”

老威：卖人肉也热闹？不去端窝子？

迟福：偶尔也有警察开车去吃。

老威：你不是在创作《新水浒传》吧？人肉包子多少钱一笼？

迟福：哪有一笼？顶破天巴掌大的一个。把血丝丝仔细扯干净，放在冰箱里冷冻，算低温消毒。其实不消毒更鲜，但是现在的妇女，得各种疑难杂症的多，消了毒保险，还可以压一压血腥气。然后就放在粘土烧的瓦钵内，放点姜，用文火慢慢煨。没出娘肚子的东西，顶多一两个时辰就烂熟了，还要炖，直到全部变成一锅雪亮雪亮的汤，再放些“土人参”。当然，所谓“人参”都是脚板苕雕的，川西坝的脚板苕又大又肥，还长着脚趾拇。这是一种雕东西的好材料，假药贩子练摊时出售的“长白山千年老人参”，就是用脚板苕雕的，分男女，合在一块天衣无缝。哦，我扯远了。这种汤本来就大补，再放人参，不把人补成药渣子？所以只能放脚板苕，让汤稠一点。这样端上桌，点成火锅，肚条、鸡丝、银丝粉、藕片都可以烫。除此还有一种更鲜的玩法，就是把地老鼠刮了，洗干净，与那东西一块炖。张胖子养了十几笼白老鼠，像他妈个科学家，不过，我一见给老鼠喂的那些腐烂杂碎，就不太舒服。要点就点货真价实的地老鼠，让张胖子发动当地农民去地里掏洞，一天总能捉十几只大老鼠。老鼠刮了皮，蜷成一堆，乍一看，同胎儿一模一样，有时候，人肉早煨化了，可老鼠还没化，爪爪像没成型的手脚……

老威：你的心理真没障碍？那死胎儿不和尸体一样么？

迟福：第一次吃我根本不晓得，朋友带去，稠稠的一窝汤上来，白得晃眼睛。取调羹一尝，鲜得耳门子嗡地一响，我感到浑身都是

舌头，在一伸一缩地舔。朋友连问几声：“咋样？”我都傻了。趁我傻着，朋友赶快把保护母亲河的环保捐款合同拿出来让我签。我一脑空白地签了名，这顿美味顿时升值为5万人民币。吃上两次，我就有些上瘾。我走南闯北做生意，山珍海味尝遍，没想到最鲜最嫩最上档次的还是人肉。非洲原始部落，一直有吃人肉的习俗，中非皇帝博卡萨，还拿黑人人肉冒充熊肉招待过外宾。我国吃人肉最著名的记载，就是商纣王为了试探周文王有无谋反之心，把他关在地窖里三年，还杀掉他的儿子邑伯考，细细剁碎，熬成一钵肉粥赐给他。周文王明白是自己儿子的肉，还连称“好吃”，狼吞虎咽，连盆子都舔个干净。老实说，当初读这些吃人故事，感到自己的肉也在抖。类似的描写在中国古书里太多，大家都晓得《水浒传》里孙二娘卖人肉包子，差点连武松也刷了；还有李逵将史文恭开膛破肚，一片一片割其搏动的肝脏下酒的细节。三年自然灾害，人吃人的传说三天三夜说不完。婴儿生下来养不活，就一家人煮着吃。只要一个村里开了吃人的头，就一直吃下去，贫下中农吃地主，吃富农，老的肉不嫩，就选地富子女吃。那时人都饿疯了，来不及品味道。老威呀，啥事都怕开戒，和尚开了戒，吃荤比你我更厉害，吃人的戒一旦开了，绝对有成批的女性专门下崽供应各大餐馆。

老威：你已经开了吃人戒。

迟福：肚皮内外有别嘛。

老威：你咋察觉是胎儿汤的？

迟福：当知青时，我吃过胎盘，胎儿与胎盘是同一种味。但是张胖子手艺好，炖汤有秘方，把怪味全去掉了。最初我不敢到厨房去看，稀里糊涂喝汤。后来遇到淡季，东西缺俏，就越来越贵。跑货的晚上十点还没回来，大家都眼巴巴地等。一两六十元，遇上不足月的，最多三两重，算一百八十元。老鼠十元一只，倒不算贵。这样一锅吃下来，三四个人，轻轻松松就耗掉四、五百。当然，运气好也可能捞着个大的，六个月以上才想起流产的傻婆娘，呼天喊地张开血膀，任医生从那洞中一锄接一锄地挖出包袱来，耳朵、鼻子、嘴都齐了，连手脚指甲都有了，这种货，少说也一两斤，弄得

不好，撞上临盆流产的，三、四斤也打不住。这么大一块，一锅要不完，就分成两、三锅。秤斤两，我再怕看，也要去监督，因为秤星子偏一颗米，就是好几十元。分肉也有讲究，遇特别大的，谁都想屁股和大腿，但胎儿脑壳最大，有的占全身的一半，有的占三分之一。张老板只好把胎发刮干净，一家切一块。管他肉多肉少的部位，绝对平均主义，然后再分开下锅。

老威：这叫美食？我听起都恶心。

迟福：听与看是两回事。广西人吃猴脑是最残忍的，一进猴餐馆，服务员就把你带到猴笼前，让你挑。你想猴子多精灵，马上就意识到坏事了。一群十几只像人的东西，都眨巴着圆眼睛，惊恐万状地朝后躲，它们尽量挤在同胖身后，并互相把同伴朝前推，有更聪明的猴，伸爪子直戳其他猴向人类示意……这么惨的一幕，除了经常杀猴的屠夫，谁能看得下去？我不能看，看了就与你现在一样，心里过不去。那么多年文明教育，受到一只猴子的挑战。但是猴脑的确鲜美，当它被捆成一只粽子，嘴巴加了木塞，被固定在四周围了黑布或面板的站笼里时，除了桌面上刮净了猴毛的天灵盖，你已感觉不到任何动静。然后用片刀削开盖子，露颤动的脑花，一匙一匙烫着吃。也许猴子痛得只有眨眼睛的份，但舌头的感觉（有些紧张的感觉更加刺激！）已盖过了一切。民以食为天啊。

老威：从吃猴子到吃人，你倒是完成了一次飞跃。这之前你还吃过啥稀奇东西？

迟福：穿山甲、象鼻、熊肉、麂子肉、江团、娃娃鱼。我记不清有多少品种。总之我这根舌头该割下来，向全国人民谢罪，因为有些品种本来就稀少，吃一只就缺一只。还有些东西并不太好吃，只因为珍奇，就忍不住去尝一口。做生意嘛，勾兑关系，除了夜总会，就是陪吃陪喝。吃什么也象征着社会等级。比方请一个处长以上的官儿，总不能一般的鸡鱼鸭就打发过去吧？

老威：你是除了人肉，啥都不香了吧？

迟福：小时候的东西香，随便爬树掏个麻雀，裹一坨泥巴，烧透了，从灶里扒出来，在地上摔，羽毛粘脱了，那雀肉我长大后回

味过多次，每次都淌口水。依法泡制过几盘，再也嚼不出过去的味了。也许泥巴变值了，渗了太多的工业化肥、激素，还有没完没了的生活垃圾。中国城市中，已没有一条不臭的沟，地下水又污染土层，几十年前的那种纯粹的黄泥巴已不太容易找。笋子虫你吃过么？竹林里，一天要捉十几只，用竹签插着烤，那个清香！一辈子也吃不够。当知青时，猫啊老鼠啊，都吃过，哪怕捉了条大黄鳢，多年以后也念念不忘。最歹毒的一次，就是煮猫，那可是远近闻名的飞贼，老鼠捉腻了，就偷悬在梁上的肉，据说还偷过鸡。那飞贼虽说体重十来斤，但动作比闪电还快。我与它结仇是因为一块胎盘，那是我赶场时，从公社医院搞的。那年月，这玩意没人要，我就弄回来，与一斤肥肉混炖。那晚我忙了两个多小时，胎盘总算快粩了，我就捞起来切。太烫了，下不去手，我只好放在台上晾。我打算像对付猪肚一样，把胎盘切成条，再炖一个时辰，就彻底补一盘虚。于是，我绕到灶膛前加了把桑柴。没料到，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胎盘就上天了。只听得哇呜一声，我猛抬头，隔着沸腾的锅去抢，但已悔之晚也！

我脸熏成了黑包公，衣服被燎去了一大截，幸好手还没按进锅里，否则就烫成猪蹄了。房上一阵瓦响，我跟着撵出屋，猫与胎盘都无影无踪。我气得满山遍野地侦察了半夜，头昏眼花地回来，抱着一钵冷油汤咕咕地灌。我发誓不灭此猫，誓不为人。

我在沟里抓了些小鱼，摊在锅底炕。农村的锅，又煮猪食又煮人食，深且大。我不喂猪，却日夜盼着喂猫。湿鱼在锅底渐渐变干，变得焦脆，老远都嗅着一股鱼香。我把直径一米的木锅盖用一双竹筷撑起来，竹筷连着钓鱼线，鱼线又远远拽在我手中。一连三天，我门都不出，就铁了心肠炕鱼，然后放下蚊帐，裹在被子里潜伏。我只露两个眼珠子在外头，我用人的高度智慧去骗猫。

猫来了，从房梁的老路落在灶台前，爪子灵巧地绕开了竹筷，向锅里伸。我心跳加速，可它又缩回爪，偏着脑袋向里面打探。这样磨蹭了几分钟，它卜地跳下灶台，兜个圈子，嘴喵叫了几声。它幸好没刨鱼线，就重新纵上灶台。既然招呼打过了，贼也就不客气，它一点点朝里挪身子，我已憋出一头汗，那猫身子入锅，只剩个尾

巴在盖子上绕。

咬牙一拉线，怀着阶级仇民族恨。篷篷两响，锅盖塌了，跟着是猫的惨叫。我冲上去，全身扑在被猫顶得啪啪乱响的锅盖上，后来又索性坐了上去。我哈哈大笑，贼猫啊贼猫，你偷老子的胎盘，老子要整散你的骨头！

我在锅盖上坐了一个钟头，猫的动静依旧大，活捉不出来，我就抓把锄头压住，转身点火。灶膛一旺，猫在烫锅里跳得跟打雷似的，那嗷呜嗷呜的声音之恐怖，把我的尿都激出来了，裆湿了一片，我还不晓得。爆炒活猫进行了两三分钟，盖子被顶开了一下，一股焦臭呛得我背过气。可就这功夫，贼猫已从滚滚浓烟中露出脸，像一截黑炭，两眼恶狠狠地燃烧。我顺手从水缸中舀起一瓢，连瓢带水扣了过去，水雾冲天，猫一声尖嚎，像他妈个女人的声音。嘿，成精了。我压好盖，一瓢接一瓢向锅里狂灌，满屋子雾气笼罩，我感觉猫还在扑腾，但已翻不起浪了。一不做二不休，为了保险，我就架起旺火煮。在脑壳发木中，开锅了多久？我忘了。双手揭锅盖时，我莫名其妙亢奋，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

就唱了这两句时代最强音，我就刹住了：半锅黑浆中，猫像水雷仰面开花。胸腔塌了，可肚子从黑暗中高高隆起，绽出拳头大的一块肉色。我用筷子一戳，猫肚像漏气的皮球，几秒钟就瘪了下去。一股铁红色的浊流随着漏气的卜卜声渗出来。

老威：你真下得手！了不起了不起。

迟福：你莫讽刺人，时代风气嘛，谁能免俗？为了嘴，知青都有奋不顾身的劲儿。我邻队的小子，冷不防把活牛尾巴砍回家了，痛得那牛满山乱撵乱撞，全村的壮劳力都出动去圈牛，谁都不敢上前。我不就煮了一只猫么？

老威：猫主人打上门咋办？

迟福：还没过夜，就下肚了，找鬼啊。

老威：煮成那样还能吃？

迟福：是肉就没丢的。当然，黄肥猫弄成黑焦炭，看着是不雅

观，但是把焦皮一褪，腿子和屁股上的肉都完好。内脏、猫脑壳丢了，犹豫了一下，颈脖到背脊也丢，毛重十来斤的怪物，拾缀出来，不过四、五斤，煮透还要缩，最后能进嘴的两、三斤。大块白切，蘸盐和干辣椒面慢慢嚼，肉是粗了点，微微有酸味，但呷两口茗干酒就通泰了。我估计猫肉的酸是因为它刚才闹得过火，人跑久了，腿肚子也有点酸。

老威：好胃口啊。

迟福：几十年了，我的肠胃还真没闹啥大毛病。瞧，吹了半天牛，它又咕咕叫了。唉，今不如昔，哪怕人肉，也没过去的猫肉香，因为那是经过奋斗挣来的肉。

老威：你可能吃的不是真人肉吧？

迟福：笑话。

老威：成批的胎儿从哪儿弄？

迟福：全中国有多少女人？至少五亿吧？就算每个女人在一生中只打过一次胎，这笔财富，过去都白白扔了，现在还继续扔。胎盘值钱，每个医生都抢，可死胎没人要。张胖子的老婆是卫生院的，知道这个性生活随便的年头，只要收费稍低，早孕打胎的就踢破门坎。城镇的卫生院和个体诊所（还不包括游医和黑店）比天上的星星还密，只要订货，到时候打个电话，就派人去收购。越新鲜，收购价越高。你真是猪脑壳，还提这种蠢问题！

老威：你教育得对，我是有点不开窍。

迟福：你这辈子，吃没吃好，穿也没穿好，活得没意思。

老威：我他妈自由。

迟福：没见你飞上天啊。喂，老威，别每次都喝茶喝茶，把人肠子都洗白了。

老威：本来我是请你喝酒，可现在已经没心情了。

迟福：过两个街口，有家便宜馆子，叫“黄牛肉”，蒸炒烧炖中，蒸菜最特别，耙得透气，挑一筷子，再呷口老白干，那东西就顺着食管一路滚热地按摩下去，把人搁得稳稳当当。我再指点一下，

让厨子把牛脑花、脊髓、豆花三种白烧成一盘，撮点葱丝，你品一口，眼睛肯定搞来眯起。我迟福的好处，就是上得去下得来，几块钱的东西尝得，上万元的宴席我也不推。死之前，还得去品品香港美食、日本和西方美食。所以要挣钱，为了胃口，人民币多多亦善。日本料理我没吃出味道，但就餐环境把人镇住了。听人说，在日本东京，还有将生鱼片码在裸体美女身上的吃法，搞得人硬梆梆的。真是吃无止境啊。咋样？我们换个地方，到“黄牛肉”去继续海吹？

老威：我改天请你吧，老迟。

迟福：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看来，你我算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

02 江洋大盗崔志雄

采访缘起：1991年农历正月初七，我随一位律师朋友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拜访了江洋大盗崔志雄。其时，他的死刑复核期已过45天。“又白捡了一个春节！”他说。

崔犯39岁，浓眉大眼，虎背熊腰，大冷天，仍单衣单裤，丝毫没有惯常死囚的萎顿之态，倒令人想起某部国产电影里的侦察排长。他拖着重镣，对保险柜和人都有天生的洞察。我无意中遭遇了这个逃跑故事。当我在几年后整理这段回忆时，崔犯已化作累累白骨，但我的手心仍惊出了冷汗。上帝啊，这一切真的发生过么？

崔犯在鬼门关还会继续越狱么？

老威：你不抽烟？真稀罕，很少有坐牢不抽烟的。

崔志雄：牢里规定不准抽烟。

老威：按人的本性，没人愿意遵守监规，况且这是在号子外面，你就放开点吧。

崔志雄：人的尊严比本性更重要，许多罪犯被人瞧不起，不是因为案子，而是因为放纵自己，丧失了起码的尊严。在牢里谁不想抽烟？没瘾也想抽，特别是我，犯了通天大案，在这儿等死而已。但是，一根烟有可能把你变得不如一条狗。犯人差不多都捡烟屁股，出门提讯，就东瞅西探，过道里，阶沿下，甚至痰盂上的烟屁股都捡，然后珍宝一样藏回来，用鞋底子搓火抽。也有从律师、从承办人那里带烟进来的，于是一堆人围着，像过节一样。太没自尊了。你想想，承办人的烟抽得么？你得用口供去换！说不定几支烟、几份肉就勾得你啥都说，判了死刑才后悔自己命贱。

老威：捡烟屁股固然丢面子，但还没到丧失尊严的地步。我父亲文革中坐过黑帮学习班，清规戒律又多又严，每天的主要功课除了认罪书就是群众批斗会。他的烟瘾特大，也捡过烟屁股，还把铺草裹在纸卷里抽。有一次开大会，他的腰埋得特别低，人家以为他

今天认罪态度好，都不知道离他两尺远有看管人员丢的烟屁股，他差点就扑上去捡了！

崔志雄：你打的比方不恰当，你父亲又没犯罪。我的职业比你父亲的职业要难得多，必须要控制自己。我最恨人在牢里捡烟屁股，谁捡了，我就要撬开他的嘴，让他整个吞下去。

老威：你别激动，我们谈谈其它的。

崔志雄：我从不激动。谈其它的？我的案子？

老威：随你的意。

崔志雄：案子昨天刚谈过。市公安局局长来了，带了两个新闻记者，还录了相。他们让我在死之前，把作案手法详细地留个案底，因为最近撬保险箱的案子越来越多，其中有一种手法与我很近似。公安局局长没许愿“坦白从宽保脑袋”，这让我满意，至少没蒙我。你呢？

老威：我怎么？

崔志雄：看你的样子，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记者，倒有点像自由散漫的和尚。大光头，眼光挺出世的。对了，你是摇笔杆子的，叫“自由撰稿人”吧。

老威：你看人太厉害！职业训练出来的？

崔志雄：我的职业是认机器不认人。栽进来了，除了罪犯和律师，登门拜访我的就是公、检、法，包括法医，过几天上路，还需要他来“验明正身”。你不属于这个行道，肯定是搞文的，商人又不可能来看我。

老威：看来你不太愿意谈案子，审了那么多遍，你谈也谈烦了。

崔志雄：换个话题，我给你摆逃跑的龙门阵。

老威：你的主罪是盗窃保险柜嘛。

崔志雄：次罪是两次脱逃，这比弄保险柜惊险多了。上帝教导我们，死之前多做善事，也包括满足你的好奇心这种善事。

老威：我洗耳恭听。

崔志雄：两年前，我第一次翻船，关在某某收审所，位置在歌

乐山中。这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老式监狱，几十年过去了，看起来却比现代监狱还要结实，背靠岩壁，钢筋浇筑的大墙四角，设有岗哨亭，像一个从中间掏空的大馒头。在放风、开饭、开大会的长方形天井周围，是分两层的监区。汽车经盘山公路爬上来，直抵大门。进门是小天井，搜身之后，才准进正式的监区底楼。底楼包括提讯室、伙房、公共浴室、贮藏室、厕所；二楼是人犯监舍，共 16 个班，包括一个女犯班。当然干警值班室也在二楼，向阳的一面。循环回廊从监区中间穿过，黑咕弄冬，白天也亮顶灯。我关的监房天窗向外，我就地一纵，就能抓住窗栅，一个引体向上，就可以望见松林坡，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的地方。

老威：你对地形这么熟悉？

崔志雄：天才的读书人对书本过目不忘，我是天才的贼，对到过的地方过目不忘。况且，我在收审所呆了两个多月，那儿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早化入骨髓里了。据说这牢从没跑过人，鬼才相信。石头也有缝，我撬保险柜出入了那么多禁地，谁拦得住我？最大的障碍是人，大家关在一块，各怀鬼胎，再是天才，也不可能从众人的眼皮下消失。头一个月，天天提讯，我的思路没转过来，以后把真货吐了些，承办人一有“收获”，就要组织人研究材料，制定下一步攻心战略，提讯暂缓下来。

老威：入收审所都要过手续，你没挨打么？

崔志雄：普通新犯都挨整，下马威嘛。整人的方法极多，这话长了。我是高智商的重犯，承办人就亲自找到所长，给班里打招呼，免过手续。提讯一缓，我就不由自主地苦想避开人的法子。什么都是集体行动，除了开饭，上下午放两次风，每次一刻钟。天井里，一百多犯人，四周还有居高临下的监视，要想躲开无数双眼睛，只有钻厕所。厕所与浴室门对门，光线昏暗，气味薰人，正好适合我这种孤独的人呆。

老威：其他犯人不蹲坑？

崔志雄：监舍有大马桶，半人高，平时大家拉撒都在里面，放风时，两个马桶贼就提前弄出去倒。所以，百来号人一涌入天井，

不是抢着洗衣服，就是望望远处的青山白云，呼吸新鲜空气；也有暗中交换小东西的。你想想，我这种大盗，居然能单独在厕所里蹲十分钟左右，还是模范监狱呢。我总共钻了两次厕所，就定好行动方案了。我不能钻得太多，否则会引起怀疑。这厕所只有一个气窗，窗外是大墙，可谓上天无路。然而入地还是有门。我之所以犹豫，是不清楚出粪口的情况——这是未经改造的老监狱，不可能使用现代化的机械抽粪，那么露天粪口在监内还是监外？有没有粪盖？粪盖有多重？拉没拉铁丝网？在我行动的前一个星期，我曾动摇过。原因是我在集体洗澡时，从水篷头上方的窗口，望见了岩壁与墙之间的一条沟缝，这恰好是哨兵的视线死角。紧接着，我隔壁听见猫抓耗子的声音。猫都能过，我相信我扁着身体也能过——这令我兴奋了一会儿。但是，得三人集体出逃才行，首先要说服牢头，政府洗完澡之后，他有先入浴室的特权；然后由一人把门望风，两人搭人梯，扭下松动的水管撬窗栅。

老威：太冒险了。

崔志雄：对，三人三条心，比监狱更恐怖。我注定只能钻厕所。第三次蹲坑，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我隐约听见有人舀粪！我仔细分辨口音，绝对是当地的农民。我胸腔的血哗地一下冒上来，冲得脑壳嗡嗡了半天。嘿，我成功了，我晓得，我死里逃生了。接下来就是计算时间、路程、速度。放风 15 分钟，扣掉倒 6 个马桶的时间，剩 10 分钟；收监点名加 3 分钟；发现缺人，追查并招集警察组成追捕队，加 6 分钟；分兵出发，加 2 分钟；路上逃与追之间的时间差，9 分钟。也就是说，我必须在半个钟头以内脱逃到山下，混入人烟稠密的地区。

老威：给人的感觉是在演电影。

崔志雄：电影算个屁。记得我被捕时，囚车从山脚烈士陵园绕上来，费时 20 分。我下坡走直线，估计同汽车爬山的速度也差不多。这样，即使我在粪坑和监狱周围耽搁 8 分钟，仍然胜算。监狱旁边有个技校，常有朗朗读书声传进来，这是追捕队重点拉网地。他们以为我逃不远，还会以为我会躲开人，藏入山里。

老威：对呀，万一碰见上山的游客咋办？

崔志雄：你直冲着他去，他就怕你。我已经在脑子里预演了几十次脱逃，连做梦都在跑，一直到腿抽筋才醒。事情进展得出奇地顺，我记得是90年的5月6号，离我30岁生日还有3天。下午，我把背心、短裤、布鞋和毛巾扎进塑料袋，拴在腰间，外面套一件工作服。放风哨一响，我随着滚滚人流挤入走廊，两分钟后，就被哗地一下从楼梯冲向天井。我回身把住门框，目光却瞟着二楼的监视窗，两个警察正在笑嘻嘻地聊天。我一下闪入厕所，与最后一对马桶贼擦身而过。

我解裤子的动作很大，马桶贼根本没回头看，有人从门外撒了泡尿进来，我在最里的一格蹲下。再也不能磨蹭了，我脱下工作服，扁着身子下坑，我根本不看下面，一股股粪气薰得我直淌泪。蹲位太窄，我的脑袋几乎就卡在格上。两手把牢，一点点向里缩龟头，耳朵差点磨掉了。接着是悬空吊着，没想到茅坑这么深！咬牙一松手，卜通！一颗重磅粪弹。心跳得快炸了，逃生冲动压倒一切。我在臭大粪里钻，一只耗子在我背上蹦了过去，时间真他妈比一千年还长，浑身下意识地抖、抖，我两眼不敢睁。其实我没游，粪太稠了，也根本游不动，我是踩着坑底朝前扑窜，粪水只淹到颈子，可我老觉得会呛死在粪里。终于触网了，眼睛一睁，出口就在三尺之外！我面临崩溃，幸好我的脚向前探了半步——原来这铁丝网只拉了上半截。没办法，我必须埋头潜粪而出，背上被铁刺拉了两条大血口子。

爬坑费了些周折，把住坑沿引体向上——我的腕力不错，这是我们这行的基本功。由于过于紧张，我以为至少在坑里泡了10分钟，其实，6分钟都不到。我两三把脱光，扯开塑料袋，用毛巾匆匆擦粪，然后换上背心、短裤、布鞋，于是，除了臭气袭人外，一个长跑运动员绕开大墙，奔下山小道而去。我逢沟纵沟，遇坎跳坎，真成飞毛腿了，我绝对破了千米越野赛跑的世界记录。我与盘山公路遭遇了五、六次，每一次都是从公路边直线往下蹦，连翻几个跟斗，居然一点没事，爬起来又跑。我在道上撞见了十来个下山客，都纷纷掩鼻让路。我老觉得背后有警车叫，其实是幻听。

烈士陵园旁边是外语学院，我就直通通地冲了进去，穿过操场。我背心短裤，肌肉结实，跑姿又挺专业，所以没人注意。我钻入学生宿舍楼，在盥洗间淋浴，顺手牵羊把晾在窗口的半干衣裤笼上身，又跑出来。这儿属于沙坪坝，半站地外就有个大医院。我打辆出租车，才驶出几百米远，就故作惊慌地叫：“停，对不起师傅，我钱没带了。”表还没跳字，司机刚回头问：“要不要转回去拿？”我已推开车门下了。此时我听见警报，追兵已到了，而前方两百米，交警开始检查车辆。我闪入医院，绕过住院部，凭直觉找到教学实验室后面的太平间。我拔出后窗插销翻入，打量一圈，约 20 来平方米，6 个停尸石台上挺着 3 个死人，还有两个死人装在有玻璃罩子的冰棺里。没办法，我只好躺下，用蓝色遮尸布盖了。

五月的天本来不冷，但在石头上睡久了，寒气仍然浸骨。灯光昏黄，满屋腐臭，我旁边的死人邻居可能是车祸，地下坠了一滩血。我盼望着天黑下来，我着急得七窍生烟，可天就是不黑下来。房外树上有老鸦叫，一股旋头风把门吹得嘯的一声！我浑身发抖！如果有人进来，我就完蛋，他敢上来掀我的盖头布，我会马上伸爪，把他掐死。

老威：紧张到这一步，还不如投案自首算了。

崔志雄：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就这命，怕活人不怕死人。

老威：你在太平间呆了多久？

崔志雄：比人的一辈子还长。当我觉得该起来的时候，差不多已冻僵了。

老威：你没表，怎么算时间？

崔志雄：数自己的心跳，快的时候三下一秒，慢下来就一下一秒，后来，我居然数睡着了。醒时，隔壁有了动静，是碗筷的声音，守灵人用晚餐了。这惊动了我的胃，它一抽一抽地疼。好几次，我都想起来活动活动，转移胃疼，但又忍住了。

守灵人大约对酌了两个小时的酒，临睡前还吼了几腔川剧，“隔壁杀鸡又炖膀，我俩口子还在屋头唱卧龙岗”之类。

老威：你还记得住戏文？

崔志雄：不晓得咋搞的，就记住了。从太平间出来可能是半夜 12 点多钟。转着找医院内部食堂，正卖夜班饭，两个护士打了饭出来，有说有笑的。我捡起一块小石子，躲在一簇夹竹桃后面甩过去，正中手腕。“谁？！”护士惊叫，饭盒翻下地。两个小姐折回去叫人，我急忙逃之夭夭，在这地盘，没一处是安全的，我只好又回太平间躲了一会儿。的确夜深人静才出来，碰见保温桶，喝了一点热水。这是我出逃以来喝的头一回水，很舒服。可当我找到几小时前打翻在路中的饭菜，抓起来吞下去时，肚子一阵剧痛。我蹲着缓了几分钟，才溜进住院大楼。我七层楼全上了，在返回五楼时，终于瞅见值班室没人，就溜进去，取了一套白大褂，当然，帽子、口罩、听诊器全要。接着，我这个假冒医生就直接去二楼妇产科，借口查房，轻而易举地连搞几批油水，加起来有 1000 多元钱，并且把蛋糕、奶粉、水果撑了个饱。医院隔壁是军医大学，当我在学员宿舍把军装弄到手，天都快亮了。有一辆大客车停在电教中心前，我寻了一节废铁丝，弯成两股，捅进锁孔开门上去，就在后排拉平躺倒。我太困，一下子就不省人事，直到被人掀起来，挤到角落。太阳明晃晃的，车上装满了兵，旁边的军官问我：“哪个班？”我答不上，就随手朝窗外指，“电教？”他又问，我点点头。听车上的谈话，我才想起是礼拜天。客车一路畅通无阻地开到市中心区解放碑，我又看见了成堆成堆的漂亮女娃儿，我又尝到了自由！

老威：你居然敢爬到军车上睡觉，就不怕被抓？

崔志雄：医院不敢回，街又不敢上，在军校里晃荡更危险，我没当过兵，又是生面孔，一盘问就露底了，军车是唯一的好去处。

老威：以后呢？

崔志雄：以后就全国流窜，变本加厉地偷。偷到后来，钱多得用不完，就想隐居，可刚在北海买了房子住下来，又觉得不踏实。做生意更不踏实，我不喜欢和商人打交道，没情趣。真的，一闲下来脑子就乱转，连梦里都站满了警察。唉，人活在世上，除了享乐，就是为了在本行上有所造诣，我已达到本行的最高境界，再要我转行干别的，肯定提不起神。

老威：你成过家么？

崔志雄：我有过情人，她喜欢童安格的歌，我也喜欢，我想娶她，但不能。因为情人可以不晓得你的职业，而老婆必须知根知底，这也是中国传统。

老威：你这次是怎么落网的？

崔志雄：脱逃已两年多，我以为不会有事了，就回到重庆，与道上的朋友打赌，把某某保险柜厂财务室的保险柜给撬了。不瞒你说，我是从正门进的，从发现到截断外部报警系统，还不到 10 分钟；开保险柜，8 分钟。我感觉嘀哒响了一下，就从缝里伸入刀片，割断连着柜门的警报线。他妈的，这就是所谓红外线感光双保险！得手太容易了，这种想法使我的弦松下来，就背靠保险柜嚼口香糖，还吹出了几个大泡泡，开门取钱时，我已经没丝毫乐趣。这次是 50 万块，还有几捆股票，我一时兴起，就点火一张一张烧，还没烧完一捆股票，就被人发觉了。落网时我还微笑了一下，一颗心从高处朝下坠、坠，终于踏实了。我站起来，把手伸进手铐，到站了，我说：“咱们走吧。”

老威：现在你钉上了死刑犯的铁镣子，还感到踏实么？

崔志雄：我经常想起两年前的那次逃跑，太神了。然而，人是逃不掉命的，我就这命，身体自由了，心也不自由。我欠这个社会的太多，却没用偷来的钱，去帮助任何一个需要这些钱的人，例如失学儿童、下岗工人、下等妓女等等，这同贪官污吏有啥区别？罢了！你是文人，晓得干啥都要有激情，我已失去活下去的激情，你呢？

老威：我？天晓得。

03 百岁和尚灯宽

采访缘起：2003 年的一个阳春下午，我随友人王海文到离成都 60 公里左右的崇庆凤栖山游玩，不禁被树荫深处的一座源自隋代的千年佛庙深深吸引。

俗称“古寺”的光严禅院依山势而建，分上古寺和下古寺，信众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殿宇恢宏、香火兴旺的下古寺，而佛法的魂魄却在断柱残塔、荒草凄凄的上古寺。

晚钟低回，天色朦胧，我在恋恋不舍地出门之际，听说了一百零三岁的灯宽法师。从明朝永乐年间的法仁法师往下数，历 600 余年，他是寺里的第八代住持。

老人家在成都治病，一直没回来。而我被内心的冲动所驱使，一次次盲目往返，对寺中掌故逐渐烂熟于心。

2003 年 9 月 18 日下午，我领着来自法国的摄影师高磊，第五次到古寺，拍了许多与环境水乳交融的个人照片，准备用在即将出版的法译《中国冤案录》里——缘分却悄然而至——我们在即将离开时遇见灯宽和尚的侄儿陈全。我随便问了声：“灯宽在么？”陈全答：“在。”

大喜过望，我们随陈全居士入“四法界”院内的一间普通僧室，拜望了正坐沙发上看电视的灯宽，他戴着毛线帽子，小眼睛，长相平凡，由于年老怕冷，还用着电热烤火器。

在为我们摩顶祝福后，高磊迫不及待地拍了几个胶卷。灯宽耳背，提问需贴着他的耳门大声呼叫，所以第一次访谈借助了陈全的“翻译”和解说。一个多星期后，我再次登门拜佛，由于已混成熟脸，就不再顾及礼数。

在我一声声贴耳呼号中，灯宽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他的一生，其间抽了两次叶子烟，吮了一次牛奶。我喜欢他吸烟叶、磕烟灰的举动，这个乡下老头儿，我几乎忘了他是个蒙冤多年，几乎万劫不复的高僧。

他在自己的佛堂里，供奉邓小平的像，他说没有邓小平，古寺的香火就绝了。

我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也点头称是：“佛法在心，你说得没错。”接着，他像许多和尚一样，宣扬积德行善。“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和睦地理，”他说。“还有爱护众生。比如蚊虫要吸你的血，就让它吸个饱。千万莫打耗子，耗子是吉祥物，它要吃点喝点，你就用个碗喂它嘛。嘿，耗子经常钻我的被窝，贴着我的下巴睡，它冷嘛，它缺亲情嘛，它是我的儿女嘛。有一回，这个淘气的儿子，把我用了多年的佛珠拖跑了，我就吓它说：‘耗儿耗儿，佛珠又吃不得，你偷它干啥？再不送回来，我就用灭鼠灵毒你了。’耗子在洞里听见了，一会儿就把珠子还回我脚边。”

我哑然失笑。并在合十祝祷之际，再次敲定下次访问的时间。我明白，百岁老人的故事流逝得太快、太快……。

灯宽： 施主来自何方？

老威： 成都。这位摄影师从法国来。

灯宽： 哦。

老威： 我到过五次古寺……

灯宽： 哦。

老威： 天擦黑，庙门也快关了，我正在说：“今天见不着灯宽老和尚……”

灯宽： 哦。

老威： 您的侄儿陈全出现了……

灯宽： 哦。

老威： 您的气色不错……

灯宽： 哦。我在成都春熙路住了两个月院，刚回古寺。不算啥病，就是岁数太高，躯壳有点不听使唤。前列腺肥大，堵塞尿道，小便不出来。

老威： 目前还正常吧？

灯宽：下面接一根导尿管。过一晌，精神养得足些了，再去开一刀。

老威：饮食呢？

灯宽：随时想起就吮两口，都是稀的。稀饭、鸡汤、鱼汤、菜汤、果汁、牛奶，外加输液瓶，有时一天最多 8 顿，像婴儿吃奶。

老威：婴儿吃奶？老还小嘛。

灯宽：阿弥陀佛。如今我腿脚不灵便，每日除了床上躺一躺，就是坐在这儿，一边数珠子念佛，一边想着自己这一生。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竟不知身处何地何时？何人在身边？哦，我灯宽生于清朝光绪年间，公历 1900 年，俗名陈锦荣，7 岁就到上古寺出家。我的师父祖润法师是远近闻名的高僧大德，他不仅教修行，还请秀才到庙里教小沙弥们识字读书，历时几年，替我打下了牢固的文化基础。

民国 17 年，师父让我步行 100 多里，到成都文殊院受戒；随后入禅安大和尚主办的空灵佛学院（又称四川佛学院）做学生；民国 19 年毕业，到新都宝光寺修行，师父师爷爷都当过本寺方丈。再后来，转入草堂寺、昭觉寺研修佛法，与众多高僧大德朝夕相处，耳濡目染，逐渐心明眼亮。

民国 33 年，我结束游学回到古寺，任知客师，抗战胜利的次年，升任主持，直到解放。

老威：您是世纪老人，以 1949 年划线，您的一生被裁成了大致对称的两段。而你就这么三言两语，把前半生给潦草打发了？

灯宽：从 100 年的这头望那头，三言两语足矣。要不，三天三夜，这口气落了，也说不完。一位师父就够写一部书，使我终身受益的有几十位师父，写不了，也没法说。

老威：怪我多嘴，法师您随意吧。

灯宽：1950 年解放，接着闹土地改革。有一天，工作组和村里贫下中农们突然涌进庙门，召开群众大会，我被揪出来，划为寺庙大地主和四类份子，接受批斗。他们剥下我的袈裟，一个接一个

上台揭发我的罪行，除了不劳而获和封建迷信，还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工作组长不时插话，上纲上线，群众的情绪就越发激昂，口号喊得惊天动地，仿佛不杀我这吃斋念佛的出家人不足以平民愤。

全寺几十名和尚也受我的连累，被宣布为地主，押出来陪斗。后来，批斗会变成了打斗会，几百贫下中农轰地揪住几十个和尚，吐唾沫、煽耳光。

我被民兵捆绑起来，一直拷打到深夜。根据当时的政策，庙里所有的财产没收，寺产（包括庙宇以及周围近千亩近千亩原始森林和几百亩土地）收归国有。

老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寺庙地主”。

灯宽：我当时也懵了，因为出家人四大皆空，地方上改朝换代的俗事，不会去过问。况且这川西平原有上百座佛庙，都是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衣钵传承，没有哪一个住持、方丈认为寺庙是自己的财产。

老威：对，既无私产，哪来的地主？

灯宽：单道这古寺，就始建于隋朝，隋文帝在青城山脉敕封了三十六庵，以常乐寺（古寺原名）为主庙，有上千僧人的规模。后经历代沧桑变故，至明朝，才被朱元璋、朱棣两代君主正式敕名为“光严禅院”。自朱元璋的幺叔悟空和尚往下数，经 600 年，我是本寺第八代住持，可谓因果转回。

老威：您能想得通？

灯宽：你只想自己，肯定不通。因为在旧社会，当和尚的绝大部分是穷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干脆就入庙念佛，图个六根清净。可一转眼，成了地主！一天福没享就受这个报应，冤不冤？佛事取缔了，别提念经，就是你的眼睛一闭上或嘴巴一咕嘟，就会被检举上去，当作“封建迷信屡教不改”，挨斗挨打。从土改前到 61 年遣返回原籍，我起码被斗过几百次，有时白天种地，晚上挨斗，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老威：您这头“死老虎”被打了十多年，有啥劲？罪状数来数

去就那几条。

灯宽：后来就不数罪状，上来就打，就吊，寒鸭凫水可晓得？就是把衣裤刚光，手脚反剪着吊起来。熬不过十分钟，人就昏死了。我的右臂吊脱臼过，至今抬起来都吃力。大冬天，一桶桶冷水从头顶往下灌。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无药医。”那年头就这样子。

老威：您是高僧，能熬得住不偷偷念经？

灯宽：只能在心里念。太难了，袈裟、衣袍、经书都没收、烧毁，连钵也砸了。他们强迫我交 100 个金碗，因为有和尚揭发我私藏金银财宝，其中有 100 个金碗。我连吃饭家伙都是寺里的，哪有一寸金？交不出，他们就吊打，于是我只好领他们去斋房找金碗，果然在墙角码了 100 个，原来是土海碗，一个能装一斤大米，和尚们因此叫“斤碗”。

老威：善哉善哉。

灯宽：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前世的孽报，我不承受，总会落在别人头上，所以到后来，我就习惯了，逆来顺受，不放弃内心的善念。立地也能成佛。

老威：我看过一些历史资料，知道与你经历相似的高僧，仅四川就有好几十。成都文殊院的宽霖法师，在土改中被“革命群众”严刑拷打，手脚砸断，牙齿脱落，直到被折磨得瘫在地上，昏迷不醒，幸而抢救及时，才捡得一条命；昭觉寺的清定法师，因早年投奔黄埔军校等历史问题，在 1955 年肃反运动中被判无期徒刑，渡过 20 年的铁窗生涯，1975 年出狱时已 73 岁；重庆狮子山慈云寺住持惟贤法师，因创办佛学院，于 1954 年蒙冤入狱，坐牢近 27 年；崇庆县永圣寺的普云法师，土改时被撵出寺院，1957 年又被划为右派，直到 21 年后方重着僧衣……随着住寺高僧的“沦入凡尘”，几乎所有和尚都弃庙还俗，并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灯宽：这是孽报，从 50 年解放到 78 年宗教政策落实之前，这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孽报，整整 28 年，寺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和尚。

老威：可是佛教协会还在。

灯宽：和尚归生产队管，不归佛协管。和尚扫地出门，农民住进庙，世象颠倒了。

到了 1958 年大炼钢铁、不管是和尚还是农民，都不准私自开伙。公共食堂设在半山腰的梅花寨，全生产队的人都去吃。吃完了，就上山挖铁矿，我听天由命，积极报名，生产队长就批准我和十几个和尚参加炼铁。庙里的残垣断壁间也架起了土法上马的高炉。从古到今，这凤栖山上就不产铁，所以当地人不晓得辨认。上面派来个巡回技术员，按图索骥教了几口烟功夫，社员们就摩拳擦掌上山，胡乱捡些沉甸甸的黑石头回来朝炉膛里添。家家户户的锅、铲、瓢、盆、锁、环都搜去炼。和尚没家，为了不当落后分子，就像狗一样，自己耸着鼻子，嗅庙里的香炉、化钱炉、钟、磬、锁、香案的镶边、飞檐翘角上的古铜色，总之，凡是沾点金属的东西都撬的撬、刮的刮、砸的砸，入炉为净。架炭猛熬几昼夜，结果出来的都是怪头怪脑的砣砣。

老威：什么砣砣？

灯宽：有点像粘了许多石头的马蜂窝，凝固冷却以后，用锤子一砸，就全散成黑铁渣渣。大伙就劳神费力做这种事，一个个像喝醉了酒。我呢，被民兵押着，背石头，背炭，呼哧呼哧拉风箱，就是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哑巴。由于从小师教很严，站如松，坐如钟，有童子功护身，所以经得整。其他人都累瘫了，饿绵了，我还能弓步扎在高炉旁，一来一往拉风箱。

老威：当时你快 60 了吧？

灯宽：可二、三十岁的人都不如我，社员们私底下给我封了个绰号叫“无根山上的钢铁战士”。

老威：这么说，你已经适应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

灯宽：我是追求进步的，但别人不答应。铁炼完了，食堂又只能吃个小半饱，于是生产队就开会斗四类分子作为消遣，没时间没章法，想起就斗。中国这么大，可有户口管着，没地方逃。每次被

打得无缝可钻时，我就记起古寺的一段掌故：朱元璋的重孙，明朝的建文帝推行削藩，四太子燕王朱棣就以“清君侧”为由，发动了长达四年的皇位争夺战，结果朱棣夺位登基，成为明成祖，国号“永乐”；而失势的建文帝却转眼失踪，数年后，摇身变为这凤栖山中古寺的和尚。

又过了数年，明成祖派出的东厂特务暗访出废帝下落，火速回报。可就在其下手前夜，建文帝再次失踪，只在其禅房墙壁留下一首诗：“沦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河无声水自流。常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气收；青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东厂特务把壁上遗诗抄下，回禀明成祖；成祖吟罢，不禁潸然泪下，随之挥挥袍袖道：“任他去吧。”于是东厂停止了追杀。

老威：可叹可叹。

灯宽：明朝苛政严刑，东厂和锦衣卫遍及天下，可废帝仍能乘乱藏身于古寺；而如今，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和尚，却想躲也躲不开，孽报嘛。

老威：共产教就是要灭佛灭心，灭一切宗教。

灯宽：灭佛？不可能。谁也做不到。因为佛是水，是空气，是善，是忍让，是人的慧根，国灭了，佛也灭不了。否则我灯宽活不了这么长。

老威：是么？

灯宽：有个姓汪的贫农老太婆，就住在这半山腰，她接济了我好几年。我是敌人，她不敢公开接近，就在地边或田坎假装歇气，用镰刀敲几下，这样，正埋头种地的我就晓得啥意思了。她前脚走，我后脚就扑过去，抓起留在那儿的包谷馍馍就啃。那是60年正月，生产队已经饿死人了，她却从牙缝里抠下口粮给我，观音菩萨显身嘛。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念经超度汪婆婆。到了61年，四类份子饿死大半，政府干脆将我遣返，隔房侄儿接我回原籍崇庆县锦江公社，名义上是还俗了，可每日仍不忘着僧衣打坐、念佛。如此虚度似水光阴，还以为这辈子只能干农活、受改造，做没有庙的野和尚，

不料山水一转到 1978 年，就有个外乡人跑来对我说，宗教政策已经恢复，可以公开信佛了。

虽然半信半疑，但眼前刹那亮了一道光，这是佛祖在开悟我了。白天不敢露声色，因为阶级斗争还在搞，生产队一旦晓得封建迷信死灰复燃，肯定又要开批斗会。只好半夜三更爬起床，把脑壳伸出门打探一番，才上路。我跑一阵，走一阵，一百多里，第二天中午就到成都。直接投文殊院，里面已聚了几十位破落和尚，都是川西坝子各寺各庙的方丈、主持，各自提起九死一生的“农禅”改造经历，唏嘘不已。

我在文殊院住了几年，任金刚上士，主持佛事。由于放焰口（超度灵魂）的本事过硬，在信徒中逐渐有了感召力。1984 年阴历 7 月 15，我被迎回光严禅院，重继香火，山上山下，聚了一万多人，鞭炮响了一阵又一阵，那炮烟像雾一样罩住古寺，久久不散；更有唢呐、锣鼓助兴，真比过节还要隆重热闹。

老威：这一年，您已经 84 岁，算一位能洞穿世象的高僧了，从辉煌的云烟中回首过去，您的得失如何？

灯宽：来不及想，因为我已风烛残年，而古寺处处残垣断壁，荒草凄凄，连一间不漏雨的屋都没有。我和师弟灯可领着几十和尚、居士，三个人挤一张床，或者就铺油布睡地下，蛇和耗子经常钻进来，有弟子害怕，我就说：“耗子也冷嘛，让它拱进被窝睡。”我从小与耗子有缘，哪怕是脱了毛的老耗子，我也经常用心窝暖它，用我的饭碗喂它……唉，这辈子挨了几百次批斗，各种苦头都吃了，可人还在，慈悲心肠还在嘛……人还在有啥用？无力回天嘛。

老威：法师不必感叹，这千年古寺能恢复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灯宽：施主你误解了。你这年纪，当然不晓得原先古寺的规模。上古寺去过了吧？

老威：去过了。

灯宽：接引殿、韦陀庙都是在废墟上重建的。在燃灯殿上头，是历代祖师的塔林。

塔林正中是悟空祖师——明太祖朱元璋的幺叔，他早年就看空

红尘，虔心向佛；在永乐皇帝登基，废帝朱允文潜逃以后，他从印度、西藏云游至此，豁然开朗，遂剃度出家，法号“法仁”，赐号“悟空”。由于法仁住持的密宗修行博大精深，在他成正果、盘膝圆寂后，肉身被供入“悟空灵塔”，历 550 余年，不朽不坏，为光严禅院之头号镇寺佛宝。

老威：我在悟空灵塔前至少站了一刻钟，神龛是空的，塔身颓败，连两边的对联都模糊了。

灯宽：两边的对联是“从今日回头大悟，是浮云过眼皆空”，联隐“悟空”。土改时，村上的民兵连长率领一彪人马进庙破除迷信，从下古寺砸到上古寺，最后来到灵塔前。民兵连长举起日本三八枪刺刀，喊了一声杀，照准悟空祖师的肉身捅过去。这中了邪魔的可怜的人连戳了几十下，肉身就烂了。一伙人糟蹋够了，留下满地零碎在塔前就走，到了下午，当他们押着和尚去“胜利成果”跟前受教育时，肉身早风化成一滩水，浸入了地里，一些干干净净的碎白骨摆在哪儿。我强忍着眼泪，在下半夜上山，收拾祖师的遗骨。据说祖师有西藏人的血统，身材高大，骨头比普通人长得多，旧社会，当地人都称他的肉身为“蛮娘娘”。我心痛，但不能说，只能偷偷用青篾筐把遗骨一点不漏地装好，没法藏，就花了很大力气吊在观音殿的梁上，以为万无一失。

不料到了文革，天下都在造反，破四旧，古寺的大雄宝殿、观音殿、财神、韦陀、接引、燃灯诸庙，全遭毁坏。由于悟空和尚主持本寺，他的侄孙——明朝永乐皇帝敕封了诸多佛宝，其中包括《洪武南藏》孤本经书一部，共 678 函，7000 多卷，总重量有三吨多；皇锅一对，永乐帝亲赐，为生铁铸造，高约 1·65 米，直径为 2·1 米，可供 2000 余和尚吃饭，此皇器只在传戒或重大佛事活动时使用；半副鸾驾，为皇后、王爷出宫时开道的标志之物；龙凤旗，帝、后出宫的开道之物；琉璃瓦大殿 5 座；明太祖朱元璋的御书“纯正不曲”等等。

老威：都毁了？！

灯宽：除了《洪武南藏》被崇庆第一任县长姚体信组织人马，

在解放初期运到成都保存外，其它都难逃劫数。生铁皇锅在 1958 年大炼钢铁时被砸烂，送去回炉了，皇锅太大太厚，砸它时，一窝蜂上来几十个壮劳力，在灶台上下，抡起二锤，像开山打石头，那一阵阵回响，隔几座山都能听见。

要炼化这些古铁，不容易，满山遍野的人，把树砍运回来，烧成炭，才能炼钢铁，因为炭火的温度比柴火高几百度。这周围的古林子，从小陪我念经学佛，都是些名贵树种，银杏、楠木、红豆木、古柏、古杉等等，近千亩，都砍的砍，伐的伐，拿来炼铁。现在你能看见的那棵千年古楠，就因为长在峭壁上，人够不着，才没砍成。来的人都夸它漂亮，千载难遇，却不晓得在寺中七棵三人合抱的古楠中，它是最丑最不成材的。

接着是文革，连摆摆样子的和尚都不准存在了。观音殿被拆，我吊在正梁上的祖师遗骨自然摔下来，失踪了。有一次，我跑回来躲在山上，远远望见几座琉璃瓦盖的殿顶，密密麻麻坐满了人，啥子“战斗队”的红旗在迎风飘扬，那些人排排坐着，一脚一脚朝下蹬瓦。还唱歌，仿佛那些皇帝亲赐的几百年古瓦的破碎声在伴奏，令他们越蹬越高兴。

瓦蹬空了，殿顶就亮了出来，人们又坠下地砸佛像，用绳子套住大雄宝殿的柱子，一根接一根地拉。几十百把人，喊着号子，舞着小红旗，一起使劲，从上午拉到天黑，把 8 根柱子都拉垮了，摔在台阶上，断成好几节。这些石柱都是古迹，现在都摆在山上，柱身有各朝各代名家题的楹联，最晚的是四川第一代督军尹昌衡的对联，看以后能不能恢复。

柱子倒了，大雄宝殿轰地塌下来……我也看不下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还有数不尽的鸾驾、御书、楹联、佛偈、诗词都没了。上古寺整个没了，下古寺只剩些残墙断壁。直到 84 年以后，才靠上万皈依弟子出钱出力，重塑菩萨，建庙宇，一点点恢复，总算成了些气候。据说恢复半座古寺也要 2000 多万。

老威：您肯定能功德圆满。

灯宽：众人添柴火焰高，寺里功德碑上，已添了几千名字，都

捐 100 元以上，有个当公司老板的居士，为请接引殿的玉佛，捐资 30 万。其它收入，如香火钱、茶点钱、长明灯钱也过得去。

老威：和尚纳税么？

灯宽：如果是正常的税收，古寺也给得起，可世风日下，大小贪官都想到和尚脑壳上拔毛。我们归宗教局管，而宗教局又是统战部的下属，这些当官的，看见别的部门生财有道早就眼红了，你不上供，他就威胁要开除你的和尚资格，甚至卖掉庙子。不少规模小的寺庙，就被他们以十几万的价格承包给私人。

老威：您是百岁高僧，他们未必敢到您头上拔毛。

灯宽：无神论者啥都敢。告诉你，连统战部的轿车，都是和尚出钱买的，一个庙至少捐 5000 以上。有一次，县宗教局长驾到，我亲自把他请到客堂，奉上茶点，不料他把门一关，就跟我拍桌子，指头都戳拢鼻子尖了。他吼：“你马上给我拿 10 万元出来修路！”我心里明白，修公路的钱国家早已拨了 200 万，被他们分掉大头，如今添不满亏空，只好打和尚的主意。

老威：你可以告他。

灯宽：出家人慈悲忍让为本。我只好先答应说：“等化到缘再说。”他立马命令：

“给个期限！”我说：“今天化齐今天给，明天化齐明天给，永远化齐就永远给。”局长一听，下不来台，就要日我妈，结果惊动了门外的几十个居士，他们冲进来，和局长对骂，赶他走。罪过罪过。

其实，只要贪官胃口不是太大，我都会满足，比如一伙人到寺里打麻将，输了钱，就找我老和尚借，两百嫌少，起码 500，或 800、1000，借了就借了，从不提还。闹得乌烟瘴气，临走前还对我双手合十，念声“阿弥陀佛”。唉，罢了，宗教局管佛庙、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一手遮天，局长就自称是“所有神仙的父母官。”

老威：岂有此理！

灯宽：历朝历代，官再贪，皇帝再昏，也没听说要在和尚脑壳

上拔毛。

老威：我也是头次听说。

灯宽：所以除掉寺里的各项开支，到底能拿多少钱去重建庙子，我实在没数，唉，随缘吧。

老威：只能随缘了。

灯宽：施主是有心人，我送你一张悟空祖师肉身照片。拍这张像的人法名“续空”，家住山脚古镇街子场。40年代，他扛着街子场的第一台箱式镁光相机去灵塔拍回这张法照，立即轰动一时。以后，他把法照当作通行证，经打箭炉（康定）入藏区，往来多次贩卖鸦片烟，均畅通无阻。因为藏民笃信佛教，尤其崇拜密宗高僧，一见照片，立即五体投地。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不断有人追查，审他，打他，吊他，一关黑屋就是好多年，可他宁死也不承认这回事。直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也许是天良发现，他才让家人去锦江公社找“师父”。待我气喘喘地赶到，他瞪着眼，就是不落那口气。直到我捏住他的手，叫声“续空”，他的泪水才扑簌簌地下来。慢慢松开拳头，把那张包了许多层棉花和绒纸的小底片交给我，连师父也没喊一声就去了。孽缘呀。

老威：阿弥陀佛，愿这位摄影师的在天之灵安息。

灯宽：一转眼，连这张法照也有60多年了。

老威：但是上面的悟空祖师，面容慈祥，两耳垂肩，双目炯炯有神，超凡入圣。再添上这个摄影师的故事……这就是不朽。

灯宽：阿弥陀佛。

老威：阿弥陀佛。法师，这几个月，我进出了五趟，古寺的每个角落几乎都看了，恢复得不错，特别是您，称得上这方圆百里乃至川西平原的第一件佛宝。

灯宽：施主的玩笑开得过了。藏经楼看过了吧？

老威：外观看过了，白粉壁，稚朴的瓦盖，有些像唐代或日本京都的建筑风格。壁间“藏经楼”三个字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所题，算古寺的一件上乘文物，从书法的风骨上，远远盖过朱元璋

的“纯正不曲”和康熙帝的“光严禅院”两件御书。

灯宽：于右任先生是民国 34 年在青城山里，听佛门中人偶然提起《洪武南藏》孤本的下落，才兴致勃勃地赶到古寺的。他上藏经楼读了几天经，几乎足不出户。右任先生美髯齐胸，二目不怒而威，俨然一幅大儒的风范，他应前任住持之邀，龙飞凤舞，一挥而就，写下“藏经楼”三个草字，口称“难得！难得！”在他之前，国民党省主席林森也坐滑竿来古寺检视过楼中《洪武南藏》。

老威：若蒙法师应允，我也想步后尘入楼拜拜经。

灯宽：如今经书已不存寺中。

老威：毁了？！

灯宽：阿弥陀佛。1951 年初夏，崇庆县首任县长姚体信根据县志上的记载，亲临古寺，直奔藏经楼，出来就表示：在众僧人面临遣散，住持灯宽已在土改中划为大地主，遭受管制的无序情况下，寺中已无人力财力保存如此卷秩浩繁的国宝。姚县长是知识分子，他当即命令封闭藏经楼，将经书打包装箱，随之派人请省里的文物专家鉴定。那时无公路，县里就征召了上百挑夫，把这重达三吨的佛典一路担到成都，入省图书馆存放，至今已 52 年。

老威：幸好搬走了。

灯宽：这姚县长是护法金刚转世吧，一般当官的可没这种觉悟。《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敕令刻造，至洪武 36 年（1403）完成。历时 31 年，共 1600 部，7000 余卷，有几百人参与了点校、分类、刻印和装帧，大功告成后却只印了两部。一部在永乐年间毁于金陵的一场火灾，而另一部，直到 1930 年，才被外界披露出来。古寺因悟空肉身和此经，一时名气远播，徒步来寺中求开眼界的文人骚客，源源不断。

老威：古寺条件简陋，如何保证这经书几百年不蛀不霉不变质呢？

灯宽：几百年来，每年翻晒一次，动员全庙和尚。我 7 岁出家，只要在庙中，就年年参加晒经。方法极原始，不能用手，只能用竹片，一页一页地翻，不能重，也不能漏。晒透后，再将防蛀的叶子

烟夹在书中。这是寺里代代相传的礼拜仪轨，仅叶子烟就要耗几百斤。

老威：现在没有毁经灭佛的危险，可以把藏经请回来了。

灯宽：从前是镇寺之宝，而眼下是国宝，任何转移都要请示国务院。

老威：看一眼也不行？

灯宽：有管理制度，连我都无缘重温，但出过意外。彭县一个贼和尚，叫某某，竟花 12 万买通省图书馆，把《洪武南藏》一次性盗版，偷运到海外，赚了大钱。为这事我和弟子们找过许多政府部门，包括省委办公厅，我一再声明藏经的传统主权在古寺，但没人耐烦听。

老威：我晓得省图书馆搬过几次家，那些管理人员既不信佛，又不会往书中夹烟叶，几十年没人翻晒的藏经命运到底如何，迷雾重重啊。

灯宽：万物皆有因果，罢了。

老威：虽说“罢了”，但法师您在这百余年的光阴中，似乎坡坎多坦途少……这到底是谁造成的？恐怕不能单用“孽报”二字来了结吧？

灯宽：直到如今，我也不能说成了正果。佛法无边，我只能学，只能战战兢兢去接近那轮回之道。学佛就得戒嗔，戒怒，戒怨，把众生当作活佛。历代皇上，有兴佛的，有灭佛的，还有逢佛杀佛的，何解？民国时期有个普钦法师，曾经在观音菩萨成道日晚上，割开胸脯肌肉，把灯芯草插进去，并用面团做成茶碗大的灯柱，灌满菜油，然后点燃。这就是所谓“燃心供佛”。在大雄宝殿内，灯焰霍霍有声，窜高四尺许，直达佛晓。普钦法师被烧焦了，肺腑都裸露出来，却居然被抢救活了，康复如初；后来，普钦又发愿刺舌血书写《严华经》，刺了 7 年写了 7 年，终于大功告成；到最后，他干脆在大殿僧众的面前，燃指供佛，将左手无名指烧成灰烬。

老威：这是自虐。

灯宽：舍我供佛，与佛主舍身饲虎一脉相承；毛泽东在另一端，灭佛存佛，他不灭佛，现在会有这么多人信佛么？他说：“我要人民享受电灯电话。”现在连我老和尚也有电灯电话了。我当地主时，许多人打过我斗过我，几十年过去，他们的儿孙穷，念不起书，我就布施，拿钱供他们念书；病了，拿钱去看病；反正我的钱也是别人供奉的，留在手里就是祸，佛主要怪罪，但不会说。我与和尚们在斋堂，谁做错了，我心里清清楚楚，但我不会说，不会嗔和怨。

生从何来，死归何处；无名无处，去西方极乐，极乐又归何处？所以，众生也，父母也，打我斗争我，相当于父母教育我。

你打了，嗔了，怒了，疯狂了，佛报就落在你身上，你代我受了。比如那个民兵连长，用日本三八刺刀捅悟空祖师肉身，头一刀戳在胯根，几个月后，也就在胯根，在同一个地方，生了一个大疮，奇臭，并且越烂越深。求遍天下名医，没治，整个下身烂掉了，人也死得很难受。又过了几年，连长的老婆娃娃也接二连三地死，最后包括亲戚舅子都死光了，绝户了。

我听说连长一门几代都绝了，并不高兴。我怜悯，为他们念超生经——

他们不绝，这孽报或许就落在我这儿。因为我的上一辈，上上一辈做过啥，我不清楚。

04 老右派冯中慈

采访缘起：1997年8月22日上午，烈日当空，我横穿尘土飞扬的大马路，走进成都西门车站附近一个叫“杀牛巷”的地方，按门牌号码上三楼，找到了湮没无闻的老右派冯中慈先生。费了一番唇舌，终于促成这次采访。

冯先生骨瘦如材，但神清气朗，他时年65岁，其妻文馨与之同龄；老俩口育有一儿一女，均已自立门户。

因斗室如蒸笼，采访中，我们均汗如雨下；冯先生两次脱下背心，拧出至少两茶碗汗水。我不禁劝其赤膊上阵，遭婉言谢绝。可见读书人的斯文本色不改。

值得一提的是，曾为大学团委书记的冯先生，现在与曾是国民党老军人的廖恩泽先生为邻，双方过从甚密，似乎历史中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冯中慈：我听老友廖恩泽介绍过你的情况，可还是不明了你的来意。右派中名人不少，且经历也都非常曲折动人，你干啥不去采访呢？你是诗人，对《星星》诗刊的历史肯定清楚，白航，流沙河，石天河，白峡，这当初的四个右派编辑都健在，我建议你去采访他们。

老威：我花了一番工夫才找到你，当然不可能空手而归。这样吧，我们随便聊聊，您愿意说到哪算哪，这不算正式采访，我也没资格对这段历史做啥评说。

冯中慈：我没啥好说的。

老威：就从《星星》诗刊说起吧，80年代初，《星星》曾开辟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栏目：“星星与我”。作者都是57年受星星株连而当上右派的诗歌爱好者。

冯中慈：我不懂诗。

老威：但对当时的政治气候陡变还是有感触吧？我查阅了有关

资料，了解到 57 年上半年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有关。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提倡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由此而引发的文化“解冻”也逐渐波及到我国。而一份普通的诗刊的兴衰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冯中慈：你好像在背书。

老威：反右斗争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当然除了你们的回顾，我只有背书。哦，我刚才说到“星星与我”，我就是在这个栏目中，而不是在《牧马人》那样可笑的电影中，看到不少无辜右派的真实遭际。有的人仅仅因为写信给编辑部，表达了自己对某首诗的赞许，或对某种左倾诗评的反批评，就莫名其妙的成了右派。可以说，这本不会说话的小诗刊的命运改变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的命运。我们这代人，根本想象不出，还会有人为保存一套诗刊，一辈子饱经蹂躏，并且在临终时叮嘱后人：要与这套刊物同进火葬场！

冯中慈：你觉得很离奇吧？但在那个时代，就太平常了。

老威：您是有感而发吧？

冯中慈：不，我当右派与这些无关。当时我思想积极，与党组织靠的很紧，加上我是苦孩子出身，如果政治需要，我可以立即站出来，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老威：您不是开玩笑吧？

冯中慈：我是学校团委书记，大学二年级就入了党，反右开始时，我们正准备毕业分配，我率先倡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组织上找我谈话，甚至透露由于反右斗争的需要，准备让我留任校刊编辑，从反动派手里夺回这个言论阵地。

老威：我明白了，您可能是左的过火，激起了众怒，于是在一致声讨下从极左滑到极右。

冯中慈：再次说明，我当右派与运动无关。现在想起来，不管在哪场运动中我都是注定要倒霉的，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

老威：直说吧，您为什么当右派？

冯中慈：为了私生活。

老威：您有……作风问题？

冯中慈：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关于“作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解释。现在的作风问题，过去就够枪毙的资格了。

老威：谁被枪毙了？

冯中慈：打个比方罢了。你这么憨厚的人，还当记者，缺了点悟性。

老威：我不是记者。你说私生活不是作风问题，又走什么问题？

冯中慈：听我讲吧，小伙子，我爱人的家庭成分不好。

老威：地主？

冯中慈：不是一般的地主，而是官僚地主。她的一个叔叔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禁烟局长，在解放初期被镇压了；她的爸爸娶过一位洋学生做姨太太，因此，她的家庭包袱是很重的。在学校，她只能一门心思扑在功课上，而在个人生活中，她郁郁寡欢。没有有任何朋友。这一点恰好非常吸引我，我在集体中如鱼得水，过得太热闹了。

老威：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当右派。您爱人在政治上与您不相配，组织出面干涉等等，我都能想到。因为我姐姐在文革期间，曾经与一位解放军的连长谈恋爱，终因我家成分地主，社会关系复杂而告吹。这种外调内查的政审制度长期粗暴地践踏个人生活——人们已司空见惯，并且认可，因为组织是不会错的。但是，这就是你的右派依据吗？

冯中慈：对。开始我是为了做政治思想工作接近她我发觉她与她父亲的姨太太关系很深，就一再警告她要站稳立场。后来，她一声不吭地把我带到一条深巷里，那女人正在巷尾洗衣服，长长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她站起来对我微笑，毫无血色的脸上有一种哀婉的美。她进了院子，就着这种哀婉的美弹了弹落满灰尘的钢琴，她似乎在有意讨好我，讨好当时的大好形势，所以弹的曲子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支已经被我们合唱得滚瓜烂熟的革命歌曲，经她那纤细的指头一弄，完全变了，发霉了，但是，你觉得那样深情，像落在深渊里的叹息。令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

全改变了。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团委书记，怎么能够这样？阶级立场呢？我想。但是，你要我怎么样？我不可能大呼革命口号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况且，发生了什么？人家不是在弹革命歌曲吗？

是的，我是穷孩子，我被洗过脑，可我受过高等教育，57年以前的教育，还不完全是一种干巴巴的教条。我知道什么是美和善。文馨对我说：“她对您没有恶意，否则，不会弹钢琴给您听。”

我转身走出深巷，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一个没落阶级的诱惑。文馨跟在我身后又说：

“她已经疯了。”我猛地站住了，这是隆冬，阴森偏僻的小巷，一抹阳光涂在低垂的屋檐，这可不像是新中国的街景。文馨似乎站在一段历史的深处对我讲述她二妈的经历：“直到现在，她还爱慕她的音乐教师，父亲改变不了现实，就由着她去。可惜，那位音乐教师得肺病死了。解放后，她与父亲离了婚，千里迢迢到西藏去找情人，不料已是一座荒坡等着她。两个月后，她回到成都，就一个人独居到现在。父亲早就原谅她了。他在前年去世时，立下遗嘱，承认她仍有财产继承权。”

听完这个资产阶级的动人故事，天已晚了，我和文馨跑步赶回学校。临别时我问她为什么对我讲这些？她说：“我这是向党交心嘛。你去汇报吧，没关系。”

我感到自己受了委曲，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仰着头，有一种快完蛋的感觉。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姑娘，然而，这一切，可能吗？

老威：组织出面挽救您来了。

冯中慈：组织是明察秋毫的，从学校到社会，都像一张网。好在我 and 文馨没有过多接触。直到临近毕业，社会上政治环境较宽松，许多大知识分子都响应组织的号召，向党提意见。开头，在毛主席以身作则的表率下，各级组织还很宽容，虚心，后来，意见越提越尖锐，过激，甚至有了结束一党天下，引进西方议会民主的呼声。我至今记得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全国100名大右派之一的葛佩琦的“意见”——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

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是可疑。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这种“意见”已远远超出政府所能忍耐的“度”，但党内整风依然按部就班进行。文馨平时不吭声，也不关心政治，在我的一再动员下，就鼓起勇气提了一条意见，大概是共产党提倡民主、平等、自由，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她在校近四年，却受！尽了歧视，誉家庭背黑锅。人党入团没有份，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大家又将她视为“白专典型”。毛主席一再教导，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只要划清界限，就要给出路嘛……

文馨发言完毕，我带头为她鼓掌，可响应的掌声稀稀拉拉，班委委员们都把脸拉得很长。我是一个机械执行党的政策的团委书记，一切都以《人民日报》社论为准，正因为这样，颇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赏识。但在这一次在对待文馨的问题上，我平生第一次没和组织保持一致。我动员她把心里话说出来，是为了让大伙理解她，同情她，没想到结果却适得其反。在政治风浪中，我是认不清形势的瞎子，还鼓励别人去闯祸。终于在一个月后，风向陡转，毛主席公开向全国人民挑明，所谓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是引蛇出洞，是为了让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跳出来。大右派一个接一个落马，上面的风刮到下面，学校和班级就开会动员反右，组织上暗中把右派教师和学生的名额安排到各系，由大家评选。文馨的得票率在全系名列第三。党委副书记亲自到场，领导批判右派学生的现场会。我根王苗红，属重点培养对象，副书记同志为堵大家的口，反击有关我的流言蜚语，竟当众信口雌黄说：“冯中慈同志是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去与右派学生文馨接触，引蛇出洞的。他做得很好，没有辜负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教导，终于将一条一声不吭，却对新中国的仇恨埋在心底的美女蛇引了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斗争策略非常出色！所以，经校党委和团委研究，并准备报请共青团省委授予他‘杰出共青团干部’的荣誉称号。”

我气得晕头转向，文馨比我晕得更快。她呼地起立，目光转向我，险色死灰，接着就软了下去。我不顾众目睽睽，冲过去抱起她就朝校医室跑。副书记一愣，又接着歪吹：

“哪怕是对阶级敌人，也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冯中慈同志做得对！”

我还是人吗？如果我昧了良心，顺着组织为我竖起的杆子朝上爬，这辈子也许青云直上，可是，我不愿意做畜牲！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牲也比做人强！我不敢等文馨醒来，就神色恍惚地离开了。团委的人找到我，要开会全面复审右派，然后上报。我不假思索地拒绝在迫害文馨的意见书上签字盖章。

先是那位副书记，然后是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来做我的工作，要我交出校团委公章。我回答不。我明知这种抗拒如同儿戏，可还是一味蛮干。党委书记警告我：“冯中慈同志，团委不是你个人的，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应该明白组织原则。”我反问：“我什么时候接受了‘引蛇出洞’的任务？”

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不搞阴谋诡计。”党委书记说：“对人民是不搞阴谋诡计。”我说：“文馨是人民中的一员，她已背叛了她的家庭。”党委书记说：“你陪她去探望过她父亲的姨太太，我们早就掌握这一情况了。”我不禁一愣，说：“姨太太？那是疯子。”党委书记哈哈笑道：“你才有些疯狂，为了一个女人，连组织原则都不要了。”我不顾一切地大叫：“组织原则不是你们用来整人的！我就是不同意把文馨打成右派，我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她不是右派。”党委书记一拍桌子：“冷静点，想清楚了再说话，我最后一次叫你：‘冯中慈同志，你的共产党员的人格就用来保护反动派吗？’”我仍然犟着：“她不是反动派。”党委书记又一拍桌子：“年轻人，被感情蒙住了眼睛，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感情也有阶级性，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懂吗？”

我一时糊涂，竟吐露真言：“假如我真的爱她，又怎样？”党委书记不拍桌子了，他换了一种轻柔的语调说：“那你就选择吧，爱党，还是爱女人。”“爱女人。”我说。于是我被开除党籍，补充

成了右派兼坏分子。

老威：当时您和文馨谈恋爱了吗。

冯中慈：没有，不过是彼此有好感而已。如果按自然发展，我不可能与文馨结合，因为我和她完全是两极世界的人。我感激共产党救了穷人，挖了穷根，送我上大学，所以，如果不是物极必反，我会听从组织的劝告，断绝哪怕是一闪的儿女私情。而文馨对我的好感没有超出同学的范围，除了我，她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帮助她的可以称作“同学”的人。

老威：可您还是承认了压抑已久的感情。

冯中慈：我是穷孩子，有反抗压迫的天性。解放前，我到地中院门口讨饭，他们不但不给，还放狗咬我。你猜怎么着，狗咬我，我也张口咬狗，结果还是我厉害，把狗耳朵咬缺了。那一刹那，我没想到受了剥削阶级的欺侮，只觉得这个大户太混蛋。是共产党教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穷人为什么造反？阶级为什么产生？

就是因为人与人不平等，不仅社会财产分配不公，而且人格也不公平。文馨是个弱女子，有那么多党员的组织，是不该欺负一个弱女子的，否则，又回到解放前了。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一部名为《在河流那边》的书中，曾引用了反右时期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话说：“你难以想象这些自我批评和各种分组会议有多么痛苦。我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送文件的小伙子，还是打扫大楼的妇女，都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骄傲慢劲，指责我打发闲暇时间的业余爱好，甚至在我沉默不语时，指责我默不作声我自己只能坐在那儿，接受他们的指责。有些受批判的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忍受这一切，我可是过了好些年才习惯了这些。……”

我记得书中的这些话，是因为这正是我和文馨在那些年的写照。许多人都为我一时冲动惋惜，我下意識地在组织、集体与个人之间，选择了个人，我应该有我的私人生活，对吗，小伙子？而在邓小平时期以前，中国人是没有私生活的，至少是私生活见不得人的。感

谢邓小平，让我们从不人不鬼的阴影里走出来。

老威：您后悔过吗？

冯中慈：没有。开始不习惯任何人都可以批判我，因为我从前是批判别人的。后来习惯了。有了孩子，就更加习惯。穷人干革命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老婆孩子，我不革命也有老婆孩子。我又不可能同组织和人民结婚，电影里常说“某某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姓什么呢，人民的奶头是什么模样呢，我没见过。道理越大越没道理。如果我昧良心把文馨朝火坑推，那才后悔一辈子。哪怕当部长也不安稳。

老威：你是怎样让文馨回心转意的？

冯中慈：我成了右派，反而踏实了，就写信向她表达爱意。当时对右派看管得很严，这样也好，否则文馨会自杀的。没人捎信，我就半夜抽空子偷跑到她二妈家，把信塞进门缝，又返回。就这样捎去了五六封长信，也不知道她收到没有。后来她被发配到新疆阿克苏，我却就地安置。这不行，我千方百计打听，过了一年，才找去了。坐了火车，又坐汽车，颠沛流离，我已经成为分文不名的叫化子了。幸好到的那天，太阳暖洋洋的，她在棉花地里，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看来，这劳动改造有利身体健康。我当时被当作流窜犯抓了起来，因为在她们农场的西北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只有一条汽车路通向沙漠核心的监狱。曾经有犯人爬运南瓜的汽车逃跑，靠生吃南瓜坚持了五天五夜。我说出了文馨的名字，她被唤回住地，认了我半天，才从乱蓬蓬的毛发中弄清“她的中慈”。

下面的故事就有点平庸了。我们都是右派，很平等。我这么远去找她，既使不太满意，也只好嫁我。这一次，组织很爽快，给她开了证明，准了假，我们一起回四川办了结婚证。又办了户口迁移证，一对黑夫妻就这样响应党的号召，欢天喜地支援边疆去了。

邓小平上台，右派平反，我们领着两个在边疆出生的孩子手回了四川，虽不算衣锦还乡，也算一家人苦乐与共。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很满足。

老威：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

05 多余的人高歌

采访缘起：高歌最早活在一首著名的莽汉诗里。1985年夏天的某个下午，他跟一个熟人到涪陵旧家来看我，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某某诗里的那个高歌。”

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可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总是在江湖上一传十，十传百，直到时过境迁，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化为泡影。

高歌和许多那个年代口头流传过的东西都化为泡影了。所剩下的，只有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落魄的高歌为了打翻身仗来到成都，布满血丝的赌徒的双眼，令人想起发迹前的希特勒。软弱、敏感、自嘲、善良、神经质以及经络暴突的双手，都在暗示他的血里淌着某种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多余的人想做不多余的事，”1999年9月9日，一个世风日下的晚上，刚从麻将桌上撤退的中年高歌抖着瘪瘪的衣袋如是说。我赶紧如实记录，并采用做这篇谈话的标题。

老威：终于见着你了，高歌，状态咋样？

高歌：你这种问法不对，我根本就没在状态上。

老威：来成都多久了？

高歌：大半年了，我租了房子，在肖家河，那是个乌云弥漫的地方，遍地发廊和药店。我是没办法，才找妹夫从银行贷款，从几千里水路浮上岸做书生意，与老同学马疯子合作，弄《画说情歌》。书生意我摸不着门，但情歌有门，我弹了半辈子三弦和吉他，是好几位诗人的音乐师傅。

老威：这书能赚么？

高歌：肯定能，都是些骚得裤裆起火的东西，不把嫖客的钱哄些出来？

老威：嫖客都是实干家，买屁的书。

高歌：那我就自己上夜总会推销，娘卖×。其实我也不晓得这书赚不赚，马疯子是老书商，他说赚，不赚也不行。万一亏了，我就不回西阳了，永别了，糟糠婆娘！永别了，嗷嗷待哺的黄脸儿子！我一不做二不休，我朝汶川羌寨跑，我沿着公路一直跑过红军长征的草地，我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少数民族，把藏族民歌发扬光大……

老威：你说话太情绪了。

高歌：只能这么想。老威，没有退路了。我贷了五万元，耗掉了大半，还没一分钱的回报。担保人是我妹夫。我前半生太平庸了，臭大学毕业回乡，丢掉公职，在歌舞厅鬼混，经常弹高雅的外国民歌去伺候比我平庸十倍的酒客和舞客。赌桌、酒桌、大街、单位，我在哪儿都多余。早晨起来伸个懒腰，连空气都在嘲笑我。老婆不孝敬我妈，我就满县城追着打，造成轰动，只有这时，我才显得与众不同。唉，骨头发霉的日子，我已四十多岁，该做点事了，就抱着贷款出来。二渠道做得好的书商，几乎都是南充师院的同学，80年代的文学梦没得逞，就愤世嫉俗地弄书，不小心真发了大财。这很有些号召力。在成功书商的外围是写手，我来得晚，算第三梯队。

老威：贷款的压力很大吧？

高歌：压力太大，大过头了，就没逮压力了，反正人一个，一根，把老子啃了？我后悔没多贷些，几十、上百万，只要能搞到手，就是本事。牟其中耗掉国家几个亿，明明是蛀虫，还开公司，吹嘘自己是爱国者，要为中国建第一艘航空母舰。老百姓头脑简单，牛皮只要吹破天，大伙自会热泪盈眶，人民的眼泪就是黄金白银！你有熟人吗？我再贷一点，你出关系，钱平分。

老威：话虽说得歹毒，但是高歌，你心地善良，不是骗子的料。

高歌：做横财梦的不止我一个。我在肖家河的租房，现在已成公寓，谁都可以一脚踹开，睡在床上不起来。大家都彻夜空吹，被一笔笔虚无的横财搞兴奋了，就下楼啄碗小面。比如写手张死兔，突然一插床沿，蹦出一个探险选题，于是聚众海吹：“啊，这本书，发得好的话，绝对二十万本，我少说也赚四十几万。”大家争着考证，一致认定是这么多。于是张死兔就神了，不再是剪刀加糨糊，

三天弄一本书的编书匠了，他已发财了。趁着他还没从云端里掉下来，我们一齐呐喊“请客”，因为他腰包里两千块钱定金才输掉一半。

老威：肖家河的路边店子便宜，请不了几个钱。

高歌：上边嘴好请，下边嘴不好请。

老威：还请嫖？太奢华了。

高歌：跟优秀书商学的，他们勾兑关系上夜总会，没搞也给小费两百。我们这拨穷后备军，阔气不了，上上发廊总可以。书商都是这样起步的，租房作写手，到发廊按摩。洗了大头洗小头，打盘手锤，三十；吹箫，五十，出浆才算数。必须给神经病讲好，先付账，否则他卵蛋一瘪，梦想破灭，必赖账。我楼下的发廊妹，人长得有点怪，但奶大，嘴上功夫远近闻名，连许多大款书商都借看望我们为名，去一次次光顾，××还搞起瘾了。

老威：高歌啊，你咋能同这帮小混混搅？你有妻儿老小，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高歌：一个人的时候，我也这么想，可我很少一个人呆。除了跑印刷厂，我连校稿子也眼花，我提前进入老花加青光。我整个人在飘起活，吉他也不弹了，除了赌，就是嫖，然后追悔莫及。我提醒自己要节约，可这根肉筋不肯节约，通常的折衷方式，就是几人合伙捉个鸡回来，轮着日一晚，几百元炮费分摊。唉，一个人在床上哎哟连天，几套器官围在床边眼巴巴地守候，斯文扫地。我常常感到与小年轻有代沟，当着人搞硬不起来，不得不下马。事过之后，那玩意儿又翘得比谁都高，“你不争气！你不争气！”有一次，白交了钱，我肉痛得左右开弓，扇了鸡巴几耳光。我大喊一声：“太监万岁！”吓得五个人齐刷刷地从我的床上跳起。受不了，一把年纪了，还挤在一堆臭肉中间。

老威：你还有点忧患意识嘛。做生意，首先要清理环境。

高歌：环境清理了，我还不习惯。马疯子说：“正事想不起高歌，玩就想起高歌了。”我为人随和，自然而然就成了三陪先生。前几天，我的同乡青铜追着我的脚迹也来成都，他是这儿住过的唯

一位饱读诗书的秀才，他父亲是解放前整个黔江地区唯一的清华大学学生，为了社会理想，回乡办教育。而青铜在 80 年代的名声绝不亚于乃父，他搞诗歌批评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坐了一把交椅，我与青铜促膝夜谈，兴奋惨了。为了他的光临，我破天荒换了床单，并用我的瘦脊梁骨筑起长城，把两个打鼾的屁儿虫隔在外头，让青铜一个人睡两个人的宽敞地方。

老威：青铜我熟悉，他的文本批评影响了一代人，不知啥原因，89 年以后就罢笔了。许多朋友鼓励他出山，去年我回涪陵看女儿，还磨了一番嘴皮，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九十年代没评头，被废掉了。”

高歌：我看他才被废掉了。

老威：此话怎讲？

高歌：后来才晓得，他整整在家打了十年小麻将，每晚都是十几二十元的输赢。就这样耗，不仅不读书，连大山外的变化也麻木了。看上去红光满面，比十年前还年轻了十岁，可中看不中吃。

老威：这样议论朋友？

高歌：他把我坑苦了。我是废人，别人打眼一看就晓得，偏偏他这个废人，显得有大用处。我陪他见了不少人。80 年代搞文学一窝，现在既然有意入商业的伙，大家自然好酒好肉好话款待。诗人柏桦自告奋勇，充任青铜的通俗书向导：“没问题！以你青铜在 80 年代的名声，好多老读者都要认账，你有比天高比海深的才，搞通俗东西简直委屈了，你一入这个门道，我老柏桦只配给你鞍前马后跑腿，而一大片写手只有下课。”青铜还在犹豫：“我真有那么大的能耐？”马疯子鼓起眼吼道：“高手！哥们儿！进来搞，进来分钱，你的老套筒一挥，粗气都用不着喘，几千上万就到手了。妈哟，你哪是文人，纯粹是一个戴眼镜的抢劫犯，我们这些发书的甘心让你抢，多抢几盘，还是用不着喘粗气，一套 20 万元的房子就过户了。”青铜小地方来的人，哪听过这种海口，当即与马疯子、柏桦成为拜把兄弟，并挽袖跃跃欲试地请战。谁知茶楼外阵阵喧哗，原来又进了一拨崇拜青铜的书商，都是旧人，而现在拎手机、包二

奶、开桑塔纳，动不动就盛情邀嫖。青铜暂别马、柏，由款爷们领着驱车去郊外黄龙溪，在经常拍电影的百年老镇连放几炮，周身通泰，险些同鸡妹产生危险恋情。幸而露半截屁股之际闻得手机响，原来是老婆催促回乡，并告之“孩子失踪”。青铜尿筋被闪断，一改温文尔雅的多年伪装，咆哮如雷：“都是你这鼠目寸光的瓜婆娘害的！早出来闯两年，房子车子都有了！”情绪调动起来了，马疯子和我在酒桌上把《画说情歌》交给青铜，嘱其点评。一共 200 首，每首只需几十百把字。“杀鸡用牛刀，”马疯子打个臭嗝，点了四千元，“一点小意思。”

第二天，我酒醒了，一算账，平均 200 元一千字，算特级稿酬。可不识趣的青铜还天天打电话，要“待遇与名气成正比”。事业单位呆久了，以为名气也是铁饭碗，能端一辈子。

老威：只要写得好，这点投资也不算啥。

高歌：他回家生搬硬抠了一个月，把稿子寄来了，并严正声明“一个字不准动”。那信中口气，犹如皇上颁发诏书。马疯子连灌三天闷酒，闷屁一放，终于爆发到脱光衣裤，在街上走来走去把青铜祖宗十八代日了个遍。我念一句他的“点评”——无须考证，是唐人诗句化此歌，还是歌在先，诗在后？如此健康美丽的句子用于“强人”、“做喜”，却大煞诗情，有损歌风，亦伤民风。

老威：没错啊！

高歌：岂止没错，简直可以上国语教材了。他妈这青铜虽在党校任教，却没当过党支部书记嘛，唉，为了广大消费者，只好找人重写，一人一半，我又出了两千多元的血。认了，就当捐助希望工程。

老威：都是你们的迷魂汤把人家灌成这样！据说这几十岁的老炮耳朵一回乡，差点把老婆蹬了。

高歌：我也没少喝迷魂汤啊。

老威：你落魄惯了，人生就显得没起伏。从 80 年代到世纪末，你一直以不变应万变。你是一条任人宰割的癞皮狗么？可没人宰割你，李亚伟在诗里说：“二十四的高歌，已经二十四年没写诗了。”

现在李亚伟也不写诗了，从外表看，似乎压根儿就没做过诗人，还是你厉害，你提前趴在人生尽头等着我们归来。

高歌：我哪有如此高境界！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人都快死了，还在检讨自己的革命错误，知识分子啊，似乎永远与当时的环境处不好关系。若要相安无事，就啥也别做。昨晚，一位著名诗人冲进我家，裤子一下褪到腿弯，他扯起鸡巴让我鉴定龟头上的几朵菜花。他染上尖锐湿疣了，就扛着根枪到处找人鉴定，荒不荒唐？他是我的偶像，至今我仍记得他的许多诗句。你别笑，老威，这世界，找不准位置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小学、中学、大学、上班、然后下岗，一切都不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人人都像你老威，自小定一个目标，诗人、作家、奔诺贝尔奖，天下就乱套了。

老威：你有最初的理想么？

高歌：做一个音乐家。

老威：你现在还可以做，娱乐场所多的是。

高歌：你以为那是音乐？有时，我真想直接扛着吉他，到街头卖艺去，又抹不下脸。我天生是瞎子就好了，对垃圾眼不见心不烦，坐在人群中，一个劲地弹唱自己喜欢的曲子，在学校时，我是吉他王，屁颠屁颠拥戴我的学生、准学生一大串。有一回，我弹日本古曲《樱花》，反反复复弄了很多遍，还意犹未尽。那是一种云端里的快活。我没有身体和大脑，只有手指，弹什么是什么，岩石洒满了花瓣，冰雪绽出笑脸来，众多赏花的美女萦绕在周围，唉，樱花，与时代有啥关系？在《樱花》中，我可以随意选择哪种活法，几百年前，几百年后，甚至混沌初开时，这是年轻的某个场景。马疯子之所以愿同我合作，可能与我以前某次演奏有关。碰见街头的卖艺人，无论多少，我都要给钱，同行啊，老威，你也是我的同行。

老威：如果不是老了点，我倒建议你去卖艺，国外的地铁口、广场、酒吧，到处都是卖艺者，小提琴、爵士鼓、印第安人的骨笛，五花八门都有。听说你还在二毛的“川东老家”搞过？

高歌：那是老石头，他在那馆子里做过大堂经理，却抱着吉他

弹，为酒客助兴，大家却嫌吵，算了，现在流行的是卡拉 OK，我一见那玩意就瓜了。

老威：你夜总会还去得少吗？听别人说，你是如鱼得水嘛。

高歌：进去当然如鱼得水，但出来就寂寞得缺氧。大伙栽培我，每次都替我点小姐，不要，就直接暴露了穷光蛋的本来面目，书生意就没法做了。只好逢场作戏，好歹在小姐的背上、腰上、腿上掐几把，我连奶子也不敢摸，怕误会了，人家跟你出台，灯红酒绿的夜色，到哪里去？一冲动就是 600 元，够两个月的房租了。幸好不付酒钱，我就朝死里灌几百元一瓶的洋酒，放翻自己，人事不醒，小费也就省了。可偏偏人穷胃贱，酒越灌人越硬，还傻笑着唱歌，唱一句，肉抖一下。娘卖×，图排场，不实惠，散伙散伙。小姐的胯夹得越紧，夜也就越深。十二点过，大家站起来，各付各的小费，我一屁股栽下去，却被小姐扯住，不由分说地掏口袋。我打开她的手，顶天立地摔出 200 元：“妹，拿去！”

我在肖家河喝了一夜风，临天亮才摸进屋，一觉醒来又是黄昏了。搜遍口袋，坐在床上一角、两角地把零票码齐，“又少两百！”我长吁短叹，若在郊县，够两盘炮费！想着想着，鸡巴就从裤衩中钻出来帮助点钱。唉，人这一辈子，三个字就概括完了：“妹，拿去。”

老威：我看你是没打算回酉阳了。

高歌：我还有一个发财计划：冒充希特勒。

老威：希特勒已消失几十年了，不过，你的模样倒挺像，就是瘦了点。

高歌：饿的，这脖子上的青筋，都是三年自然灾害留下的，那时我才几堆屎高，已经饿得不哭不叫，有宿命的感觉了。两眼发直，盯馒头练出来的，境界高的人，吃东西用眼不用嘴。有个日本老太太，听说是二战时期流落到酉阳，她在小学教书，“文革”中还被打成间谍，严刑拷打几天几夜，差点就没命了。改革开放后，她回了趟日本，住了一夜又回来了，她为啥回来，日本那么发达，环境像明信片。统战部门的人经常找她，她是小县城惟一的老外。她会

中文、英文和日文，却拒绝用任何一种文字写材料，正面、反面的都不写。看来，她想把一切带入坟墓。对，成为一个谜而进坟墓，就是永恒。她对我的影响很大，乃至此时我突然想起她，除了偶尔对我笑笑，她同我没任何关系。这个多余的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我流落到阿根廷，哑口无言地生活几十年，也会同她一样吗？我为啥喜欢《樱花》和《荒城之月》？中国曲子精品不少，却没有日本古曲那种来自血缘的震撼。

老威：高歌，你是最棒的喜剧演员，至少比葛优强，可你排练的却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前程未卜啊，多余的人。

高歌：你不多余？那把不多余的地方讲出来我听听。

06 酒鬼高马

采访缘起：高马属狗，生于1958年，在北京一家著名报纸当了多年编辑。他嗜酒如命，曾喝遍天下无敌手，真不晓得他的编辑是怎么当的。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高马还是诗人，出色的翻译家，虽然满脸浮肿，烂得像一堆酒糟，左看右看都不像有文化的人。

他已离过三次婚了，第四位夫人在我采访他时，就坐在旁边，她一再开玩笑说要对我的采访记进行审查，像我和高马的领导同志。

高马早不耐烦了，他一再伸懒腰，舒展着一身肥肉，为中午的酒宴做准备。

时为1994年10月3日，在和平里附近的一个公园。

老威：你已经毁了三次约了，今天好不容易逮住你。你到底愿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高马：我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你采访我什么呢？我已经好些年不写字了。

老威：你撒谎，前几天我还在一本杂志里见过你翻译的希腊诗歌，赛菲里斯的《桑托林》：“假如可以/你就回到幽暗的大海吧/忘记笛声，忘记赤裸的双脚/在你和他人的睡梦中踩踏/沉沦的，生命的声音/假如可以/你就在你最后的贝壳上写下/日期、姓名和地点吧/然后再抛回大海之中……”

高马：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很危险，老兄，很危险。这是个不需要记忆的时代，一个人出车祸死了，脑浆涂满的轮胎依旧要在道路上滚动。文化大革命，红色大海洋，集体的狂欢突然之间沦为集体的痛苦。痛苦吗？痛苦是为欢乐所付的门票，记忆是为遗忘所付的门票。列宁同志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背叛了，又他妈的怎样？当然不能怎样，谁能把醉鬼怎样？我说到哪儿去了？你看我这脑子，注意力无法集中。我上午不喝酒，脑筋就不转，或

者转也白转，你看见我皱着眉头，以为我在挺深沉地思考问题，其实我在睁着眼睛睡觉。

老威：你刚才还在编发新闻呢。

高马：工作是一种本能，闭眼也能干，我编了十八年，报纸已化作身体的一部分。这边领导视察、讲话，那边特大车祸，家属要讨个公道，其实这种公道死者不需要，左边鲜花和儿童，过节呢，下边，脱毛霜广告。11点半下班，中午喝啤酒，边喝边做私活，效率很高，脑筋像生锈的机器开转了，开始头有点疼，咔咔响，后来喝通了，第一泡尿出来，整个身心都舒畅了，接着越来越舒畅，半个钟头一泡尿，肠子好像是直的。有人说，醉鬼没心没肺，对，我越喝越没心没肺，腰以上全没有。一张漏斗嘴巴直通尿道。你说我译过诗？现在我想起我译过诗，好像和排泻有关。我忍着一泡尿，偏不拉，这时就会本能地亲近大海，向大海撒尿太舒畅……我接着喝，直到受不了直冲厕所，这下诗的感觉没有了。我一下午要喝十几瓶，你算算一个月酒钱多少？

老威：相当于你的工资吧。

高马：你太小看我了。晚饭我还接着喝呢。白的，二锅头，一瓶半到两瓶，有一口没一口，直到半夜。有朋友陪着喝当然好。80年代，家里有许多过路客，吹拉弹唱挺高兴，开会的时候，大伙一块醉，摔跤一般抱在一块，躺在街心说悄悄话，什么永不分开。谁拉我回家我就同他急，一个狗钻裆，撞到树上，又弹回来。星星长毛了，这是诗人马松的句子，“我的毛醉了！”“腋毛还是阴毛？还是月亮抖下来的寒毛？他妈为什么不在80年代被汽车碾死？我在80年代醉的最后一场酒是在和平里，与一个当兵的，大冷天，喝着喝着就开始扒衣服。你知道醉鬼与醉鬼之间就这样。我埋怨他坐得太远，其实他就在我的旁边；后来我又问他的鼻子在哪儿？他摸着我的鼻子说在这儿，我说不是，这个鼻子不是那个鼻子。他火了，扇了我一耳光，我倒在地上，看见那玻璃窗一晃一晃地扇耳光，就撑起来要去打它。当兵的说，有种的脱衣裳练，我就脱衣裳，当兵的说，有种的脱裤子练，我就脱裤子，后来我们都哭了。再后来，我

的酒友纷纷戒酒，成家立业，变体面人啦。一晃八年过去，我还在喝，常常一个人喝，鬼都不上门。

老威：你也结过婚。

高马：结过三次。第一次醉了，抱错了人，恰好被我原配夫人撞见，完蛋了。第二次又抱错了人，我的次配夫人说，你哪是酒鬼，纯粹是个花鬼，你连亲了谁的嘴也不明白？我说那是酒杯呢，她说去和酒杯睡觉吧，又完蛋了。第三次，是我老婆抱错了人，她以为我醉了不知道，就跟一个男的出去了，我趴在窗台上，看见他们手挽手在雪中散步，真够浪漫。我追出去，头碰了电线杆。我不省人事，差点没冻死。我醒过来，却躺在床上。我冲守在一边的老婆咆哮：“肯定是你的野男人把我弄进屋的！”我老婆答：“哪有男人？是我把你拖进来的。”我气疯了：“你撒谎！我明明看见！”我老婆答：“什么明明看见？你一个酒鬼能看见啥？”我挥起拳头：“看见风流鬼！你骨瘦如材，岂能弄得动我这大块头？”我老婆答：“早知如此，我就不管你。”我的拳头挥到她身上：“这是我的遗产，分给你这骚婆娘！”这么一来，祸闯大了。

老威：你这种东西，结什么婚。

高马：我早有这种自知之明就好了。年轻时真好色，醉了也能干，后来就淘空了，瞪着眼看，干不了，酒令人阳痿，现在想起来，老婆即使有外遇，也没错。醉鬼有什么自尊？她偏偏同我这种人计较，转身进书房了。我继续狂喝，他妈的，但越喝越感到冷，酒里有股血腥味！酒变红了，整个屋子酒杯一般晃着响。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听见鸡叫又走了两步。我感到奇怪，五年没听见鸡叫啦，饲养场的肉鸡，三个月就肥了，不会叫。会叫的鸡让时光倒流。我推开了书房门，嗅到一股比酒更浓烈的酒精味，我恍惚记起我老婆是外科大夫。又灌了一大口，我明白，就几步之遥，但我永远走不到我老婆那儿去，钢丝床太远了，我进一步，床退一步。我老婆在床头，不，在船头，穿着白大褂，要离去了，她将融入白色，融入一座大医院。我感觉到，血在白床单下面无声地淌。

老威：我听说过，你老婆在大腿上划了一刀，血嘀嗒嘀嗒流了

两小时。

高马：嘀嗒嘀嗒，像钟表一样。我醉得太厉害，居然救不了她。结啥婚，作孽呀。她的葬礼弄了三天，人潮水般涌来，亲属、朋友，还有她治好的病人。她是个好医生，以前我一点不知道，这么多人需要她。我没喝酒时，少不了挨骂。但是我病了心慌、肚子疼得要命。不行，我这辈子交给酒呢。

老威：老婆都死了还喝？

高马：老婆不是我喝死的，是自杀的。当然，你说我借酒杀人也可以。唉，这现实太丑恶了。幸好时间不会停滞在某一悲惨时期。我再也不结婚了，孤独吧，麻痹吧，如此而已。

老威：什么“如此而已”？凭《国际歌》，无产者能找到自己的同志，你凭酒味还不能找到自己的酒友？

高马：还没喝你就说酒话了，我的酒同志都是阶级性或季节性的，哪能天天陪着喝？现在快 12 点了吧？我们边喝边聊，你看我这肚子，像一口缸，你相不相信，你这种不好这壶的人，我一个屁就把你醉倒了。开个酒厂吧，老威，我给你看大门，做广告，将来呜呼了，请你把我的遗体剁了装缸，埋地窖发酵十年，自然是天下最美的酒。

老威：转眼之间，你三瓶就下肚了？

高马：我一般要喝五瓶，才会撒第一泡尿，你摸我这肚子，很实在，里面像绷着弹簧，现在我有点醉意，等出了尿，我反而不醉，越喝越不醉。

老威：我可是越喝越难受，幸好不是白酒，要不早吐了。

高马：喝酒有两关，第一是肠胃，第二是心理，这是相互作用的。本身酒量好，就占了先天优势，如果人逢喜事，哈哈笑几回，酒量还会上涨许多。你喝了两瓶半就想吐？这可太不够意思了。一定是见了我心情压抑，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老威：我几乎不喝酒，我们好几年不见面，所以“舍命陪君子”嘛。

高马：我不是君子，我是高阳酒徒。

老威：怎么又扯上西汉的酈食其了？我又没让你做刘邦的食客。

高马：跟你这种现实主义者，要不出理想主义的酒疯，饮酒要互相凑趣才够劲，你一杯，我一杯，猜拳行令说醒酒笑话。汉高祖刘邦是个酒徒，所以才会让酈食其在门外走来走去地骂街，没砍他的脑袋，反而奉为上宾，这种事在历史上太多了。老威你呀，这几年尽学些没用的东西，“人文精神”啦，“反殖民化”啦，“本土”啦，“中年”啦。跟酒没多大关系，中国历史是被酒泡出来的，因此也跟历史没多大关系，既然跟历史没关系，跟现实就更没关系啦，因为从我们身边淌走的每一秒钟，都是历史，远一点，近一点，不是我们说了算，是天上的大醉鬼说了算。我们是他老人家的亡国奴。

老威：那什么跟现实有关系呢？

高马：酒。

老威：不行，那是你的生存方式，放到我这儿就不灵了。实话说，89年我在海南岛，醉了一次，人事不醒地横在大街，连大货车在我面前急刹也不知道。差点就血溅海口了。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行人见着这堆死肉，纷纷掩鼻饶行。从这以后，我发誓再不沾酒了。

高马：你当时灌了多少？

老威：就七、八两白酒吧。

高马：这么点就成死肉了？一定有事，你这人不会凭白无故灌这么多。

老威：我姐姐刚遭车祸去世不久，我就下海南，岛上人很多很乱，找不到工作，我反而惹了一大堆麻烦。那时，岛上挤满外乡人，都莫名地兴奋、狂躁。

高马：我猜中了吧？一般中国人都这样，遇高兴的事喝，遇不高兴的事更要喝。好像酒不是致幻饮料；而是一种发泄对象，像男人对女人，需要时就想起来，射了就完事。自己把自己当畜牲。你别打插，我胡乱说呢。女人与酒谁更可爱？我说，都可爱。你要懂得爱，爱酒或女人更胜于自己。当然，女人不这么看，她们恨酒，

与酒较劲，争夺男人，她们认为男人呕吐、胡闹，死猪一样睡在垃圾里不好看，女人重视外表，酒鬼很丢面子。丢了面子可以再捡回来嘛，她们不这样看，因此她们看不透酒鬼温柔的内心，一团烂泥，还要让他说“我爱你”么？

你们四川的老杨，评论家，知道吧，他也贪杯。并且越喝话越多，他想离婚，想了 20 多年，女儿都 20 多岁了，但就是离不了。离不了贪杯也是一种活法，精神就升华了嘛。升华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就成柏拉图。柏拉图是我知道的世界最早的阳痿者。刀不磨要生锈，老杨肯定出问题啦，他的日常生活是，一郁闷就喝酒，喝了酒就骂人，骂累了就睡觉，其它时间才是读《圣经》和写充满尊严的道德文章。他的酒龄与我差不多，区别只是酒使他发泄，发泄了灵魂上的有毒物质，身体才会健康、有活力。自杀丧命的女诗人普拉斯说：“我吞吃男人像吞吃空气。”那对于老杨，吞吃酒精像吞吃女人，每一口都咬牙切齿。我没有这么多不平衡，至始至终，喝酒就是喝酒，这样，人也纯粹得同高粱酒一样透明。这么透明的柔情的液体竟会放翻一个个彪形大汉，使之露出爬虫本色，这不是老子《道德经》的含意么？

老威：《道德经》里赞美婴儿，将其同水的特性相提并论，这只是一种自然属性而已，婴儿没有母亲不行，母亲就代表一种社会属性。

高马：你说错了，母爱也是一种自然属性，婴儿哇哇大哭，母亲把乳房塞给他。婴儿能够吸引所有人去爱，因为任何监护他的人，都有权为他的将来设计蓝图。我一旦醉了，也同婴儿一样，任何比我清醒人，都有权把我抬走，以免阻塞交通。不过，我比婴儿气力大，我心里完全明白，但我管不住自己的行为。有一回在酒吧，喝到半夜，我付给三陪小姐五百元，准备回家，可那小姐看我摇摇晃晃两眼发直，硬说我只付了三百元，气得我劈头就是一巴掌，她才不吭声了。骗得了谁。还有一回，我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遇上一个小馆子，就坐进去，嚷着要继续喝，把所有的女顾客全吓逃了。服务员也躲着不敢出来上菜。老板只好亲自出马，劝我穿裤子，我摸了摸身上，真光着。就叫他爸爸。老板说：“疯子，我一不报警，

二不打人，因为我是你的街坊王老三。我下岗快两年了，好不容易攒钱开了个饭馆，今天才开张。

既然你这么照顾我，我也不做生意了，就陪你一醉方休好不好？
“我回答好，我付酒钱。谁知没喝到两盅，我爸拎着裤子撵进来，老人家 70 多岁，气得浑身哆嗦，我只好乖乖地穿上裤子，我爸还揪我的耳朵，嘿，40 多岁了，还被揪耳朵，太过瘾了。”

老威：你没觉得丢人？

高马：你太看重社会形象了，又不是政治家。“醉了一次就不再喝了”——这语气挺像个大人物。时代不同了，风气变了，每个人都在强调独立性，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以我为中心，所谓多元化社会也不是独生子女的社会。按照现在流行的行话，每个人都应该寻求适合自己的定位，即社会角色。我的定位是酒鬼。

老威：你是报纸编辑。还是翻译家。

高马：这些都是一个酒鬼的保障。自由的保障，随便脱裤子，回到童年的保障。我的先天酒量是爸爸培养的，一岁的时候，他就喜欢把我放在膝盖上，自己喝一口，再用筷子头蘸一点让我沾，这样，我逐渐成为与众不同的孩子。

老威：你这样“与众不同”，还能在报社呆下去吗？

高马：现在又不是毛泽东时代，一看家庭出身，二看政治表现。我的业务能力过得去，没有因醉误事。另外，我从不在金钱上与人计较，什么工资、奖金、提成、稿费，任何人都可以比我拿得多，我这个优点比所有优点都强。还有，单位领导请客，有我护驾，免受多少罪。实话告诉你，我人缘好着呢，光屁股在街上跑也成了善意的玩笑。我唯一碰不得的伤疤就是婚姻——酒与女人真的势同水火。

我夹在中间，充当调解人。现在，我偶尔也打打野食，但家伙不行了，酒一过量，就有点挺而不坚。

老威：你号称喝遍天下无敌手，你最喜欢的酒是什么牌子？

高马：对于酒鬼，什么酒都能喝，一般过得去就行了，很少在

意牌子。家里有常年泡的老酒，好几坛，活蛇、猪板油、拐枣都能泡酒。名酒如五粮液、茅台、竹叶青、汾酒、泸州老窖当然滋润，但价钱昂贵，一年品不了几次。其实这些酒，包括一些几百元一瓶的洋酒，适合酒仙、酒圣一类的人物在场面上喝，我是酒鬼，有喝的就满意。如果你一定要我选酒牌子，就好比让嫖客选妓女，让家庭妇女逛超市，琳琅满目。不过，自然发酵的酒感觉总要醇些，而勾兑的酒要来得猛些。当然，并不是每个人的感觉都这样。几年前，四川一帮下海经商的诗人闹着要造一条载满酒的轮船，从重庆沿江直下，直抵出海口。他们取名叫“梦之船”，并选浪漫老诗人孙静轩做船长。孙静轩同四川各大酒厂关系特别好，据说他能拉到钱，赞助长达一个月的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当然在酒足饭饱之余，上了“梦之船”的众酒仙还要重评中国十大名酒，发动新一轮的广告攻势，把老字号的十大名酒给打下去。

老威：这种文人阴谋永远得不了逞。

高马：“梦之船”就是做梦而已，不过这是最对我胃口的梦。

老威：顺便问一句，你喝酒还吃饭么？

高马：我早忘记米的形状了

07 演员高洋

采访缘起：1997年4月中旬，我应好友周忠陵之邀，上京游广，住在日渐破败的鲁迅文学院，却有不少出奇不意的巧遇。

重逢高洋便是巧遇之一。他于半年前在德国定居，现回国探亲，却在北京旅居了一个多月，他大约不会有回老家的念头。

高洋36岁，披头，风衣，很性感的欧化大鼻子，略有斜视的眼睛，显出艺术家的傲慢。我与他也是熟人，并曾是他崇拜的偶像，可这次也花了相当大的功夫，才将其制服，逼其吐露真言。虽手段有些卑鄙，但也是边不得已。

当我整理这篇文字时，仍旧冷汗淋漓。诗人无耻到这种地步，也算叹为观止。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比高洋年长4岁，但世界显然是高洋的而不是我的，因为他永远是时代的同步者。

这次采访地点是北京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儿访问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

老威：高洋先生，您是刚刚在德国定居吗？

高洋：不错，这是我的妻子汉娜，我们正在度蜜月呢。

老威：她会汉语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高洋：在北京人学附近的一个酒吧，过万圣节的时候，她来了，文静地坐在角落，忧郁地看着别人唱歌、起舞。仿佛是上帝的安排，我注意到了她，然后靠过去。相视一笑之后，我就为她朗诵诗歌，诗歌内容大约是写古代汉人的爱情生活，古籍里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当然只能在想象里假设，在假设里追忆。我没料到她居然感动了，她到中国不久，只会些简单的汉语词汇，但我们连比带划地交谈上了，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夜，我一杯接一杯喝酒，一首接一首为我的异国听众背诵诗歌，日常交谈和诗的节奏那么天衣无缝地交融，令人忘记世间的一切丑恶。

老威：你们现在交谈仍然连比带划吗？

高洋：仍然比划，不过，我在抓紧时间学德语，以后还要学英语、瑞典语，这不仅是为了适应语言环境，促进家庭和谐，更重要的是，我要试图进入德语、英语、瑞典语的文化界，将自己的诗翻译成这些语言，我觉得自己的诗之所以至今没得诺贝尔文学奖，完全是因为语种间的隔阂。中国诗人欧阳江河说：“由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我想，我也在完成这个转变。

老威：将自己连根拔起？

高洋：我们这代人根本就没根，有奶就是娘，我不管这奶是洋奶还是国奶。从某种程度上，我比白求恩大夫还国际主义，全世界都是我的祖国。

老威：那您下一个“祖国”在哪儿？幸好您的妻子不太懂中国话。依我看，您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您一点也不浪漫，或者说，您根本就不相信浪漫。在北京或其它大城市，有许多您这样披着艺术家羊皮的狼，忍饥受冻，强作欢颜地在外国人出没的场所厮混着，忍耐、窥视着。在九十年代，生存竞争环境空前恶化，人人缺乏安全感，相信浪漫爱情的中国妞日见稀少，于是，聪明人都把猎艳目光瞄准金发碧眼的外国傻妞——她们对于中国的知识是从唐诗宋词里来的。

高洋：请您从我家里出去！您这位正直的先生不该到这儿来。

老威：我这儿有一张您第一任妻子的照片，她今年 38 岁，比您大两岁，头发全白了，神态看上去像您母亲，还有您的儿子，因长年孤僻而得了失语症。最近，您的儿子离家出走了。要不要我把您的过去告诉您的德国妻子？

高洋：你这恶棍，想要什么？

老威：要你好好地接受我的采访。我会隐去您的真名，您是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您的诗和小说写得像翻译作品，您自己动手斩断自己的血缘，您最恨最怕的就是生您养您的母体在先天的绝望的自卑中，您写高贵的诗，想象以高贵的诗歌氛围营造或改变出身，您像这个社会的许多源于农村的诗人一样，认外国教

父，俄罗斯的、英美的、古希腊的。高洋先生，请最后一次披露您的成名经历好吗？

高洋：我们到外面去谈吧？这附近有个清淡酒吧。

老威：好的。

高洋：我早就用鼻子嗅出您的来意了。我承认，我是一名乡村孩子，是通过个人奋斗，考上了省里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毕业后志愿回县里行医……

老威：请问您是哪里人？

高洋：贵州赤水县。

老威：应该是贵州赤水县赤水公社红旗七队，地名是罗家沟，您的真名叫罗富贵，小名叫牛娃子，18岁那上，您高考落榜，就遵从父命，进了地区卫生学校，读了两年，就恋爱结婚，然后有了儿子，您大约有五年没给孩子寄抚养费了吧？

高洋：您没资格教训我，我是穷山沟出来的，我是叫罗富贵。正因为这样，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朝上爬，我的家乡大约几千年才出了一个艺术天才，我不能自己把自己埋没掉。是的，每年的《诗刊》和《星星》，要发表多少充满泥土味的诗歌，这样不忘本的农民诗人有什么出息？既不能出名又不能出国。天才不是书呆子，而应该以书呆子的面目出现，把天赋运用得恰到好处，路遥的小说《人生》描述了这一过程。

老威：您在公社医院工作了几年？

高洋：三年吧。真是地狱般的日子，我成天坐冷板凳，农民们信老中医，甚至宁愿找巫婆、神汉捉鬼，也不找我这个嘴上无毛的卫校后生。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座危楼上，冬冷夏热，外面一打雷，整座楼就咋咋乱响。我天生好读书，每月工资买书用去大半，就没法添置任何东西了，一家三口衣衫褴褛，像叫化子。可就这样，邻居和农民还来偷东西，没值钱的，就偷锅碗，甚至当着我儿子的面把他做作业的小木桌抢去。一位朋友曾号召所有的现代派诗人都来参观世上最穷的中国作家。他说：“高洋和邻居的关系是贫农和地主的关系，不过解放前是贫农多地主少，而现在是众多地主欺负一

个贫农。”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房内也下起小雨，我和妻儿忙着把书搬进唯一不漏雨的大床，堆成了一座小山。我们围着书山打盹，禁不住悲从中来。我高洋也是男子汉，我不能拖累妻儿同我一道过这种日子！于是我疯狂地写作，疯狂地寄稿，拉关系。我要出名！我非出名不可！

老威：您第一次离婚是什么时候？

高洋：1989年冬天，文学处于低谷，我虽然已出了书，调到了省里，但仍然觉得自己像革命小说《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竖着大农领在灰蒙蒙的大街上走。我知道大家瞧不起我，因为中国南方很保守，文人离婚往往酿成众叛亲离的事件，像乡土作家周克芹，刚有离婚的想法就背上了千古骂名。好在我前妻通情达理，知道缘分尽了就没多纠缠。我们一起到民政局领了证，然后一起从学校接孩子回家。孩子快十岁了，还有蹲在墙边看蚂蚁搬家的习惯，我说，儿子，爸爸走啦。他一声不吭，指甲一点点抠那潮湿的墙皮。我说，儿子，爸爸会回来看你的。他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老威：据我所知，您在离婚前有一段放荡的生活？

高洋：无可奉告。

老威：而且您在沉迷于酒色的同时，大写特写正气凛然的作品，您当时的代表作是《坚守阵地》和《真理与贵族》。

高洋：文化人格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兰波很放荡，兰波同样很高贵，况且兰波同样源于乡村。

老威：欧洲的田闭和中国不是一回事。高洋先生，最近国内出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传记小说。其中有个人物就是根据您的原型塑造的。我背诵一您段听听：“某个诗人夜读《聊斋》，对书中人鬼狐共宿一处成好事的细节把玩再三，决意模仿。于是乘朋友外出之机，奔袭其妻及妹，不料两女忠贞不二，合力抗日，将采花贼乱棒打出；诗人落魄而归，又被乱棒打泡——原来他的后脑勺上拈着一只湿漉漉的避孕。”

高洋：这是无耻的诽谤。我保持对这本书起诉的权利。

老威：我一定把您的愤怒转达给作者，揭人疮疤是很不道德的，至少不符合文明社会的规范。我觉得您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实用主义典范，至少能一步一步脱离使您声名狼藉的环境。1989年离婚后，您马上就迁到上海了吗？

高洋：费了些周折。虽然我的第二个妻子是地道的上海人，但是要把我的贵州县户口转进我国第一大都市，真比登天还难。我的战略是先当上门女婿，然后托关系找路子。我的恩人是上海一家大酒店的经理，同我妻子一样，是文学崇拜者。

老威：您的这位恩人我认识，他到处骂您是卑鄙小人。

高洋：他也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大人。我承认我利用他混入了上海滩，但我和我妻子也给了他精神和肉体的满足——这为我第二次离婚打下了伏笔。

老威：您的第二个前妻在哪儿工作？

高洋：上海圣彼得大学。

老威：好像上海没有这么个大学。

高洋：解放前叫“圣彼得”，现在叫××大学。

老威：您说××大学不就得了。这么说您是住在大学里？给您老婆当助手？

高洋：我写作，听音乐，散步，像老康德一样随身携带一只表，计算着散步的时间。

老威：您没具体的工作？这么说您是靠老婆养活？人家整整养了您七年，您居然就一脚蹬了？

高洋：离婚结婚都两厢情愿。现代人哪存在谁蹬谁的问题？况且，我有稿费。我还同上海的许多一流的先锋音乐家合作过，写清歌剧。

老威：别蒙人了，高洋，就您那五音不全的嗓门，连唱山歌都成问题，还清歌剧呢。

高洋：您这是采访吗？您是找岔来了。

老威：我需要听到您内心真实的想法，而不是演戏。当然，人

生就是演戏，但我不是一个好观众，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跑上后台，揭发演员脸上涂粉的正常举动。

高洋：您不需要涂粉么？后台是演员的私生活，警察都管不着。您的心态不对，您好好想想，中国有谁是可以通过结婚和离婚来尝试改变个人历史的？只有我高洋，结一次婚就刷新一遍历史，乡下人——省城人——上海人——德国人，怎么样？嫉妒得牙齿发痒吧？我的生活史也就是我的艺术创作史，喜新厌旧，或者喜旧厌新，像一个反复无常的欧洲贵族，总想领任何时代的风气之先。

老威：艺术需要诚实吗？

高洋：艺术是谎言，是改变现实社会的工具，您先一个劲地否定那无法选择的可恶的低贱出身，那淌在血管里的几千年的农民卑鄙的液体，您一次次地重复：“我不是农民！不是！！绝不是！！！”奇迹就会产生，一种冲劲把你引向虚幻的高处，上帝给您换了血，让您一次次地重复：“我是贵族！希腊的，俄罗斯的，德国的诗歌贵族！”于是您就相信了。您真诚地骗别人，给别人以“艺术的享受”，然后双方都得到了满足。

老威：您这样“换了血”或“断了根”的贵族在中国还有多少？

高洋：没有，或者全部。国门敞开后，真相大白，美帝国主义不再张牙舞爪，台湾人民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论是物质水平还是精神水平，我们都落后许多年，于是人人都巴不得马上换血做洋鬼子，但别人不会像我这样彻底。

老威：您还在又一次新婚热劲头上，自吹自擂很正常，也许再过若干年，您仍会萌生衣锦还乡的农民念头。

高洋：还乡？我的“乡”在哪儿？

老威：在女人怀里。您该不会像《百年孤独》里的能征善战的布恩迪亚上校，在无数行军床上搞出无数小高洋吧？

高洋：我的“小高洋”就是我的诗歌，它们比这个社会更善于撒谎，因此大家都认可它们，我这儿私下对您说，诚实和正直和真理和原则当不了饭吃；但只要肯公开这样叫板，就能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

08 嫖客耿东风

采访缘起：老耿戒嫖在生意场引起反响，大伙都说他标新立异，这同十多年前的标新立异简直南辕北辙。看着，世纪末的风水有可能朝回转，正如欧美经历了若干次性解放，又绕回家庭寻精神血脉了。当我 1999 年重阳节采访老耿时，他断然否定了我上述盲目乐观的想法。其时，成都市面时冷时热，谁也搞不准明天流行太阳、小雨还是些微的凉风？一个外地朋友说，成都的绝妙在于高中低层的人民都能找到自己享乐的去处，除高级宾馆、夜总会及旅游胜地外，发廊、药店及烂馆子几乎配套存在于每条街巷，而乡下民工进的是大棚录像馆，门票一元，看两三部港台打斗或言情片。看来，老耿戒嫖不太合时宜？

老威：听说你戒嫖了，老耿，我不太相信。

耿东风：你不信算球了。

老威：好大的火气！憋太久了吧？

耿东风：你也这么轻浮，

老威：你又不是经常出入风月场的人，干吗像苍蝇一样盯着嫖呀赌这些破事？你的精神有缺陷。

耿东风：你在嘲笑我？

老威：没有。我羡慕你，至少在有时候。生活单调、乏味，除了写作，除了找朋友喝茶，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我土生土长在这座陌生城市里，经常觉得自己没长大，还是含着手指数站在尘土飞扬中打量行人的痴呆孩子。我几十岁了，注定了是这种命？我就不可以寻一些刺激和变化？

耿东风：你没事找事，老威。你老婆多好，眼睛充满清纯，仿佛刚刚在打量这个暗伏杀机的世界。干什么事都有成本，家庭之所以永恒，就是两个人的结合可以把时间成本降到最低。性生活免费，情感免费，生活开支纳入长期的计划，除了养育孩子，你尽可以干

喜欢的事。别打插，还不满足呀，这些年你写了多少东西！女人算啥，交配了，然后消失掉，然而你记录交配的文字留下来，你老了，再回头读这些文字，会热泪盈眶的。

老威：你是嫖客吗？什么时候提升到文学高度了？

耿东风：我是地地道道的嫖客，80年代末，全中国人民还没醒的时候，我就开始嫖了。我是个把书本当真的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描写过妓院，或婚外恋情。那么，人的本性肯定好不了。我没有老唐虚伪，有手腕，把老婆哄得一往情深，我老婆是妇产科主任，天天接触堕胎、私生子或种种妇科疑难杂症，凭本能也能把男人的德性透视得一情二楚。她与我的谈判结果是，嫖，适可而止；找情人，绝对不行。她也晓得生意场上，没一个男人下身是干净的。顺便提一句，她拜读过你的《嫖客唐东升》，竟盯住我捧腹大笑，说：“老威把你们这帮臭虫都嫖了。”

老威：你老婆是所有男人的知音，你在家咋过日子啊？

耿东风：她一手遮天，又网开一面，战争年代，绝对是女将军的料，女儿也被她训得刚强果敢，小小年纪，就是少先队大队长，还天天练一小时空手道。我在家里没地位，只好拼命做生意。书发得一般，枪倒是越打越出名。我有个怪癖，性高潮时不由自主地拍打小姐的屁股，啪啪啪，发出整齐的节奏。我曾梦想做个爵士鼓手，80年代做文学青年，曾在家练过将近一年，却无用武之地。《素女心经》里讲采阴补阳的交合节奏，应是九浅一深，九缓一急，我领会为一种鼓点。轻重缓急，深入浅出，啪，啪啪，啪啪啪，咋样？

老威：你都把嫖弄成一种“艺术”了，看来戒掉不容易。

耿东风：我已在长沙书会上当众宣布了。开始都认为我标新立异，于是大伙围着我，企图重演拉人下水的戏。盛情难却，我跟去了，大伙有意要了间大黑屋，七八对一起搞，象横七竖八的超级大螃蟹，有个鸡妹还从我的脚后跟摸上来，触到胯间，我却感到痒痒，忍不住哈哈大笑，把大家的情绪都影响了。我只好退出门，说声：“对不起，我阳痿了。”

老威：我服你了，老耿，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地。我觉得有些

点蹊跷，你不是突然就看破红尘，立地成佛了吧？谁与佛做书生意呢？

耿东风：我真的很恶心。

老威：讲你的故事吧。

耿东风：那天夜里十点，我们一拨人去长沙郊外的一个度假村，先在卡拉OK间唱一会歌，照旧，每人都要了小姐，我要的小姐叫阿红，可能是化名吧，但我听出她的川东口音。阿红有些弱不禁风，不实惠，并且苍白的脸蛋有浅浅的眼袋，所以我最后点了这个剩下的。刚坐下，还没唱两曲，她就向我诉苦——父亲得了肺癌，住在重庆的医院里，下岗的母亲倾家荡产也付不起医药费，一拖再拖，已过三个月。院方警告说：他们也亏不起，再不补交费用，爸爸只好被强制出院了。我妈一个星期来几封信，钱，钱，钱，我把所有积蓄寄回去，还不够，我明明晓得这是无底洞。可他是我爸爸呀。爸爸自小对我要求很严，我考上了长沙的大专，因为穷，上夜总会坐素台，慢慢，不能拒绝物质的引诱，下水了，无所谓了。我寄钱回去，父母还认为我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如果爸爸晓得了，还不气死。她边说边抽抽答答的，太煞风景。我以为她在编故事，比这动人十倍的东西我也一笑了之。我说：“戏做得太过了吧，何必呢，高高兴兴地做生意嘛。”阿红愣了一下，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就强作笑脸来依偎我，她撒娇说：“这个月我天天满勤，今天你是第七位了。”嫖客就喜欢这个，我说：“你可以挂头牌了，小凤仙。”她说：“你温柔一点，我怕痛。”我说：“劳动嘛，伤筋动骨难免的，我花钱也肉痛。”她脸都白了，说：“给我一点时间准备好吗？求您了。”我体内涌起一种把握生杀大权的得意，就牵起这只羊羔开房去了。

老威：我有种预感，你会栽在她手里，说不定是个黑店，你撞上了仙人跳。

耿东风：仙人跳？

老威：就是女人作诱饵，进屋刚脱光衣裤，壁间蹦出几条大汉，诬你搞了他们家失踪已久的嫂子。借机敲一笔钱财。这营生解放前

的上海滩较普遍，现在成都营门口一带有点姿色的打工妹，也无师自通。

耿东风：我的确被刷得赤条条的。

老威：亏你是老嫖客。

耿东风：不过不是肉体，老威呀，文学把你熏陶成猪脑壳了。80年代，某直辖市的宣传部长在深圳嫖宿被抓，那恐怕是遇上高级仙人跳了。而我老耿，是仙人跳他师傅。

老威：我低估你了，抱歉。

耿东风：这个度假村开了十几年，是个饱经沧桑的老鸡窝，里面人才济济，官场、黑道、商界、娱乐。样样齐全，你想，若没相当的背景，能欣欣向荣到现在？我拉阿红进了房，一进门就来个大鹏展翅。我瞅了眼手表，算时间，这是比钱更永恒的成本啊。我是速战速决的料，绝不来含情脉脉或打情骂俏那套。男女生理结构不同，哪怕是婊子，她们也下意识地注重彼此的感觉，用虚情假意作烟幕。否则，你对付的就是一块裹着人肉的木头。听说老外的职业道德普遍过硬，在东北，俄罗斯姑娘特棒，北京各大学的许多留学生也搞这特殊的勤工俭学，几个手势一打，别人自会从头舔到脚，舒服，都说我适合搞外国妞。

老威：扯远了。

耿东风：哦。刚才我说到大鹏展翅，这是优势，我手臂特长。双臂过膝就能当皇帝，我差一点，所以做了书商。阿红缩在被子里，比一只老鹰蛋大不了多少。她的奶子太吊了，好在奶头还有点上进心，在平板胸上悲愤而醒目地翘着。她脱裤子太迟缓，今人联想到祥林嫂，我急躁地催促，终于不耐烦，抓住她的裆向上一提，裤衩就飞到墙角了。她发出骇人的喊叫！接着把被子紧紧抱住。我从来没嫖得这么费力，就生气说：“你既然不愿做这笔业务，就拉倒。这种档次的服务，我连小费也不付，还要找你们经理，赔偿精神损失。”说完就开始穿衣服。阿红扑过来，拦腰箍住，连声道歉。绝望得把指甲都抠进我的肉里了。唉，算了算了，将就着搞一盘，趁早脱身吧。我蹲下去，把脑袋搁在床沿，拿开她的手。她朝后退，

我捏住双胯拖回来，她不动了。

我起兴了，半跪着上马。我嗅到了下身强烈的异味，“原来是只病鸡！”我沮丧之余，就摸出安全套戴好。不料，我招数使尽也插不进去，抬腿，掰胯，每试一次，她都痛得哆嗦，咬牙切齿，连脸都抖歪了。

她把我抓得紧紧的，尽全力配合，那门依旧纹丝不动。我朝那儿抹了大半瓶润滑剂也无效。不得已，只好拿过台灯一照，我吓傻了。她哪地方已肿得比一匹砖还厚，浓血象岩缝的溪水，源源不断地渗出。床单染了，我的玩意儿也染了。我不是嫖客是屠夫！泄气了，我准备撤退，阿红却哀求说：“再试一回。”

“抱歉，太抱歉了。”我下了床。

“再试一回！”

“你应该上医院。”

“吹一盘行不行？效果是一样的。”

“没情绪了。你呀，病成这样了还做业务，要钱不要命。”

“先生你行行好，让我做。”

“我不是杀人犯。”

“家里等着用钱，我爸爸肺癌……”

“你太无耻了，风月场中还有脸提自己的爸爸。”我说着冲进卫生间清洗，不提防阿红却大哭起来，我皱着眉头回望一眼，竟看见她边哭边疯狂地捶击自己的下身，我差点晕了。后来她哭累了，手打得血乎乎的，就使劲掐那地方。她望着天花板，一下一下地抽长气，仿佛在向一种看不见的主宰哭诉：“我就剩下这点东西可以换钱，我全身上下就剩这个了，你还不让我卖！你狗日太狠心了！爸，没办法，我莫法了……”

我打了几个寒战，接着汗如雨下。我为啥要到这儿？就是为了经历这一幕么？我掏出 800 元钱，她接过去，一个劲地磕头，我应该给她磕头才对。这女孩是天使，应该载入《新二十四孝》。可直到此刻，我仍想呕吐。这些年，我都干了啥？

老威：喝口水吧，老耿，平息一下。

耿东风：已经过去了，犹如一场地震。

老威：也许，只是偶然事故？毕竟你十几年才撞上这么一回。

耿东风：你太冷酷了。

老威：我不能被你的故事牵着走，像言情小说，两个男人相对无言。我真的有些尴尬……还能继续我们的谈话吗？

耿东风：当然。

老威：你戒嫖了，生意怎么做？还去夜总会？

耿东风：去。勾兑关系，小姐是必不可少的，聊天，唱歌，做游戏都可以，但仅此而已。大伙都笑我老了，建议吃伟哥。我还用得着药物？笑话。

老威：生意淡季呢？

耿东风：陪老婆孩子逛街，成都难得有好天，走在好天里，行人花花绿绿的，灿烂无比的阳光中，感觉不到社会还有另外一面。

老威：我有个不恰当的疑问，在这次之前，你就从来没把小姐当人看么？

耿东风：付钱买一种满足。要过这个坎，这个所谓的心理障碍物，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嫖客。记得初入道时，在深圳郊区遇上个鸡，当时穷身上只有五十块钱，买了包烟，花去四元。我还以为这个乡下姑娘爱上了我，就想借机白占便宜。谁知她脱光了才与我讨价还价。我从 200 把价杀到 50，她说再低就不干。我咬牙答应下来，完事后，就将身上所有的票子都点给他。她一分一厘地验收，竟生气地质问我：“讲好五十元，咋只有四十五元零八角？”我回答：“买包烟四元，上了趟公厕两角。”她说：“那不行，你要把零头补齐。”我说：“零头是放在桌上的那包烟。”她说：“我带走了。”我说：“你还是留两根给我解解闷。”好没心肝的婆娘，她摇着数了数盒内说：“只剩十五根，我留一根给你，烟抽多了不好，尼古丁致癌。”

我望着枕边孤零零的烟，恨死那鸡了，但人穷志短，罢了。我

挨了两天饿，第三天，才认了一位报社的同乡，找了份报童的工作。

老威：饥寒交迫还嫖？瘾够大的。

耿东风：谁也没把谁当人，老威呀，你瓜得可爱。

老威：这是你第一次下水吧？

耿东风：差不多。

老威：你戒嫖了，我倒被你激得跃跃欲试，那个世界够丰富多彩。

耿东风：一旦文学情结用错了地方，代价就高了，稍不小心就倾家荡产。当然，你是作家，说不定哪天真能撞上杜十娘、李香君一类，可你老婆咋办？一离婚，你娃就惨了。还是做个模范丈夫，既安全，时间成本又最低。

09 招魂术亲历者何老东

采访缘起：何老东乃四川万县人，现年 64 岁，50 年代参加过抗美援朝，任过团部文书。后负伤转业到贵阳，因喜欢写写画画，就被组织分配到某省级文化单位，几十年来，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 300 余万字，并历任编辑、记者、创作员、处长和正局级领导。

由于发表作品，我与老何在 80 年代神交已久，98 年元旦，我与杨远宏、李亚东、蒋浩等朋友应邀抵贵阳，在阴霾弥漫中，爬黔灵山，听何老东一再鼓吹招魂术，本欲亲自去见识，无奈神婆的生意过于兴隆，即使马上凭熟人关系预约，也得十天以后。

幸而老何口才极佳，令这篇采访有“身临其境”之感，众友均称“不虚此行”。其日夜，我与老朋友唐亚平不期重逢，惊喜交集，君以玉屏箫笛一对赠之。

老威：你亲眼见过巫术吗？

何老东：我昨天刚看过神婆张某，她三十来岁，在贵阳乃至贵州都有相当大的名气，如果你感兴趣，我就安排人去预约。找她的人特别多，你只能排在一个星期以后。

老威：这张某是什么人？

何老东：贵阳郊区的一个普通农妇，据说七岁的时候，突然抽风，医生想尽了所有办法也止不住，于是就请端公到家里招魂，折腾了三天三夜。烧符、化水，并在水缸内看见一男一女两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在搏斗，端公一剑刺去，又满山遍野地张贴拿鬼招魂的帖子。大约到了第五天的头上，已浑身冰凉、气息全无的张某突然睁眼，说见到王母娘娘了。

老威：胡言乱语吧？

何老东：开始人们都认为是胡言乱语，可突然发现，这孩子的嘴没动，所谓“声音”是从腋窝发出的，左边为男声，右边为女声，

还能一问一答。这“声音”叙述了张某抽风死去，又死灰复燃的过程，她的七窍被堵塞了，灵魂出不了气，这就好像一个人被关在窗户钉死的屋子里，憋坏了，就拼命蹦达。灵魂蹦达得越厉害，身体也就抽得越厉害。后来，有人用剑在双腋戳开了两窟窿，灵魂嗖地钻出去，她的身体就不抽了，落在床板上死了。她的灵魂上天入地玩了几天，看见端公到处张贴唤它回家，正高兴得笑，却望见自家房前停放着一副小棺材，父母正张罗着要把自己的躯壳放进去。这才慌了手脚，赶回来入壳还魂，据张某讲，再晚半个时辰就装棺入土了。

老威：这太玄了，前一晌的报纸还在揭露人用肚皮、腋窝或其他部位说话是假的，专家也出面证明这是神汉、巫婆骗钱的伎俩。

何老东：你信记者的话？

老威：不信。实用主义者特别可怕，为了某种新闻的需要，他们可以绞尽脑汁去论证、去判断什么东西是真，什么东西是假，而除了这种快餐式的主观，他们一无所知。我从小在农村生活，对你讲的并不感到陌生，我愿意在传统的背景下考察这些现象。

何老东：我也在农村生活过，但张某的情况同寻常的乡村迷信不同，她的双腋都有明显的疤痕，发音时，疤痕就像嘴唇一般翕张，我们这个文化机构二十多人，几乎都去看过，我还将她请到家里来当众演示，不过出场费要 200 元。

老威：张某到底有何神奇之处？

何老东：她最大的手段就是招魂。你只要把名字告诉她，她就开始念念有词，不一会，她卜地倒下抽风、吐白沫，然后直挺挺地站起来，此时，亡灵就附身了。四十年前，我和九岁的弟弟偷着下河洗澡，我生性胆小，不谙水性，只能挨着岸边扑腾几下子，弟弟与我性格相反，他游到河心时，一个浪打来，他摇了几下手就没了，当时我不敢去救他，也忘了叫人，只呆在岸上发抖。这事使我内疚。我做梦都想见见弟弟，向他解释我当时吓傻了。我通过张神婆招的第一个魂就是我弟弟，我一听就知道他在左腋里说话：“哥哥，你喊我来干啥子？”还是他小时候的尖嗓门！我像挨了雷劈一般懵了，

下身一麻，裤裆就湿了，接着弟弟又说：“东娃子，明明是你尿的床，你偏要赖我，惹得妈打我的屁股，哎哟！”我说：“西娃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在想你哟。”弟说：“我晓得。”我说：“因为你，我这辈子再也没过过河，后来，长江里漂过一对水大棒，男的趴着，女的仰着……”弟说：“我晓得，前两年妈到阴间来就告诉我了。”于是我说：“西娃子，你不怪我么？”弟说：“我命中注定只能长这么大。”我说：“听你的话，算成熟了，怎么声音还是几十年前的？”弟说：“本来死了就不会长了，但我周围都是大人，渐渐我就学成大人思维了。”我说：“你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么？”弟说：“我是淹死的，只能住在水里，我的双腿害风湿关节炎，被锯掉了，我长了一个鱼尾巴。好在我的家叫通天河，有一次我不知不觉就游到天上去了，我在月亮上厕了泡屎，并且把屎递给那些升天堂的人，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说：“西娃子，你还那么淘气。”弟说：“阎王爷见我乖，就逗我去捉下一个淹死的小孩，并让它的魂来代替我。前几年我不忍心，这几年没机会了，上游有造纸厂排污，河水变臭，连鱼虾都绝迹，别提游泳了。”我说：“爸妈在干啥？你让老人家来同我说话。”弟刚要回答，声音就被突然插断了，张某跌在地上喘息道：“这坏蛋，扫我一脚！”我揪住她质问：“你为啥不让我父母来？”张某道：“我不能同时让三个鬼附体。”我说：“我多给钱还不行？”张某说：“我从千里之外的万县把魂招到贵阳来容易么？”于是不再理我。

老威：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提钱呢？这不是褻渎亡灵么！

何老东：这都是市场经济闹的，后来我一再赔罪，张某才答应下次招引我的母亲。

老威：真叫人难以相信！如果你不是文化机构的领导，我会认为你在编故事呢。

何老东：那你就在贵阳多往些日子，我明天一早就去给你排队预约。你先想好，先招谁的魂，最好是直系亲属，到时你的感受会比我更强烈。

老威：很遗憾，我明天要回四川。

何老东：你认识四川的诗人某某吧？

老威：我们很熟悉。

何老东：那是个通灵的家伙。去年他到贵阳，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我给他讲张某的招魂术，刚讲到鬼附体时，他浑身一阵哆嗦。突然电灯熄了，我摸着火柴，点了蜡烛，我听见某某喃喃地说：“我真想找找这位大仙，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听听姐姐的声音，她 88 年遭车祸死了，我连她的遗体也没见着，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但这些年我一直感觉她在。”于是我答应去安排他们姐弟通话。可他又摇头说：“见着姐姐说什么呢，我没给她烧过纸，

今年清明，我和老婆一定给她烧纸。唉，巫术真是无处不在呀，阴阳相隔，阴阳界的人彼此思念对方，你感应到了，却摸不着，这是最大的巫术。”

老威：某某描述的是他个体生命中的某种仪式，在现实里，我们要预约某个人，到什么地方见面，就打电话、发传真，也可以用电子邮件，而在超现实里，这一切也演化成类似的程序，在四川巫山一带的传统巫术里，驱鬼、招魂的仪式有较强的代表性，瑞公的法术往往能调动大家的情绪，于是都沉醉其中。

何老东：不错，我们招魂的都是个体生命中虚幻的部分，某某的《死城》里有一句“赶尸人的吆喝不绝于耳”，赶尸人在哪儿？谁见过？

老威：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张某把你母亲招来了吗？

何老东：对，张某一抽风倒地，我就听见妈在埋怨：“东娃子，你少熬夜哟。”我忙说：“妈，文化人的工作就是熬夜嘛。”妈一听就气了：“工作个屁，你熬夜打麻将，把工资都输光了，还落下个胃病。”我大吃一惊：“妈，你连儿子的底细都晓得？”妈说：“以前在的时候，你在外省工作，干啥妈都不晓得，因为路途太远了，你写个信，打个电话回家，都是你说啥我和你爸信啥。你是文化官儿，也给家里人长脸。现在无所谓了，在阴间也没个省界国界，你干啥妈也瞧得清清楚楚。还骗说熬夜写文章呢，你已经大半年没摸过笔了。妈就在你的隔壁呢。去年腊月初四，你趁你媳妇不在家，

干啥啦？”我心虚地应道：“我干啥啦？”我妈见我不老实，就扇来一巴掌，我屁股上一阵凉嗖嗖的：“你偷了个女人回家睡觉，还哄人家说过几天就离婚。”

老威：你妈这样明察秋毫，大概你和她只隔着一堵玻璃墙。

何老东：玻璃墙？我当时真有浑身被剥得精光的感觉，张某还在地上抽筋、腿都蹬直了，我却总觉得她站着，或者我妈就站在她的身上。我上前两步，却什么也摸不着，我妈在一片雾中，那“玻璃墙”时退时进的。唉，我忘了在母亲的眼里，孩子总是**裸的。我旁边的两位朋友也目瞪口呆，幸好我没做其它丑事，要不我妈也给抖了出来。

老威：怎么会呢，母亲最疼孩子的。

何老东：阴阳界的观念不一样，阳界是文明社会，人有许多伪装的东西，因为没有大体符合社交准则的面具，就无法与其它人交朋友，君子成人之美嘛，那个“君子”又去揭人之短呢？而阴间是人类在地上绕了一圈之后的归宿，命都没了，还有啥放不开的？

老威：你母亲在阴间情况怎么样？

何老东：不愁吃不愁喝，因为人死了就不吃不喝。我问：“妈，那我每年给您老人家烧的纸钱怎么花？这两年改革开放，祭品市场也活了，还有‘幽冥银行’发行的货币，面值都是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甚至还有兆亿元的，我见大家都抢着买来烧，也随大流焚了几大捆。”妈一听又叫骂开了：“你这浑小子烧假钱给我？”

老威：你妈脾气够大的。

何老东：可不，我刚要解释，张某醒了，又不满道：“你是文化人，不能与亡魂抬杠，你得顺着它们，话才能说得长。要不鬼在我身上动手动脚，弄得疼。”

老威：不瞒你说，我出生在川北农村，那里的山川地貌同贵州很类似。而且出殡仪式非常隆重，从择墓、入棺、埋葬，都要请巫师跳神。可这无法替代生离死别的感受。阴阳的鸿沟真能跨越吗？还是仅仅为一种催眠产生的幻觉？印第安人擅长药术，据说向你的鼻孔喷一股烟，你就飘起来，看得见乳白门楣的天堂，因此印第安

巫师在世界上名气最大。

何老东：这不是幻术，张某招了二十多年，一千个鬼有了吧？我没听谁告发她作骗。亡魂的感召力虽然不如宗教，但它有抑恶扬善之功。

老威：据我所知，揭露巫婆神汉的专家和记者们也曾四处寻找张某，企图当面测试，而张某却东躲西藏，这是为什么？

何老东：所谓专门揭露某种巫术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偏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了两千多年，至今也没结果，这是因为两种东西都是人们需要，唯物强调看得见的秩序，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生命短促，你一辈子又能见多少？听多少？张某凭一种心灵感应，就知道记者和专家们是怀着搞垮的目的来的，他们不想招魂，也无魂可招；有了科学作盾牌，就不怕撞鬼。招魂为业的张某也怕鬼，这些现实的“鬼”会使她下地狱。

老威：你作为文化机构的领导和著名作家，你觉得这样说合适吗？

何老东：你错了，当我与你谈论巫术的时候，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领导，而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站在天地之间，让源于远古又贯穿始终的声音层层困绕。我死去的亲人们正是这个声音链条的某一环，这一环虽然不起眼，却是不可缺少的。你仔细想想看，《易经》难道不是一部招魂术么？乾坤两卦不断繁衍，成为六十四卦以至无穷，而无穷归一又是乾坤两卦，在这个循环当中，你是否是某个祖先的化身？你说的是谁的话？你淌的是谁的血？几千年以前的人害过与你同样的感冒么？你拥抱的是否是古代的某个女人？当然这种联想张某是不会的，张是文盲，但她确实能在某一特定环境为信者打开血缘的暗道。你可能不知道，她的腋窝还能讲许多种方言。

老威：什么意思？

何老东：也就是亡灵都操着家乡土语。如果某个亡灵的家在大西北，你招它还得等好几分钟，你能感觉它急促的喘息和拍打灰尘的声音。

老威：我还会来贵阳，下次一定亲自找张某。其实在中外典籍里，由招魂而进入生死对话的描述很多，德国电影《古堡幽灵》中，鬼魂还在大街上跳舞呢，虽然这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套用，但也折射出人类普遍的欲求。我现在不敢断言巫术的虚实，因为我们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东西太多了。只要在房子、股票、工资、发表、开会之余，一个人偶尔抬头望一望夜空，想想那些星星是怎么回事，就会感觉到什么是巨大的孤独。科学家们在努力，试图论证与人类对应的高等智能生物的存在，他们把运载着大量人类信息的飞船推向太空，推出太阳系，还沿途播放贝多芬的《欢乐颂》。这种大海捞针式的寻求对话是多么迷人啊。

何老东：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招魂的方式，整个地球都在宇宙中飘荡，我们的根在哪儿？家又在哪儿？科学家是在为人类招魂，而张某作为一个文盲，只能为凡夫俗子招魂。人死了，就完了么，生命如此简单？我现在真切地感受到亡魂，我的父母和弟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如同宇宙。对，宇宙也是活的，有感情的，不过这种“感情”大得令渺小的人怅然若失。我还会从张某的腋下听到已故亲人们的声音，我也希望张某让你享受到同样的狂喜。因为亡魂比我们率真、善良。

老威：那么暴死之人就无魂可招？

何老东：不一定。哦，忘了给你讲，张某还破过几个案子，最著名的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在公安局侦破的过程中，死者亲属在别人的引荐下找到张某，于是作法招魂。不一会，死者就说话了：“好黑心罗，插了我七个眼，现在我还在淌血。”亲属问：“谁杀的你？说出来，政府去抓他。”死者说：“当时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了，啥也弄不清，但我感觉是熟人，说不定还是街坊。你这几天去挨家挨户地摸一遍，谁最近外出不归？”

老威：案子就这样破了？

何老东：当然，鬼话不能作为证据，有人试图把这些鬼话录下来，但磁带一片空白。但巧的是，凶手的确是死者的邻居，谋财害命后逃往广州，终被抓获归案。张某因此还名声大震呢。

老威：“名声大震”也是传出来的，“招魂破案”之说与我们今天的谈话正题还不一样。有点类似包公故事或狄公案类的传奇。

何老东：那今天到此为止吧。

10 边缘学者洪声

采访缘起：拜访洪声之前，我很犹豫，因为他已做了学者，就不再是底层人物了。是另一位学者李亚东纠正了我的偏见，他说：“我在成都一个畜牧单位做了几年学问，还离‘中心’远得很，更别提洪声了。”

至今，洪声没出过书，如果不是教书和外文水平都很高，他升教授肯定困难，他早过了不惑之年，同事们却多次建议他找机会留洋。

1996年9月13日下午，我与李亚东，蒋浩等朋友搭人货混装的公共汽车去成都效外的某大学见洪声，暑热未退，尘土飞扬，我们在途中盼望洪声，犹如在沙漠中盼望甘泉和绿洲。

老威：在出发之前，我研究过关于您的资料，发现您一再强调“边缘性”，这个名词在当下使用率很高。由于您的行文风格有些晦涩，因此我不明白您的“边缘性”与别人的“边缘性”有何区别？这样想着想着离开了成都，一路颠簸来到这儿。破公共汽车真有些像《围城》里方鸿渐等人搭着去三闾大学的那辆，人货混装，沿途抛锚，幸好不是战争年代。我终于悟出点门道，所谓边缘是否就是“地缘”？或许地理位置决定了您的研究方向？

洪声：您的比喻很妙，我任教的这所大学的确是九十年代的“三闾大学”。您看到了，学校周围都是农田，连到乡镇去也得走好几里。钱钟书先生博古通今，他书中的三闾大学典自屈原被放逐时的官职“三闾大夫”。不过，祖代的流放地已同几千年相去甚远。

老威：您的价值取向是屈原还是方鸿渐？

洪声：您这种问话方式我很为难。我是搞文学理论出身，89年后，转向了哲学，兼顾社会科学。就学科来说，我应该想法设计钻进北京，至少在省会，那样能多交朋友，多汲取国内外信息，而现在，我只能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好在有电脑，有互联网，能够

捉摸一点时代信息的尾巴，但这毕竟很隔。生存环境是极重要的，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你首先得改变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就这样，至少在本世纪内改变不了。您说我做屈原？真可笑。莫说报国无门，就是有门，我也不想去报。并且屈原爱国也爱得荒唐，现在楚国在哪儿？在湖南省，屈原就是为了湖南省被兼并投的江。做方鸿渐，更可笑，人家好歹留过洋，有这种背景的人，在今天让人羡慕死，还会从上海滩节节败退到三闾大学去做副教授？

老威：我指的是做精神上的屈原。八十年代，朦胧诗人杨炼就有“屈原”情结，他曾经给自己一本重要诗集命名《礼魂》。

洪声：这怎么可能呢？屈原的《楚辞》是有空前绝后的才华，但是你把它读得再透，也做不了屈原第二。屈原的诗源于一个致命的错误情结，他的思想很糊涂，生活作风很混乱，他把报国无门的问题、山川神鬼的意象，以及失落的自恋幻觉揉和到一块，竟产生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激情。从现代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激情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不犯致命错误就成不了伟大诗人，精神上的升华必须以现实的挫折作为代价。你发过疯吗？你吃过屎吗？你是头猪吗？你被宰过吗？您如果这样问一般群众，准打架，只有伟大的诗人才对此回答“不！”或“是！”

老威：您的诗人只有到医院去找。我看见过一位，他刚从医生手里逃出来，躲在走廊角落，端着一只痰盂喝得津津有味。

洪声：但他不写诗，也不狂妄。

老威：看来您的研究的确“边缘”。

洪声：跟您闲扯呢。其实我指的边缘是针对中心话语而言。中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也有“坐而论道”的传统，那么论的什么道呢？当然是关于天下的大道。孔孟是入世的，朱程也是入世的，他们维护正統的忠、孝、仁、义、礼、乐、爱，沿袭至今，形成了一套精深博大的种族文化，另一方面，同样精深博大的老庄，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主要论述的是超凡入圣的大问题，大宇宙。因此，无论是儒道互补中的“进则兼济天下”，还是“退则

独善其身”，都是非个人的。既使在这种文化中有大量具体、细节化的个人修为描述，也是作为某种抽象的、集体的前提，或论据出现的（当然，我这里所言不包括野史、传说、小说等“乱性”的东西）。五四运动为什么要提出“打倒孔家店”？我想主要是针对其“存天理，灭人欲”的部分。可惜，五四运动流产了，它发生的时机不成熟，它真正的内涵至今没被人认识。本世纪以来，我们依然同我们的祖先一样，被大问题，大抽象所感召，我们只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来没问“天下”是什么？谁的天下？从古至今，天下有兴亡吗？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分疆裂土，宋朝统一中原，天下不还是“寡人的天下”么？元朝灭掉宋朝，清朝灭掉明朝，还不是一样的“各民族大团结”么？与你，与我，有何关系？过去了许多年，改朝换代的“血流成河”在历史书里就感受不到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年复一年靠这些“历史和文化积累”搞课题研究，写文章发表，以此换取工资和稿费，这就是“坐而论道”。

把具体问题抽象化，把社会问题理论化，长此以往，我们将失去作为人的感知。我们不是人。对，传统文化这样回答，你们不应该满足于做被七情六欲支配的“小人”，而应该做社会公认的“大人”，大人者，现代社会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大人因为某种契机，从我们这群凡夫俗子中走出去，在舆论的一再宣传强调下，离我们越来越远。大人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缺陷，成为一个抽象的完美的目标，我们终身向往这个目标，被精神上的道德崇高感笼罩。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破了“四旧”，捣毁了许多寺庙和古代像，但就其实质，依然没有走出传统文化的范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这“敌人”是谁？为什么不说“凡是刘少奇、邓小平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因为敌人的范围比刘、邓大得多，凡是不顺眼的人都可以是你的敌人，或者说红色司令部的敌人就是你的敌人，至于敌人与你有无恩怨，你为什么混在大群“我们”中去“拥护”和“反对”，就不用考虑了。还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什么“国家大事”？他干吗不说“我的大事”呢？古代帝王说：“朕即国家”。专横而坦率，可在这儿，却以

“国家大事”这样抽象的、泛指的概念来代替个人的、具体的争权夺利，这种词语的转换无论在中国文化还是政治中都非常关键，所谓统治术完全是语言游戏。因此正义、真理、公道永远是强权和阴谋的孪生姐妹。

汉民族在人间大道上走着一条漫长、曲折、黑暗的路，今天，人道主义开始复苏了，我们开始回到人的本身了，但社会却因此失却了主心骨。中国已习惯了运动，政治、文化或经济运动，运动就是压倒一切的热点。人们习惯被运动卷着走，一旦改变了，让其在市场中去“主宰自己”，就变得惶惶不可终日。知识分子同样具有这种“民族特点”，怀着“失重的危机”，他们寻找并握出能在知识界引起共振的“中心话语”，形成“主流意识”。在这里，话语权利至关重要，联络一帮文化精英垄断话语权利，就能掌握天下的“生杀与夺”。

老威：但秀才毕竟是秀才，这不过是他们的幻觉而已。

洪声：这种急功近利的幻觉吸引着大批学人，令其沉不住气，学问也就像社会形态本身，沉渣浮面。其实我觉得，操作热门话题本身并不重要，例如鲁迅热，胡适热、林语堂热，顾准和陈寅恪，人文精神的讨论，本土化与殖民化，后现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人权、国情与民主进程，历史、遗忘与个人内心真实等等，热点一个追着一个，每个人都有权参与讨论，哪怕一个中学生，一个打工仔，只要他偶然翻阅了相关书籍，都可以谈谈看法。问题的关键不是谁是谁非，谁的观点最发人深思之类，而是话语方式，你用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词汇什么的句式结构来表达你的观点？弄得不好，你会不知不觉地用一种垄断式的语气去肯定民主，用“文革”的词汇去反思“文革”，用一种欧美哲学或文学化的句式结构来谈论“回归本土”，因为大的抽象的传统已化作血液、动作、思维习惯，离开这一切，你就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穷二白“文盲”，你谈论纯诗、纯理论、纯学术时，却被一种“潜政治”所支配。

老威：谈到话语的习惯，我现在有一种“四面楚歌”感觉。除非有大的灾变，例如坐牢、流亡、生离死别等等，我想一个人一辈

子是极难改变他的语言习惯的。特别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现在至少四十多岁了，他们是承先启后的一代，从他们身上能铲除意识形态影响？

洪声：因此要作些清理。首先是记忆的清理。因为我们现在的语言方式是记忆的一种积累。今天回首解放以来的种种运动，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拉线木偶，没有家庭，没有私生活，因为家庭和私生活都是时代文本复制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世界上哪个民族的历史是无形的大复印机弄出来的？我这样想着，感到心里有泪，却淌不出来。我把记忆情感化，这样会影响它的真实。从我个人开始，一点一点地清理。这样，在冥想中，我或许会花三年以上的的时间，写成一本书，它将否定我以前那些“才华横溢”的东西，我在吃力地学习说话，学习表达和领会记忆。我是个婴儿，向长眠的母亲怀里走去。唉，时光真能倒流多好。

老威：您觉得知识分子还没有学会说话吗？

洪声：我觉得知识分子还得从头学说人话。

老威：那您说的什么话呢？

洪声：“边缘人话”，如果别人不感兴趣，就当它是自言自语吧。

老威：“自言自语？”如果您成天自言自语，您凭什么当教授，凭什么拿工资和带研究生？

洪声：我们讨论的不是职业，心灵的独白与职业无关。我是一个称职的教授，带着研究生钻研大课题，抽象而无用的课题。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引证适当，确切，论文不用修改也能过关。

老威：您在从事职业欺骗。

洪声：可以这么说，但这能帮学生解决现实问题。

老威：您刚才对沿袭至今的传统的批判非常有力，可我感到有……我一时没想透有什么。您仿佛从您的批判对象的另一面在施展“权利”，纯抽象、纯具体；大、小；天下、个人世界好像由两座对抗的峰巅组成。

洪声：这是什么意思？

老威：我按您的意思打个比方：大的，抽象的，天下的历史和现实使命，是由全体人民一齐承担的，真实，落实到个人，谁也没有承担什么。因为大家都参与的活儿是最好偷懒的。

洪声：对。

老威：如果人人都这么抽肩膀，天下也没有，国家也没有，甚至家庭也没有——因为一结婚，就意味着您将承担丈夫和父亲的角色，紧接着，要维持家庭，就必须工作，进入社会角色。再紧接着，您要想挣钱多，有地位，给老婆孩子长脸，就得更多地介入世俗社交，做顶天立地状。仅这一点，知识分子同凡夫俗子没啥区别。所谓“区别”，是在精神领域。“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您刚才叙述的正统历史的另一面，嵇康在临刑之前，整冠奏《广陵散》，以成绝响；阮籍歌啸山林，“白眼对青天”；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不仅展现了为后世所认可、所称颂的书生气节，更重要的不为世人所认可、所称颂的个人孤独，源自肉体的大孤独啊。在这里，没有边缘和中心，庄子混迹于乱世，自称“无用”到连老婆也养不活，老子骑黄牛出函谷关时，被官吏扣押，被迫留下买自由的五千字，从此杳无踪迹，他们边缘么？可读《逍遥游》、读《道德经》，您感到宇宙的中心就在这儿，每个人都是中心。这种具有切肤之痛的出世的、自甘堕落的大孤独向时间深处弥漫，于是有了《红楼梦》，有了王国维和朱湘，“悲凉之雾，遍及华林”啊，在一派茫茫中，您承担的是谁的使命？个人还是集体的？

洪声：这同我的论述是两回事，我在清除历史记忆中的障碍，您在强调个体的自由本能。这同现实非常脱节。

老威：我承认有点脱节。有时候，您感到既与老百姓脱节，也与知识分子脱节，由于环境的恶化，现代社会没有隐士，除非您很有钱，又能耐寂寞。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分子先是惊诧、苦闷、失语，而后，开始疏离意识形态，闭门读书，强调“私人性”——这是贯穿在九十年代文化中的一条暗线。虽然操作中的文化热点一个接一个，可“私人性”逐渐发展成文人写作

的主要倾向，琐碎、具体、不厌其烦，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种后现代时期的“多元”充分体现了市场写作的优越性。

洪声：市场？“自言自语”和市场有什么关系？

老威：昨天我从一张旧报上，读到一个擅长“内心独白”的作家已辞职单干。据说他依然保持着上班的习惯：早上八点，提着饭盒出门，到几里外的工作间，用电脑写字到 12 点，吃了午饭，打个盹，下午继续“内心独白”到 6 点下班。这样，一天至少写个 5000 字的短篇，如果 1000 字挣 100 元，那他一个月能净赚 15000 元。这相当于多少下岗工人的工资？可此人还在一家刊物上发高级牢骚，把顾准和陈寅恪热形容成“呼啸而过的噪音”，并不对“真正的写作构成影响”。

洪声：您居然在我们的谈论中插入这么无聊的例子？可见讨论该结束了。

老威：才刚刚开始呢。先锋作家、诗人嘛，总有些不同凡响，一年至少“不同凡响”两三次，否则大家真把他们忘了。

洪声：响个屁。

11 被勒索者胡牛

采访缘起：胡牛是成都小有名气的观念艺术家，两年前为生活所迫，挥泪下海，做鲜榨椰奶生意，却一直不在状态上。

“钱没赚两个，麻烦惹了不少。”他躺在医院里对我苦笑道。天真无邪的眼睛却闪动着泪花。

1999年10月5日，秋意如诗。我的内心一阵阵发冷。“闯天下去吧，今天是个坎”，我说，“你翻过去就好了。”这种诗意的句子在现实中显得虚弱，虚伪。

老威：胡牛，咋躺进医院了？

胡牛：不晓得。昨晚11点多钟，我溜回肖家河的住处，取了些换洗衣服，就接到一个复合的传呼。我打电话查询，原来又是××的留言，大意是让我放心，她会摆平一切。我心里热乎乎的，眼泪都差点坠下来，患难见真情，虽最终分手了，毕竟还是轰轰烈烈爱了一场。我情绪极其复杂地出门，下了三层楼，就被迎头一闷棒打晕了。恍惚中，我感觉有千军万马，醒来时，却睡在这儿，肋骨断了一根，这是警告，下次就没这么便宜了。

老威：你报警了么？

胡牛：恐怕没啥用，警方重证据，而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岂能傻等着让你抓？况且，也抓不完。

老威：你晓得他们是谁？

胡牛：晓得。每一个被追杀者心里都清楚杀手是谁，而警方又不可能成天兜着你转，许多无头案年复一年地立在哪儿，我算啥？不过，他们不会轻易取我的小命，他们要钱，就找了个理由。

老威：大半年前那场生死恋？天！不是早断了嘛，你暗中与××还有来往？

胡牛：没有，她后来嫁人了。为了悼念那种铭心刻骨的感觉，我在夏天的一次观念艺术展中，推出了一个作品，叫《玫瑰禁忌》。

透澈的玻璃里，放一把喷了漆的黑玫瑰，四周散落着一大圈花瓣，像血迹被参观者肆意践踏。所谓的爱情已经在我空空如己的胸腔中散发着工业的臭味，还有什么好说的？

老威：当时我扔了把荔枝壳在花瓣中，你撵着我吼。

胡牛：你破坏我的作品，我的爱再不值钱，也不是食物垃圾啊。

老威：她值得你这样么？我估计是现担任丈夫捣的鬼。

胡牛：我早打过电话，××根本就蒙在鼓里，她男人还说我打骚扰电话，反而破口大骂。我急得七窍生烟地顶回去：“那拔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清清楚楚，不是你是鬼！要钱，你就亲自出面嘛。”她男人一听毛了：“我要鸡巴钱！办你不简单，桥头雇两个民工，几千元解决问题。”

老威：后来呢？

胡牛：我接二连三地接到匿名电话，什么“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什么“不给钱也行，留一只手下来，我们带回去向顾主交差。”还说：“不信就伸头朝楼下溜一眼，有一辆面包车停在大门口等你，要不要我们上来绑你到郊外解决？”

老威：没王法了？你应该早通知我，商量设个套。你假意答应交钱，约好时间、地点、暗号，再报警。我呢，事先约一伙搞新闻的朋友，扛摄像机躲在暗处……

胡牛：匪警片看多了吧，老威？趁交钱的刹那，一网打尽，哪有这种便宜？你看，下岗浪潮如江河汹涌，这社会上的混混，象浑水里的泥鳅。从前搞观念艺术，纯上了天，后来为生活所迫，做了贩卖鲜榨椰奶的小老板，方从空中楼阁跌下来，脚踏实地招促销小姐，她们年纪轻轻，花招却五花八门，这也是为生活所迫。唉，这世道除政府之外，还有一种自发的无形的势力，一大批游手好闲的人是它的群众基础，这同书本上的江湖不是一回事。

老威：你按江湖的“规矩”交钱啦？

胡牛：如果没背景，按规矩，一旦有人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你一般只能出点血了账。

可这次，他们的胃口实在太大了。我的生意一直在亏，卖出去的椰奶，不太好收钱，因为酒楼也不景气。我已穷得连内裤也没多余的了。

老威：他们肯定一开口就是几千？

胡牛：四万元人民币。

老威：活抢人啦？你又不是银行。

胡牛：我也喊“我不是银行”！但他们说：“这年头，人人都抢劫，只是抢的方式不同。你做鲜榨椰奶，一杯成本最多一元钱，卖进酒楼就是十五到二十，不是抢劫么？谁来替顾客向你讨公道呢？”

老威：你等着挨宰？等来了……这个下场？

胡牛：我走投无路，就打电话给一个作家朋友，他有社会影响，马上替我找了位有黑道背景的著名律师，约好第二天下午一起到永丰立交桥下吃讲茶。

老威：现在还兴这个？

胡牛：吃讲茶的历史悠久，从明、清到民国。过去是由袍哥老大或当地名绅出面，聚会扯皮双方到茶馆，借吃茶，讲道理断公道。解放后，这种黑道风气铲除了。我没料到现在又死灰复燃，敲诈勒索也吃讲茶！

老威：这有啥公道可断？两个文人陪你不行。

胡牛：缓兵之计而已。我们到了茶馆，就被一些人围住了，吃讲茶成了批斗会。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是一幕现实的话剧，每个人都安排了角色，并经过精心排练。坐在我对面的是个烟灰一般的说客，说客旁边是自称武警的枪客，枪客背后是联络官，从头至尾都在打手机，仿佛随时能招来千军万马，把我踏成肉泥。

还有成都市面上的职业杀手，一个害了红眼病，穿着油渍西装的胖子，胖子的助手捧着个文件夹，似乎在准备做记录。

我那见多识广的作家哥们见此阵仗，晓得凶多吉少，就来个以静制动。果然，说客起身作揖，垮至膝盖的吊裆裤扇起股臭风：“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东西南北哪条道？”还是律师厉害，当即回

答：“不是黑道是正道。我，张乾明，方圆律师事务所主任，这是我的名片，坐不改姓，行不改名。诸位若愿意与敝人交朋友的，请留下行踪。”众贼见老张气宇轩昂，且字正腔圆，毫无惧色，忙纷纷拱手说：“原来请的是两位老师，失敬，看茶！”双方重新施礼入座，说客操起鸭公破嗓托出开场白：“黑道白道，正道歪道，讲的是个公道。丧失公道的屁儿虫，人人得而诛之。你，胡牛，正是这样犯了煞的屁儿虫。古往今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断人财路，抽人底火被称为四大罪恶。你居然搞了人家的老婆！”

我忙声明：“不是老婆，是女朋友。双方都有竞争的权利嘛，况且我还是个失败者。”“闭嘴！”说客打断我。七八只手顿时都伸过桌桌，戳我的鼻子尖尖，成都杀手蒲扇大的巴掌，眼看就要当顶拍下，把我的脑袋硬榨进肩背里。“如果是我的婆娘，哼，看我不血洗你们全家！”我的两位朋友忙架住众贼，律师说：“现在不是旧社会，历史发展了，这夺妻之仇嘛，就算不了啥，我一年不知要打多少起离婚的财产分割官司！现代人，好合好散，如果我遇到类似情况，会主动提出离婚的。”枪客闻之瞪眼说：“婚要离，人要杀！我们专程从乐山赶上来，会知成都市面上的各位老大，就是为了办这事，依我说，绑跑算了。”

说客露出恨铁不成钢的神色：“胡牛呀胡牛，按说我们这种冷面杀手，应该见面就捅你几刀，让你醒点眼子，凉快凉快，偏偏我又同情你是读书人！”我说：“就这几根筋，刚了也拿不出四万元。”说客说：“今天你带了两位老师来，证明还是有诚意的，你能拿多少？”我说：“最多当面向××的男人陪个不是，请大家一台客。”说客说：“一台客？笑话。我们一泼人远道从乐山来成都，候了你几天，这差旅费、辛苦费、成都市面的打点费，就值一桌酒席？啥子山珍海味这么贵？”

我还要顶，律师忙拦住：“大家给我张某人一点薄面！我在打点官场之余，好歹同道上的朋友交情不错，乐山的周氏二虎，拖了命案的，逃到本地首先找的旧的。现在发了，开了好几家搏击学校……”说客不认黄：“乐山的龙头，我们只认雷公，至于老的，我们没听说，也不想听说。老师有这方面的朋友，可以介绍来会一

会，谈得拢练酒，谈不拢练刀，不打不相识嘛。”

律师说：“都在江湖上混饭吃，何必扯破脸面？黑道水深火热，总有要扯到碰到的关系。不然，胡牛拿不出钱，你们把我绑去好了。兄弟为警官学校出身，同学遍天下，失踪一盘，当体验生活，让一千个警察满城拉网找人好了。”

成都杀手冷笑数声，丢出一张名片：“请神送神，交个朋友，有啥不敢？”

我忙接过来读片子上的字，顿时冒一头冷汗：“清洁社会，替广大客户伸张正义，讨回公道，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全部的热血和生命捍卫客户的权益不受侵犯。”在名片上面，竟赫然大书着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律师此时才意识到对手不是闹着玩，说客劝住跃跃欲试的众贼，满腔激情地背了首打油诗：“下岗工人不要愁/腰间别把小斧头/街头巷尾站一站/该出手时就出手。”

老威：你们咋脱身的？

胡牛：说客把我唤到一边，我假意同他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欠账”两万元，限一个星期交清。“你是逃不掉的，”有人抓住领口威胁说，“黑道的网比公安局还密，半个钟头就能把你从上千万的城市人口中揪出来。”

老威：你一个穷鬼，命也不值两万元。

胡牛：我也有同感。因此当即就由律师的车拉着，在城里转了五、六个地方，最后找个朋友家落脚。我有家不能回了，房是租的，生意已经转手给别人，剩下的就只有书和床了。

那作家哥们曾替我求律师，让他搬出另一拨职业黑道去收拾场面，律师说：“他们也是靠这个吃饭，如果小胡出得起钱，可以由我转托，断这帮混混几只手脚不成问题，当然钱越多，摆得越平。”

老威：要是我，砸锅卖铁也要出了这口恶气！

胡牛：我哪来的锅？总之，这两万元，不管你给哪一方，明的，

暗的，不晓得有好多张老虎嘴在等着分肉。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次日就出逃了。

老威：这么容易就溜了？

胡牛：他们还认为我有生意在那儿，其实，已山穷水尽了。这该死的鲜榨椰奶！××就曾是招来的促销小姐。公司兴旺时，我有一桌八个促销小姐，活动在几家大酒楼，进行榨奶演示，我他妈为啥别的女人不找，偏偏找上了××。我还以为是一场真爱，在这场真爱前，我已两年多没碰过女人了。我和她有令人回味的浪漫时光。

老威：你是个蹩脚的浪漫主义者，惹了杀身之祸也不回头。唉，你既然出逃了，为啥又被盯上了？

胡牛：××给我打传呼，头两次我忍住没回，后来也不晓得怎么心一软，就回了。她在电话里就哭起来，说早知嫁了这么个人，拼死拼活也要跟我。她还说宁愿自己受伤害，也不愿我背井离乡，她会出面摆平这事儿。

老威：你咋这么愚蠢？

胡牛：我是艺术家，做不来买卖，我平生就这弱点，见不得女孩掉泪。她一可怜，我就心潮澎湃，在屋里走来走去，搓手、掌脸，不知如何是好。成都多雨，她赌气就去露天淋雨，我陪她淋，一件一件脱衣裳为她遮雨，隆冬天气还亮过一身排骨。想起这些，我就不顾一切从外地跑回成都，一露面，就被绑架了。车开到郊外，抬出一架铡刀，我的右臂被固定在刀口。幸亏我急中生智，大叫：“借钱去了！”才刀下留臂。狗杂种们宽限我两天，让我回肖家河，从七楼远远望了××一眼。她把我害这么惨，可我恨不起来。艺术，爱情，罢了罢了！这些我自以为能净化灵魂的东西都救不了我。报案，没依据，我晓得，我是小人物，命不值钱，但至少比那些社会混混要高贵些。我下不了鱼死网破的决心，那样会成为艺术界的丑闻，我不想成为顾城第二。接着，我就住进医院了。

老威：××还在欺骗你。

胡牛：她不会。但我直觉到她已被控制了，一只看不见的手，

扼住她的喉管，逼着她充当诱饵。老威，你一定拉兄弟一把。

老威：除了报警，我似乎想不出任何高招。

胡牛：报谁的警？你不帮我，我就只有买把大片子菜刀，压在这枕头下防身。等出院后，就把菜刀背在书包里，到了约定交钱的时间，提出来就砍。今天报载，有个民工被地痞敲榨急了，就提两把菜刀把码头上的舵爷劈了，连抓人的警察都拍手称快：“这一害终于被除掉。”

老威：有人给钱，这民工就会转头砍你。

胡牛：也许吧，我一个艺术家，沦落到这地步，还有啥子好说的。我内心深处不愿做陈胜、吴广，但难保不被逼成陈胜、吴广。老天爷，你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太不公平！

老威：胡牛，你别哭，我会帮你，大不了豁出去。今晚我回去，找几个朋友，给你化化妆，混出成都再说。唉，世纪末了，人人都想发横财，你看，街上荡着那么多闲杂人员，谁又比你活得好一些？你才 20 多岁，正是闯天下的年纪，这是个转折点，到了下个世纪，一切都会好的，别哭。

12 偏三轮胡小松

采访缘起：偏三轮又叫“爬耳朵”，起源于文革中后期。那时还没有出租车，公共汽车既破旧又拖沓，所以大家习惯骑自行车上下班。大约是为了方便家中妇孺长辈出行，有聪明人就利用工厂里的材料，在自行车后架右侧焊接一个座位，使两轮变成了三轮。

偏三轮省钱省时，很快在底层民众中流行开来，到了 80 年代，此车外型不断改进，一度成为家庭客货混用车。随着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偏三轮开始活跃于大街小巷，逐渐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偏三轮小巧、灵活，适宜短途客运，老年人出门，骑自行车不安全，“打的”不划算，因此张口就叫“爬耳朵”。例如我父亲，年已 80，仍然坚持去两里之外的牙科诊所上班。老人家每天的交通工具就是偏三轮。父亲说，偏三轮的主力军是进城农民和下岗工人，“工农联盟”沦落到如此朝不保夕的境地，恐怕毛主席在阴曹地府也闭不了眼。

2002 年 8 月 9 日晚，天气暴热已久，我经人介绍，在成都骡马市附近拜访了 28 岁的胡小松。他虽然只拉过一回偏三轮，却因为“咬警察”的事件，上过报纸，一度成为这个行业中的新闻人物。

看来，阶级斗争仍旧尖锐、激烈。

老威：我读了你的《判决书》，仿佛又回到文革时期，那时的大字报就这种文风，什么“狗急跳墙”，什么“气焰嚣张”，看来这法官是红卫兵出身。

胡小松：我早就瞅着不顺眼，你一点，我就醒豁了，法律咋能骂人呢！

老威：不过，你真的咬伤了警察？

胡小松：逼急了，就捞住跟前的一条膀子下口，当时我的脸已被捶变形了，眼睛根本睁不开，就一条缝，一些影子在缝外晃来晃

去。我捞住一条膀子咬下去，接着就倒了，昏了，我被判了三年，天啦，我胡小松不抢不偷，不嫖不赌，从小到大，还没跟谁红过脸，却成了劳改犯！

老威：咬一口，判三年，太不值了。

胡小松：我真急了，如果手里有把刀，我就砍他个狗日的，你不让我活，那就都活不成。我们村上的牛三妹，平常从荷花池批发些小百货，拿到五块石去卖，结果被城管踩了地摊子。牛三妹一向温顺，不知咋的突然疯了，从一家饭馆抢了把大片菜刀，出街砍人。附近诊所的医生来拦，脖子挨了一下，血蓬地射出几丈远，几个病人见了血，吓得满地乱钻。牛三妹又闯进里间，把床底的一个拖出来，照准那背梁几十刀，人都晕了，尿壶大的一个洞。没人敢进屋，防暴警察围了几层，磨了个把钟头，直到牛三妹把自己给劈了，才敢踹门进去。骨灰没留，捎信回村，家里也没人来，可能走得动的全出门了，老的讨口小的打工，总之都比守着那几分地捱饿强。

老威：咋乱砍人呢？

胡小松：她没捞着城管，当然就乱砍。这是凶兆，就在牛三妹出事的第二天，我就倒邪霉了。一大早，我从中间贩子手中接了辆新车，花了300元。一般的偏三轮都是旧的，刷回漆，只值百多元，我考虑要换行当，图个吉利，就狠心出血。

老威：此话咋讲？

胡小松：现在市面上转动的偏三轮，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交警和城管随时采取行动搜缴上来，集中运到××市场，以几十元钱一辆的低价甩卖给有关部门的。二道贩子定期去××市场收购，再批给三道贩子，价格也在转手中一次次攀升，最后，兜一大圈……

老威：又卖回给拉车的人。他妈的，难怪每次沿街搜缴偏三轮的行动都兴师动众，有时还十几辆摩托车四下出击，城管车警灯闪烁，大卡车压阵，不弄个满载而归绝不罢休，原来这是几级部门的固定财源啊。

胡小松：所以，我要进入这行道，就不想要兜圈子倒卖过几次、几十次的破烂。我检查了轮胎，链条和轴，还把车杠的漆皮刮点下

来查看，钢材是新的。其他人都笑我瓜，因为久走夜路必撞鬼，你天天在道上跑，鬼更是说来就来。哪怕你路再熟，胆再小，一年也要损失几辆车。我隔壁的张大爷，70岁，拉了近十年偏三轮，他扳着指头算，平均一年被缴四辆。他说：“最倒霉的一个月就赔四辆，一般倒霉的一季度差不多赔四辆，我是本地居民，运气好，就当赔车给国家交税吧。”

老威：这位张大爷是人精，你该重视他的话。

胡小松：可我年轻气盛，一心要凭力气挣大钱。一环路内风险太大，我就跑二环路以外。地方敞，新开发的小区多，公共汽车的线路一时半刻又规划不过去。有的地段正修路，挖得乱七八糟。拉车得小心，提防陷坑里。我考察过，除了自行车，偏三轮是这些小区主要的交通工具，很受欢迎。那天下午，我下了一斤面条，撑得饱饱的才出门，穿小巷小街，一路倒风平浪静，只是过二环路口子时，突然有一拨偏三轮飞叉叉地从西延线方向过来，沿途叫唤：“牛蚊子来了！牛蚊子来了！”这是暗号，大伙一听，只恨少长了两条腿，有辆车正逃着，龙头咔地失灵，撞了街沿，前轮扁了，那瘦儿一个饿狗抢屎翻上人行道，再也爬不起来。我是新车，关键时候显神威，当然比众人都溜得快，拐进一个菜市场就脱险了。后来听说，交警缴了车，还把拉车的老头扔进了臭水沟，激起公愤，交通堵塞了几个钟头。

府南新区正在开发，战旗这边人住满了，菜市场从小区里面摆出来，好大一片；而另一边的楼盘建到一半，从“清水绿苑”到摸底河，两里多长，全是工棚。那是民工社区，城里人这么叫，工棚下除了住人，还开饭店、录相和茶馆。当然，最大的露天厕所是摸底河，晚上从那儿过，老远就一股股比大粪恶心几倍的河风吹来。

老威：你做过民工？

胡小松：我啥都做过，在建筑工地干得最长，三年，从挖土方、砌砖到外墙装修。说不定，你住的楼房都是我建的。我用工钱买了新车，大小是个老板，不必受资本家剥削了。前年5月份，我们本土的一个包工头招了30多名工人到××高尚社区装修外墙，

那栋大楼有 15 层，我们悬在上头没日没夜地贴瓷砖，刷涂料，每天干 20 个小时，屎尿胀了都夹着。原来讲好每月 500 元，可我们连干 3 个月，没拿到一分钱。包工头也不露面了，大家见势头不妙，就停工四处找人，终于在另一个建筑工地揪住包工头。可狗日的狡辩说，他没钱，因为承包给他活路的建筑公司转眼蒸发了，连办公地点都是假地址。大家顿时瓜了，气急攻心，于是 30 多名工人扭住一个包工头一起上了十五层顶，小朋友一样排排坐在楼沿，准备朝下跳。脚下万丈深渊，车辆和行人比眼屎还小，包工头埋头瞅了一眼，一身冷汗，就忙招呼大家说：“莫乱来，我先给 110 报个警。”旁边的张大鸟也是个怕死鬼，就帮腔说：“再给××报、××××报打电话，招些新闻记者来，搞点社会效果！”我问：“万一真不给钱呢，还跳不跳？”包工头说：“一定跳，只要下面消防队把网绳拉开，我就跳！为自己的工人兄弟争利益嘛。”我说：“恐怕到时由不得你。记者上来又拍照又采访咋办？”同村的五娃子说：“对，不给钱就一起跳，否则太没面子。”张大鸟说：“人都摔成肉酱了，还要鸡巴面子。”

大家意见不统一，包工头借打手机，想趁机溜，却被我们挟持住，大伙一横心，就手挽手挤在沿边上，大喊：“不拿钱就拿命！”胆子果然壮了。恰好楼底的警报响了，110、119，还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都到了。再朝下看，黑压压的群众，扎断了大街，都仰着白花花的脸。

不过几分钟，110 和抢险人员都上了顶，记者一大群，扛着摄像机、照相机。一个当官的戴着安全帽，举着电喇叭冲我们喊：“赶快下来吧，工人同志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不开的烦恼，都可以商量，千万别开这种玩笑！”

包工头说：“我们不开玩笑！不给工钱就跳楼！”电喇叭又喊：“没有命，拿钱干啥子，莫冲动呵！”包工头说：“没有钱，就没法活命！您看见了，我们手挽手，每个人都身不由己，不给钱就一起跳！”电喇叭迟疑了半秒问：“为了啥事？请您现在告诉我，要相信党和政府。”于是大伙你一言我一语，鼻涕眼泪地诉苦。抢险人员摊开手，微笑着，企图借机靠近，马黑娃忙喊：“跳啰！”就向前挪

屁股，左右的人被他牵得身体直晃，惊爪爪地叫起来。虽是夏天，烈日当头，但在几十米的高空，一阵阵风仍把头发吹竖了。电喇叭立即命令抢险人员后撤。我说：“不见票子就见棺材！”这话经典，大伙一起喝彩，可惜手挽着，没法鼓掌。热劲头上，只有怕死鬼张大鸟叹气说：“现在哪来棺材？做你妈的春秋美梦！”我回骂：“做你妈的发财梦！跳楼死哪点不痛快？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死鬼才让人瞧不起。”张大鸟反问：“跳楼就让人瞧得起了？”马黑娃说：“至少动静大。”包工头也上了情绪，说：“这回出名了，比无响无臭强他妈一百倍。”我们和抢险人员对峙了三个钟头，又渴又饿，脑壳开始嗡嗡响。太阳偏西了，我们再没力气斗嘴。此时若有人带头跳，我们真的会一个个往下掉，因为都被晒得软绵绵，象快融化的硬糖。110 毕竟神通广大，一边在楼下拉网、铺垫子，一边根据包工头提供的线索全城追查蒸发了的建筑公司，终于在一家馆子里找到已喝得醉醺醺的总经理。有政府出面，不给工钱就抵押财产，总经理一听，平时逆来顺受的民工居然闹出这么轰动的乱子，只能出血。天黑时，一叠钞票由民警带上来，大伙见了，才木偶一般松手，转身，溜下顶沿。四肢酸痛，大伙牵成一线，残兵败将似地由抢险武警押着，下楼，被送进附近的派出所。群众像满河的鸭子，议论纷纷地撵着我们看，记者不停的拍照，再加上街两旁的灯箱广告和明星彩照，我们顿时觉得也过了盘出名的瘾。挨个讯问，填表，手续过到半夜，我们才领钱出来。本来每人 1000 元，可包工头摸出合同，闹着扣除了他那份，每人就只得了 600。包工头太黑了，可白纸黑字，你拿他没办法。我们在路边鬼饮食吃面，人多好讨价，结果三元五一碗的面只收两元。划得来，也不敢多吃，连手最散的马黑娃也没超过三碗。回到住处又饿了，我说：“还是自己做饭实惠，一斤面才一元多钱，加菜，加点佐料，就冒尖尖的一盆。”大伙表示赞成。

老威：你们算跳楼讨债的先驱了。据我所知，你们后继有人，阵营一天天庞大。据《成都×报》载，本市本月就发生过 8 起跳楼被解救的事件。请听相关点评：“跳楼不是正常渠道——如今的蓉城高楼林立，这些大厦的设计建设者们想不到，凝聚着他们心血的

建筑居然成了一些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经常有那么一幕两幕跳楼秀上演，或讨要工钱，或为情所困，稍不满意就爬上高楼，向解救人员讨价还价。拿跳楼作秀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跳楼者得到的只能是人们的不齿。”

胡小松：咱们也是活不下去才跳楼，啥秀不秀的，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老威：你们该找报社讨工钱去。

胡小松：开玩笑！

老威：也算作秀嘛。

胡小松：只有女人才秀得起来，男人也秀，不成了鸭子？嘿嘿，你莫诳我，鸭子比鸡贵，有钱人的奢玩意，我这号的玩不起。

老威：扯远了，还是回到拉车的话题吧。你买偏三轮的钱是跳楼换来的？

胡小松：对，所以头一盘就招凶。我从战旗菜市场出来，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提着菜，招呼搭车，我拉了两站路，收两元钱，算开张。老太太是退休教师，下放过，很同情劳动人民，她沿途和我聊天，担心农民都跑进城，地没人种。我说近几年讲环保，退耕还林，已没多少地可种，况且捐税太多，既使有地也没法种。老太太叹口气，我把她搀下车，问要不要帮她提菜进屋？我晓得她不肯，但言语要拿得顺。

接着又拉了三个客，不知不觉快到九点半钟，按规律，过了十点，二环路以外就是偏三轮的天下，虽然客源稀少些，但大热天，回房憋着难受，不如敞地凉快。我这样想着，警惕就放松了，望见几个同乡，歇在“铁旅”门口摆龙门阵，我绕开了，负担重，没闲功夫磨牙啊。

十点多钟出的事，抠破脑壳也料不到，交警这么晚还出动，并且深入到黄忠小区，这沓晃离二环路好几站，连路灯都没装。摩托从几个方向围追堵截，偏三轮又下河鸭子一样嘎嘎嘎地逃开了，我奔的是绝地，去金沙的路两头都在修，中间挖了个大坑，所以摩托不着急，一左一右慢慢跟在后头，亮大灯罩住目标，看你这跛脚鸭

子能不能扇翅飞上天去。我在坑边咔地刹车，钢圈都擦出火花来，轮胎肯定瘪了。我转过车头又跑，摩托见我这么疯狂，就闪开道，继续，依旧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整个人都绷直了，嗷嗷吼着，居然迎头撞向城管大卡车。看来狗日的已收获不小，车厢上垒成一匹山不说，车屁股还重重叠叠挂了二十几辆偏三轮。我跌翻在地，又一跟头爬起，死死抱住车。几十个交警把我团团围住，戴着头盔，套着几道黄杠的亮背心。一个高个子过来掰我的手，我抵死不放，他就叫：“放开！”我不晓得哪来的胆量，就把整个身体扑上去。他气坏了，就挥警棍敲我的手背，下雨一般，手背都整血浸浸的了，我仍不觉痛。有几双手从背后拿住我的膀子，使劲扭。你晓得，农村人的蛮劲一上来，九头牛也搬不弯。

他们吼，我也吼，吼的啥，我也忘了。因为所有的想法都挨扁了。我一根筋抱住偏三轮，直到怀里偏三轮没有了，我还抱住交警的腿不放。我被拖了几十米远，眼睛睁不开，但感觉得到周围人山人海，群众都在议论：“太过分了！”“没偷没抢的，何必把人打成这样！”城管车拉了几遍警报开道，群众不让，有个声音还骂：“拉警报值个鸡巴，今天不给个说法走不脱！”有群众撑腰，我忍不住哭了。交警说：“车都缴了，你抱我的腿有啥意思？”我一个劲地叫“车”，比死个亲妈还惨。有好心人劝说：“把车还他嘛，人家也是凭力气吃饭。”交警说：“缴偏三轮是市政府的规定，消除交通隐患。”好心人反驳说：“有这个功夫就去抓贼，消除治安隐患。”交警说：“这是两回事。”好心人说：“一回事，你们这样乱来，偏三轮走投无路，就去抢去偷去傍黑社会，交通隐患不就转化成治安隐患？”交警说不赢，就威胁说：“我奉劝大家还是各回各的家，莫在这儿聚众闹事，抗拒执法。”群众立即喝倒彩，驳斥说：“也奉劝你们莫执法犯法，伤天害理。”交警又冲着对讲机鸡鸡歪歪了一阵，就弯腰掰我的手，不知咋的，我突然气急攻心，就丢开腿，扯住他的膀子咬了一口。

交警叫了声哎哟，接着我的嘴被卡住，腮帮子挨了一拳。我在许多裤裆下钻来钻去躲，结果还是被拖住双腿，扔上面包车。群众还在后头追撵，终于，防暴大队也出动了，一个当官的坐在副驾

位说：“偏三轮居然敢咬警察，抗拒执法，造反了么。”

我两手反铐着趴在后厢，汗背心稀烂，刷把一般绕在腰上，下半身光着，鞋和短裤不知啥时候丢的。进了××派出所，当官的让人把一条油抹布裤衩给我套上，接着是连夜审问，盖手印，第二天我就被转送市中区的××看守所。

老威：这么快？

胡小松：警察说，性质一转眼就变了，咬人前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口就是敌我矛盾。

老威：就为了一辆偏三轮。

胡小松：你觉得我没出息？也许吧。如果不是新车；如果不是跳楼钱买的；如果不是翻本的愿望太迫切；如果我是你这样的城里人……唉，世上没后悔药可吃。

老威：这不是城市人和乡下人的问题。

胡小松：城市人有工资，钱总要来得容易点。

老威：不见得，许多下岗职工和街道居民一个月才拿两百来元，还要养家糊口，根本买不起 300 元一辆的偏三轮。六月初，通用汽车公司的几百老职工在武侯商场门口请愿，把闹市区的街扎断了一上午，他们举着××的遗像，要求增加待遇。我刚骑自行车经过现场，见挽着盾牌的防暴警察与老头老太太们对峙着，却不忍下手打。我向围观群众了解，原来该公司的女工××下岗好几年，凭每月两三百的工资养家糊口，可最近，公司不景气，拖欠了几个月工资。××的几岁女儿不谙人事，仍嚷着向妈妈要 10 元钱过六一儿童节，××回答：“没有。”女儿降价说：“哪就要 5 元。”××回答：“没有。”女儿眼泪汪汪地再降：“两元，妈妈，给我两元过节，别的小朋友都过儿童节啊！”××不出声，她身上只剩下 5 毛钱了。女儿伤心地跑开了，××把自己关在房内，想了一下午，终于找了一根绳，上吊自尽。

胡小松：太惨了！

老威：你以为呢。

胡小松：这么说来，我就增加了熬下去的信心。流动人口，三无人员，名称虽不好听，可总比在一个地方穷死没有退路强。

老威：到底是坐过牢的人，容易看开。

13 吸毒者黄河

采访缘起：黄河出身于书香门弟世家，80年代又曾是颇有名头的寻根诗人，现在吸毒成瘾，堕入渊薮，真令人感慨万端。辱没祖宗么？可瘾君子都不认祖宗；自取灭亡么？可黄河咬定的“艺术”就是自取灭亡。两年前的一天，他失控斩断了自己的右手无名指。

这次访问时间为1995年6月26日下午，烈日如火。我背心短裤，手握地址，骑单车一路寻找，好不容易才抵达成都东门大桥附近的一条小街。某单元楼内，昔日一米七六的壮汉黄河已被淘成一具皮包骨头的空壳，只有两眼贼亮，灼灼逼人。

晚上回家看电视新闻，方知今天是国际戒毒日。为严肃法纪，各地又处决了大批毒贩，群众拍手称快。

老威：你为什么吸毒？

黄河：这由不得我自己。

老威：这是借口，你曾经是作家，想戒肯定能戒。

黄河：我为啥要戒？

老威：你看你，50开外的人了，还这么，丧心病狂。对不起，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汇。你的家呢？老婆、孩子呢？

黄河：我要这些干啥？身外之物。

老威：身外之物？好好，算你狠。你干脆别住房子，也别睡床，躺到大街上去。

黄河：只要有药吃，住哪儿都一样。你要这房子？卖给你吧，2500一个平方，建筑面积70平方。你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先付一半，或者先出订金，咋样？这张床你可能不会要，床头裂了个缝，是我上次瘾发缺药时撞的。

老威：好一个铁脑壳！痛么？一张血糊糊的老脸，难看么？

黄河：挺舒服的。

老威：倾家荡产也不回头？

黄河：什么叫家？什么叫产？你是诗人，肯定读过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自由的，放纵的，吸着大麻朝前走，横贯整个大陆，连女人都挡不住。你至多与她性交，而性交时耸动着身体，这也是一种走路的方式。一个人光溜溜的生下来，不是只与阳光、空气、水、食物发生关系么？为什么要与国家、社会、家庭发生关系呢？我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原来我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吃药上瘾后，我不用想就明白了。

老威：你第一次吸毒是什么时候？

黄河：1985年6月31号。

老威：你记得这么清楚？

黄河：那相当于我的初夜，连妓女都记得自己的初夜。不过，第一次吸白粉毫无快感，我趴在床沿，呕了十几分钟，过后身体软溜溜的。你知道，80年代风行文学，尤其是风行诗歌，就像现代风行做老板一样，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城市人口都倾慕诗人。我也写过两天诗，还学朦胧诗人某某，遍寻中华民族之根，创造史诗。我准备先去敦煌，住下来感受一下气氛，再漫游大西北，向浩淼的沙漠索取灵感和想象。我是第一次去北方，临行前，我读了不少介绍敦煌的书，还随身带了一些西部诗人的作品。一天一夜后，我在甘肃兰州下了火车，按当时黑道诗坛拜码头的习惯，我手持四川著名诗人某某开出的路条，去叩访当地的一位边塞诗人老黑。老黑大块头，特豪放，二话不说就下馆子灌酒。昏天黑地到夜里12点，老黑又架着我，到西郊去看朋友。地上全是铁轨，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摔了无数跤，才捱拢一个小货站。那晚上的月亮特别大，还长满红红的毛，我还听见月亮在叫，声音又尖又远。老黑说，来感觉了哥们，一会儿让你抽点白粉，感觉就大了。

那货站背后是一个斜坡，我们一屁股溜下去，脚抵住两扇仓库大门才刹车。一个穿军便服的开门出来，老黑叫声“大刘哇”，就互相搂着肩进去。我也被扛进去，洗了个热水脸，才清醒了些。我感觉困，想睡。老黑说，哥们千里迢迢来会诗友，太不容易，人一

辈子，互相碰不上几面，咋就要睡？即便困也得熬着。大刘嘿嘿笑道：“何必熬？抽支烟提神吧。”我不抽烟，大刘却先替我点着，然后塞进我嘴角。我迷迷糊糊地吸了小半截，就挺不住了，胃在翻，却啥也呕不出。清口水牵着线地坠。大刘说：“没想到你的反应这么大。”老黑责怪说：“你的料下得太猛吧，老黄是初夜呀！”我在下面急着，心打着急鼓，上面两张嘴在鼓点中“哈哈”的，像癞蛤蟆。

第二天，我才晓得这仓库是个临时收容站，里面关了不少妓女、小偷、乞丐、盲流。白粉就是从他们中搜缴的。大刘还悄悄问我搞不搞只野鸡来尝尝？我莫名其妙地反问：“北方也有野鸡？”大刘一愣，见我不是开玩笑，就开导说：“这么老实，还写诗呢。”老黑说：“哪用得着碰野鸡，多吃几回药，想什么有什么。”我推辞说：“谢谢二位的盛情，不过下午我还要赶路呢。”老黑问：“下一站是哪儿？”我说：“到敦煌朝圣呀，那是史诗创作者灵感与想象的母源，你们也一起去？”老黑问：“再下一站呢？”我说：“到吐鲁番，最远到伊犁，然后折回来，去阳关和嘉峪关。当然，楼兰是去不了。”大刘说：“这么辛苦？何必呢。在这儿多住几天，把兰州当成你的最后一站吧。”我客气说：“回程再来看你们吧。”大黑说：“兰州绝对是你的最后一站，你在这儿，啥都有。你要去的地方，不用脚，你想一想就去了。”

两人说话古里古怪的，于是我暗下决心，最多再滞留一晚就上路。

老威：80年代就吸毒，还拉人下水，这诗人当得也够先锋的。

黄河：有个朦胧诗人比我们早好几年，他到成都来，当众讲抽大麻的感受，真是美妙极了。总之是人特别放松，像面条一般软在地毯上，然后有许多彩色的方格子，像电报一般从脑门哒哒发出来。当然，现在在西方，抽大麻已较普遍，几乎称不上毒品。连大学生、中学生都围着圈子，在宿舍里抽，大伙一块飘飘欲仙。

老威：接着讲你吧。

黄河：当晚没喝酒，大刘拿出三支特制的烟。说裹成烟卷抽，

劲要缓得多，也比较浪费。最直接的方法是把白粉撮在锡纸上，下面使酒精灯加热，然后用鼻子和嘴吸尽那烟。太过瘾了，不过新手不行，新手的鼻子抽不了那么快。我有些迟疑，害怕上瘾。老黑说艺术家吸毒的多了，你读读《流放者的归来》，里面到处是鸦片和大麻。况且，吸毒是为了写诗，它能使人放松，最大程度地开放人的潜意识，超现实的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哪一样与毒品无关？灵感就在这支烟里，你还满世界狂跑干啥？都是写诗的，人家是好意，我就学他们的样。三个人躺在床上，用深呼吸抽进去，然后忍住不吐，直到烟自然地冒出，我又出现了干呕的症状，但两三分钟就过去。老黑不断在耳边提醒：“放松，放松。”然后我真的觉得放得很松了，老黑的声音像回音一般，我在半空中飘着，那房顶越来越高，我看到的敦煌就在太阳里面，有很多洞窟，非常飘渺的壁画。释迦牟尼睡觉了。他说他死了，却微笑起来。我亲眼见着许多诗句，像铁轨一样在沙漠中横七竖八地铺着，铁轨立起来了，我在叮叮当当的诗句中穿行，迷了路。我把铁轨一般无穷无尽的诗句拴在怀中宣告，我把所有的大诗人都盖了，诺贝尔文学奖非我莫属。

就这样我困在兰州，哪都没去就返回了。我吸了三次海洛因，上瘾谈不上，但已感到一种诱惑，那是一个太美太美的梦，一个在现实里走一辈子也到不了的梦。我想更深地进入，可又怕。我毕竟生活在现实中，有家，有老婆孩子。

老威：对呀，况且 80 年代，成都市面挺干净，几乎没有吸毒的，你想吃也找不到东西。

黄河：回家三个月，我几乎忘了这件事，可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邮包，落款是西北某部队的番号，我拆开看，是一部大 32 开的精装《军事人物辞典》。我感到莫名其妙，就丢在一边。这部辞典在我的床底躺了整整两年，直到有一天，我准备处理旧书报，才重新翻出来。我无意中拿在手上掂量，突然感觉不对劲，就用铅笔刀起开发潮的精装封皮——真相大白了，两小袋白色粉末掉出夹层！估计有十多克吧。我赶紧锁进抽屉里，连呼吸都凝固了。接下来的几天，我心绪不宁，也不给老婆打招呼，就自己上了峨眉山。我打算在山上呆一个星期，让大自然来澄清一下浆糊状的脑子，可

是不行，脑子越想越乱，最后都有点魂不守舍了。

老威：事情都过去两年多，咋还像热恋？

黄河：这是命，我认了。况且，女人的魅力不及毒品的百分之一。

老威：那你娶老婆干啥？

黄河：我也这样问自己，结果越问越无聊。男女热恋当然好，一旦谈婚论嫁，感情就贬值了。于是就找情人，就找三陪，就在若干的女人之间撒谎，玩平衡术。说来说去，人一辈子就为了上面的嘴和下面的嘴而疲于奔命，在两张嘴之间，才是社会为你安排的角色，不，不是安排，是逼你进入的角色。大学毕业分单位、进公司，从科员做起，如果马屁拍得顺溜，40多岁大约能干到处长。锤子！鸡巴处长！就是局长、市长、总经理、部长、国家主席又咋样？还不是被无形的绳子捆绑着做人，戴着戏脸壳做人。我当专业作家那阵，相当于处级，老婆感到很骄傲，逢人便吹。其实我写文章是为了贴金，你贴我贴大家贴，在金子和面具下面，人就没有脸了。这世道，穷也累富也累，下岗工人、打工仔、叫化子累，老板、官僚、警察也累。从来如此啊，连庄子那样的大圣贤，都为老婆的暴病而亡鼓盆歌唱，况且我辈乎？

老威：你老婆死了？

黄河：疯了。我与她同一战壕，文革武斗一个派的。围中江凤凰山与继光兵团打仗时，山上一梭子弹扫来，我老婆奋不顾身扑倒我……这件英勇事迹到处传扬，她虽然相貌平平，我也非娶她不可，无产阶级的火线生死情嘛。后来，我稍有出路，她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提醒：我这命是她给的。我承认除了父母，这条命是她给的，但这笔帐永远还不清么？

老威：你这样看待夫妻关系？

黄河：除了三陪，男女一旦上了床，互相之间就开始纠缠了，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就这意思。他妈的，我写文章她没觉得丢人，我吃药她就丢人丢疯了！拉着儿子给我下跪，软招不灵，就吓唬说要找人捆我进戒毒所。

老威：什么时候？

黄河：89年。那时正规的戒毒所还不普及，一般都关派出所。我晓得她不敢找人，她太要面子了，她爱的是我的社会角色，而不是我这个人。我把积蓄都弄光了，又变卖东西，如果能卖人，我早把老婆、孩子卖了，这世界上的人太多，就是该流通。我这样想着，就觉得欲望在血里淌。老婆疯的时候我刚吃了药，她从厨房里操起两把菜刀，念念有词地舞过来，她唱的什么？真奇怪，那声音像一把豆子到处撒。她把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问我戒不戒？我没有力气抬手，就直直地瞪着她。我看见自己的血喷起来，溅红了她的脸，我的嘴角扯了一下。她说你还笑？我没笑，我想说老婆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床在动荡，在海洋之中，我盼望着老婆砍我，在气管上拉一刀，我会分解成许多鱼，化入波涛。当药效过后，我老婆终于发展到街上舞刀去。我的衣裤全被割碎了，从下到上，有54处刀口，我居然没觉得有多疼。我也懒得上医院，过了一星期，伤口全结疤了。我老婆却一发而不可收拾，从舞刀到跳脱衣舞，终于被群众扭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儿子也跑了，嘿，现代人都想摆脱家庭，我用不着离婚分财产，就光棍一条了。

老威：你太没廉耻了。

黄河：廉耻？那是你们这些伪君子的玩意，我命都豁出去，还要廉耻干啥？当然，入门时都要有借口，好奇啦体验啦，我呢，最先是为了创作。可后来，境界就升华了，没烦恼没追求也没欲望，因为自己就像上帝，要什么有什么。你要到美国？几分钟就去了，梦游似的，走在百老汇大街上，周围的人也在梦游，树啦汽车也在梦游，你迎着他们上，一下子就穿过去了。女人有啥了不起？你要和玛丽莲·梦露发生关系，几个玛丽莲·梦露就抢着搞你，要舒服多久就多久，你把她的奶子揪下来当坐垫都成。如果你在吃药前正在翻一本科幻杂志，你一会儿就到月球了，在上面骑马打猎。如果你恨谁，想揍你的上司，就把他任意剥成八瓣，当桔子吃下去。人赤裸裸地来到世上，追求的就是赤裸裸，自由，放松，满足所有欲望，把无法抵达的未来当成现实来享用，甚至享用死亡。

老威：享用死亡？

黄河：有一次我感冒了，高烧近 40 度，可还在街上走着找药。卖药的不肯赊账，我就跪下求他，赌咒发誓的。他不理，我就以自杀相威胁，我说万一我死了，你就少一个长期客户。他说你这种客户我不缺。见他如此绝情，我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整整一瓶，一下子倒进嘴里，然后抱住他的腿。我已瘦成一把骨头，可不晓得哪来的那么大劲，任他手下的几个彪形大汉怎么拽怎么打，就死活不松手。没钱，我又憋了好多天，病都出来了，本来沾药上瘾的人是不生其它病的，一旦缺药生病，就有生命危险。后来我软了，世界像一个大坑，我轰地陷落进去。

怕我弄出事来，卖药的带我去医院洗了胃，还送我回家。他临出门时丢给我一小包药，说已经两清了。我赶紧趴着用舌头舔了一点，才点火把这宝贝全吸了。劲一缓，我想自己太没出息，还不如死了清静。果然，身子就飘起来，非常高，我扇着翅膀在云里飞，飞。仰着、竖着、横着，朝越来越广袤的远方射去。我清楚地意识到还躺在床上，是另一个我在躯壳的外面飞。我感到渴，就哗地俯冲向一条明晃晃的大河，我钻进水里，却感到这还是天空，我连钻几次水，都是泛着波纹的空气，一个声音在耳畔轻轻唱：“这就是死啊这就是死！你已经死过几遍，还想死么？”我说：“这不是死！我还没消失呢。”那声音唱得更温柔：“你摸摸你自己，是不是变薄了？变透明了？”我真的摸不着自己了，我的指头长在一个女孩的手上，她在从上到下地摸自己，在乳头、屁股和阴道上触得特别久，我感到快活极了，毛发都竖起了。你听说过这么舒服的死？身体和灵魂完全化掉，你只有感觉，无处不在，任何一个裸体女人的自赏自淫都能触及你的神经。

唉，老威，你这么明明白白地活在世上有啥意思？我以前看过你的文章，太实在了，你总是同别人较劲，累不累呀？还是飘着活一回，过一过从世界外面看世界的瘾？

老威：你这是意淫，吸毒就是为了意淫吧。一个人就这样被掏空了，就像被白蚁蚀透的房屋，说不定哪天就轰地垮掉，真可怕。

黄河：你是诗人，也同愚众一般见识？你晓得金斯伯格，他震惊欧美的垮掉一代杰作《嚎叫》和《祈祷》就是在毒品烟雾中诞生的，可以说，没有毒品就没有金斯伯格。

老威：如果做诗人要以染上毒瘾为代价，那宁愿不做。记得金斯伯格母亲给儿子留下的遗嘱么：“钥匙在抽屉里，钥匙在窗外的阳光下。我带着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栅栏里，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

黄河：但老金还是成了著名的毒品专家。

老威：那是 50 年代，后来金斯伯格进入学院，成了教授。

黄河：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我进过两次戒毒所，每次都超过三个月。我做过文人，与周围的文盲半文盲不一样，只要我内心不需要麻醉了，戒起来肯定容易些。我受不了的是医生和警察都把我当作病人，当作可怜虫，除了强制戒毒，所谓的关心、照顾都显得世俗、功利。对，我一旦健康了，投入社会竞争，说不定真能发光发热，可太没劲了。这年头，健康人与病人从外表看不出。

老威：你这种“理性”已疯狂到极点。

黄河：疯狂？我没伤害任何人。缺药时，我熬不住，就自伤自残。我这右手的无名指，就是 92 年剁掉的，脑门上的这条槽，是刀背砸的。我的魂在跳舞，在同铐住并囚禁它的肉体搏斗，人这肉体看起来柔弱，可真经得住锤打，比钢、比黄金钻石更耐磨。世间万事万物，以人为灵长，洋房名车美女佳肴，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器官，只有毒品，是为了满足人的灵魂。简单、直接、不兴师动众，就那么一撮白粉、一管针剂足矣。毒品是对这个混乱世界的报复或逃避。说实话，我也痛恨毒贩子，他们用肮脏的交易糟蹋着人类的最后一个精神避难所，这些巫术师，控制着我们的灵魂和欲望，不择手段。唉，听说印第安人能凭本能在原始森林里找到迷药，嗅上一点，一堆人能围着火堆舒服一天一夜，太美了。

老威：你从什么渠道弄药？

黄河：公安局已抓了好几拨，根据国家法律，上了 50 克就判死，可谋取暴利的活儿，总有人干。从古至今，这都是世界性的问

题，清末民初，华夏大地满目皆是鸦片烟馆，清朝垮台，也是烟毒熏的，因为朝中大臣，除了林则徐那类古板清官，几乎都做鸦片生意，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这样靠烟枪支撑。国民党时代的地方军阀，不少也以毒养兵，其中川军刘文辉的“鸦片财政”非常出名。新中国肃清烟毒，首先是从精神着手，让全国人民有事干，有盼头，运动作为集体升华的一种方式，令人远离孤独和孤芳自赏。现在，几十年一眨眼，你还是你，空虚又回来了。

老威：你还挺在乎历史？

黄河：说说而已。

老威：你的老婆疯了，你捱一天算一天，你的孩子呢？

黄河：在岳母家。

老威：几岁了？来看过你么？

黄河：15岁。他同岳父岳母一起来过，不是看我，是看房子。

老威：你不把房子留给后代？

黄河：你太滥情了吧。我想这几天把房子处理掉，吞下这房子，我就自行了断。

老威：看你几根筋，刚不到那时候。

黄河：那你就帮我刷几把，借500元钱咋样？房子卖了就还。

老威：我没带钱。

黄河：没钱你出不了这门，我陪你干吹了几个小时，水没喝一口，瘾都逗发了。

老威：这不怪我。

黄河：不说话，我闭目养神，吃一次药至少管两天；可说话太兴奋，一天都抗不过。

老威：刚才我还觉得你挺有诗意，现在这种感觉全毁了。

黄河：商品经济，啥都要付钱，真话就更值钱啦。

老威：那我告诉你真话：我没钱。

黄河：我搜搜腰包……才20多块钱？不可能吧，老威？我晓

得你父母家，你打张欠条，改天我上门去讨。

老威：当心我揍你。

黄河：那我谢谢啦。

14 风水先生黄天元

采访缘起：1998年9月5日，我与友人老谢、老田乘游船溯乌江而上，至彭水县，换乘小火轮抵龚滩嘴，离贵州苗族的地界不远了。

几年前，我作为地区的民间文化工作人员，经常在这一带从事资料搜集，如今故地重游，感慨之余，谢绝了同伴相携旅游酉阳、秀山、张家界的美意，在此逗留了三天，寻当年山中老路，竟与90岁的风水先生黄天元重逢。

这是值得一记的奇遇。

老威：老先生，我能与您摆摆龙门阵么？

黄天元：有啥好摆的？

老威：这个，这个。

黄天元：我不是风水先生，您不要听人家乱说。

老威：误会了，我不看风水。我是外乡人，即使相中了此地的风水宝地，将来骨头也葬不过来。

黄天元：你不要老跟着我，天擦黑了，这儿两条路明摆着，上坡、下河，你走哪一条？

老威：走12年前的那一条。

黄天元：路早变了。

老威：山里小路，能变到哪儿去？当年我在文化馆，与彭馆长一起沿着酉水搜集民间文学，一扎就是几个月。原来在这岔口边，有座农家院子，半片茅草半片瓦，当家人是位81岁的瞎婆婆，叫冉红玉，唱起山歌嗓子一下就变脆了，比18岁的大姑娘还脆。我曾经提着个录音机，守着她录了一个晚上。你肯定听说过她吧？

黄天元：她过世6年了。坟地还是我选的，就在这上面。

老威：院子呢？她家里的人呢？

黄天元：早迁走了，冉红玉命硬，阴宅当头，死人就压了活人。

老威：我能去看看她的坟么？

黄天元：天晚了。

老威：先生您还担心啥呢？12年前，彭馆长就请您看过水，那时您留个平头，胡子还没白，看上去超不过60岁。“您在一碗清水里能看见啥？”回忆起来没有？我曾经站在一边这样问您。您只回答了一个“魂”字，让彭馆长为他的父亲入土安魂。彭馆长说已经安了，您就拿冒烟的香头在碗边连敲三下说：“魂生气了。”把彭馆长吓得脸煞白，因为他父亲的骨灰盒的确还放在家里。据说您还培养了一个看水神童？

黄天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罗。

老威：这么说，您准备收我多少钱？

黄天元：你印堂发亮，没灾可消。好吧，既然是旧人，就给50元咨询费吧。你们文化馆已换了好几批，每次下来，都要千方百计找我徒弟“看水”算命。嘿，还是些大学生呢，被一个9岁孩子唬得一愣一愣的。我早洗手隐居了。你看，冉红玉的坟在这儿，这命有啥好算的？我比她小3岁，年轻时还追过她，隔着山沟对歌。她是方圆几十里的一枝山茶花，追她的人太多，没人能唱得过她，我只坚持了半宿就败阵了。现在咋样？还不是归了土。这茅草长得多深啊，她一辈子要强，都没跳过龙（农）门，把这一脉旺起来，所以我为她选了个好归宿，比冉土司的地脉还旺，你信不信？

老威：你和她有啥关系？

黄天元：她这辈子嫁错了人，我要通过阴宅的风水，把这错改过来。

老威：人死不能复生，咋个改？

黄天元：我要与她结为阴世夫妇。

老威：梁山伯与祝英台？！生不同房死同穴？！

黄天元：乾坤日月有方盈，母亲先死入幽冥，堂上父亲还现在，正是人尽亥时生。

老威：您念的什么？

黄天元：《南极神数》。待我寿尽归土之时，就是子孙发达之始。歌诀云：“千里游龙落笔架，三代运势起春雷。”

老威：我一句也听不懂。

黄天元：此为笔架山，你抬头望出去，仔细瞧，不止一个笔架，而是连续三个笔架。三起之落，三三得九，九九归一，穷尽了天地、阴阳间所有的变数。这块阴宅，我用罗盘测过好多次，正好朝西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笔架之间，从右手下退 30 里，就扎入乌江的龚滩嘴，俗话说：“笔走游龙”。咋样，认清楚了？

老威：笔走游龙？您在谈论书法？

黄天元：啥子书法？这正应了“千里游龙落笔架”啊。可惜这么大的气象，世世代代都没人发现、利用，所以本该出天子的地方，只出了一门冉土司。

老威：在旧社会，土司也算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土皇帝。据传末代冉土司临终时，学蜀相诸葛亮，于崇山峻岭中遍布了 72 座疑冢。抬过棺材的人全被杀了陪葬，所以土司墓就成了永恒之谜，吸引了无数盗墓贼，不少人把一生就押在这个无底的赌注上。说不定啊，这脚下就是真墓，您认为的好风水早被盗墓贼给悄悄破了。

黄天元：风水不可能让冉土司占尽，要不他的后人中总有发了，不会这么无响无臭。况且，地脉运行，风水也是轮流转。

老威：您的后人中会出天子？

黄天元：天机不可泄露。

老威：您把“阴世夫妇”的事给家里谈了么？因为死后怎样，您可做不了主。况且冉家婆婆的后代也不会同意你们合葬吧？

黄天元：这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事情，我肯定会给两家儿女讲清楚。这些年，大家越来越信风水，起阴宅和阳宅都要请人看，不选好日子，绝不破土动工。我这一辈子，都在为人民服务，现在 90 岁了，也得为自己服务一次。唉，其实我早有准备，让冉红玉先把地方占着，如果儿女不尊重我的意思……

老威：那又咋样？

黄天元：我就自己到这儿来。

老威：您不可能自己埋自己吧？

黄天元：我的阴宅早修好了。

老威：在哪儿？

黄天元：在向西的那些岩石里，你看不出来，除了我，谁也看不出。

老威：这么隐蔽？我还以为您会扒开冉婆婆的墓，连着垒座双头坟呢。

黄天元：我为啥要做给别人看？暗地相通就行了。

老威：这个，还是有点别扭，总不能一点标记也没有吧。

黄天元：我看风水的名气在外，如果为自己选地的消息一传开，这儿就不得安宁了。这几年，风水、算命越来越吃香，城里和农村差不多，稍微多挣了点银子，就急爪爪地考虑后事。去年，我少说为 50 多家测过风水，今年无论如何不干了。可是许多人都在传，黄老仙勘过哪匹山，哪条沟，于是就一窝蜂去，把地皮子越炒越热，基修得一座比一座大。我们乡长才 50 多岁，墓起得比他现在住的院子还大。我前年随便为他选了块地，他就跟着把七座祖坟从十里外迁过来，雇了石匠、泥工、砖工、基脚工一大群，热火朝天地干了三个月，把墓弄成私家园陵了。完工时，乡长请了二十桌客，我屁股一拍就躲了。人太贪，身上就带煞，我怕客气转眼就变成晦气。

老威：这风水宝地是您选的嘛。

黄天元：啥地葬啥人，该如何葬，都有规矩，您改了这规矩，乡长赶到县长，甚至省长的头里，就要折阳寿。上乘风水为阴阳五行汇集点，当不盈不冲，墓起得超出了规格，就叫满。你不晓得，乡长在墓里把行头都布置齐了：桑塔纳轿车、龙床、夜总会、卡拉 OK 包间、跨国公司董事会的椅子，本来还想打些小姐，可石匠的手艺不行，凿子把石头人的五官啃得稀烂，认不出男女——唉，区区风水小事就硬生生地闹成大事，电视台和报纸争着曝光。上面来

调查组，乡长倒霉了，又牵出一串书记、村长、镇长和村民组长，原来没有一个清官，都是铲国家和农民的地皮，并把贪来的钱投资修墓。有领导带头，看不起风水的乡下人也晓得靠着大户边儿圈阳地，通往县城的盘山公路，向阳的一面就有几十座空墓，远远望去，还以为是别墅区呢。

老威：您没事儿吧？

黄天元：咋没事儿？祖坟被造了，乡长一肚子火，转头就咬我一口，我又成了大搞封建迷信的坏人。我藏进了阴宅，没人晓得下落，他们就拿我的看水徒弟出气——电视台拍了一集神童如何算命骗人，大家都看了，背地里对我黄家指指戳戳。当然，这跟乡长到处散布谣言有关，他说就因为信了我才倒邪霉，吃了官司，还连累后人。

老威：胡说。中国法律不兴株连。

黄天元：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垮了，哪个尿你这一壶？

老威：这倒是实话。

黄天元：所以乡长认为我断了他家财路。乡里乡亲也不认黄，纷纷检举我。公安局找不到人，就把我家里请进去审问。这样拔萝卜带泥，又扯出 20 多个风水先生，一溜押到群众大会上，与人贩子站在一块批斗。劳改、劳教的都齐了。又司祖庙旁边的瞎子算命市场也取缔。当然，90 岁的人，在这儿也算国宝，所以抓住我又能咋的？即使劳改了，也干不了活儿，也避不开对风水和长寿感兴趣的人，我有群众基础。文革时，打击封建迷信比现在厉害，我照样做业务。

老威：我在县城住了两天，市面很清静，看来整治之后，风水算命都萧条了。

黄天元：跑到贵州和湖南去了，几十里就过省界，现在交通又方便。四川搞运动，其它省不一定搞。如果嫌抢人家的饭碗不吉利，还可以跑更远些。福建、浙江都信四川，这边的风水先生有根基，随便露两手就把当地的歪货给盖了，这一行竞争激烈，谁的本事硬，发财就快，靠真才实学稳当。

老威：据我所知，全国都在取缔封建迷信。

黄天元：封建迷信指的是跳大神吧？前一晌，风水、算命一歇下去，陈巫婆的业务马上红火，门坎都被踩平了。陈巫婆只会一种本事：纸符化水，让人喝下去，然后就披道袍叽哩哇啦地兜圈子乱跳，说啥王母娘娘下凡附身。天晓得啥子鬼附了身。箩筐大的字不识两个，跳一盘神还收人家 50 元，太黑了。

老威：陈巫婆一跳就个把小时，70 多岁的人，还把灰盆子（有时是箴筛）顶在脑壳上，人不人，鬼不鬼，也够辛苦的。

黄天元：你晓得个逮。农村人长那么厚的膘，丢不丢脸？她瞎跳当减肥了，哪能消灾去病，预测未来？哼，打击风水，跳神就火；老子倒霉，陈巫婆就吃香，这世道的水风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真他妈被盖里面逮耗子，这边按下去，那边又冒起来。

老威：您算个德高望众的老江湖。

黄天元：所以，我不把陈巫婆放在眼里，纸符化水，治不了病也医不好人。这阵风一过，大伙又会想起黄老仙。我自幼个读孔孟书，以后又多年研究《易经》、八卦、《梅花易数》、五行、阴阳宅基学。我连《推背图》、《天宫书》、《黄帝内经》都反复揣摩过，如果放在过去，说不定涓滨姜子牙早就逢上文王了。

老威：高寿之翁，志向还如此远大，佩服佩服。

黄天元：志向远大不顶用，我这辈子怀抱子牙之才而混迹于世，皆因祖上风水平平，还略有败象。我花了好几年功夫踩勘地理，终于寻到这块“笔走游龙”的宝地。根据命星推断：待我享尽阳寿，与冉红玉行阴间合礼始，黄氏一门，三代之内，必出王侯！封地万里，光宗耀祖。五代，游龙出海，以笔力而文治东夷，以分庭抗礼而震惊天下；至六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老威：如此了得的风水，老先生何必与外姓人分享呢？

黄天元：我阳妻病逝得早，况且自然灾害期间，遍地饿殍，哪有风水一说？我一家几口，刨土葬亲，坑还不及三尺，人都饿趴下了。由此可见，堂客她命薄，骨头轻贱，一旦迁入贵地，风水就破了。而我一人独葬，阴阳不调和，风水也不圆满。冉红玉与我的阴

世缘分是天定的，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这种百年奇缘我讲不清楚，即使给你讲了，你也不清楚。但生死循环，天作之合不能违啊。

老威：老先生的学问的确高深，不仅我不清楚，天下也没几个清楚的。

黄天元：所以世道险恶，能够抽身尽早抽身。

老威：朝哪儿抽身？今天不是古代，连个隐居的地方都没有。这山，这水，早晚得开辟成旅游景点，如果生意好，在山下修个山门，再打广告，说是最新发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这样历史与自然的遗产都上档次了，人们就会乘乌江火轮，潮水般涌来，说不定您百年之后也会成为一个招徕游客的绝招。

黄天元：你的心境太乱了，我们下山吧。

老威：您不是住在这儿么？

黄天元：我住在村上，我的儿女跟孙子辈住在县城。

老威：您刚才说“曾经藏进阴宅”。看，月亮爬上第二个笔架了，这风好像来自天堂，有一股幽香，如果这时再婆婆从墓里出来，肯定脱胎换骨了。鬼都是好鬼，美鬼，在草上飘来飘去，令人摔跟斗的鬼。老先生，我们回吧。

黄天元：回吧。我不会当着人下阴宅，我花了很多年的功夫，一个老年人，容易么。其实我已经搬家了，看风水赚的钱，我起了两座院子，儿女分了，后来又转手卖了，因为他们要跟孙子、重孙子辈去城里凑热闹，一大家子挤楼房。老人好清静，但我的儿女都跟他们的儿女享福去了。我不去，要分钱尽管分，反正我人不去。人太老，一脸的皱皮疙瘩，年轻人看久了，就不习惯。你孝顺我，为我倒屎倒尿，我还觉得是个负担。算了吧，再红玉一过世，我的尘念就绝了，虽然还勉强给人看风水，但魂已不在这上面了。你看，那块岩石大半悬空，岩石周围还有岩石，像钢筋水泥浇的，没一条缝。只有我晓得咋进去。60年代，这山上有只虎，饿晕了，就下村里扑人。后来全村人都打着火把、敲着锣赶上山，老虎走投无路，就从那块岩石上跳下去，摔死了。人们连夜剥虎皮，露天架锅煮肉，

百多口，每人分到一小碗。据说这是川黔五县的最后一只老虎。我刨出的或许是虎洞，20多米深啊。我每个月都要下阴宅住几天，有冉红玉陪着我，阳世就一天比一天淡。你嗅到的香气是陈艾、苦蒿、黄连、白芍、薄荷、马桑、断肠草，有野生的，也有我种的。我在这一带撒了二十多味草药种子，土太肥了，春天撒种，夏天就蹭蹭朝上冒，到处窜，岩上的浮土窜满了。这比庄稼管用，心情好，折些草药压在舌根下，就感到饱，感到身体从内到外透着香。这些草药防虫、除虚、明目、解毒，能治多种病。随便扯几把配成方子，搓挤成浆，搽一搽自己的口、鼻、耳、腋下、屁眼，都能驱除邪气、浊气、烟火气，百虫不侵。现在我经常几天不吃饭，睡在阴宅里，即使吃，也不要熟食。我还剩五颗牙齿，一天能慢慢将两把米磨成浆，一点点吞下去，就很满意了。阴宅里太黑，如果有虫子钻进嘴里，我也一口含住。蚯蚓味道还好，蛇和蝎子不敢惹我。

人太毒了，比蛇和蝎子毒得多。特别是现在的人，以前是吃阶级斗争的奶，如今又吃升官发横财的奶，都练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不相信？你捉条蛇来，隔着一层衣裳咬它一口，不出一分钟，再毒的蛇都死。过去的人没这么大毒性，因为吃简单，想法简单，粮食不上化肥。《三字经》里说：“融三岁，能让梨。”连娃儿都让水果给人家吃，难怪孔夫子要讲“礼仪之邦”。

人生先做加法，后做减法。许多人一辈子做加法，结果越活越累，累死不到头。开国帝王打了江山坐江山，坐了江山又想传给子孙万代，这就是没完没了地做加法。其实帝王与商人有啥不同呢？江山也是一笔生意，哪能永远只赚不赔。所以加法做到一定时候，就得一点点减。我90岁了，生命快减到零了。零就是自然，就是没有脾气的风水，就是金、木、水、火、土。我的后人在这上头增加一点点，都是一。

老威：丢开名利，谁也不会关心您的下落，老先生好自为之，不要急于求成，草草活埋了自己。

黄天元：这是我的家。我会享尽天年，为了黄家后人“笔走游龙”。

15 乡村老教师黄志远

采访缘起：61岁的黄志远是我父亲的同事，80年代拉家带口，擅离公职，回到故乡成都，为蔑视户口管理的所有打工仔之先驱。

黄老师黑人黑户，又要养家糊口，又要担惊受怕，其多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好在现在他已基本安居乐业，小杂货店的生意也算不错。

不过，大学是白念了。1998年10月9日下午，我爸特嘱咐我在白果林家中多布置酒菜，招待若干年不见的黄同事。“只有在你们家，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苦笑着，客套着，我却觉得亲切，遥远的亲切。

老威：您好，黄老师。

黄志远：这不是二毛么？多年不见，差点认不出了。

老威：您啥时回成都的？

黄志远：84年。

老威：这么早就退休了？

黄志远：我自己跑回来的，公职、户口都没要。你看，一黑就黑了这么些年，凭几根穷骨头硬撑着谋生活，我起码干了五年搬运工。嘿，我学的物理，当搬运工倒挺合适。

老威：这不与农村打工仔抢饭碗么？您是大学毕业的中学老师，至少代课不成问题。

黄志远：没户口，代不了课，连高考补习班也干不成，运气好的话，偷着干点上门家教。我人老皮厚，豁得出去，娃儿婆娘就惨了。娃儿上不了学，婆娘打零工受歧视，更气人的是经常查户口。妈的，这是我自己的家乡！我倒成了外来人口！当然，现在宽松多了，老黄历也不提了。

老威：您当时45岁，再干10年，体面退休多好。

黄志远：那鬼地方，多呆一天都烦。

老威：磨了这么多年，还这么冲动？

黄志远：我们这批人，到底为谁在活？一晃就 60 岁了，黄土埋齐下巴了，可仔细想一想，脑子里除了运动和饥饿，啥都没有。50 年代没赶上中苏友好，60 年代没赶上文革，70 年代没赶上平反，80 年代更没沾改革开放的光。90 年代嘛，终于攒钱开了个杂货铺，可他娘的税费又多。唯一的安慰就是娃儿跟我自学成才，读完了大学，可现在找对口的工作又困难。

老威：您这辈子的确艰难。

黄志远：我刚好是 61 年上的大学。如果早生一点，还可以跟苏联专家唱歌、跳舞浪漫一回，相隔多年，我会唱的苏联歌还是比中国歌多；如果晚生一点，读书时撞上文革，也能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风光一回，说不定还发配不到山区去。偏偏我刚够臭老九的格，就充军到盐亭。

老威：您一直都有“充军”的感觉？

黄志远：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脑子容易热，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党团组织稍微表示一点居高临下的亲近，脑子就热得稀里糊涂，让堵枪眼也上。我家成分是“小资本”，当然应该感恩戴德地服从分配。我是表了决心的，直到风尘仆仆地下放盐亭，又由盐亭再下放到山垭公社，《决心书》还贴在衬衣口袋。老实说，初次下乡的经历虽说不上美好，但至少是新鲜的，也有几分激动。

老威：您讲一讲。

黄志远：你没听你爸讲过？

老威：他是更老的一代人，跟您有差别。

黄志远：我从没见过那么破的公路，有点像《地雷战》里日本鬼子进村时，经常挨炸的那条道。我们在这条道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天擦黑时，客车还熄火抛锚了。一时修不好，就由一个同车的山民马拉松长跑着去通知公社。我们站在路边等。

而挤成一锅粥的山民乘客们纷纷下车，各自赶路。一会儿，接

我们的手扶式拖拉机出现了，我们心急火燎地坐上去，突突突地向前。头上悬崖突兀，月儿高挂，阵阵寒风刮得人直打哆嗦。突然有一艘甲板样的巨岩挡了一半道，拖拉机减速，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公社到了。

白天一车人，夜里就剩我们三个大学生，像逃荒的。山垭不通电，百多米长的一条土街，只有场口修理农具的铁匠铺还亮着汽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铺板里传出，使四周显得更寂寞了。真有点像在月球上走路，连野物也是静悄悄的从我们身旁滑过去。

老威：有些像梦境。

黄志远：多年以后回过头去想，也差不多。那真是个奇怪的铁匠铺。据说原来是座庙，庙旁的岩壁，凿着个八层楼高的观音菩萨，几百年香火不断，山垭就是围绕着这庙，逐渐发展成乡场的。后来破除迷信，庙改铁匠铺了。冷落了菩萨，生意还特兴隆，农忙时，叮当声要响过后半夜，因为坏损农具总是堆积如山。

老威：得罪了菩萨，也没见报应？

黄志远：文革时，菩萨被炸了，当地老乡都传要降灾，结果不但没灾，铁匠铺还扩大为修理厂，厂里的十几个农村铁匠都升格为工人阶级，死保当权派山皇。那时山垭中学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红箍的学生们上街造反、游行、开辩论会，总要路过修理厂。于是学生们有针对性地呼口号，唱歌，有时还挺抒情。你想想，几十个喉咙在群山夕照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还真能把自己感动得掉泪。而此时，铁匠们都丢开铁砧，亮出半身黑亮链子的肉，一人握一把长柄二锤，齐刷刷地列队门前，敌视学生娃。我从来没进去过，怕被放上砧子当农具给修理了。铁匠在学生的谣传中比吃人生番还凶。有一回，学生组织头头张红梅失踪了，大伙们怀疑重点就是修理厂。于是调集了几百人，甚至把武装部的枪硬借出来，围剿。攻了半天，铁匠们真红眼了，拉开铁栅子冲出来拼命，把二锤舞得呼呼山响，一会儿就扫荡平了一大片。许多学生中锤当场就哇哇吐血。幸好二锤皮往人的脑瓜子上砸。造反派急了，仗着人多势众，终于掀翻铁匠铺。那次还开了枪，把一个铁匠

的耳朵崩飞了。嘿，你看我越扯越远。

老威：没关系，我正听得上瘾。

黄志远：刚才讲到铁匠铺。再朝前几十米，就是门口蹲着石狮子的公社及武装部。我们拾阶而上，书记领着这个简陋衙门的所有差役迎出来，为了“贵客”临门，炊事员兼值班员一手马灯一手汽灯，正准备鸟枪换炮，把会议室照个雪亮。

与公社书客套了几句，我就饿哑了，同伴张大春忙接过话头。炊事员笑嘻嘻地端来晚餐。此时已近夜里9点，书记说：“我再陪你们吃一碗。”就不客气地坐定会议桌上首。见我们发愣，他又解释：“农村人开夜饭，也是这时辰。我直到现在还不习惯五点半吃机关饭。”

水瓢大的土海碗，酸菜包谷面粥堆出了尖儿，筷子朝里一搭，婴儿拳头一般的红苕露出来，嗖嗖冒热气。我超水平发挥，没用咸菜就吞掉一碗，撑得腹大如鼓。这是踏入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绝对不能剩碗底。张大春把胃病胀翻了。哎哟了一夜。

可书记连吃两海碗，方停箸摸烟。张大春见抽的是《春城》，忙掏出兜里的《大前门》递上，并撒了一圈。你不知道，这粥包括盐亭人民赖以生存的三大特产：红苕、包谷、酸菜。贮入地窖的红苕是农民大半年的主粮，因糖份重，常吃造成胃酸过剩，所以非与酸菜搭配着吃。酸菜的制作是将大青菜洗净，晾透水气，塞进大瓮密封。几十天后，青菜沤得发霉，呈酱色，指头蘸尝一点，又臭又酸，能倒掉人的大牙。沤得好的上等酸菜，瓮面起一层鼻涕状的“悬水”，伸手抓一把朝上提，能吊三尺多长。酸克糖，红苕吃出的毛病就解决了，但据专家考证，盐亭之所以成为全国食管癌胃癌的传统高发区，跟红苕酸菜有直接关系。

老威：您对吃还很有研究。

黄志远：那年头的伙食太次，似乎每个人都研究吃，不是味道，而是啥能吃，啥不能吃。我放在吃上的心思肯定比教书的心思多。所以，我们觉得公社书记不错，人实在，待客用大海碗。人家是三代铁匠，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钻进农具修理厂重操旧业。闹文革，

铁匠们都成保皇派，跟书记打铁有直接关系。批斗走资派时，铁匠们劫了法场，从此书记在修理厂躲了一年。后来厂被攻破，造反派就将书记揪回中学，与校长关在一块，天天喊着口令，让一长串大小走资派光着脚，跑操，刮风、下雨、晒太阳都跑。学生们换着喊口令玩，时快时慢，把走资派摔得鼻青脸肿。终于有一天，书记的铁匠性子发了，就与学生们打起来，结果被揍得大小便失禁。学生们不解气，把他架在毛主席像前认罪，他死不开口，原来他把舌头尖咬断了。

唉，悲惨事说不完，书记死了好几年，我都还记得刚到山垭公社那夜，书记的分分头，像土改电影《槐树庄》里的富农。可深秋天气，他只穿单衣，一脱下来，就显出黑亮肌肉的铁匠身份，我总觉得他的脸与他的身子不协调。他曾留我们到修理厂过夜，说铁打完了还可以蹭包谷酒喝。可惜我们奔波一天，太累了。刚在招待所躺下，公社机房又接到学校电话，告之邓校长已亲自带人上公社来接新老师。

那是个热情过盛的时代，虽然书记在电话中一再说“睡了”，可校方回答“邓校长已在路上”。我们激动得倦意全无。我不是诗人，要不真要写诗了——书记陪我们站在垭口，极目远眺脚下朦胧一片的山路，一长串火把蜿蜒蜒蜒地上来——那十里开外的乡间中学就是等着我们奉献青春的地方。

我们夹在一群大孩子中间一直下坡，曲曲折折地下到底，就是山垭中学。

行李由孩子们扛着，一左一右是邓校长与杨主任。有时，路变窄了，人就排成单行，路旁是深沟，当脚偶尔踩虚时，总会有手或前或后地拽住你。接近学校时，要穿过一片坟地，火把照着人影，一伸一缩的，与墓间的纷飞磷火互相牵引。我想起书记临别时说的话：“破太陡，机耕道也莫法修。年轻人，做好长期吃苦的准备，改造世界观肯定不像电影演的那么容易。”

老威：您对那苦地方还是有珍贵记忆的嘛，至少铁匠书记不错。黄老师，我觉得您是 90 年代青年志愿者的先驱。他们都是各行各

业的人才，却主动申请到最穷最苦的山区希望小学教书，体验生活，一年或者两年。

黄志远：这有啥意思？中国山区是改造不过来了，不管投多少钱，最后都变成了水里的月亮。光秃秃的山梁子，一座接一座，你在上面走半天，风景是一样的，脚和眼睛都累了。种树致富？活不了，即使活得了，人活儿样也享受不了，农民不会干这种傻事。谁都不愿脸朝黄土一辈子，能跑的都跑了。笔试时代出门要证明，人不敢跑，哪怕种着庄稼饿肚子，也认了。邓小平把一切都搞活，泥腿子比我们跑得更远更欢。

老威：您读过山西作家李锐的小说么？吕梁山那么苦，农民还是眷恋自己的土地。

黄志远：瞎编嘛。每个朝代的作家都瞎编，因为农民从来不读小说。你编得如何他们也不晓得。文革中，浩然的《艳阳天》普及得宽，还有克非的《春潮急》，里面有加钢黄蟾卖假牛的场面，挺生动。说实话，没一个中国农民真爱自己的土地，谁愿意世世代代种地？只要有更来钱的活儿，都丢下地跑了。树砍没了，水不能喝，人也会渐渐走光——在成都和绵阳，我偶尔也碰见我的学生，当官、做生意、打工、下苦力都有，走运和倒霉都有，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跳农门。

有一次，我在磨子桥一带拉贼三轮，撞上城管缴车，躯闪不及，三轮就被弄上大卡车拉走了。我绝望得两眼发黑地蹲在街沿边，正考虑下一步该靠啥谋生，后面却有人拍我肩膀。一回头，见一个胖老板冲我叫“黄老师”，我早忘了我是老师了，所以猜不出对方为谁。

胖老板硬拉我去一家夜总会坐，还自我介绍，原来他是山垭铁匠书记的老二，80届的初中生，我当了他三年班主任，后来他去县城上高中，去绵阳上大专，进一步的情况我不晓得。我看了名片，才晓得这小子是这家夜总会的总经理。铁匠书记的儿子还是念旧的，他请我喝酒，还给城管的熟人打电话，设法把我缴去的三轮弄回来。这小子门路野，酒量也大。他一会儿就灌完一瓶红酒，醉醺醺的，

一定要给我叫小姐，把我的魂都吓出窍了。他说：“黄老师，您和我爸一个城市一个农村，但命都一样的苦，这辈子太没意思。做学生的今天一定要让您享受享受。”我说：“师道尊严还是要讲的，你咋可以拉老师下水？”他说：“课堂上是师生，下来就是朋友——这都是您以前教导的。我爸死得早，老师您偏向我，经常留我在您寝室做作业，今天我非要报答您。”我说：“您虽然是好意，社会风气也如此，但你爸的在天之亡……”他哈哈大笑打断我：“算了吧，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不容我多话，两个小姐就上来挤着我劝酒，把这张老脸羞惨了。我的学生见我手脚无措，就起身说：“慢慢来，我这会儿去给您找个更漂亮的，把你们那代人的世界观彻底改造一下。”

我好不容易挣脱了两个小姐，冲出包间，却见走廊拐弯处围得水泄不通。

我浑身都汗湿透了，凑近人堆却见我的学生正殴打一个小小姐，他揪住她的头发，手、脚、膝盖、倒拐都用上，小姐被揍成一团，满脸血，浑身发抖；旁边好几个人拉架，可这铁匠的后代力气大，无论如何分不开。再打下去肯定出人命，我不得不上阵相劝，还挨了学生一拳。我学生见我鼻子出血，一愣，酒才醒了些。他说：“这婊子嫌您老！妈的，她那逼有多嫩？起码几百男人搞过，有多嫩？”我实在听不下去，只有赶紧走。三轮也不敢去要，生怕铁匠后代再找到我。可有天读《华西都市报》，竟无意在社会新闻栏里看到关于我学生逼良为娼的追踪报道，当记者采访被拘留的“打人凶手”时，他说：“我的老师太穷了，小时候，他对我那么好，长大了，我为了他被关几天也值得。”

老威：世上竟有这种“念旧情”的学生！

黄志远：他爸在阴间还不气死！有时我不明白，老毛和老邓谁对谁错？开放好呢，还是关门好？铁匠后代不打铁，到大城市来乱使力气，结果变成害人虫。比他混得差的更是害人虫，宁愿瞎闯，也不回老家。

老威：瞎闯不动的，总留在家里吧？

黄志远：朝人多的地方搬。混出人样的，到绵阳或成都继续混；次一等的，在县城或郊区定居；再次一等的，迁往大的场镇；最差的，也靠近乡场。地再大山再高，祖宗的骨头埋得再多，但传说的风水说变就变。听说山垭中学也撤消了，房子平了，操场填了，全弄成农田。我估计原因是师资缺乏，离乡场都十多里，生活太不方便，如果不用行政命令，现在谁愿意去？

老威：山垭中学教学条件咋样？

黄志远：在当时算不错的，30多名老师，大学文化的占一半，甚至还有你爸那样教过多年进修学校的特级教师。那年头，哪儿都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谁也不觉得山洼洼屈才。据说山垭中学还是清朝末年一个同乡举人创办的，拱式教学楼与大礼堂还有点西洋建筑风格，农忙时，教学楼前的操场就成了晒谷场，农民们甚至把风车都搬来，干得欢天喜地。学校师生要进行篮球、足球等体育比赛，得事先与生产队好言协商。而体育课根本上不成，因为农村孩子从小到大都干农活，体育课天生就该满分。

教师、学生住的大、小四合院及女生院都有几十年历史，山湾堰塘绿水幽幽，兼作灌溉与天然游泳池。我看过电视剧《围城》，这儿环境有点像方鸿渐去的三闾大学，日本鬼子的飞机根本炸不到。也许，这儿该办成五·七干校或农业大学，因为学校所辖的果园、农田与菜地都由师生耕种。75年演《决裂》，其中有句台词：“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以为今后大学不用考了。贫农出身的高校长趁着大伙热情高涨，擅自把全日制课程改为半工半读，并率先挑起一对大粪桶，在田地间疾走如飞。师生们争先恐后，每天下午都掀起种地热浪，以至收获季节，水果、蔬菜过剩。学校没有公粮任务，校长找公社好说歹说，才争取到义务送粮到贫困区的光荣，而水果、蔬菜吃不完，也没地方可送，好只烂掉。

老威：赶乡场卖嘛。

黄志远：学校不兴做生意，况且农村，不占肚子的东西不好卖，总之，20年中，我可能有5年在认真上课，恢复高考，邓小平复

出，学校为适应形势，才划分出教学组，整理教案。此前，我这教物理的，也教过数学和语文。

文革武斗时，山垭中学分成两派，造反派一占上风，就将以校团委为核心的保皇派撵出校园。附近农民也有组织，叫“农奴戟红色兵团”，与学生们观点不一致，校方就鸣钟集合宣布：学校操场是革命小将的练兵场，不是小农意识的打谷场，而大礼堂是排练和演出忠字舞的红色舞台，不是堆放资本主义黑庄稼的仓库——这一招太狠了，“农奴戟”抗了几天，就召集上千泥腿子沿山路游行，挺进学校，发出怒吼。几百学生娃都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齐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与农民对峙。

乡下人毕竟老实，胆小，不敢贸然出手伤人，而书生们伶牙利齿，利用越战越勇，“母校保卫战”持续了几天，县里造反总部来了两名特派员，声称：

“再敢围攻革命小将，‘农奴戟’将被县革委定性为保皇狗。”如此狠话出自“县里”，农民们马上作鸟兽散。

清静日子没过多久，中央号召“革命大联合”，接着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进驻学校。嘿，风水马上又倒转，几个学生领袖被驻校代表宣布为坏头头，“刘少奇的走狗”。经过游乡和批判会，压服了学生们的嚣张气焰后，学校变本加厉演化为农场，不仅拾掇庄稼，而且养猪养狗养鸡。深秋重开课程，学生都不能按时报到。校空了，连早已熟悉的迎接“最高指示”的游行也失去了往日敲锣打鼓的热闹，“贫农代表”跺脚乱吼，急忙去校旁的刘家大院动员乡亲，不料乡亲没有熬夜的习惯，连“最高指示”也把他们搞不起床。

老威：您虽然在乡下，但热闹看了不少。

黄志远：人像面团被搓来揉去，农民管理学校，除了监督劳动，就是忆苦思甜。你不搭理，他就三天两头找你谈心。忆苦饭更是常吃，师生都成瘦猴子了，还让“斗私批修”。农村学生很本份，都走几十上百里山路，从家里背粮食。学生食堂有口大锅，人横着躺下去只能够着锅底。下面煮水，上面架木格子蒸饭，全是学生们自

带的五花八门的器皿。锅盖平时吊在房梁上，蒸饭才放下来。学生下饭顿顿是白水菜汤，没有一星油。长此以往，人会得甲亢病，学校也太黑了，师生打了那么多粮食，却一粒也不抠出来。守着个世外桃园，我最深的感受自然是饿。一个礼拜赶一次场，炊事员早就出门，按教师的人头买肉，一人二两。星期天晚餐，大家无一例外地聚集小食堂，把碗摆在案桌上，等待伙食主任唱名、分肉。炊事员分肉手艺已炉火纯青，片数不会多不会少，连油与菜，也尽量平均。因为此时众多鹧子眼都随着“印把子”转动，你有私心，人家总会咳嗽，以示提醒。

肉碗到手，每个人都要本能地簸一下，才伸出另一碗打饭，一碗三两。计划经济时代，27斤的口粮定额，绝不含糊。为了改善生活，教师们成群结队夜捉青蛙，一会儿一大桶，刮皮白水煮吃，特鲜。

老威：除了乱七八糟的事，您是咋教书的？

黄志远：你问我，我问谁？那年头根本就没固定的课本，只有讲“最高指示”没错。毛主席啥都讲过，就缺物理和化学，所以我也不敢乱讲。您爸是特级教师，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出神入化，就凭这一条，文革开始他就成“黑帮”。唉，这辈子太落魄了，连老婆与我的共同点也是吃。她是当地农民，小学文化，管刘家大院的榨面机。我开始去榨挂面，接着就经常接受她一把面的贿赂。结了婚后，她才嫌我吸面的声响太大，“一吸里外都听得见”。

老威：您一个大学生，不嫌她土？

黄志远：我是臭老九，30多岁了，没人要的货；而人家当时是生产队一枝花，追求者满山遍野。我们秘密好了一年多，才公开。她爹见生米煮熟饭，还叹息“鲜花插在牛粪上”呢。还是俗话说得好：“胃口就能成夫妻。”

16 采购员霍海仲

采访缘起：75 岁的擦鞋老人霍海仲，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出太阳，都在那象征司法公正的招牌下坚守鞋摊，且忙碌不停，他称得上四川省高院来访接待处门前的一道持久不变的风景。

2003 年 3 月 28 日，我花了一下午功夫泡在对街茶馆里窥视，却只见到 3 位匆匆过客坐下来擦鞋。清冷如斯，我动了恻隐之心，就现身趋前“照顾生意”。

不料老人横乜一眼，将我和我的鞋均晾在一边，却转脸招呼两位风尘仆仆的外地上访者，并滔滔不绝地介绍与之相关的法律过场及熬磨经验，其中包括附近几家旅馆和小食店的最低价格，俨然是高院的编外咨询接待人员。

与老人交谈片刻，其冤情平淡无奇，一目了然。我追究久拖未决的原因，老人回答：“当年的案卷丢失了。”

我哭笑不得。老人又叹道：“我的一生可用‘莫名其妙’四个字来总结。这桩莫名其妙的官司把我毁彻底了。”

老威：您是霍老先生么？我在某报记者武田那里看过您的材料。

霍海仲：武记者一年前找过我，写了稿子，还拿给我看，但以后就没下文了。

老威：没下文？很正常。因为报纸是党办的，武田再同情您，他的胳膊也拗不过党的大腿。

霍海仲：我懂，武记者头上有主编，主编头上还有宣传部。

老威：宣传部养了一大批离退休的老革命，组成读报委员会，每天上班唯一的头等大事，就是扛着放大镜，一字不漏地串读本地几家主要报纸，挑毛病，上纲上线。正面的各种阳光新闻必须占百分之六七以上，而所谓“阴暗面”只能有选择地刊登，还要留点“光明的尾巴”。

霍海仲：可上访人士登报的也有，比如老陆。

老威：老陆告赢了公安局，至少从司法上，他的事已有定论，所以媒体能够有条件地炒作。而您的案子好像还没有个定论……

霍海仲：我冤枉，这是明摆着的。

老威：您讲讲看。

霍海仲：我今年 75 岁了，还坐在这儿擦皮鞋，还一遍一遍地向人们诉说内心的冤屈，想起来，跟做梦似的。前一晌开两会，公安局清理省高院周围的三无人员，把上访的撵得鸡飞狗跳，腿稍慢，就抓进收容所。我风烛残年，不在乎这些，但也被警察打了，腰和腿挨了警棍，趴在街沿，半天起不来。鞋摊也被踩平了，他们说我是老反革命，是特务，故意把个破鞋摊摆在高院来访接待处门口，打反面广告，损害国家形象。我争辩说，上访没钱，我一个孤老，不偷不摸，不叫化要饭，而是擦鞋自食其力，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他们说，哪你到别处去，莫在这儿碍眼睛。我说就要日夜钉在这些官僚的眼皮底下，直到死。

老威：没用。冤案见得太多，人心就成了铁打的。

霍海仲：但一个人冤死在高院门口，你总不会无动于衷吧——一桩莫名其妙的官司消耗了他一辈子。坐牢、留队劳动、申诉、上访，除此之外，他无儿无女，无家无室。

老威：我很难过。

霍海仲：我是三台县中太镇长乐办事处 7 村 4 社人，年轻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草草训练，连枪都没打顺，就被送上前线。新兵嘛，一听排枪响，就鸭群一般嘎嘎后撒，被督阵官赶回，就干脆埋头装死。到解放那年，壮丁更是抓得多跑得多，长官开枪止不住，自己也被挟裹下战场。有一次，我们遇上解放军，照例丢枪就跑，因为是开阔地，我跑得急，方向偏了，竟入解放军的包围圈。我立马举手投降，成了俘虏，稍后成了解放战士。抗美援朝时，我 23 岁，刚跨过鸭绿江，准备上前线，却突然怕死，装病脱离了部队。

老威：你这段经历挺复杂的。

霍海仲：够写一部书了，但我只能三言两语，作为开场白，让

你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

壮丁出生，贪生怕死，希望能回老家，平平顺顺地过日子。总之，思想开了小差。部队领导还算宽大，没有过多地追究。复员回四川，我转到了江油钢铁厂当工人。1956年，厂领导根据我喜欢跑腿，好交际的特长，分派我做采购员，直到六几年。这期间，我经常回三台老家，与乡亲们混得火热，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这是我一生中得意的日子，大伙叫我“霍采购”，八竿子打不着的也瞅准机会来散烟敬茶，搭关系。说媒的更是接二连三，在家里寻不着，就揣着姑娘的照片在车站等。没料到，好景不长啊。

老威：我是58年大跃进出生的，三年大饥荒，我因营养不良得了黄肿病，差点就夭折了。你能在那种全国性的水深火热中活得春风得意，不简单。

霍海仲：社会主义初级目标就是缩小三大差别，我嘛，在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中穿针引线，沾些油水，活命的空间自然就大。我经常受组织安排，为厂里采购农副产品；而农民也乐意通过我，把在集市上赚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成批卖给国营企业，即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个人也能得些油盐钱。

老威：供销对路，您也算改革开放的先驱了。

霍海仲：由于工作过分积极，我累出了病，经厂领导批准，我于1960年回家休养。

在此期间，厂里派给我新任务：为江钢采购箩筐、蓑衣、斗笠等农副业加工物品。由于需求量大，我就专门找到长乐四村四社队长，与之签定加工合约。当时，社员们还挺感动，叫我大善人，因为我在普遍揭不开锅的情况下，为大家引了一条生产自救的路。1961年春，四社按和约交货，可我手里没现钱。

为啥？因为按当时的现金支付管理规定，除了职工的工资，所有支出，上30元就必须由银行转帐，而四社却没有在银行立户头（那年月，恐怕大队干部也不懂“户头”）。

众乡亲嚷着要现钱，我一时又从帐户中提不出，只好凭多年的关系，四处借贷，自筹资金，先垫付了这笔1978.40元的货款——

我不能失信于生养我的故土，大家都在等米下锅呢。完成任务回到厂里，正逢社教运动，冻结了江钢的帐务。经过相当漫长和细致的逐项审核，确认没问题，社教领导小组才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签字，将我的垫款作兑现处理。1964年，厂方按规定将1978.40元等额货款直接汇到我的老家——三台县长乐七村四社霍海仲收，并且注明是三年前的蓑衣、斗笠、箩筐钱。在60年代，私人收到这么一笔巨款，肯定引人注目，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结束，人们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长乐信用社收到钱后，马上作为重大“敌情”汇报给公社。据原分管民政和治安的副社长，现已80高龄的涂国华讲，当时公社连夜召开由几个部门参加的分析会，一致认为来路不明，应立案侦察。

老威：信用社没有通知您本人？

霍海仲：没有。他们直接扣下钱，就派专案人员按收款地址去我老家调查，都说从未做过箩筐、蓑衣的买卖，这刚好证实了先前“来路不明”的猜测，于是冻结了款项。稍后，我“落入法网”，严刑逼供，最终便认定我勾结四队队长、财务等人骗领江油钢铁厂巨额现金。1965年10月3日，三台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我有期徒刑7年。

老威：您与四村四社做买卖，咋会去七村四社调查呢？况且，您为公家办事，前后应该有不少证人，他们都没有站出来？

霍海仲：这些我都说了，包括与谁签的约，谁验收的垫款，账本在谁的手里等等。但整我的人都红了眼，宁左勿右，根本不顾我的申辩。

老威：这笔“冻结款”现在何处？

霍海仲：我打了18年的官司，倾家荡产，孤独无依，所以一再要求法院在平反冤狱的同时，助我讨回本属于我的财产，可那笔钱却蒸发了。

老威：不会的，既然认定您“骗领公款”，按法律就该退回原处，以“挽回损失”。

霍海仲：我都坐牢了，江钢还不知道自家的采购出事。直到

30 多年后，长乐合作信用社才在律师跟前查旧帐，证实此款经主管副社长涂国华签字，转给了永安电厂集资部。涂国华也承认，并称这是当时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的，可具体经办人不清楚。然而，当年任永安电站财会股长兼主办会计的刘洪党却说“并无此事”，因为 60 年代根本没有集资这种说法，也就不存在什么“永安电厂集资部”。

果长乐信用社确需要转款，也只能按那时的管理规定，通过电站所在的芦溪营业所，最后方转到电站指挥部财会部门。所以长乐方面提供的转款手续有“伪造之嫌”。

老威：这也算一桩案中案了。

霍海仲：我怀疑有人整我的目的，就是为了黑吃这钱，可 60 年代搞阶级斗争，谁有这么大的豹子胆？唉，30 多年了，孰真孰假，孰是孰非，一团乱麻，只有老天爷去解了。

老威：您就稀里糊涂劳改去了。

霍海仲：刚结婚的老婆也在组织的感召下，“大义灭亲”，与我断绝关系。喊冤、撞墙都没用，只能在某某劳改农场抬石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由于我不服判，坚持申诉，不但没减一天刑，而且在 1971 年 11 月 18 号刑满之际，被强行宣布“留队就业”。

老威：这和劳改有啥区别？

霍海仲：挣几块钱象征性的“工资”，在农场内有一定活动空间，偶尔还能近距离地看女人。从外地来探监的家属，都要带些吃的用的给犯人，警察懒，只动嘴支使，搜查这一关就由我们手上过。

老威：这也算特权？

霍海仲：当然。女人，特别是年轻女子为了顺利过关，总要讨好我们，对我们笑，身子凑过来，近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你想，都是憋了若干年的老光棍汉，嗅着香水味，瞟着那衣领里的白肉，能不起化学反应么？没办法，一走神，藏在袜子、肥皂和食品里的纸条、现金就放过去了。而一回队，几圈骚哄哄的劳改犯就围着你，咽着唾沫让你谈感觉。谈就谈，添油加醋过过嘴瘾，但内心那个酸！那个痛！刚娶的老婆飞了，如果不坐牢，恐怕我已是几个娃儿的爹

了。都怪我太要面子，对故土乡亲太有感情，垫啥货款呢？付不了现金，拖一拖又能咋样？

唉，罢了，不能往下想，成天卖后悔药，这牢就坐不出头。

老威：我能理解，您壮年蒙冤，把大好的时光都废了。

霍海仲：我留队 14 年，农场只批准回过一次家；加上前面 7 年，我总共 21 年没有出过监狱大门。我在高墙、电网和警察的监管下干了 21 年的重体力活！1985 年，我 57 岁，老了，干不动了，农场才按照党的政策“清放”我回原籍。

老威：按字面理解，“留队就业”既不是服刑，就应该算参加工作，有退休金的。

霍海仲：从未听说过。我只记得一条老光棍被踢出农场时，浑身皮包骨头，一根筋，连走路也晃晃悠悠的。没家没地没钱，我往哪儿去？但我晓得，冤还没伸，气还没出，天子都换了，这口气还是咽不下。我突然有个感觉：当年所以把我强制留队，肯定是某些人怕我在外面到处申诉、上访，制造麻烦。

老威：老先生，您这案子若要放现在，不仅判不了刑，您还能反过去告他们侵吞私人财产；但在 64 年的社教运动中，比您冤的大有人在。我曾经看过一则《人民日报》的老新闻：某个地主婆为了讨好新上任的贫农生产队长，私下送去几个粽子，并提出义务替队长妻子照顾小孩。不料，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被暗中监视她的人发现，立即上纲上线。于是，倒霉的地主婆成了“腐蚀、拉拢革命干部”的罪犯，被判刑劳改。在为此而召开的社员大会上，老贫农这样帮助差点失足的队长：“我们一眼就看透了某某的鬼胎，可是你还蒙在鼓里。原因是大家脑子里有阶级，你脑子里还没有阶级。当干部的脑子里一定得有阶级，有了这东西，不管敌人耍什么鬼把戏，都不会轻易上他们的贼船。”

霍海仲：在老毛时期，啥都朝政治上靠，所以不奇怪。

老威：您呢？

霍海仲：我不同，所以我上访了 18 年，从老毛，到老邓，再到老江老胡。像你刚说的地主、贫农以及阶级、成分，一转眼全没

有了，取消了，平反了。如今回忆，这一切似乎发生在几百年前。可我呢，还在老江老胡手里为老毛手里搞出的冤情奔波。

老威：这么简单的案子，这么多年就没进展？

霍海仲：1990年，三台县法院复查过一次，“维持原判”。1997年，两位大好人仗义免费替我打官司，他们是三台县齐民律师事务所邹光新律师和三台县法院副院长邓烈文。两位恩人不辞劳苦，下乡走访了大量知情的干部、群众，进行取证，并将结果写成书面报告，上交有关部门。

老威：咋样？

霍海仲：杳无音讯。邓院长和邹律师多次找县法院交涉，催促尽快办理，但他们总是踢皮球。

老威：一个屁大的县法院还踢皮球？

霍海仲：当年判案的卷宗找不到了，所以就失去平反的依据。

老威：那1990年“维持原判”的依据又从何而来？

霍海仲：啥时有案卷，啥时没案卷，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跟变魔术一样。为此，邓院长于1998年2月23日电话联系省高院，经系统内查询，才知道相关资料已转至绵阳市中院；而中院则回答说，早在94年2月20日就已退回去存档了。无奈，邓院长又亲自去县法院，利用老关系查阅94年和95年的全部案卷，均无收获。

老威：这是渎职，您可以据《行政诉讼法》告他们。不过，这案子也够蹊跷：先是以“骗领公款”的罪名判您的刑，接着这公款又以集资修电厂的名义“不知去向”，具体经办人“都不清楚”。而几十年后，连案卷都不翼而飞，似乎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霍海仲：邓院长曾对某报记者公开表示：按照中央纠正冤假错案“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当年判我的主罪是“骗领公款”，而后来的事实却否定了；主罪都不成立，我当然该平反，获得赔偿。

老威：又过去好几年了。

霍海仲：75岁了，耗不了多久。我在这省高院门前擦鞋，也是不得已。许多上访的还年轻，路还长，我可是黄泉路近。冷、饿、

挨骂，甚至受点皮肉伤都没啥，可最近这次，警察也打得太狠了，尽朝腰和腿上踢。我只有一双手，护得了脑袋抱不了腰，我直喊：“腰腿整不得，本钱收不得嘛。”我怀疑，他们动手了，不让我活了。因为我不在人世，就不用平反了。

老威：他们是谁？

霍海仲：不晓得。这辈子，我没惹过谁，没做过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但明里暗里，总有人和我过不去。眼看平反有望，可又一直拖着。

老威：所以您要尽可能地保重自己，开朗些，就算赌一条老命吧。

霍海仲：争取吧，努力吧，我现在最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两眼一闭，不完也完了。

附录：三台县齐民律师事务所律师邹光新、三台县法院副院长邓烈文关于请求重新复查霍海仲骗领公款一案的报告（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略）

17 上书者蒋朝才

采访缘起：2002年11月30日下午，天气晴朗。我在四川省高院接待室门口，撞见一个慷慨激昂的年轻农民，当时他正被两个武警战士从里面架出来，扔到街上；一个上访群体中常见的装材料的蛇皮编织袋也被甩出来，并擦过我的肩头。我急忙去扶摔筋斗的人。两武警骂道：“傻B上书？也不屙泡尿照照自己。”农民回骂道：“老子照得很清楚，给胡锦涛的书上定了。”武警道：“再闹，就送你进收容所。”

农民道：“进阎王殿老子也要上。”

武警作势抓人，围观者急忙劝架，我揪住这高烧不退的家伙撤进僻巷一家茶馆，几杯滚水下肚，双方就有了相见恨晚之叹。我当即奉读了自学成材的乡间文人蒋朝才先生的《致胡锦涛总书记暨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书》，虽文字谬误极多，可也算拳拳报国之心可昭日月。

于是我一手持蒋先生大作，一手持笔作访谈，不觉天色将晚。可惜接近尾声时，老蒋对我的身份和谈话目的频频质疑，我闪烁其辞，他就“为安全起见”而收回了我准备据为己有的蒋文原件。

幸好访谈已成，在此，将它与蒋氏上书中涉及到的李玉英婆婆之《求助书》一道，公开于后。

老威：听说您给中共中央16大上了一道《万言书》？

蒋朝才：这叫“与时俱进”，胡锦涛总书记上台掌权，这是我一个沿街乞讨三年的特殊公民献给他老人家的第一份贺礼，至于他有没有肚量消化这份礼，我们就等着“以观后效”吧。

老威：您在《万言书》里写了什么？

蒋朝才：我列举了发生在四川地区的十大久拖未决的冤案以及社会影响，指出这是由于前几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腐败、高耗低效、执法犯法、不顾人民死活造成的，希望这一届领导能够把平

反冤狱提上议事日程，向古代的包公学习，用虎头铡斩一批公，检，法系统的败类。否则，难平民愤，就将造成以暴抗暴，天下大乱，亡党亡国的后果。

老威：您的忧患意识令我佩服。

蒋朝才：我也佩服您这样的作家，如果老陆早介绍，我就会把《万言书》的草稿交给您修改一下。我只有初中文化，言语表达上不太顺手，律师又看不起这些东西，认为是“开玩笑”。

老威：既然已经递上去了，您的心意也就尽到了。

蒋朝才：我向中央、省、市各级部门投寄了 100 多份，大街小巷还张贴了一些，真奇怪，一直还没有人来收容我。真实姓名和地址都落在《万言书》上，找我很容易——这要在前两年，我早就进多宝寺（成都郊区有名的收容所，据说一年羁押南来北往的三无人员达几万人次——老威注）了，从这一点看，胡锦涛还是比江泽民有人情味。说不定，共产党内部正在议论我的上书，考虑部分接受我的建议呢。

老威：这么有把握？

蒋朝才：我读报纸很细，胡锦涛提出“政治文明”，这和江核心的物质、精神两文明是有区别。

老威：您最盼望上面采纳您的哪些建议呢？谈具体点。

蒋朝才：我提出解决冤案的具体措施是——从全国各地秘密抽调出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干部，共产党员占一半，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一半，集中到一个绝对保密的地方受训。每天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包公、海瑞、狄仁杰的语录，讨论这些先贤是如何办案，如何体察民案，如何身先士卒，两袖清风，用他们忠君爱民的头脑代替自己贪财贪色的现代头脑。然后，由胡总书记亲自提口袋，亲自授给钦差大臣们独立行事的金牌一面，再分别派向各省、市、区、乡、镇进行微服私访。当然，众钦差大臣都要严守总书记御定的纪律，不能惊动当地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具体方案是——化装成身份不同的人，特别是流落在外乡的社会底层民工、妓女、上访人员、乞丐、收荒匠、买血的、耍把戏的、跑江湖的、做

小生意的，深入到各地上访群体、建筑工地、垃圾场站、城乡结合部以及居民小区、乡村集市，平等地调查了解当地民冤和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真实地位和形象，找出原因及对策。对于有影响的案子，要及时升堂处理。当然，由于冤情遍布，民间有许多过激的言论，例如因“阙定明聚众闹事案”在南充地区影响太大，许多川北的农民称共产党为土匪党、贪污党、侵华日军等等，钦差大臣们大可不必计较。应该看到老百姓胆小、善良、爱国忠君的主流。狗急了跳墙，兔子憋慌了要咬人——千万不能做贪官污吏的同党，把好人逼上梁山，被持不同政见者、达赖喇嘛、法轮功和西方敌对势力利用，造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那么“三个代表”就将泡汤，千古之罪名……

老威：您不愧为上访人士中的演说家。

蒋朝才：您觉得我的设想如何？

老威：耳目一新，虽然操作起来有难度。

蒋朝才：您听我讲完……

老威：这个话题太大，我们改天再详细探讨，现在说说您自己，咋样？

蒋朝才：我是四川省威远县蚕马镇十村三社农民，28岁，初中文化，因弟弟蒋朝坤被逼致死，所以倾家荡产打了这场官司。1999年元月8号深夜，我弟与本村的几个小青年躲在村东头水冬瓜家里搞小赌博，用扑克牌押金花，一元钱一注。正玩得高兴，屋子外看家狗老黄突然狂叫，大伙立即藏牌灭灯。水冬瓜从窗帘缝朝外瞅，不料嘣地一响，老黄被一片满天星放翻，狗嘴顿时裂成几瓣了。

大伙吓得人腿变狗腿，抽个不停。正愁没有地缝可钻，门蓬地被踹开，十来支大手电乱晃，随着，电灯拉开了，房内房外都是人。原来是镇长、执法大队长、派出所所长率领执法队伍抓赌，已在村里挨门挨户搜了七、八家，终于由举报人员带路，瓮中捉鳖，将六、七个参赌人员围在屋中。

赌资没收，又抄家搜身，抽掉每个人的裤腰带，准备把这一连串的倒霉蛋押回派出所，拘留罚款。执法大队个个喜气洋洋，因为

又可以分奖金了。一年到头，他们抓赌抓嫖越勤，奖金就分得越多，所以“执法”这项肥差，人人都想沾，但必须同镇政府、派出所勾兑，多上供，菩萨才会点头。我弟生性顽皮，20 来岁的人，就喜欢凑个热闹，不料撞在枪口上，几十元赌款泡汤，还要罚钱。按惯例，至少 500 元以上，否则就拘留 15 天。我弟提着裤子，越想越怕，家里本来就穷，500 元，够乡下人吃一年了，说不定，你累死累活，扣除各种税费和几级提留款，还剩不下 500 元呢。

老威：既然这样，为啥要赌？

蒋朝才：快过年了，又是农闲，乡下没啥玩的，所以年轻人就凑一块赌点小钱。我还念叨着过了这个年，就带弟弟进省城打工呢，没想到他命里只该长这么大。傻东西在路上，撞开执法人员，撒腿就跑，一大拨二警察（群众对联防队员的戏称——老威注）脚跟脚撵，追到一座水库边，我弟无路可逃，就一头扎了进去！

你想想，寒冬腊月，水库里都结冰了，我弟在下面搅着冰碴，哇咻哇咻，至多扑腾了十几米远，就被冻住了。据在场的人说，他喊了几声救命，嘴里就进水了，他举着双手乱抓，脑袋隔几秒钟，呼地向上猛窜一下，逗得坎上的二警察哈哈大笑。有两、三根手电射着他，直到他冻成冰砣子，沉下去了。手电还钉在那儿。

天亮时，我弟被打捞上来，光着屁股，肛门的屎都挣出来了。而棉裤还缠绕着脚脖子，他当时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想回到坎边，可是至始至终，没有一个人伸手救他，哪怕伸一根竹竿过去，他都活了。我能咽下这气么？二十几号人，都站在四周，用手电照着他笑，笑，好像在看猴戏。

老威：真是禽兽不如，你应该向他们讨个说法。

蒋朝才：事发后，镇党委和政府还是高度重视的，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考虑到我父母年迈，且母亲因重风湿半瘫，长期卧病在床的特殊情况，决定破格对我家一次性困难补助 3000 元人民币，条件是先埋葬死尸，就此了结，今后不得再找政府的麻烦。这太过分了，不仅是我，连邻里群众都聚在一块，议论纷纷，说如今超生一个娃儿，政府的罚款都是万元以上；一个 20 来岁的活鲜鲜的生

命逼死了，却只给了 3000 元，并且还要从中扣除打捞和安葬费用，最终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天理何在？难道我弟就白白送命了？

这对于我父母，尤其是晴天霹雳，他们天天守着我弟，唠唠叨叨，都有些疯了。我一怒之下，就领着同村的几十名群众，抬着死人，去镇政府交涉。镇长和书记都躲了，只叫一拨二警察出面，威胁说：你们借死人压政府，就触犯了国法，奉劝你们先埋尸，再提进一步的条件，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说：

“如果是朝坤他自己落水淹死的，我家就自认倒霉；可是他被逼死在结冰的水里，你们不仅没抢救，还用手电射他，还围着边笑边看热闹，人心真他妈被狗吃了。领头的二警察说：我们的嘴没有长在你的下巴，你咋晓得我们笑了？况且，一个赌博犯自寻死路，没啥大不了的，政府解决 3000 元，也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如果你们得寸进尺，性质就变了。”

此话一出，顿时激起公愤，群众把尸体停在政府门口，并且骂：你们收了那么多的税费，死一个人，就出 3000 元！请镇长出面说话吧。

就这样，闹了两个钟头没结果，这边群众越围越多，而那边也调兵遣将，公安，联防全体出动。傍晚，镇党委书记在警察的保护下，站在台阶上宣布了最新决定：经法医鉴定，我弟弟蒋朝坤属畏罪自杀，与任何人无关；而我率众抬尸到政府门口聚众闹事，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使其日常工作陷于瘫痪，已触犯了《游行示威法》。

群众不服，立即起哄，书记继续宣布：撤消对我家 3000 元的困难补助，勒令抬走尸体，马上处理掉，否则将强制火化。

群众齐吼：坚决停尸到底！书记冷笑着命令二警察抓人，双方发生了一阵抓扯，枪托子乱捣，我和帮忙抬尸的几个乡邻被当作罪魁祸首按翻在台阶上，五花大绑地进了派出所。

由所长亲自审案，我被吊上房梁，手脚反悬，太厉害，熬不过，我只好审讯笔录上签字画押。第二天上午，我们几个人被放了，所长说，本想按《治安处罚条例》治罪，但考虑到我家有丧事，就从轻发落。若再闹事，就送去劳改。

我回到家里，面对父母的眼泪和弟弟的尸体，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经过昨日的威吓，群众也不敢上门了。接下来的几天，派出所不断派人来催促埋尸。无奈之下，只得用白布将弟弟裹了，草草下葬。随后，我在好心人的指点下，到县法院告状；由于无钱交手续费，法院不受理。我就披麻戴孝，举着“为民作主”的大纸牌，在法院门口站了两天两夜。此事造成轰动，每天都有数千群众围观，有人打电话给成都的报纸，提供新闻线索。我是豁出去了，哪怕毙了我，也要出这口恶气。

春节期间，成都某某报纸有记者来采访，跟着，法院免费受理了我的案子。刑事案够不上，法院说：没人谋害蒋朝坤，他自己跳的水，我只能要求民事赔偿。我提出赔偿3万元，法院开庭，判定蚕纸镇政府赔人民币4000元。

一条人命4000元，况且，我在派出所挨打挨吊，膀子几天回不了原位，医药费也花了近1000元。欺人太甚哪！我又不能学梁山好汉提刀去砍这帮狗官，于是上诉，被驳回；我就到省高院上访。父母丢在家中，没吃没喝，就去县城作了乞丐；而儿子我，要高级些，做了省城上访的乞丐。

老威：从您的《万言书》看，上访三年，您的确长了不少见识，与当年的你不可同日而语了。同老陆一样，您除了自己的冤屈外，还挺维护上访群众的权利。

蒋朝才：过奖了。

老威：被您列入十大冤案的杨继年、阙定明、王翼、老陆等人我都写过，接下来的案子，有的我手里有材料，但一时找不到当事人；有的没材料，只是听说，而您又写得过于简略。

蒋朝才：《万言书》的重点是平反冤狱的措施，而不是案子本身。其实我提的十大冤案在全国，甚至在四川都算不了啥，比这更惨的还多，我不过顺手捡来些案例。

老威：这个李婆婆是咋回事？您把她列在冤案的首位。

蒋朝才：这个李婆婆在南充市可谓路人皆知，她原有很幸福的

晚年，3个女儿均已成家立业，而自己跟着大女儿蔡素碧居住在南充市区某黄金口岸的一栋祖传的三层楼房里。大女儿头脑灵活，就利用自家祖屋底层铺面开了个眼镜店，由于生意红火，几年下来，就积累了包括房产在内的上百万资金，其中流动资产就60多万。

大女婿是现役军官，很孝顺，而眨眼间，孙女又上小学了。李婆婆过着要啥有啥的蜜糖日子，成天笑哈哈，见人就夸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她解放前读过女中，所以闲着还作些打油诗，歌颂盛世。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12月，由于城建需要，她家所在的地段被规划为拆迁范围，可在尚未接到正式的拆迁通知之际，对黄金口岸早就垂涎三尺的房地产开发商就伺机动手了。有一次，大女儿去重庆进货，几天不归，李婆婆就去二女儿家暂住。但她们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家中无人的空隙，她家的三层私房就已被开发商雇佣的民工大队撬了门窗，砸掉了部分墙体，并大模大样的住了进去。

大女儿进完货赶回家时，已一片残墙乱壁、床、桌子、柜台等家产被捣毁，全部扔到大街上。而锅碗瓢盆则扣下来，供民工们自己开伙之用。大女儿痛哭一场，拿强盗没有办法，只好报案。派出所接报，来人进行一番实地调查核实后，就给蔡素碧出了一份“报案属实”的证明，并建议她上告法院。

蔡素碧代表李婆婆全家，向法院状告当地开发商违法侵权擅拆私宅，并要求赔偿。但法院由于同开发商的黑幕交易，一直拖着不开庭。与此同时，开发商又通过市政府拆迁办公室施压，并以逐步全部赔偿损失为诱饵，迫使缺乏官场经验的蔡素碧与他们签了《拆迁停业协议书》。尔后，此协议成了废纸，李婆婆一家不仅没有得到应按面积返还的新房，甚至连“通知”也没有。在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处境下，李婆婆家屡次找到房产公司和政府拆迁办，对方均狗仗人势，不予理睬。从此，李婆婆一家走上漫长的诉讼之路，地、市、省、中央，四处上访，官司一打就是8年，不仅耗光了原有的积蓄，而且债台高筑，一家人终于流落于街头巷尾。生活唯一来源是女婿从部队寄回的工资。

老威：这案情并不复杂，咋就断不下来呢？

蒋朝才：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表面挺简单，可背后关系网就像地下的树根一样，缠来绕去，一言难尽哪。

老威：后来呢？

蒋朝才：后来就是一场横祸。

老威：李婆婆一家全死了？！

蒋朝才：2002年9月27日半夜12点多，大女儿正在北京上访，孤零零的李婆婆饿极了，就拄着根棍子，市内大北街正阳火锅店门口，在垃圾堆里刨捡些食物充饥。她埋着腰，正全神灌注地把一块什么东西朝嘴里塞，不料被一辆无牌照的小车从背后撞翻在地。

肇事者正是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巡警队长李华平，他们一行5人吃完火锅，醉眼朦胧地出门开车，竟撞倒在街沿上拾垃圾的老人。李婆婆当即大叫“救命”，将姓李的吓出一头酒汗，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立即熄火停车，下去察看受害者的伤势，履行一个警察救死扶伤的起码职业道德，而是倒倒退几米，猛踩油门，向倒地的李婆婆碾压过去！后者本能地朝旁边一滚，躲过车轮，更凄厉地呼救，惊动了过往群众。火锅店的吃客们也纷纷涌出来，靠近李婆婆。可接下来的一幕令围观者膛目结舌，小车再次倒档，加油冲往受害者，终于将其卷入无情的车轮底。

老威：这象港台黑帮片里的镜头，不过，将一位老人连压数次，也太狠毒了。

蒋朝才：按照交通肇事法规，因过失或机械故障碾死一个人，赔偿五、六千元，加上其他费用，也就付万把元钱；可把一个人撞残了，或弄得半死不活，肇事方就得赔偿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总之伤者一天不康复，你就一天脱不了干系，这是个大把扔钱为他人当孝子的无底洞。所以，作为巡警队长的李华平，各种法规背得滚瓜烂熟，他当然清楚撞残一个老人该承担的后果，为了下半生的幸福，他必须变成畜生，狠下杀手，一次干不成再干一次。可没想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这么命大，眼见不可能一次性了结一条饿、人命，只好在群众愤怒的谴责声中仓皇逃跑。由于事情

闹大了，满街都有人围追堵截，姓李的才在逃出几百米后，面对人墙倒车回转，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将李婆婆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当晚失血 3000 多克，医院发了三次“病危通知”。

老威：李婆婆去世了？

蒋朝才：终身残废。她虽捡回一条命，但住院 11 个月，由于无钱支付医药费，停药 9 个多月。2001 年 3 月 29 日，肇事者利用职权，背着受害者办理了出院手续。由于被遗弃，医院于 2001 年 7 月 20 日将李婆婆送还给交警一大队，再由区公安局和姓李的将其直接拖往收容站。李婆婆目前趴在街头乞讨，无法起立，无法行走，大小便失控，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生不如死啊，她多次想自杀，都动不了。

老威：政府不管吗？

蒋朝才：政府管了，交警大队的《认事故责任认定书》判定李华平负全部责任。2001 年 7 月 31 日又发出《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由于李华平拒绝给医疗费，李婆婆一家万般无奈才把他和公安局告上法庭。拖了半年，顺庆区法院下达《民事裁决书》，责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医治费用 10000 元。被告抗法拒付，还出警抓捕原告蔡素碧，煽她耳光，抢走并销毁大量医疗票据，逼得她走投无路，切腕自尽，幸被家人及时发现救起。李婆婆悲愤交集，向法院呈递了《支付令申请书》，但石沉大海，至今也没有得到一分钱。

老威：怎么是交通肇事呢？这是公开故意杀人啊。

蒋朝才：官官相护，古今同理。但可恨可叹的是，国家之大，竟没有一个衙门为小民讨公道。到后来，公安局的人竟放话，快 80 的人了，早该死了，与其活在世上占地盘，碍眼睛，不如死了，一次性了结痛快。

老威：我设法将李婆婆的《求助书》向外界公布，看能否对她有所帮助。唉，她哪是栽在官府手里，纯粹是被土匪毁了。他妈的，遍地黑社会，我们活在怎样一个乱世！

蒋朝才：您说“遍地黑社会”？在哪儿？您指出道，我马上去入伙。这上访太累了，跑来跑去，乞讨几个钱，没脸面，更没个

结果。耗嘛，这上访群体吧，虽然彼此都面熟，也有老陆这样的热心人互相牵线，弄些集体签名什么的，但不算个团体。人嘛，得有个团体，香港录相中把黑社会演得不错，穷人可以去投奔，受了气，挨了打，才有人为你出头。

老威：您的《万言书》里还盼望中央派钦差为民作主，怎么一转脸就向往黑社会了？

蒋朝才：钦差和黑社会，一上一下都渺茫。我也是气糊涂了，才说这没水平的话，谢谢您点醒我这个梦中人。

老威：还继续往下谈吗？

蒋朝才：下面这桩案子也是一桩车祸。大约在8年前，四川威远县境内发生过一件千古难逢的怪事——大货车上了房顶，碾塌了半边农家大院，造成死亡14人，重伤20余人的惨祸。

当时已夜深，居住在公路拐弯山坳中的范姓和罗姓农户已入睡，不料哇味一个炸雷，一辆失控的巨兽从公路上俯冲而来，几秒钟就滑过斜坡，弹上房顶，再晃着大灯压下来，撞开两面院墙，一片树林，最后卡在了一道石缝中。司机江某某从摔扁的驾驶室里爬出来，满鼻子酒气，一脸血，他愣在那儿，似乎自己也不相信眼前的情景。还好他没有受内伤。

他在漆黑一团中逃进草丛，目睹四方农民敲着锣，举着火把聚拢。尸体一具接一具从废墟中被刨出来，无论男女老幼，都半裸着。有两，三具尸都压成肉饼了，脑袋剩一个大窟窿，不能看，只好用被子盖着。亲属要扑上去揭，几个人就抱住。地上又是泥又是血，人脚又跑来跑去地踩。唉，我听受害者范正根讲了一下午，难过，恶心，连饭也不想吃了。老范当晚睡得不踏实，总是做梦，所以屋顶哗啦哗啦砸下来时，他抱住老婆打了个滚，刚翻到床底，房梁就把床打裂了，他从碎瓦中探头，墙倒了，砖头雨点般乱砸，他老婆顿时成蜂窝了。他在一扭一扭的蜂窝下面，才捡得一命。不过，后来他被埋住，一点也动不了，直到被人刨出来，才意识到腿已经断了。他被连夜送到县医院抢救，腿锯掉了。

14条人命丢在梦中，虽然死相难看，倒也没受活罪。可怜的

是老范这样苟延残喘的残疾人，不断腿，就断胳膊，或者受了内伤。老范的侄儿，胸口受了压气闷，吐了两年多的血，也一命呜呼了。按照有关交通法规，一条人命赔了一千多元人民币，而由于雇佣肇事司机是私家老板，早已闻风而逃，所以这堆残疾农民至今为止，每人只得到两三百元的公家赔偿。

老威：人命贱如草啊。

蒋朝才：是草就好了，没知觉，没痛痒，割了还能长。

老威：肇事司机呢？

蒋朝才：判了三年，早已刑满释放了。

老威：这么便宜？凭什么？

蒋朝才：没凭什么。抓了送监狱，避过了风头，否则，这家伙早晚要叫受害者亲属给吃了。还有，人蹲班房，也就失去赔偿能力，一了百了。

老威：牢房成了避难所？《责任认定书》怎么说？

蒋朝才：交通大队实地勘察了，却没给受害者出《责任认定书》。都是农民，光顾哭去了，克制一点的，也忙着给死者洗擦换衣，给伤者送汤送药，都没有想到还要这个东西。受害者罗文礼说：事情明摆着，汽车从天上掉下来，把我们给压了，还赖得掉？

老威：我恍惚记得《责任认定书》应在 35 天内送达当事人，这也是法院判刑依据。

蒋朝才：20 多个受害者奔波呼吁 6 年，国内媒体也陆续有报道，威远县一位副县长才出面接见大家，并拍自己胸脯承诺，请死者家属放心，要相信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2000 年 9 月 27 日，也就是在惨案发生了 6 年之后，县交通大队才在这位副县长的监督下送达了《责任认定书》。

老威：没有《责任认定书》，当年肇事司机判刑的依据是什么？

蒋朝才：这正是受害者的律师要问的。他们因此将县交警大队告上了法庭，理由是执法机关不作为，使他们错过了索赔的时间和机会，导致伤情恶化，残废多人。不到两个星期，受害者接到县法

院的《行政裁定书》，判定县交警大队已经作为了，受害者的诉状不能成立，所以不受理。

老威：本该 35 天内办的公差，拖了 6 年，这也叫“作为”了？还有，国家有哪条法规限定一条人命只赔一千多元？

蒋朝才：山里农民懂啥法，还不是你咋解释，他咋听。狗日的就蒙一个算一个嘛。现在这些受害者没钱没能耐建房，就原地搭一个棚，一住这么多年，有一顿没一顿，靠八方乡亲周济着赖活。我曾跟老范回去过一次，老远就闻到一股股屎尿味。残了没有人服侍，就原地拉撒，绿苍蝇嗡嗡钉人，一头扎进脓疮中，死活轰不去。命啊，只能认了，把眼泪当粮食往肚里吞。人的善心也有尽头，残疾人，走动艰难，出门讨要吧，路一长就拖垮了。

老威：您在《万言书》里也为他们呼吁了。

蒋朝才：但愿中央能够听到，派钦差下来调查，处理。这个世道，当官贪一点也没啥，老百姓不敢有意见，但是你得让人活；死了算了，残废了也认倒霉，但是你不能丢下不管。不管还不准人揭短，还要说太平盛世，影响了安定团结。

老威：这种事太多，靠您一人也呼吁不过来。

蒋朝才：对，我天天喊破喉咙都不行，除非换一个大人物，比如胡锦涛，刚上台，阳气旺，就把 3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的耳朵揪住不放，连续朝里头灌一个月的血、泪、大粪、金元宝和民冤。

老威：啥意思？

蒋朝才：整傻当官的，工农就翻身做主人了。

附录一、求助书

我叫李玉英，现年 76 岁，系四川省南充市原新街 2 号城镇农民。

94 年 12 月我的私房被当地开发商侵权，致使我和我的子女停业、租房、告状长达八年之久，被整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无家

可归。目前，不但无生活来源，且无栖身之处，祖孙三代逼迫流落街头捡垃圾糊口。不幸还未解除，又遭飞来横祸。

2000年9月27日零时，我正在南充市大北街正阳火锅店门前街沿上的垃圾堆里捡垃圾时，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巡警队长李华平（一行五人）吃完火锅后（无警官证和执勤证）驾驶一辆无牌照小车将我碾压在垃圾堆里，连压两次，我紧急呼救，惊动街邻群众百余人，追住肇事车，扣住李华平的身份证，才阻止他继续逃离现场，强迫他将我送到南充市中心医院抢救后，李又将车开出现场不报案。

经医院确诊：“（1）胸部双侧7根肋骨粉碎性骨折并形成畸形，（2）胸部双侧内胸腔积液并广泛粘连，（3）冠状动脉有钙化，（4）胸腰尾椎骨压缩性骨折并形成畸形，（5）手肱骨骨折并肩关节脱位。住院当夜输血3000余克，发病危通知书三次，不通大小便，无法进食，靠输液输氧维持生命。住院11个月中，停药9个多月，医院确诊我已终身残废。因我及家属没有能力支付医药费，肇事者李华平又对此置之不理，我的伤得不到正常医治。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肇事者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于2001年3月29日替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其手续至今还在李华平手中！由于李华平将我遗弃在医院，医院于2001年7月20日将我（李玉英）送入交警一大队，后却被顺庆公安局和肇事者李华平将我拖进收容站，再次摧残我。

2000年10月12日顺庆公安局交警一大队事故处理中心以第（2000）927号下达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书中载明：“经本机关调查取证后，作如下认定：当事人李华平在发生事故后未及时报案，使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认定李华平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2001年7月31日顺庆公安局做出了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

我被压伤后，前后共花去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达9万余元，至今我尾椎骨骨折未愈，不能行走，而且大小便失控，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李华平不但置之不理，而且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进行威

胁、我及亲属在精神上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子女、亲属要求肇事者李华平支付医疗费，却被关、被抓、被打，并抢走大量医疗票据（金额 1 万多元），逼得我大女蔡素碧割腕自尽。我弟李光成和大女蔡素珍家为了医治、护理、照顾我的生活，家中口粮卖尽，农村庄稼停种，无法生活。现我无法起动，无法行走，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大小便失控，需专人护理，现我无生活来源，又无经济收入。我女蔡素碧及亲属代我找遍了南充市及顺庆区公、检、法、政协、人大、党委、政府都相互推诿，上访到北京、四川省有关单位都没有解决问题。找到新闻媒体、报刊社、电视台都只表示同情而不敢接受我的求助！

苍天啊！你怎么不长眼啊！救救我这老太婆，救救我这个老太婆的子女们吧！

求助人（受害人）李玉英 2001 年 11 月 26 日附录二、支付令申请书

申请人：李玉英，女，现年 76 岁，汉族，住南充市大北街 79 号。

申请人因 2000 年 9 月 27 日零时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巡警队长李华平肇事压成终身残废，大小便失控，不能行走，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现仍在医治之中。申请人无经济来源，如不先预支付，会严重影响申请人医治、生活及护理。南充顺庆区法院已于 2002 年元月 8 日裁定先支付壹万元的医治费，可二被告至今未付，严重影响和威胁申请人生命、生存权利。为此，特向顺庆区人民法院再次提出申请，责令二被告支付人民币壹万元为其医治、生活保障费。

此致

顺庆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玉英 2002 年 2 月 22 日

18 盲流诗人蒋大器

采访缘起：我初识蒋大器是 1995 年初夏，那时他刚从大学毕业，到成都打工兼写诗，书呆气与农村孩子的淳朴劲都一览无余。由于双方均穷途末路，我们一见如故，成了一道混饭吃的忘年交。

做写手，搞家教杂志，报假发票，为涨工资同资本家作斗争，然后逃窜，然后顾影自怜……

我看见蒋大器一天天鼻青脸肿地成熟起来。

终于，他的翅膀长硬了，私下操练多日的四川焦盐普通话也有了一定火候，他为寻艺术真谛，到北京闯荡去。

好样儿的，不过一年，就已熟知圈内掌故，收获了不少虚荣与世故。“生活所迫啊，”蒋大器叹道，“你 28 岁的时候在外头飘么？”

这是 1999 年 10 月中旬，我这个永远飘着的老江湖反而被新秀蒋大器牵着鼻子满北京跑，拜码头，学文圈行规。我不知不觉“采访”了他若干次，反复整理弄成一篇文章。也许，这意味着我们之间情感上的诀别？

祝这个盲流兄弟衣锦还乡。

老威：大器，在北京还混得下去吧？几个月不见，人都长出境界了。面窄胡须长，还从耳根子一路披挂下来，嘿，你这京戏胡子留得太地道了！像杜甫，如果不是朝代不同，他与你就是一个妈。

蒋大器：还是这一套！老威，你落伍了。站在你面前的蒋大器已不是昨天在成都混饭吃的蒋大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老威：真把老子的尿吓出来！

蒋大器：你迈出来吧，都一把年纪了，趁还有余勇，出来垂死挣扎一盘。再窝在成都那弹丸盆地，成天傻吃傻喝，糊糊涂涂，你吹我拍，夜郎自大，要信息没信息，要机会没机会，恐怕你这辈子就划句号了。你看看周围，与你同辈的有出身的老诗人，几乎都移师北京，或安营扎寨，或以北为跳板，一次次留洋，代表汉语诗歌

挣国际影响去了。肖开愚，四川中江县农民的孩子，80年代后期还没摸到现代诗的火门，据说还是你给他启的蒙，带他入江湖闯荡。可现在，他先上海后德国，散步到哥德的家里去了。他与故乡唯一的精神联系，就是一首长诗，叫《向杜甫致敬》。我在杜甫草堂旁边租过房，我晓得诗人，特别是流芳百世的诗人，一生下来就有点老。我20多岁，有个40多岁的爹，我们父子俩走到一块，我的背比他还驼。我与肖开愚都汲收了杜甫的灵气，但又不能被老人家一生的晦气罩住，所以得远走高飞，最好在洋人地盘上去不断向杜甫致敬。只要中国文化的根不断，老外就佩服得不得了，大把马克拿出来，听说当代杜甫老肖就靠德国的各种小基金会（相当于中国的县文化馆级别）轮番养着。诗人说穿了，就是寄生虫，我正在向虫努力。做虫做得完全彻底的要数欧阳悬，先施展形而上的思辨优势，把朋友的情人安娜拿下，然后与老肖一样，休掉糟糠老婆及国种儿子，再婚，进军美国，在某某名牌大学当了几年哑巴，卧薪尝胆，杀回马枪。现在美藉台湾人安娜是美国某大公司的北京代理，年薪几万美元。诗人欧阳悬终于如愿以偿地吃上软饭，在郊区买地盖大宅子，隔三差五开名流 party，我还被邀请过一次，那洋酒呵，那点心呵，那一拨接一拨的当红名人呵，那大奶子洋妞呵，那歌那唱呵，我眼睛都忙不过来。我见着了西川，我与他边呷酒边谈诗，旁边一位人民文学的编辑想插进来，我们理都不理。诗人中，就我和西川大气。我还朗诵了诗。

老威：四川话还是普通话？

蒋大器：当然普通话。我一读，全场都感动，都静静地望着我。真正的诗，都是直接念。欧阳悬也念，我觉得他的诗句已炉火纯青，接近大师。诗人就是要养，要游手好闲，才能最终出新。欧阳悬拿着绿卡，脚踏两个国界，呼风唤雨，要啥有啥……

老威：有个逮，那小子阳痿，听说安娜借 party 招野男人，公开在家姘居，三天两头换。两口子还定了个欧式口头协议，欧阳悬不得干涉安娜的私生活。若要回家，必须提前一天电话通知，否则就踢出门去。

蒋大器：岂不更好？鸡巴软了，麻烦也就少了，身心更加解放了，像你老威，硬得穷凶极恶，也没见日出响动来。还有 80 年代比你差好几个等级的老王老孙，都经常出国混，然后回来在各大学各沙龙开信息讲座，把名声搞得如雷贯耳，估计在文学史上开个专章的本钱都够了，你别小看这换不来银票的本钱，你的儿子都可以用，说不定孙子重孙子也照用不误。现在许多名人之后，自己不写东西，或经常写臭东西，全靠祖上的庇荫，甚至还能骗钱开文学馆，当馆长，攻入国家五个一工程，给作家、歌星、杰出科技青年发奖。当然你老威清高，拒绝仕途，但至少老王老孙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到北京来！瞅准傍定一个汉学家，要不了两年，你也能在郊区买地盖房，弄个车开，这是西方的白领生活方式，住在郊区某村某店，一般的崇拜者无法上门找麻烦。如果要见面，得提前两天预约，要不人家开车气气派派来接你，要不就在城里找个咖啡厅，谈完事，拱手告别。君子之交淡如水，西方白领见面都只喝水不吃饭。

老威：诗人过西方白领生活？你在造谣吧？老王老孙老欧阳的诗我都经常拜读，那你卖啥钱。诗人在国外都特穷，精神白领还罢了，谁能靠诗发财？

蒋大器：现在的西方慈善家多，诗没卖相，但披着诗人的高雅羊皮就有卖相。其实我打听过，北京郊县的荒地大片大片空着，风沙大，长不出粮食，几万元就可买一亩，用 50 年。加上盖房筑院买车的钱，也就 20 来万。而一套同样大的别墅，得翻十倍。当然，你们那代老谋深算的人，赚钱都各有邪招，这些招数放在其它人身上不一定适用。但是，好事令人眼红，今年一开春，两拨诗人就眼红得打起来了，一拨“知识分子写作”，一拨“民间立场”，或者一拨北京一拨外省，找了个风景区“论剑”。外省诗人于坚、韩东等人虽经常进京捞名捞利，搞得欢声雷动，但毕竟不如住扎在北京方便、实惠。诗都写得泥鳅鳝鱼一般齐，读的书也差不多是德里达、福柯，机会都不均等。俗话说，吃屎吃头泡，占山头占第一，谁要最先抢个眷顾中国文化的黄毛白种孤独得要命的富婆回家，谁就一夜之间发了。于、韩二人一直想 pass 北岛、顾城，从二十几岁 pass 到四十几岁，如今还壮志未酬，关键之关键，就是没吃到头泡屎。

人家七十年代末泡老外的时候，于坚还在云南挖山芋，韩东可能还穿开裆裤，站在江南街头看别人点秋香呢。汲取了“落伍三个月，后悔三十年”的教训，所以两泼人非在世纪末决出死活。两派文章我都看，可能是因为于坚年龄最大，所以也最沉不住气，他在《黄河》99年1期的对话里说：“并不是分赃不均，比如去某个国际社会上争取一个名额。我的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四川那帮诗人写信给他，说怎么热爱德意志什么的。（我从）诗歌节回来时，他们让我推荐一个中国诗人参加下一届诗歌节。我打电话给韩东，韩东说，不要推荐我，我不去。这要放在那伙‘文化派’诗人身上，还不感动得涕泪交加？”

血泪控诉啊，真正“涕泪交加”的说不定是于坚自己。因为知识分子诗人们善于与国际勾结，甚至还与80年代的对头北岛杨炼勾结，几乎承包了大部分洋人基金与国际会议。

老威：大器小子，真行啊，短短数日，就晓得这么多文化动态。我真落伍了，即使扎到北京，也出息不了。脸不厚腿不勤，成天瞎写，在哪儿不一样。《黄河》上的对话我拜读过，据说还有《北京》上的问卷，这一套跟台湾的拨皮文人李敖学的，说：“《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小圈子，你想庞德、乔伊斯、卡夫卡全在这个圈子里，这是一个圈子吗？如果是小圈子不可能爆炸那么多巨星。”还有，“《他们》影响了整个当代文学的方向……各个时期最优秀的作家都曾经在此出入……光芒四射……黑暗中的光明……超越了所谓的时代……”等等。我小时候读过一本英国连环画，书名好像叫《吹牛大王历险记》，太逗了！我不行。不是我脸皮没有韩东、于坚厚，而是我天生绷不下脸，我一卷起舌头胡吹，就想哭，再一联想韩东文弱书生装酷的样子，或者于坚那少数民族的厚嘴巴皮，就更笑得欢。我曾把这篇谈话朗诵给很多人听，都觉得这群口相声段子精彩，我哥问：“这咸鱼（韩东）是不是马季的化名？”我答不上来，我哥就自问自答：“马季有个段子叫《吹牛》，最后是：‘我高！我高！我上嘴皮沾天，下嘴皮沾地——哪脸呢——我们吹牛的人是不要脸的！’”我解释说：“人家很认真！真的……”话还没完，四周就一顿爆笑，我也忍不住，我家小娃儿都尿裤子了。

蒋大器：我觉得没啥好笑。地方小，见什么都乐，在京城诗歌圈一趟，一切平淡无奇。

老威：我觉得你也挺逗，绷着个小脸，比左拾遗杜甫还刚直不阿。已混成人物啦？什么时候？我咋不知道？蒋大器，你在成都借过很多哥们的钱，你不提还，大家也没开口要啊，小地方哪点对你不好？记不记得上京之前跟着亚东操练普通话的事？

蒋大器：不是朋友不仗义，是地方的问题，成都人文环境太差，是个猪圈，大家都齐齐喳喳地吃、吃，然后是麻将，然后是小姐，剩下的就是小市民的狗眼看人低。

老威：上次你回四川，大家好酒好饭招待，也没看不起你啊。

蒋大器：什么好酒好饭，纯粹是借饭桌开批判会。我一个人哪招架得住十来张快嘴？我有意识多谈北京，多谈最近看的新书，比如克尔凯郭尔，继尼采与叔本华之后，西方最牛的哲学家，我写过他的书评，简直服气惨了。老克是个清教徒，生在丹麦一个极保守的传统贵族之家，却写出了极具现代意味的《诱奸论》。

老威：花花公子？

蒋大器：克尔凯郭尔一生只有两次真正的性，他的《诱奸论》完全是想象的、思辨的，并且设计了无数男女精神方面的可能性。老威你听，这是多棒的一个知识分子话题，探讨一晚上都不够。可老李张口就开黄腔：“蒋大器，你那点文化底子我们都清楚，吃啥屙啥。最近又诱奸了哪个女生？是不是在为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寻找理论依据？”

老威：太过分了。

蒋大器：老廖更过分，他劈头就问：“大器哇，在首都没卖假文凭？”我忍气吞声地回答：“早洗手不干了。现在我堂堂正正地写作。”他说：“写作？哄鬼吧，我觉得你是做文凭贩子的料。”他妈的，这叫人话吗？士可杀，不可辱，我气得拂袖而去，又被笑嘻嘻地拉回来。我总共只卖过几份文凭，就成了永恒的话把。这个老廖，出了名的毒，我还帮他哥搞了一份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凭，结果不像，他闹着要退款。

老威：70年代哪有文凭？

蒋大器：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时代，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整顿教育，招了，不，推荐了一批大学生。我起先也不相信，后来人家借了个样本，上面还有毛主席头像和“最高指示”。我拿着这份文物去找人仿造，结果假的出来，真的倒差点弄丢了。老廖与我合伙，“向资本家讨还血债”，收了他哥5000多元钱的“工本费”。砸了锅后，人家几次三番找老廖他哥，说要不回宝贝，就报案。老廖一急，就押着我，深夜还在大街上晃荡，找上家。老廖说：“钱赔了，其宝贝得要回来，否则就扭送你到派出所，把一串文凭贩子全牵出来。”他心狠手辣，啥事都敢做。我只好接二连三打传呼，东跑西颠，才找到上家，索回东西。

老威：钱没退？

蒋大器：老廖抵挡住他哥，回头又找我算账，我钱没分着，倒赔了4000块。饥寒交迫的日子啊，你说这事已过去了一两年了，他还要提，无情无义么。

老威：你是误入狼群了。

蒋大器：老汪要温柔些，借钱给我，还招待我好多顿。在成都就他的温暖送得多，我是他最欣赏的诗歌天才，如果一段时间没上门借钱，老汪还不习惯，到处打听我是不是被当作“三无”人员给抓起来了。还有九根老师，也是我蹭饭的根据地，他比我爹还大，不允许我失去尊严。上次回来，我们还一道去成都最豪华的假日酒店参加一个酒会，九根老师腰挺得笔直，在灯红酒绿中如世俗的耶稣，而老廖老李那帮人，趁人不注意，每人都偷了一捆银叉子。我告别了过去，当然与他们合不来，恰好手机响，我就蹲下去，摸膝盖以下的布兜。这时，两个势利眼的保安冲了过来，一人逮我一只手。我挣不开，急忙喊：“手机，不是炸弹！”保安还不愿放手，九根老师立即挺身而出，大骂：“什么玩意！穷人就打不得手机嗦！”唉，成都，成都，令我伤痕累累的地方！同样这身打扮，在北京是艺术家，在成都就是叫化子。5年了，我从市区到郊区，搬了十几次家，一次比一次更加沉沦、背运。最后，我实在找不到净土，搬

到远郊。那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房价便宜，不查暂住证。半夜写作困了，还可以去野地免费欣赏月亮和鸡叫。唉，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古代，可以写一部惊世之作，可没想到才入村一个星期，农民们就找借口串门来了，追根问底像公安局审案。在他们眼中，除了逃犯，只有精神病跑这么远租房。我对人一律装哑巴，对老鼠却没法装，它们与我太亲了，剩饭的锅碗丢在地上没多久，它们就急不可耐地从门坎底下挤进来。有一次，我见到一只和我一样骨瘦如材的灰老鼠，太稀奇了。因为如今的老鼠社会与人类同步发展，胖子居多，粗腰暴发户居多，很少有瘦的。我同情加好奇，就被子蒙脑袋，躺在床上露眼观察。那小可怜埋头啃碗，然后坐在碗边，用爪子搓那两颗爆门牙。还叽叽直叫，埋怨碗底留得太少，接着，它纵上锅盖。太过分了，锅里的余粮还够我吃一天的，我不得不轰跑它。第二天晚饭，我想起一身排骨的同类，就心酸地留了不少人道主义碗底，把那瓜得可爱的老鼠撑了个肚儿圆。它舔着嘴站直了，两前爪捧着个大肚皮叽叽叫，柔情惨了，我理解为“谢谢”，就眨眼表示“小意思”。老鼠歪歪倒倒地原路返回，谁知门坎底的洞太窄，肚皮一卡，它就出不去。我又帮不上忙，它只得后退，并上窜下跳向我示威，仿佛我不该拿剩饭伺候它。好个泼妇老鼠！它一下子冲上房梁，荡着秋千朝下坠，把锅盖啪地砸翻了。大冷天，我起来赶了它三遍。这无赖，在我的桌子、床、锅碗瓢盆上跳够了，才瘪着肚子从原路逃窜。

老威：捡条狗来养，也比养耗子强。

蒋大器：养不起。当晚后半夜，老鼠又光临寒舍了，这回不是一只，而是一群，男女老幼总动员。看来，老鼠准备把家搬来吃垮老子。我赤条条地撵到天亮，耍了一夜打鼠棒，结果贼没打着，锅倒插扁了。没想到，成都的耗子跟人一般势利，但这东西不是人，不可能同它赌气。我只好骑车直奔市区，把朋友和半朋友都排一遍，轮流投宿，饱尝白眼。你看我多有爱心，简直是绿党，连床铺都让给小动物了。

老威：唉，落到这步田地，成都是没啥可留恋了。大器哇，成都人民麻辣，对不起你，可成都姑娘的多情，在全国都有影响，你

这种天才诗人就没个红粉知己？

蒋大器：我人穷胃大，耍不起女朋友。后来，终于遇上一个重人才不重钱财的，我又不肯当面说。我每天都给她写情书，半年后，就形成了习惯，不写就有感冒症状。我想将来汇集成一本《大器情书》，一旦发表，杜拉斯的《情人》就黯然失色了。

老威：艺术情书？这倒别致，能不能拜读两封？

蒋大器：她收到一封烧一封，连拆都不拆。这个笑眯眯的冷面杀手，毁了我，也成就了我，我上北京也与她有关。

老威：现在你以啥为生呢？能够成名出国当然好，但在这之前，总得有个工作，如果你愿意到文化单位打工，我倒可以引荐。

蒋大器：天下乌鸦一般黑，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给自己打工吧。曾经去过一家家教杂志，月薪 800 元。在北京这地方，800 元只够糊口。更不能容忍的是，主编一家人都是矮子，平均身高一米五。他喜欢昂着脑壳，招集全体编辑人员到他家开会。有一回，我与同事开玩笑说：“一个矮领导一群高人。”不巧有人汇报了，我当天就被炒鱿鱼，接着，我就写书评。多跑几家报刊，缠着编辑问清要求，然后拿回书，把内容简介，开头结尾翻了，马上写几百字。这样的书评我一天写十来篇，一稿多投，广种博收。最近，我又与人合伙，买个电脑，开始设计书封面，一个封面最多个把钟头功夫，就几百上千的，划得来。

老威：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电脑的？

蒋大器：我这合租房里还有一人，投资者，电脑操作者。我这种天才，只需要守在房边，关键时刻出点感觉，封面立即就上档次。老威，你认识的书商多，帮我拉点生意嘛，要不晚上我还得出去，妓女拉客一般拉客户。

老威：劳动好啊。

蒋大器：成天埋头劳动，不搞国际主义社交，出名的机会就少了。老威，来北京一块干嘛，你来了，我的五年计划起码缩短三年。我们也到郊区买地盖院子，把北京市的文化社交中心都抢过来咋样？还有一招，就是把食指从福利院接到家里，让他天天朗诵，哪个崇

拜者要欠这块现代诗的活化石，得先过你我这一关。

老威：我看你应该进福利院去给食指做邻居了。

蒋大器：我是诗疯？好吧，花岗岩老威，回四川养老吧，哪天憋死迷了，我给你悼词。哦，球赛开始了，对不起。

19 神医信徒瞿曲

采访缘起：瞿曲小姐与我有数面之交，因此这次访谈是非常随意的，她边开车边说话，也许其中有不少闪光的警句，可惜行车速度较快，录音效果大受影响。

瞿曲约 30 岁，是成都波洋电讯工程设备公司高级职员，白领阶层，却是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虽很讲科学，也出过国，但极其信命。她是个热心肠的神医信徒，曾志愿驱车带领许多朋友去诊病。

这次采访时间是 1998 年 5 月 21 日黄昏，天气阴转晴。

老威：您是怎么知道这里有神医的？

瞿曲：经人介绍。大约是 91 年吧，省军区的一位退休干部患了前列腺癌，多方医治无效，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找了神医。几个疗程的药吃了，没想到还真痊愈了，把个老头惊喜得发狂，逢人便吹。当时我患了子宫肌瘤，压迫双股神经，连走路都成问题。去了几家大医院，都说必须开刀。我平生最怕开刀，加上公司正处于创业阶段，千头万绪理不清，我是挑大梁的，不能住院。在万般无奈之下，就信了老头的鼓吹，与几位朋友一起，开车去了。我下车时，下肢疼得不行，被人搀扶着来到神医跟前。

老威：还是同所有的病员一样，不把脉、不问诊，隔着寸把远吗？

瞿曲：对，也同所有人一样检药回去，特便宜，五元一包药，一个疗程七包。我大约治了一个多月，病状消失；到医院一照片，真神了，包块居然被化掉了，于是，我也同我的介绍人一样，逢人便大吹特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听了，想起他在美国波特兰市的邻居，一位开餐馆和商店的华人老太太也患有子宫肌瘤。

老威：老太太也到大陆来了吗？能不能引荐一下？

瞿曲：来了就不神了。老太太有 60 多岁，姓李，同董事长的

关系特别好。这位李老太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开刀不吉利，而美国的医生则认为必须做手术，切除病灶。就这样，一拖再拖，瘤子也越长越大，压迫下肢，使双腿出现水肿，后来，连门也不能出了。我们董事长要为他的异国邻居做点好事，就亲自开车，拿着老太太的姓名、年龄，由我引路去找神医。张老师仔细看了，双手发抖开了药单子。

老威：你们就把处方发到美国去了？

瞿曲：不是处方，是寄药过去。

老威：美国没有中药铺吗？你们花的邮费可能比药钱高几十倍吧？

瞿曲：就这样也划算。因为美国的中药奇贵，不是一般人享受得起的。

老威：你们花了多少诊疗费？

瞿曲：前后不到 200 元，治了两、三个疗程吧，老太太就行走自如了。打越洋电话过来，激动得哭。

老威：这么说，神医的药对子宫肌瘤有特效。

瞿曲：别提美国开刀要多少钱，在中国做肌瘤切除手术也得几千、上万，还得留下疤痕。而在神医这儿，几百块钱就解决大问题。我当时想，应该酬谢一下张老师，可他两眼恍惚，像不认识我一般。

老威：后来呢？

瞿曲：后来我就充当志愿军，带了许多人到这儿看病，还为朋友们免费充当车夫。我想用这种方式报答张老师。按理我一个知识分子不该如此迷信，但是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限，在科学技术暂时无能为力的现状下，我们不妨虔诚一点。我们董事长是个有心人，他曾想替神医办护照，让他到外国显神通，给洋人也开开眼界。可是，张老师离开本乡本土就不灵了，他说自己怕城市，一见高楼大厦就犯病。

老威：读过某报关于神医的报道吗？

瞿曲：那种地方小报您也相信？中国人嘛，什么都一窝蜂。前

几年气功热，男女老幼都练，报刊杂志也大肆渲染，要宏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后来热过了头，就有人站出来揭露，特异功能是假的，骗人的，于是，风向一转，人人都成了科学卫士。我觉得这或左或右的极端思维，都是文革余毒没肃清。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什么？是中庸，中正之道。站在中正的立场上，就好像站在地面的中心朝四面八方看，您觉得万事万物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老威：包括异端邪说吗？

瞿曲：今天的异端邪说，明天也许就是正统大道理。这世上最没原则的就是记者，你把一年前和一年后的报纸对照着看，会发现从前被他们吹上天的，正是眼下被他们踩入地的。他们带着搞新闻的功利目的来看神医，完全是高高在上的文明人进入蛮荒之地的劲头。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乡间神医比他们更喜欢读书，更懂善待别人也就是善待自己的文明处世之道。他们居然没被感化？

老威：他们不会被感化，因为他们只信眼前的、具有新闻效应的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极左极右的快餐思维正是报纸造成的。

20 算命先生孔庆天

采访缘起：孔庆天先生是孔夫子第 74 代玄孙，现年 88 岁，文化大革命中由山东曲阜老家迁居来蓉，是成都最有名的算命大师之一。

1998 年 5 月 31 日下午，我和妹妹小飞因友人引荐，入九眼桥附近一陋巷，拜访了孔老先生。大师瘦削无须，在满室古董的环绕下，犹如枯骨，唯双目炯炯有神，令人望而生畏。

据身旁算命客介绍，大师解放前曾执教于南京金陵女子学院，与蒋介石的高级幕僚陈布雷有数面之交。

孔庆天：客官，请报您的生辰八字。

老威：我只能说出年和月，日和时无法确定。我的身份证上写着 6 月 19 日，但这是阴历还是阳历？我多次追问父母，他们只恍惚记得我是天快亮降生的。

孔庆天：算命又叫“推八字”，您的四柱不清，命就没法算了。不过，相面、摸骨、量掌纹也很准。您坐近一点，我好下手……哎呀，先生是罗汉下凡！这天庭……

老威：我晓得，我的脑壳很圆，自从几年前秃顶后，就更圆了，如此寸草不生的好天庭当然暗合“天圆地方”的数。

孔庆天：“数？那您的幸运数字是“1”？”

老威：不错。

孔庆天：“1”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老威：请大师指教。

孔庆天：“1”是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数。这就是所谓“天圆地方”。“天庭饱满”“地廓方圆”这类相术词汇，说得小是指具体某人的头部，说得大应该是江山社稷，甚至宇宙。从古至今，社会上流传的算命看相书籍多如牛毛，随便读几本，演译几回其中的算命程序

和方法，再加上察颜观色的本能，就可放心摆摊营业了……因此，命相术本身算不上什么学问，然而，我们的祖先捉摸出“天人交合”的大学问，这种学问能从人的出生，人的面孔，甚至人的种种习惯中凸现出来，既玄，又具体，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嘛。人是一个小的宇宙，而眼睛、鼻子、耳朵、下巴、眉毛、太阳穴、颧骨都是自然之门，它们看似关闭，实际上都是开启的；它们就是日月星辰、江山社稷呀。当然，“天人交合”是犯禁的，因为在古代，皇帝才是“天子”，平头百姓妄论天道会遭杀身之祸，所以，命相术里的所谓“上算天道轮回，中算国运兴衰”成了绝学，只有“下算苍生百姓”在民间代代相传。当然，本朝的事不能说，前朝的事还是可以说的。

老威：请大师为我相面。

孔庆天：先生的嗓音如一口刚刚出土的钟，还有半截陷在地里，但尽管这样，已构成声势……

老威：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孔庆天：我的账房在那边，您得按规矩交纳命金。如果是一般的命，随便收点也罢，您的命非同凡响。

老威：我先后花在算命上的钱有几千块。当今中国，从京城到地方都遍布算命者，我什么没见过？文殊院门外，瞎子算命一条街您晓得吧？从街头至街尾，有数百名瞎子，我常到那儿，挤在水泄不通的香客里，感受一种气氛。

孔庆天：我算命从来不讨价。另说几千块，花上万块找我算命的人也不少。先生如果觉得自己的命不太值钱，就请回吧。

老威：您？！简直是敲诈！好吧，这兜里的三百元，全拿去！

孔庆天：哈哈，快哉！我活了 88 岁，第一次听明眼人骂瞎子敲诈！先生是个豪杰！今天是 98 年 5 月 23 日下午，我得记住这个痛快的日子。

老威：废话少说，摸吧，按您刚才说的，摸骨、量掌纹、相面、您得来全套。

孔庆天：算命就是花钱买废话听。因为命既然由先天决定，算不算都一样。就像一个性格倔犟的人决定干一件危险的事，您是劝不住的。您就有类似的经历，您这天庭看似饱满，但仔细感觉，还是有劫后余生的暗纹。我敢断言，您的相貌改变极大，在“1”成为您的幸运数字前，你一头浓发，看不到天庭，这是您人生中的黑暗时期，不，不，现在我触及到了！耳朵，两条眉尾，犯煞。童年您几乎死于天灾，后来从浮肿里复活了，您被架在一口大锅上熏蒸，您捏紧小拳头拼命哭喊，这场地狱，您是该下地狱的。25年后，您的姐姐替您下了，您的命硬，克死了她，您还会克死谁呢？人生的三大不幸您必居其一！但是，如果您姐在您的生活中一直充当母亲的角色，那这一劫就已经过了。不错，您的山根崩裂过，您坐过牢，因为做了件危险的事，您避不开，现在好了，您姐姐在天之灵保佑着您，这段时间，您不要离开她生前活动的范围，哪怕再大的名利诱惑，也不要。今后，您也要远离名利，记住您的幸运数字。

1，可大可小，大如宇宙，包容天下万物，时代苍生，人们都熟视无睹；小如微尘，自由自在地在人间进退，人们也熟视无睹。您呢，也要可大可小，远离名利，最终您将获得最大的名利。

老威：您的意思是我该出家当和尚？

孔庆天：您的灵魂早出家了，可您的躯壳还在凡尘里。您的筋骨结实，气血充盈，想法天真，像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有许多欲望，时间随着种种欲望在您心里倒流。然而，您的灵魂已看透了您的欲望。就像我，早就不想活了，可还活着；我爱钱，爱这些古董，明明晓得自己没几天活头了。

老威：这话我不太懂。

孔庆天：每个人都有时来运转时候，不过早晚而已。古人所谓“大难之后必有后福”，意思是“大难”和“后福”是对等的。老天爷也是公平的。比如周文王被暴君商纣王囚禁在河南羑里的地窖里好几年，不但自己的儿子伯邑考惨遭杀害，被剁成肉酱，就连自己也险些掉脑袋。这种大难，一般人是挺不过去的，而文王不但挺过去了，还通过巴掌大的泥窗，夜观天象，日演伏羲，废寝忘食地

苦心钻研，终于做成了一部千古奇书《周易》。自此，天下学问之大，莫有超过《周易》者也？道生乾坤，乾坤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如此卦卦相扣，循环往复，正是永恒的天道规律。大至天道，小至古人、今人、未来的人，都在循环，至于某个人的命运，不过是天道轮回的某一点，《周易》的随机起卦，正是根据心血来潮时的个人感应，去窥测天道的。现在，我也心血来潮地对您说：“您肯定名扬天下！因为您的难与天下有关。可惜您从了文，要不，36岁就做将军了。您把刀光剑影带进了文章里面，这是文人折寿的主要原因。您得改变方向。我晓得您现在很自信，但到时候（我算是62岁）肯定改变方向！如果经商，您将具有陶朱之富，如果从政，您将立国封爵，而且，您不怕失去什么，假如流浪到国外，您将有宫殿式的大房子住，所谓“失者有其居”。古有《天官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九五，上下各千岁，然后知天人之际续备。”唉，老夫扯远了。请先生注意其中的变数。

老威：大师开始让我远离名利，而后又让我注意“天运变数”，弃文以谋取名利，这是否自相矛盾？

孔庆天：远离名利正好清静无为，注意“天运变数”，以取得大功利。古今中外，以隐而显的名人不少，所谓“隐”，不过是一种直达中心的捷径。中国古代很少有真正的隐士，介子推在跟随晋文公落难时割大腿肉给主人熬汤喝，功成名就想隐退，结果被大火烧死在山中；诗人李白也曾隐居，跟道士学武艺，后来长安一热闹，他就出山了；诸葛亮是个最好的例子，他隐在隆中，纵论天下大势，写了《隆中对》，就等着刘备三顾茅庐才好出山。而在此之前，要耐得寂寞，姿态要拿够。“动则王，静则圣”嘛。

老威：大师讲的是一种精妙的运作游戏，可惜我不擅此道，说穿了，我还是个性情中人。

孔庆天：性情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谁从娘胎里就有性情。如果您现在是省长，可能想不起上这儿来算命；可如果您从省长的官位上跌下来，就会自然而然想算命了。然而，您如果以

出世的心情来看待这一切，命就可算可不算。

老威：佛还是要拜的吧？

孔庆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威：大师的说法有些机会主义倾向，我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但抓不住。您刚才讲我“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可能是揣度着我的心理说的吧？我已40岁了，您指的“后福”应验在何时？45岁？50岁？60岁？恐怕那时老了，什么福也享不了。现在社会越来越乱，谁晓得我70岁时会不会发生战争？环境污染会不会毁灭人类？科学因素能不能预测呢？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里讲，战国时期，秦国武安君白起带兵攻打赵国，大破敌军于长平，坑杀赵军40余万。难道这40余万人都注定要在同一天被杀死？类似的惨案有现代的南京大屠杀，几天之内，30余万军民横死，难道这30余万人的命相中都有夭折的迹像？还有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

孔庆天：您别说了，我知道这样的人类遭遇灭顶之灾的例子多如牛毛，我只能用“天遣”来解释。刚才我说过，人的命相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当一个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庇护他的星座也将从他的面孔中消逝。我敢说，被坑杀的四十万赵军中，无一人有好相，因为他们都在无法摆脱的国家命运的笼罩下，象羊群一般被驱赶到前线当炮灰。所谓天无好天，地无好地，作为“三才”中的人哪来好相？发国难财的都是大奸大恶，谁让这些大奸大恶者能够得逞？再说南京大屠杀的前几日就已有城破迹象，危城之中的百姓如同放在砧板上待宰的鱼，哪来什么好相？

老威：我看过一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图片，其中不乏好相。五官端正，天圆地方者也同尖嘴猴腮，其貌不扬者一块被枪射刀劈，被丢进万人坑。一把火焚烧之后，累累白骨莫辨彼此，把什么星相、命相全消解了。当然，也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若干年后还惊恐万状。我觉得这样的“大难后福”者也未必有好相。

孔庆天：所谓命相，不仅指五官摆放的地置，它还包括血、气、骨、肉、形、体诸多方面，一个上乘的算命者，如同一个上乘的中

医，甚至国医，通过望诊、把脉就能深知一人、一家、一国的宿疾。因此，在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命相就在其次，或者谈不上个人命相。我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满城的人都被一股恶浊之气，一股冲天血光所笼罩，这难道不是一种命的劫数吗？东洋人，据说是秦始皇为寻不死之药，派到海外去的五百对童男童女的后裔，一千多年后，却从海外回来戮杀与自己同宗同源的中国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天道轮回的报应吗？覆巢之下，所有的相是同一个相，工农商学兵同命，如果您是专家、教授、学问奇才，您只能叹息自己生错了时代。连孔子、庄子、老子、荀子那样的大仁大圣大贤，都生错了时代，一生坎坷，不被当政者重用，何况尔小小的读书人乎？乱世之中，好命相者首先应具有好的心相，远离时代凶气，超凡入圣以独善其身。

老威：大师您也算独善其身吧？为什么谈吐间有忧愤之气？

孔庆天：我有忧愤之气吗？这可是算命这一行的大忌。这么多年，我这是首次谈古论今，把胸中块垒一吐为快。天道、国运，这些无形之相，本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秦始皇坑的儒，大半是方士。方士者，异端邪说的传播者也。当社会上异端邪说盛行的时候，天下就要出改朝换代的大事了；反之，社会上如果寂静得除了当权者自言自语、发号施令就什么也听不见，说不定就会发生比改朝换代更糟的事。现在我知道您是什么人了，但我不会说出来。您不是个信命者，如果信命，您早该死了。您犯刑犯煞，能活到今天，算是奇迹。

老威：我至今不明白信命好还是非命好。

孔庆天：当然信命好。命像一把无形的巨剑悬在空中，让人们害怕。有人说算命这一行是封建迷信，却没有想过，人是应该迷信的，这是一种强迫你自我约束的力量。要不，国家就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制止人们去为非作歹。我们这行的宗旨是让人“上畏天命，下守法律”，积德行善走正道，这同官方宣传的大前提一致，区别只是报刊文章教条多些，不像我们天天面对私人，人家不口服心服就赚不了钱。

老威：说来说去还是钱。

孔庆天：您这样讲就没意思了。算命不是慈善事业，除非您的命糟得无可救药，我怕招惹晦气不敢收您的钱。您想想，在西方，还有心理治疗诊所，收费特别昂贵，而我这也算大半个诊所吧？不瞒您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命相业一天天兴旺，特别是现在，有点档次的老板、文人有点什么疑难或不顺，都兴打个卦、算个命。前两年兴起《易经》热，有关《易经》的书出了几百种，印数都上好几万。在青羊宫，还有一个挂牌营业的《周易》研究会，我去试过一回，原来会里的“专家”都是泥腿子跑滩匠，平均文化程度连初中也不够。这从反面说明了，中国老百姓从精神上开始“病急乱投医”了。毛主席有首宿命诗，里面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句子。意思是：雄关漫道如钢铁屏障，我这辈子还要过多少生死关口？惨败了，又从头开始；而前途渺渺，如海的苍山，如血的夕阳，就是已经注定又不可捉摸的天命么？多么深不可测的古意啊！这不仅是毛主席个人命运的写照，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暗示。再过两年，就是下个世纪，我们都处在翻越一个大的时间门坎的心境中。我已经 88 岁，说不定今晚睡去，明早就醒不来了，下个世纪会怎样？谁说得清楚？您说现在不稳定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事，您说今不如昔？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款爷多如牛毛，花起钱来哗哗水滴，从前别提一般百姓，就连中央首长也没这样大手大脚过。像我这样的瞎子，算了几年命，居然能买房子，这在解放前连想都不敢想。可是您发觉过么，这当中有点不对劲。钱越多越不对劲，人们连老祖宗也忘了，活得不踏实。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对外却从来不提家谱、血缘。孔孟之道我都一知半解，愧对列祖列宗呀。虽然《论语》里一再提到命，夫子却认为命是不可违，也不可算的。

老威：人得吃饭穿衣呀，孔夫子的学生中也有做生意的。

孔庆天：人们感到慌，无头苍蝇一样为生计奔忙，为生计你争我斗，缺乏安分过日子的心态。我敢说除了烧香拜佛的，就数算命的多。我一个礼拜工作四天累得够呛。形形色色的人，算的都是不需要算的俗事，大家都丢了魂了。那些高官、富豪、自命不凡的老

板，甚至黑社会的杀手，天不怕地不怕，却到这里来，心甘情愿把命交到我这个瞎子手上。人们在遭遇不幸时，常绝望地骂“老天瞎了眼”，难道这世界真是由瞎子指路么？

老威：过去好还是现在好？穷而踏实好还是富而空虚好？

孔庆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没有什么好不好。

老威：大师，两天前，我的一个朋友做生意亏了本，债主堵到家里，他只好躲在外面。他老婆急得跳墙，只好到明清茶楼去找术士某某，某某掐指算出近日有血光之灾，因债主已花钱雇了杀手。不过，某某说没关系，只要将他画的符在门前化掉，在卧室外挂面镜子，买五条活鲫鱼向府南河放生，并且用红纸包一把米，四毛钱，在日落时丢在十字路口上，如果有人叫你，千万别回头看——做完这一切，厄运就过去了。大师您说这真的灵验吗？

孔庆天：您说的某某我认识，他把乡间巫术用到城里来了。这是一种仪式，如果您一心一意做完它，就不知不觉进入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冥想世界，产生一种通灵。您在祈祷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阻止灾祸。或许，您的朋友会因此而借到钱，还债然后转向做别的；或许债主会让步——心诚则灵嘛。但是，对于命运，可不能采取这种实用主义态度，逼急了才想着找术士化解，否则，从长远来看，这种人是没救的。

老威：大师令我茅塞顿开，小子感激不尽，刚才我掏钱肉疼，令您见笑了。

孔庆天：您的七窍通着呢，应该是您令我茅塞顿开。将来君若春风得意，请不忘随地烧香告诉我一声。

21 上访诗人老陆

采访缘起：2002年春节后的某天中午，有个陌生人来电话，自称“上访专业户”老陆，并受我的记者朋友老张的引荐，想找“老威”谈谈。由于怕国家有关部门设陷阱，我十分客气地留下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后，就借故推脱了。

接着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陌生电话，逼得我急匆匆找老张核实。“无误，”老张说。“人家可是上访名人，曾两次告赢地方公安局，一度成为‘民告官’的热点。”我说：“报纸上热过的东西我不感兴趣。”老张说：“你还有不感兴趣的东西么，同志？”

一时语塞，我只好转头去拜访老陆，接着又拜访了几次，拎回一蛇皮口袋上访材料。老陆最先住四川省高级法院后墙陋巷内的一家下等旅馆，这是省内上访者聚集地，每晚收费10元，条件极差；而最近一次——2002年8月1日我与他联系见面时，此人已干脆沦为露宿街头告地状的乞丐诗人矣。

可敬可叹的是，老陆仍旧长发披肩，举手头足，豪迈之情溢于言表。“陆某某，37岁，四川蓬安人，”他作罗圈揖，朗声告白道，“我给大家当场作诗一首。”

老威：这段日子跑哪儿去了，老陆？我到你原来的住处找了好几次，都说你搬家了。

老陆：我被收容了，5月18日进去，昨天刚出来。本来打算上京，火车才拢广元就被查获了。听说中央下了死命令，严防死守，不准法轮功和我们这类人出川。半夜1点钟，几十号牛鬼蛇神被押拢，黑压压一片。我背着铺盖卷，一点不在乎，反正作为长期的上访专业户，一年要进局子报几回到，让政府的脸面添些光彩，让警察的腰包添几两贿银，才算给社会作了贡献。

老威：此话咋讲？

老陆：现在开放了，表面上不像毛主席时代那样搞政治运动了，

其实暗地里，运动一个接一个：扫黄打非，清理外来人口，整顿市容，严打，年复一年，运动名目越搞越多。收容所的生意好惨了，平时，关百把人，运动一来，百把人的空间就像发洪水，一夜就能涨到七、八百口，比猪笼子还挤。赌、嫖、非法同居、没办暂住证的民工、小偷小摸、沿街叫花、占道经营、下岗闹事、抗拒城管，等等，真是五湖四海，五花八门。特别是大热天，大伙肉贴肉，站也不是，蹲也不是，直冒人油。屎尿没法屙，也不见人屙，我估计是汗出得多，蒸发了。老哥你想，一入这鬼门关，谁撑得下去？可你急警察不急，先熬你一天半晌，才慢吞吞地露面，像驯兽员一般隔着铁栅栏，一个个核对名字。

里面的人炸锅了，拼命伸手朝外递纸条，上写亲人好友的电话和地址，哀求警察尽早联系，好带罚款来保释自己。嫖和赌的，罚得快走得快，因为沾这两样的家伙经济都宽裕，警察张口要几万，都拿得出。一般人至少罚 500 元，底价 400 元，我这等吃百家饭的穷人，也必须交够底价。没人保释？对不起，你就一月两月地坐吧，过了三个月，再用闷罐车将你遣返回乡。他妈的，这和土匪绑票有啥区别？抓人换钱嘛。

老威：你没犯法呀。

老陆：我上诉上访几百次，不认输，这就犯法了。我还喜欢写诗刺激政府，是上访这堆人中名气很大的诗人，这就更犯法了。

老威：你是诗人？真没想到，我在这儿还碰见一个同行。老陆，你的作品发表在哪儿？也让我拜读拜读。

老陆：我的诗经常发表在大街上，有时也自己印成传单，到处张贴，我还给省高院、全国高院、人大、国务院信访办、《民主与法制》，以及一些报刊投寄过。今天早上，我在省高院大门发表了一副对联，挨了几枪托，差点又被抓了。我念一遍：上访户，排排站，盼青天老爷击鼓申冤；人财尽，一场空，这高级法院是猴戏院。横批是：来一个耍一个。

老威：不错，请再背诵一首你的代表作。

老陆：我送给你一份诗稿，我念，你看，这样也可以替我纠正

错别字。

我只有小学文化，靠着这 8 年官司，写上诉，翻字典，也算得到了锻炼。后来倾家荡产，沿街乞讨，就试着把心里的想法编成诗，写在地上，过路人读着新奇，就有了社会效应。

老威：你这头一句就有两个错别字，政府不是“正腐”。

老陆：没错，政府就是“正在腐败”的意思，还有法院滑头，所以叫“猾院”。

老威：原来如此！老陆，高明呀。

老陆：我献丑了——

当今正腐真是好，舞台清官个个高，冤民血泪谁知晓，活该坐牢官难告。

铁脚磨穿走京城，沿街乞讨来维生，客官问我何原因，官官相护路难行，人民猾院缺人性，五年六审搞不清。如今清官哪去找？繁荣娼盛是正道。

宋朝奸臣包公斩，今朝贪官谁来管？婊子牌坊给人看，百姓头上三座山。

有道是，贪官不怕烧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生猛海鲜走鱼丸；桑拿按摩浑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有道是，舞台包公比天高，毕竟宋朝过去了，今朝冤狱管不了，饥寒交迫命难保。

替人擦鞋为求生，城管撵得到处逃，哀告求援为治病，凄风苦雨讨不成。

巡夜恶犬来咬我，身上心上有伤痕，捡张报纸当被盖，没脸回家见乡亲。

光棍汉，一个人，无国无家无双亲，申冤申到黄泉路，见了老毛和老邓，毛邓变鬼叹口气，平反要找江泽民，学好三讲讨公道，花钱买通看门人。

绕来饶去还是钱，所以敬告好心人，施舍在下钱几文，有钱保

命讨公道，无钱都市做冤魂。善心做了善事情，子子孙孙保太平。

老威：好，比很多正儿八经的诗人写得好。老陆，可惜你的文化低了些，否则这个时代的杜甫就是你了。

老陆：你莫挖苦我。

老威：这类诗适合用你的家乡方言念。再来一首咋样？

老陆：刚才的调子太低沉，我弄首好耍的活跃气氛——上级领导来开会，“三个代表”天天背，忙了公事忙酒会，水平越高越开胃，只有上司说酒话，下属工作才到位，人民不醉公仆醉，喝空国库无所谓。

醉鬼才好打醉拳，违法乱纪乱收费。假如胃肠出了血，医院里头来相会，革命同志不后悔，舍命为了本单位，有人乘机来送礼，你吹我拍为了谁？二奶三奶加三倍，齐心协力花公费，利益均沾官官有，百姓哪个敢反对——判他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扰乱社会秩序罪。

老威：你写过多少诗？

老陆：记不清，有些东西，一时冲动就写，过了就忘了。但记在本上或心中有数的总有几百首吧。去年我在北京上访，被一群不明身份的当地歹徒毒打，造成脑震荡，经常头晕、呕吐，记忆力不如以前了。也可能是止痛片吃多了，记忆神经麻痹。我得抓紧写，否则将来成白痴就惨了。

老威：至少目前还没这种迹象。老陆，讲讲你是如何成为上访专业户的，也好替你的诗作个人生注脚。

老陆：关于我状告本地公安局胜诉的事，全国各地媒体都有许多大同小异的报道，大概经过是这样：1996年5月16号，我在本组清理阴沟时，发现了蓬安县烟厂几年前因改道而废弃不用的大半截锈水管，就捡回家。此时有过路人对我说，前面不远的荆棘丛中还有些废水管，可以挖出来卖钱。19日上午，我拖了辆板车去挖水管，由于是废弃多年的破烂，开挖过程没人干扰。可当天下午，自来水公司以“失主身份”找到我，要求退回所挖水管，因所有权的争议，他们又改口要钱，并承诺只要给钱就可以长期照顾我的废

品收购生意。

第二天，我主动到自来水公司业务科，与科长老熊达成付钱60元挖废水管的口头协议。5月23号，我刚挖出半根水管，业务科就迫不及待派人追钱。明明说好卖了废品再付，况且我身上没一文钱。这就惹毛了他们，说好话也不顶用，他们马上以失主身份去派出所报案。

我被抓进派出所，家也抄了，发现了“与我身份不符的赃物”：破自行车四辆，电动机两台，烟丝筒、排风扇等等，统统没收。当时正“严打”，我成了有重大盗窃嫌疑的典型，当日的本地电视新闻这样播的：“自三月以来，陆某某趁夜深人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大肆盗窃……”

我被收审了20多天，由于“死不认罪”，被反铐，被拳打脚踢，更恐怖的是为两名死刑犯陪杀场。公捕公判的万人大会上，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朝我扔石块，吐唾沫。我叫了声冤枉，武警就把我踩跪下去，且同死刑犯一道，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毙人时，我也跪在旁边，脑壳随枪响一开瓢，我就吓晕了。

6月14日，由于没查出任何真凭实据，我这个县城里赫赫有名的贼被解除收审，无罪释放。回到家中，所有的财产都被村里强制没收、变卖，我一下子成了自己家门口的流浪汉，悲愤之下，为了洗清贼名，我向法院起诉公安局并索赔。两次都败诉了，派出所长还上门威胁我：“你再告，看老子今后收拾你。”

既然地头蛇放了话，我只好连夜收拾行李，上省城申诉。由于“民告官”

具有新闻效应，所以全国多家媒体都找我采访，进行报道，终于惊动省高院。

1998年元月12日，南充中院按照高院旨意重审此案，我胜诉了。可3月26日，公安局竟答复我“不予赔偿”！

没办法，我只好再次起诉，要求公安局赔偿关押23天的误工损失、家庭财产损失、名誉损失共计几万元，我有自己做人的标准，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漫天要价。7月15日，我再次胜诉，得到

5662·35 元的赔偿。这与我的实际损失相差太大，况且几年官司下来，我已欠债 8 万余元。

我再次上诉上访，跑成都，跑北京，成了一个打赢了官司的乞丐，一个上访专业户。我一度靠擦皮鞋为生，在擦鞋的同时，向群众背诗，诉说冤情和对社会的看法，但鞋箱一次次被城管和巡警没收。后来，我没钱买谋生工具了，就写诗告地状，每天乞讨 20 个小时，借以糊口和交上诉费。有一次，我病倒在大街上，两个 110 巡警赶来，竟把我当盲流暴打一顿……。

老威：你这种饱一顿，饿一顿的上访何时有个头呢？说不定哪天就倒毙街头了。老陆哇，我看你还是回家种地算了。

老陆：你读书读呆了吧？而今不是古代，你想种地就种地？我妈改嫁过两次，79 年，我才 14 岁，就因不堪忍受继父的歧视而离家出走了，我还被人贩子卖到了河南，后来四处流浪打工，早成毛主席说的“流氓无产阶级”了。就这命，在哪儿都生不了根。以前还有成家立业的想法，现在，啥都显得渺茫。只有上访能提神，能使我活得像个人样。我已经穷惯了，欠债欠惯了，这辈子，怕是还不清，所以经济赔偿倒是其次，我的第一要求是：公安局必须在县、市、省三级电视台上，20 天以内以循环滚动播出的新闻方式，公开向陆某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恶劣影响。

老威：这可能么？

老陆：不可能，我就耗下去。大不了——一进牢门心惊肉跳，二人同行一副手铐，三顿糙饭准时送到，四季衣裳只有一套，五花大绑陪了杀场，六亲不认闭目修道，七根钢筋把天分割，八条监规条条霸道，九肉没有口水滴哒，时辰一到该你报销。

老威：又吟诗了。

老陆：狗屁国法早失灵，腐败官僚已成精，天公若有分身术，化作万千江泽民，一个单位派几名，双手倒提机关炮——共产共惨党员们，哪个还敢起贪心？

老威：你真是出口成章。

老陆：活鸡活鸭活王八，好烟好酒好贡茶，请来请去请公仆，

吃垮私家吃公家，不怕报应就怕罢，乌龟王八是一家，只有人民输定了，因为官帽比法大。

老威：打住吧，老陆，别激动过头了。

老陆：只要你愿意听，我可以吟诗到世界末日，激动有啥不对？脑溢血死了还痛快些。下面一首是……

老威：我们换个话题。让我看看你这条蛇皮口袋，装的都是上访材料么？

老陆：你不想听诗了？

老威：实话告诉你，我 80 年代也写诗，发表过不少，后来因诗惹祸，进了监狱。我已经十来年没沾诗，没和过去的诗友交往了，没料到，今天不小心听了这么多好诗，一时消化不了。

老陆：你太谦虚了。其实我的蛇皮口袋有好几条，随身带着，除了上访材料，就是诗，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替自己写，也替别人写。由于我是民告官的赢家，所以许多有冤屈的上访者找到我，咨询法律，联系媒体，求写申诉状。我的生活规律是：白天乞讨时凭灵感编诗，晚上接待上访者，并熬夜写材料，我瞌睡少，实在累了就身体一歪，闭闭眼睛。当然，每月一次的高院院长接待日不能错过，那天半夜就得起身，赶去排队，几百人的长龙，去晚了，连领导的面都见不着。忙啊，累啊。你是文人，能不能帮我分担一些？

老威：怎么个分担法？

老陆：这只口袋你提去，里面有四、五个人的申诉材料，你分类整理，凭着良心拉他们一把。这个杨继年，11 岁就判刑坐牢，恐怕是世界上年纪最小的劳改犯。他被关了 34 年，释放回乡时，竟又被当地踢回监狱。监狱当然不能再收留，他去哪儿呢？无家无地无任何亲属的孤人！我第一次遇见他流落成都街头，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充饥时，就心酸落泪了，我带着他乞讨，上访，去北京。他的冤屈比我深，所以写东西比我勤，都堆成山了。可惜去年在北京，他遭遇了一场火灾，身体大面积烧伤，被抛在街头。我赶过去，与几个好心人一道，送他进陆军总医院，没钱，医院只作了简单的处理，就放弃抢救。我在守护他时，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歹徒毒打，留

下脑震荡的后遗症。乘我昏迷，杨继年被弄出医院，终因溃疡感染，不治身亡。他全部遗物都在这儿，一个人惨到这地步，你不会没有一点感想吧？我准备在他的老家为他立个碑，刻一首祭诗在上面，也算对这个申诉了 700 多次的冤魂的安慰。

老威：这需要多少钱？

老陆：起码 500 以上。当地让不让立碑也是问题，他同我一样，是个被冤枉的贼。世人只习惯给革命英雄、名流、大官、德高望众的长老竖碑立传，给贼立诗碑就过分了——这算我许给死者的一个遥远的愿。

老威：我和我的朋友老张都访问过杨继年，我会尽力去写他。

老陆：还有个比杨继年更惨的，叫胡显林，1957 年，他家喂养的一头黄沙耕牛因病死亡，被当地县法院以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 5 年，这口袋里，有他的亲属提供的原判材料。你猜都猜不到，这个姓胡的自逮捕之日起，就失踪了！他的家人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和申诉，要求依法探监，可公、检、法三家都说不清犯人的下落，档案内既无解往何处劳改的记录，更无逃跑或意外死亡的记录。这有点像侦探小说了，可不相信“失踪”的家人终于上访到北京，惊动了某位政府要人。1986 年 10 月 20 日，原判法院以（1986）蓬刑监字第 169 号《刑事判决书》，宣告胡显林无罪，可无罪的大活人早已蒸发掉了！

老威：哪有这等怪事！当年承办此案的人呢？

老陆：都健在。

老威：找他们要去。

老陆：50 年代错判误判的多了，没人能回忆起来。一位法官说，我们一年成百上千地判，累瘫了，也忙不过来，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大形势逼人嘛。公安局也曾几次发函给看守所，让协助查询胡某去向，均无结果。

老威：蒸发一个大活人索赔多少呢？

老陆：当时只有关人毙人的国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以一

分钱不给。

老威：那“宣告无罪”有啥意思呢？

老陆：心理安慰嘛，老百姓善良，政府承认整错了，也就算了。如果你想不开，提进一步的“无理”要求，政府的脸面就撑不住。就像我，虽然告官告赢了，但沦落街头，一屁股烂账，可谓贫病交加，走投无路，为啥？就为了争这口气！

老威：有意思么？

老陆：有意思。每次进收容所，我的腰都挺得直直的，没偷没抢，就为了争气！我这条腿已被打残了，我只能拄着棍，慢慢走，前景不乐观。只要共产党不垮，老百姓的前景都不乐观，但我这辈子活得不冤。从 50 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都要弄死弄废多少人，加上饿死和自杀的，至少几千万上亿吧？大家都算了，只要新政府上台，宣布上一届政府的某些作法不对，大家就够满足了。只有我老陆，天生的犟牛，我就要你公安局以整我的方式公开消毒！全中国，就我这么个不起眼的破烂王，赢了两回官司还不放过他们。当然，如果几十年来这些被整、被冤、被杀、被饿的全学我，国库掏空也不够赔，推倒北京城也不解恨，所以老陆只能出一个。

老威：口气大啊。

老陆：口气不大，能做诗人么？我本想以失踪的胡显林为题，编一首长诗，但又觉为难。人没下落，碑都没法立。算了，我今后还是多关心没失踪的人。这儿有一份《冤民申诉》，上呈省委书记、人大主任、省长、政法书记和主任，省高院院长，全国高院院长，在上面联署签名的一共 105 位，我是发起人之一。我们状告四川省内 181 个法院、789 个法庭的司法腐败，办案不公，走后门，贪赃枉法，造成 10000 多起冤、假、错案，致使多位涉案人含冤而死。高院法官经常拖压申诉案件，有的甚至拖压长达十年，十几年。

法官某某某公开回答申诉人说：我们只有五个人，要看全川一万多起案卷，看不过来，就烧掉，你们有意见去省人大反映……

老威：这东西递上去有结果么？

老陆：结果就是好几个人又进了收容所，唉。

老威：你是上诉群体的社会活动家。

老陆：我的案子上下都清楚，就耗着嘛，多关心别人，眼界就宽了，这也是诗人灵感的来源。正是——华夏古国谁乐土，贪官污吏大老鼠；民脂民膏搜刮尽，太平盛世冤民苦。初院中院又高院，法律游戏弯弯曲；露宿街头梦清官，惊醒方知警犬毒！

22 风流穷人雷公

采访缘起：41岁的雷公是文学界的一个奇迹，他经常拿性命作儿戏，在这个动荡的人间乱撞。大概是因为太倒霉了，死神都不愿招惹他。

雷公自以为成名了，但那些写文学史的狗日的权威吃了他，耍了他，却经常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重要的诗人。由于无门无派，连最末的交椅都不让座，没办法，雷公只好省吃俭用，一本接一本自费出书——我是他多年的朋友，到头来也纳闷：“这东西凭什么硬撑到今日的？”

于是在1997年6月5号夜里9点，有了这篇对话。因为在绵阳雷公自己家中，所以他坦然、颓废、伤感。也许，白酒起了一定作用。

老威：又从鬼门关归来了，雷公？

雷公：回来了，你得请我的客。我碰见所有的哥们都这么说，赶快请我的客，否则就没机会了。

老威：不就一次车祸嘛。

雷公：人经得起几次车祸，你说？那小车眨眼就过来了，根本就没减速，我像个耍杂技的，一下子被铲起来，滚过车顶，落下车屁股，居然没事！我坐起来，拍身上的灰，皮都没擦破，那司机还算客气，主动提出送我上医院检查。我来成都办事，日程一环扣一环，根本就没空上医院。我站起，试着走了几步，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不晓得从哪儿钻出这么多人。成都市面就这习惯，踩死个蚂蚁也要围一堆人。我对司机说：“你走吧，没事了。”司机忙递了支烟过来：“大哥，对不起。”周围看客马上打抱不平：“对不起就算了嗦？要他医，要他赔钱。”我说：“没撞着，你走嘛。”司机一溜，群众追着我骂“瓜娃子”。

老威：你没把车牌号记下来？

雷公：没记，所以麻烦就大了。晚上到一位朋友家，整个腰开始疼，撩开衣服，黑了一大片。朋友给我搽了一大瓶红花油，凉嗖嗖热辣辣。我不敢躺下去，就坐着与朋友侃了一个通宵的诗，然后搭车回绵阳，连家门都没进，就直接进医院，一检查，肋骨断了两根。你看我这肋腔，鸡蛋大的一个包，就是接骨的后遗症。

老威：这世上骨折的人多了，咋都没留下后遗症？就你……

雷公：医生的手艺臭，把骨头接错位了，又掰开，重新接。这刑罚，把老子的屎都整出来了，旁边的人还说：“男子汉，挺住！”我喊：“挺不住！我不要排骨！”周围的白大褂全在我的眼泪鼻涕里笑，我又喊：“刽子手！希特勒！”看来，骂人是止痛的。你不晓得，我一见医生就新仇旧恨涌上心头。89年，我发烧看病，医院为了赚钱，非要我输液，结果输进去的青霉素是过期的，感冒一夜之间就转成了败血症。那一次，我昏迷了三天三夜，做了很多怪梦，我甚至把阎王爷认作了女的，要搂着他老人家睡觉，结果被打了三百饿逼棒。满身冒火，一口开水锅在肚子里沸腾，我他妈在光速前进，那些梦像被盖，一条压一条，还没回过神，被盖就变成石板，最后，当石板又变轻时，我飘起来看我自己，乱蓬蓬的胡子，像个新疆的买买提大爷，有声音说：“雷胡子，你到底醒了！”我听出是我哥们，接着又有声音说：“是几根指头？”我雾里认花，就吐鱼泡一般回答：“三根。”

“你还晓得是三根！”那嗓门一下子就大了，原来是我老婆。“我数了一下，不是三根，一共是十三根女光棍来给你哭丧。雷公，雷骗子！死到临头老娘才认出你是个花痴！”

我没有力气解释。后来才晓得，我即将见阎王的消息作为医疗丑闻登了报，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曾经与我有过这种那种关系的女娃子都纷纷赶来，好多年不见面的弃文从商卖烧腊的，已经嫁人生娃的，当然，也有死爱文学的，这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样黑压压的一群女人，都捧着鲜花，挺着粉脸，一进病房就齐放悲声，谁见过？不仅我老婆没见过，连我也没见过。可惜我那时一点知觉都莫得，否则，我一定每人亲一口，以谢患难

情。

老威：你老婆才是患难情，你是文联十多年的临时工，工资不及正式编制人员的一半，还不报医药费。上次多亏你老婆拦住领导，下跪，才榨出钱救了你的命。

雷公：诗人嘛，生得低贱，死得清高。这一跪，档次降下来不说，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每个月扣一半工资，现在都望不到头。算了，不提这些倒霉事，也不要提老婆。成家立业生孩子，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爬坡，哪天爬不动了，就彻底滚球下去——如果不离婚的话，这就是一辈子。太沉重了，哥们，老婆再好，也像你在《黑道》里说的：“像银行的存款，你不再，就始终在那儿。”而情人就不同了，你不用，别人就抢着用。

谁都不想死，谁都不想皮肉吃苦，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之后，你觉得这一切还是值得。听说上回女娃们拥进房来，把花堆了满床，不顾体面，抱住我又哭又啃。抱手抱脚抱脑壳的，全齐了，后面的挤不上来，还急得跳，把我老婆气惨了，拦不住，反而被当作妇联干部揉出房门。为这事，她后来一直气不顺，想起就破口大骂一回。我说我跟死人差不多，她们愿意啃死人，证明我高尚。

我的确高尚，我从来没有主动抛弃过谁。我经历过无数次伤感的分手，觉得这才是诗歌的真正源头。你看，我上班八小时，还要起大早，给娃儿做饭，打扫卫生，养花，养鱼，楼顶上，我还喂了百把只鸽子。你曾经说过，我家里就差一头猪，否则海陆空全部齐了。

老威：你的社交活动也频繁。

雷公：对，并且做事认真。我打扫卫生全是跪在地上抹。你算算，单位与家中我要耗多少小时？我太忙了，可越忙，诗越多，每年至少一两本，我不能停，一停灵感就跑掉。我一直跟你说着话，肋腔隐隐作痛，我至少在你这间屋里来回走了好几里吧？

老威：你谈情说爱也走来走去？

雷公：除了做爱不走，其它都走。

老威：写诗呢？

雷公：走不了，但两只脚喜欢在桌子底下互相搓。

老威：天才总有怪癖。喂，雷公，你是咋处理工作、家务、外交、读书、写作及恋爱之间的关系？我的印象是，你样样都不拉下。你睡觉么？

雷公：一晚睡四个小时就足够了。

老威：你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吧？撞不死，累不垮，过期的青霉素也放不翻。

雷公：我当过兵，身体底子打得扎实，所以经得住熬。况且忙里偷闲也是种快乐。比如与情人的浪漫故事，最好发生在开会或出差期间，假公济私，又没啥花销。现在讲市场经济，空手套白狼的功夫很难施展，穷文人只剩下开文学会的出路，吃住行全包，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并且尽可以耍酒疯，当众逞风流，为文坛增添一些才子佳人的段子。咱们的九根先生，都 50 好几了，还在大会上狂追女娃子，其不愧为人文主义的一面旗帜，值得我辈永远追随。我亲眼见某某，80 多岁的前辈，边接受记者，边摸另一位女诗人的屁股，那屁股粉白粉白的。当然，人家都喝醉了，在酒里干的事，跟在梦里干的事差不多，谁要追究，谁就是阴险的王八蛋。所以九根先生虽穷，只要一年四季有会开，自然就成了感情上的富翁。我与他既是诗友又是会友，懂得中国文人从古至今，都喜欢开会，如果某人瞪着电视机里的开会骂会太多，那就是他好久没开会，没到追名追利追女人的浑水里去搅了。

老威：你借开会之机搞了多少女人？

雷公：那种场合，比我有名有资历的人多，还轮不上我，有限的几个残花败柳或半老徐娘就被瓜分干净了，其他的实在憋不住，就约一个现已下海经商的文学崇拜者买单，一窝蜂出动找三陪。我这种忙里偷闲型，就把老情人带上，一起赴会，拜会些名人，多些鼓励的笑脸，让情人也亲身一下雷公在文坛的实力。

老威：你还是没变，雷公。80 年代就这么一股川西老农的朴实劲。

雷公：年岁不饶人了。像九根先生，爱喝酒爱开会，为啥？就

是平常活得太累太苦，过去的文人看重外部形象，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都是做给历史看的。谁晓得困难当头的堂堂大丈夫，在私生活中是不是变态狂？而今改革开放，就是内外一起放，把知识赋予的道德约束力丢开，就其本能，文人与商人、政客、鸡或鸭子同为一路货，都是追求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有一个下午，我打发了上学的儿子，就边做家务事边约情人。下行两点半到五点半，整整三个钟头，家里都是空的，得找点东西填满。情人准时到了，我们聊一会儿天，她就到书房翻书。我说别看书了，时间紧张，该做啥就做啥。她装着不懂，我就牵手来摸肋骨上的车祸包。她问：疼吗？我说晚上疼上午疼，就这会儿不疼，所以就来了感觉了。她说我成了止疼膏药了，我把她放翻在木地板上说，你就是膏药，天天贴在这儿，包肯定消了。

我忙乎半天，才把她硬梆梆的牛仔裤卸脱，大家的情绪都高，却不料有人敲门，砰砰砰的，我们马上憋住气，得平静了再快活。可门越来越响，最后，一个童音喊道：“爸爸快开门！我晓得你在屋头！”

情人慌得一跟头翻起来，我忙打手势稳住她，就提起裤子出书房问：“啥子事？”

儿子说：“我的文具盒忘记拿了！”

我气得干瞪眼，可也没法。就在抽屉里翻出文具盒，从窗口递出去。儿子一跑，我马上折回来重温鸳鸯梦，但情绪已低落了不少。正在关键时刻，狗日的门又响了，还是儿子！他喊：“爸爸快开门，文具盒里的三角板没有了！”

我差点没背过气！只有边骂龟儿子边找三角板。儿子要求进房，情人吓得钻厕所。当时的情景一团糟，可过后一想，又忍不住笑。老婆问我笑啥，我就捂住嘴更憋不住了。真是意味深长，如果偷欢成功，还有这种快活么？

老威：当心身子骨啊。

雷公：离散架还远。喂，老威，为啥不哭？

老威：我感到有些不是滋味。

雷公：其实我信仰苦难，它使诗歌显得有份量。可真要有人在我跟前回到旧社会，我又忍不住管闲事。上回派诗人芒克来四川，我们陪他上窦围山。整天游山，都是高高兴兴的，芒克还与我们比赛爬树，他说“芒克”这个笔名就是英语“猴子”的意思。可晚饭时，酒才喝到一半，芒克突然马上脸，独自端杯子到一边灌闷酒。我想起芒克的身世，当80年代他周围的今天诗人都火起来，在正统诗坛坐了一把交椅时，他却寂寂无闻，过着艰难的日子，其实他的诗非常有灵气。我望着芒克的背影，感到鼻子酸，就提着酒瓶子过去与他碰同病相怜的杯。我说：“有啥痛苦往事就讲出来，朋友帮你分担。”芒克说：“我高兴啊。”我说：“你肯定不开心，你的内心太痛苦了。”芒克说：“我不痛苦。”我说：“你痛苦。”芒克说：“你有完没完？我不痛苦！！”我说：“你才没完，明明痛苦又不承认！！”芒克差点气疯了。第二天下山，就在菜摊上与我比赛吃圆白菜，他以为自己经常出国蹭洋餐，吃生东西是强项，哪晓得我就是农村吃草长大的蛮牛。我们各抱一棵菜啃，我撕掉老叶，一头就扎到菜心里去，但不中用的芒克只嚼了几口就投降。肚子坏了，拉得青面獠牛，还说不痛苦，不痛苦做啥诗人？

老威：听你老婆说，你上一回窦围山，就在家病了半个月。拉完稀又发高烧，大热天还裹着棉袄揩地板。雷公，莫发人来疯嘛。

雷公：远客来了，自然舍命相陪，咱穷人，只能是这种玩法。

老威：那你有钱之后，就会绅士起来？

雷公：当然，有钱，情人、老婆、孩子都将舒服一些，小毛病也不会与我计较，诗的产量也会大大提高。我羡慕成都那位著名富婆诗人，开着酒吧，满世界游逛，然后才去慢慢关注女性及人类的苦难。

老威：最近你就将发一笔财，一万块。周二黄来信说的。

雷公：是I love you 诗歌奖么？

老威：不算正式，是奖之外专门拨给你的救济款。

雷公：靠得住么？

老威：二黄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人物，几番甜言蜜语加愤世嫉俗，

一定把那美籍台湾富婆哄得眼泪在眼眶里转。富婆可能没生育过，所以喜欢叫诗人“我的孩子！”目前她在中国的诗人、画家、行为艺术家孩子起码上百，再添你一个也不多。

雷公：我愿意做她的干儿子，不过周二黄那里，你还得替我美言几句。

老威：为啥？

雷公：二黄先生可算个大人物，在北京又开酒吧又开摇滚乐公司，白道黑道都通。上次他到成都，还是你通风报信，我就立即打他手机，邀他无论如何到绵阳看看。

老威：我还特地向他介绍四川最穷最有意思的诗人，人家虽是混混，却一点不势利，马上就答应微服私访你一把。

雷公：二黄先生一表人材，能说会道，把本地的文学土包子全镇了，大家一致认为，他除了嘴和屁眼，浑身都无漏洞。当然，干吹绝对不行，我又找人请客，牛鞭火锅越吃越见效，一会儿，周二黄斯文的伪装就剥下来，趁着醉意要睡晕觉。我手上没有现成的良家妇女，周二黄就要去夜总会。这门坎一跨就上千，没大款跟着，谁敢进？于是我哄他：“这晌扫黄严打，见嫖就拘留罚款。”周二黄酒吓醒了些，可灵机一动，又瞅准我灌迷魂汤：“你是本地名流，知道什么地方安全嘛。”

我当然清楚，就与一位朋友陪他到城郊的一座立交桥下，找一位卡拉OK老板。这老板过去写诗，长期追随在我手下，自然仗义，马上打传呼约人。周二黄见有点像黑店，就担心安全与卫生。老板拍着胸脯说：“实行三包”。

我与老板说好改天结账，看客人的满意程度。我和朋友连水也没喝，办完事就走，节约成本嘛。周二黄坐在屏风里，拿一张报假看，其实心急火燎。嘿，我以为他要干个把小时才收场，没想到我们前腿拢，他后脚就到，还一拐一拐的。我朋友忙扶着他进屋坐定，我笑着问：“搞安逸了？”

“安逸你妈个逼！”周二黄大骂，“太黑暗了，雷公！炮房就一破沙发，大冷天，连块遮屁股的布都不给！什么文明城市，文明得

日逼都不盖东西，光溜溜地扑来扑去，那鸡还怕羞，死死按住那地方不松手！”我问：“哪有三陪不做生意的？”周二黄说：“当然做，你给一万元她都不拒绝。关键是我喝了酒，认不准目标，好不容易逮住，腰还被鬼沙发给闪了。忍痛**去，才顶两下，鸡就开始盘问我：“你是雷公老师的朋友？”我哼哼两声，鸡又说：“你千万莫告诉他我在干这个。”“真撞鬼了！”周二黄大发感慨，“怎么各行各业都有了诗歌爱好者？”

老威：这鸡跟你是啥关系？

雷公：迷关系。我是偷鸡不成倒蚀把米。周二黄嚷着要我“赔偿损失”，没办法，我得罪不起，只好连夜火速动员所有的朋友挖老窖，终于在午夜 12 点约来两位大龄女青年。周二黄吃了若干牛鞭，刚才又闪了屁筋，更饥不择食了。但绵阳不比北京，除了三陪，哪怕再开放的女子，也不可能初次见面就刷裤子。周二黄的强项是口才，从北京到东京，再到巴黎、纽约，吹得天花乱坠，有位绰号“小雀斑”的真被他迷住了，就互相留了地址、电话，依依惜别。

老威：他哪有这种浪漫情调！

雷公：可无论也要熬到第二天。据周二黄说，他送别时，已亲了嘴，摸了奶子，约定次日上午相见。我说声“好好休息”，就安排他睡，说实话，我也疲倦了。

老威：周二黄说，他在你家几乎冻成冰棍了。

雷公：你通风报信时说，要我变得越穷越好，我生性好客，在吃喝上装不出来，只好在住宿上做。我安排他睡儿子的硬板床，并且把儿子小时候用的铺盖给他。

老威：多大？

雷公：一点五平方米，盖得了脚就遮不了肩。周二黄脸都青了，说：“这怎么过夜？”我哭丧着脸说：“实在拿不出其它东西。你冷，我心里也难受。”周二黄要去找宾馆，我说：“你这不是扇我的脸么？”周二黄说：“那你今晚成心收我的冻死骨？”我一横心，把一家人的过冬衣服全搬出来，让他盖个够。二黄发誓：一定替我挣一百条被子的钱。

老威：周二黄见多识广，居然被你给蒙了。

雷公：诗人无钱，只有耍苦肉计。

老威：你盖啥子？

雷公：我一家三口挤一床，三层大棉被，热得汗流成河。没办法，即使我要照顾客人，老婆也不愿意。第二天大早，周二黄冻醒了，出门散步，真是好习惯。

用罢早餐，周二黄才缓过来，他说四川这鬼地方，阴冷没暖气，你们怎么过？我说一家三口抱在一块就暖和了，二黄连说：“不容易不容易。”

十点钟，二黄的心上人来了，两人迫不及待进里屋，唏哩喳喳弄出了动静。刚好是星期天，儿子睡懒觉，迷迷糊糊地上厕所。他进去后，砰地一下关门；哗哗哗完事出来，把脚一勾，又砰地一下。气得我直叫“小狗日的造反”。

我的骂音没落，周二黄的骂声就起了：“叫化子雷公！穷鬼害人啊！”

老威：你又把二黄咋个整了？

雷公：他怪我铺盖太小，还一床衣服，简直是狗窝。勉强趁热劲头上身，连裤子都不敢刚多了，老觉得背上冷风嗖嗖。抖抖索索半天，瞄准了要入冰胯，门外突然砰地一声，像新年爆竹，把女的震坐起来了。扳下去重新来，又砰地一声，女的就下床提裤子了。

这下子，二黄再不听我解释，一冲就回成都。他说：“忆苦思甜终于结束了。”啥意思？

老威：你是装傻还是演戏？天才啊，雷公。等一万块到手，就请客吧。

雷公：烂账还没还清呢，昨天还倒贴了 300 多块。

老威：请谁？舍得 300 多块？

雷公：我得了台湾一个诗歌大奖，邀请妻子，我哪有钱渡海峡风光？没奈何，只好给颁奖大会发了个贺电，简略地阐明我的艺术道路及立场，当受奖辞吧。99 个字，花了 300 多，还打了折。

老威：你发横财了！台湾的诗奖少说十几万元。

雷公：就一座铜雕，暂时还领不回来。

老威：那跟大陆这边的民间诗歌奖差不多，评委一长串，评语与诺贝尔文学奖相仿佛，就是不拔一根毛。

雷公：这是一种精神含金量，给钱就俗了。

老威：你还没俗够？雷公，风流穷人雷公呵。

23 偷渡犯黎忆丰

采访缘起：偷渡意味着铤而走险，所以，如果没有能说服自己的明确动机，老百姓连想都不会想。而年过 30 的黎忆丰恐怕算十几亿人口中挑出来的，他在“娘胎里就偷渡”。

这次采访发生在绵阳涪江边的一个茶馆里，时为 1994 年 6 月 7 日。黎忆丰刚从深圳樟木头收容站放出来，政府查清了他的住址、身份，以及从前的一系列偷渡史，发觉动机不明，就法外开恩，以教育为主。

“家乡的水好空气好”，黎忆丰赞叹道，似乎要从此打消冒险的念头。唉，天晓得。

老威：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偷越国境的？

黎忆丰：什么时候？说不准。大约是在妈肚子里就开始了。

老威：你在说笑？

黎忆丰：不是说笑。我是 62 年出生的，我妈怀我的时候，我爸就丢下我们，跑到新疆。没办法，他饿得受不了，只有丢下我们去闯一条活路。他在新疆，与当地的哈萨克混，混着混着，就朝苏联跑，那一年，据说中国的饥民朝苏联跑了好几万。他从塔城出去的，结果被强制遣返。这次他一声不吭，装成哈萨克哑巴，为了不激化民族矛盾，他没被治罪，还白吃了不少大馒头。当他回到四川，不仅胖了，脸上还有了血色。那年头，脸上有血色的人非常稀少。

老威：这跟你越境有啥关系？

黎忆丰：我还没说完。我爸是个不安分的人，出去几十天不打招呼，是极平常的事，我妈怀着我在娘家的，也习惯了。可我那无情的爸爸回家才几天，又悄悄跑了，这一次，他南下广州，直奔深圳。那时的深圳是个小渔村，戒备森严。我爸在草丛里潜伏了一个白天，才从离罗浮几百米的地方下水。这老疯子，他准备游过去！游向那灯红酒绿的自由世界！至于到香港干啥，别人会不会收留他，

他一点也没想。当然，我不了解他想没想被抓住的后果。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在闭关锁国里，全被老毛的那一套驯得瓜兮兮的，象我爸这种出格的疯子，一百万人里也挑不出一个。总之，他才游出一百多米，就被探照灯和一梭子子弹吓回头了，岸上有一个班的边防战士等着他。他被爆打一顿，绑成肉粽子。这次投奔自由的代价是有期徒刑 20 年。

老威：他判的啥子罪？

黎忆丰：反革命。具体罪名就不清楚了。你想我那时还在胎中，我妈就捧着我去监狱探他了，还顺便送去一纸离婚申请。这就是我的胎教！我爸的老家是下川东的万县，一个江边城市，后来考上大学，进了省城，分在文联。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是胡思乱想的地方。不过我爸的胡思乱想源于童年，他喜欢一个人坐江边，望过往船只。水外面还有水吗？世界外面还有世界吗？也许你会说，62 年偷越国境的人，都是因为没吃的，但是我爸好像不完全因为饿。有部美国电影叫《德克萨斯州的巴黎》，讲的是一个流浪汉的故事，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虚妄的理由，就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找到“巴黎”。据说，那是他父母初次约会并做爱的地方，由于这次约会决定了以后他的诞生，所以他最原始的家园应该是“德克萨斯州的巴黎。”为了找到它，流浪汉抛弃了家庭、城市，一直往前走，走。这种血液里的欲望，或本能，我爸也有，我也有。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代价要轻得多，毕竟时代变了。

老威：你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因为中国人越境要么是经济，要么是政治的原因，哪会为了流浪的本能去冒险？这是背弃自己的祖国呵。

黎忆丰：我的祖国都揣在这只挎包里，几本书，几首诗，一本《汉语辞典》，外加几张女人的照片。我晓得，现在是市场经济，只要有钱，也能通过正常渠道。糟就糟在我没钱。还有，我上哪儿凭什么要给谁打招呼？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一直是我们教科书，他也没给谁打招呼，就一个人跑到缅甸仰光去了，可惜老头没敞开写，省略了不少精彩的段子。

老威：这么说，你越境的首选地应该是缅甸。

黎忆丰：不错，缅甸是佛教国家，从云南瑞丽沿滇缅公路再往前，就可抵达边镜小镇芒市，中间要经过惠通桥，龙陵坝、潞西县的大湾，及木康边防站等关卡。我们三个人，一个自称记者，一个是乌江中游武隆县的乡干部，凑钱买通了瑞丽的一个还俗和尚，再由他引路，找到另一个独臂的云游和尚艾山。艾山是缅甸克钦族人，专干偷渡向导。他一米八几的个头，黄色袈裟在烈日下灿烂无比。我们跟着他昼伏夜出了两三天，赶了几百里山路，累得筋疲力竭。

老威：这是哪一年的事？

黎忆丰：1989年夏天。

老威：不是政治原因吧？

黎忆丰：我不是，其它两个是不是我不晓得。我想先在仰光打工，看能不能撞上发达的机会，不成，就到香港投奔黑社会，如果命运让我到金三角种鸦片也行。总之，我是利用了89年那个时机。真他妈象梦游一般，我们沿途没见着一个兵，就踏上了缅甸的土地。当艾山用独臂依次敲敲我们的，肩打着手势要告别时，大家都没回过神。“这不行”，还是记者反应快，揪住带路和尚说，“这荒山野岭，鬼晓得是不是缅甸！”

四周鸦雀无声，我们站在一座马鞍形山梁的臀部上，透过齐腰深的灌木和杂草，能隐隐约约地望见一条河。“勐古河”，艾山用生硬的汉语说，“缅甸的河，我的事情做完了。”

“咋沿途不见一个兵？”乡干部怀疑地质问。艾山嘲笑说：“遇见兵很好吗？”

我们三人都死死缠住艾山，我甚至掏出刀来，威胁他继续带路，这陌生的土地太危险了。艾山生气了，独臂横扫一圈，三人就被摔出一丈多远。他把水和冷米饭都放在地上，指着山下说：“顺着勐古河走，没错。注意绕开游击队。”

太阳升起来了，艾山的袈裟鼓满了晨风。他撩开大步，几秒钟就不见了。

“记者”建议天黑再下山，我和乡干部都反对，因为我们已经望见了竹楼和稻田，觉得再也不能喊娃子一般困在这儿。“边防军来了咋办？”“我们已经过了边防站好几里，”记者说，“他们撵不过来。”“我说的是缅甸的边防军”，我解释说，“万一被抓住，扭送回去就完蛋。”

于是三个人商量，各自拉开 20 米的距离下山，这样，一个出事，另两人总能及时躲避。我自告奋勇在前探路，开始，除自己的脚步声外，还能听见背后跟来的脚步声，渐渐，就啥也听不见了。我回头“喂喂”了几下，就敢紧猫下腰，嗖嗖地朝回窜，象拍电影一般。我把周围都折腾遍了，仍然没找到同伴，累得倒在灌木丛里，眯着眼从叶缝里看太阳。刚天亮不久，天气还不太热。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临近中午，又被蚂蚁咬得跳起来，缅甸的蚂蚁太大了，稍微出点汗，脖子上就绕了一圈。我又拍又抹地清除蚂蚁项链，就继续赶路。

老威：你懂缅甸语吗？万一碰上当地老乡咋办？

黎忆丰：中缅边境的老乡经常往来，能说几句汉话。六、七十年代，也有云南知青越境过去，参加人民军，搞世界革命的。应该说，老乡见着我这样的，不会有报警之类的想法，再说，人民币通用，这也许比语言更管用。

老威：看来，你越境之前准备很充分。你不是因为喜欢流浪而去冒险吧？你别用这些浪漫的东西来蒙我。

黎忆丰：你又不是警察，我凭啥子要把“犯罪动机”坦白得那么清楚？话说回来，中国人都像我，想留就留，想走就走，“英特纳雄耐尔”早实现了。政府也没这么沉重的负担。我觉得应该从蒙古开一条大道出来，穿过前苏联地区直达欧洲，你不用管，他自己就去了……

老威：好啦，莫发宏论了。刚才讲到哪儿了？

黎忆丰：赶路。他妈的，根本就没路，我在灌木丛里连滚带爬，见着坡就下，我掏出表已经过了六个小时，无论如何也该到山脚了，可是，原本远远能望见的勐古河，不知到哪儿去了。在灌木丛右边

百把米，出现了一片密林，一旦钻进去，绝对就出不来了。这时，你猜我想起了啥子？我想起了《山间铃响马帮来》，一部老电影，写土匪走私的，大约就演的这一带。我没遇见神秘马帮，屁都没遇见一个，但这部 30 年前看过的东西，这时居然就想起了，紧接着，我又觉得周围很眼熟，“是不是早晨猫着腰转后找人时，把路走叉了？”这念头令人发毛，但更叫人寒毛倒立是一声低沉的吆喝：“不准动！”

老威：是缅语么？

黎忆丰：标准的普通话。

老威：你咋个绕来绕去又回来了？

黎忆丰：我也懵了，脑袋轰隆一下，浑身哆嗦起来，两个不争气地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我抖得跪都跪不稳了，还不见人影。于是，我勉强抬头看上面，那吆喝又起了：“举起手来！不准抬头！把武器扔出来！”

老威：是边防军？

黎忆丰：和边防军差不多，只是军装要破旧些。不怕你笑，我吓得尿裤子了，裆里全是臊烘烘的。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了，双手被绑在前面，像个瞎子一样，被人拉扯着向前走，而腰上被枪管硬硬地顶着。待黑布一拿掉，天已黑尽了。我发觉自己在一个山洞里，周围是一群穿七十年代中国军装的军人。

我被剥得精光，才被推到一张桌前，顶上吊着雪亮的碘钨灯，而桌边审讯官的背后深不可测，似乎还有许多小的洞口。审讯官发问说：“姓名？职业？年龄？单位？来干什么？走私还是政治？有几个同伙？一溜儿招下来。”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全都招了。

老威：他们到底是不是边防军？

黎忆丰：两边的边防军都不是。他们是人民军、缅共的游击队。六、七十年代红火过一阵子，据说分好几个军区，有十来万人，几乎把中缅边境全占了。现在有些衰落，也是受世界潮流和红色高棉穷途末路的影响。

老威：你被人民军抓住了？真是活天冤枉。

黎忆丰：我的路走偏了，瞎戳戳地撞进游击队的营区还不晓得。后来才知道，这儿离边境已十多里，我差不多脱险了。太倒霉了。更冤的是，那个胡子拉碴的审讯官还是重庆知青！1969年，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营地跑过去的。审到中途，他突然与我聊起家常，问朝天门码头变化大不大？他说已经打了20年的仗，依旧很想家。

我惊喜交集，就与他摆龙门阵，谈国内的变化以及风起云涌的学潮，我们都一口四川话，并时常纠正对方的某个字眼，“你是20年前的重庆话”，我说，“现在好多言子儿都不说了。

“你晓不晓得夜总会的小堂客叫啥子？叫瓦块儿。“知青反问：“崽儿总没变吧？”

我说：“那当然，永远都变不了！”

我们俩都哈哈大笑，笑到后来又流下泪来，周围的人民军都莫名其妙。接着，那40岁的老知青命令摆酒席，弄了四个菜，一壶酒。不一会儿，我就有点醉意了。老知青与我谈起格瓦拉；谈起当年的国际主义理想；谈起同来的知青战友，十之八九已埋尸异国沙场。我深受感动，就问他还打不打算回国？不料他却反问：“你都跑出来了，我还回去干啥？”我说我是迫不得已，从某种程度上，也许我和你一样，是追求冒险的理想主义者。他说：“你的理想和我不同。你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全人类。20世纪，只有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才算剩下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叫珍稀动物。”龙门阵已经摆到这种深度，我恳求他放我走。他叹息一声说：“我们是老乡，哪怕政见再不同，我也应该放你一条生路，虽然你前面不一定就是生路，可我这一关是应该让你过去的。可惜，太迟了。抓到你才个把钟头，上峰就已晓得了，并通知了中国边防当局。”

我的酒被吓醒了，像一条掉入冰窖的蛇，依然拼命想挣扎：“您就说我逃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我的老乡无可奈何地笑了：“围都是兵，一条大活人，能逃到哪儿去，除非地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真的对不起。如果在上报之前，就晓得你我

是同乡知己，不用你开口，我就，现在，唉！”我卜通一声给他下跪磕头了：“该哪个办？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求您看在老乡面上，马上给我一枪还痛快些！”

老知青把我抱起来说：“想开些，老乡，假如没得其它动机，单纯越境，最多不过判一两年，救你的还是自己，千万莫弄些东西往脑壳上笼起！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是团长，一有私心，兵就不好带了。不像一般军人，大不了脱这身皮，也惹不了多大的事。”

老威：人家话说到这份上，你也该死心了。

黎忆丰：他妈的！我像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的代价就是两年徒刑。你看我的脸，一边大，一边小，下巴也是歪的，这些永久的记念都是在历次越境中被揍被摔的。那种刺激，才叫做人生哪！我曾被一条长绳子拴在手扶式拖拉机的后面，被拖着在密林里跑，衣裤烂得像刷把。那时，我羡慕电影里绑在木桩上出卖的黑奴，市场里的买主都有权出价，有权带我漂洋过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隶的生活！今儿东明儿西的浪漫生活！妈的，现在兴自己卖自己就好了，省得我挖空心思地越境。

这世上最难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饿死没人管，可是你要挪地方，变一种活法，就有人管你了。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号称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允许人随便去，没钱，没具体的政治原因，你说一千遍热爱自由也不行。真他妈的虚伪。

老威：坐了两年牢，你的梦也该醒了。我觉得缅甸比中国还差得多。既使你越境成功，到了仰光，或者其它东南亚邻国，也有可能被当作黑人黑户抓起来，那岂不更惨？

黎忆丰：我还没坐过外国的牢，我咋晓得惨不惨？不过，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坐过，他跟我走的是同一条道，在缅甸内地被当地人检举，下了政府的大牢，嘿，这家伙，居然同缅共的一位中央委员关在一个号子，不到一年，就学会了英语和缅语。还了解到缅共的不少机密。当然，都是些没用的机密。

老威：你也想上这样的大学？

黎忆丰：我没这个命，想也白想。我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不仅

同中央委员是难友，而且被承办人忘在监狱里了。没人审他，没人搭理他，如果不是他有一天突然大吼大叫起来，那就只有烂在里面了。

老威：傻瓜也晓得吼。

黎忆丰：你吼就吼了，别人用汉、英、缅三种语言骂娘，结果，命运就改变了，他被当作劳工输出欧洲，后来在丹麦定居。这是我晓得的运气最好的偷越国境者。

老威：这好像是天方夜谭。

黎忆丰：我对你来说也是天方夜谭，在和平时期，只有偷渡最刺激。

老威：这么说，你已偷渡成瘾了？

黎忆丰：至少四、五次吧。不过，最具戏剧性的是刚才讲的。其它经历比较平淡，都失败了，只要在提讯时不乱说话，一般都罚款算了。我没钱可罚，也就在收审所呆几个月。最近的一次是去年，我以为香港快回归，边防就不那么严了。我花了几十块钱，在广州买了个假身份证，混入深圳。本来我是想到中英街去看看，去不了，就在街这边过过眼睛瘾也行。可是到了沙头角那地方，那的一切就像巨大的磁铁，一下子就把我吸住了。我傻戳戳地靠近了街中间的铁丝网。嘿，那哨兵，街上密密麻麻的人不管，就直冲着我来了。

我想都没想，就把装有假证件的皮包扔过了街。我还以为那是香港地界，大陆哨兵不敢踏入。不料那军人用枪指着我，然后拉开铁丝门，“出国”去捡回“罪证”。

老威：你的皮包总算出了一趟“国”。

黎忆丰：我也这样对哨兵说。他说香港马上要收回，以后去玩挺方便，何必这么着急。

我在樟木头收容站住了两个月，才查清身份。太悬了，差点就以伪造证件罪判我了。

老威：你为啥要把皮包朝那边扔呢？你本来没做见不得人的事。

黎忆丰：哨兵冲我来了。

老威：他冲你来，最多盘问几句，赶你走。凭啥子抓你嘛？

黎忆丰：我哪有你这么清醒。偷渡惯犯嘛，本能地就要扔掉证据。

老威：皮包是证据么？

黎忆丰：你说呢？

老威：看来，你这块心病的确是你爸遗传的。

24 梦游者之妻黎英

采访缘起：我一直对是否有梦游者存在疑问，直到有一天，读到老诗人牛汉的文章《关于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其中写道：“由于被击打，我的颅内淤血，血块压迫神经，使我成为一个梦游病患者，已经折磨了我半个世纪。梦游几乎成了我生命的特征。夜里梦游，白天也梦游，我成为一个清醒不过来的梦中人。”

我与牛汉是忘年之交，可他那 1.9 米的个头泰山压顶，使我不敢正面提及他的病症。1996 年 11 月 1 日，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黎英女士，无意间知道她的丈夫，70 多岁的小说家关东先生与牛汉的经历相似，便有意同她聊起来。窗外的阳光已失去了温暖，但我依然听得一阵阵心热。谁说这不是一个历史童话呢？

老威：黎伯母您好。我曾在最近的一本杂志里，读到关东老师的一篇小说，其中有关梦游的情节，写得尤为逼真。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关老师的亲身经历？他能如此完整地回忆、整理自己的梦吗？

黎英：不止一个人这样问，因为关东的梦游症是众所周知的，他早年思想进步，参加反对国民党腐败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时，同前来镇压的军警搏斗，被抓进监狱，折磨了 40 多天。出狱那天，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完字，就穿过黑洞洞的走廊。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声太大了，太空旷了，就尽量走得轻一点、慢一点，终于快到头了，他松了口气，却不提防一群黑影从走廊的各个部位挪了出来，他猛一回身，后路也被堵了。关东的块头大，学过西洋拳，他拿了个架势，准备迎战，可对方人多势众，并手握粗木棒。他很快被逼到墙角，大约有四五根木棒同时砸过来，他双拳一分，挡飞了两根，然而迎面的一根，却击中了脑顶盖，他大吼一声就昏倒了。醒来时已经自由了，躺在窗明几净的医院里。我在这所医院做护士，所以我知道他的病根，并情愿嫁给他。

当时，他简直成了大英雄，许多社会团体前来探望他，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社会进步人士，还有一些挺有名的电影演员。他的病室

被鲜花堆满了。在这种社会热情的鼓动下，关东很快就恢复了。

关东的日常起居由我负责，渐渐，彼此产生了感情。有一次，我端着药盘从值班室出来，突然听见关东的屋子里传出一声大吼：“哧——！”比火车汽笛还响，我一哆嗦，药盘掉地下了。我顾不得拾起来，急忙赶去撞开门。所有的值班人员都被惊动了。可关东面对大伙的惊愕，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当时站在窗前抽烟。我扑过去扶住他，他却拍拍我的手背，平静地微笑说：“怎么啦？这么多人到这儿来，出了什么事吗？”一个护士正要回答，却被主治医师拦住了，“没事”，他说，“大家都出去吧，没事。”

关东见大伙有些反常，就抓住我的手追究。我以为他演戏呢，气得不知说啥好。后来，院长找我谈话，说：“你真打定主意嫁给关东了？”我的回答很肯定。“可是，”院长说，“关东的病也许永远好不了。”我急忙问：“他得了绝症，最多能活几年？”院长挥手打断我：“看你想哪儿去了。关东的病根是在监狱里留下的，国民党特务把他打成脑震荡。他颅腔内至今残留着一块淤血，以院里现有的医疗条件，是无法开颅取出这血块，所以，一旦这东西压迫中枢神经，他的记忆就会出现间歇性的空白。他在这儿治疗了一个多月，刚才是他首次发病……他大吼一声，然而记不住自己曾经吼过。”我听得愣住了，又问：“他经常这样吗？”院长回答：“心情紧张、压抑、兴奋过度都会出现病兆。不过，只要关东性格乐观，什么事都看得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北平马上要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肯定会更安定民主进步。关东才 20 多岁，再过几年，医疗条件改善了，他的病根也不难除掉。”

我没想到，这病一拖就是几十年！我对他的吼叫习以为常了。可当时院长没说，这种病症还有比吼叫更加极端的表现形式——梦游。关东平时的言谈举止很稳健，很体贴，而梦游是他生命中的另一面，无声无息，却充满激情和执着。像弗洛德曾经描述过的一样，所有的梦都是突兀的，残缺的，与病人早年的经历密切相关。因此，关东不可能自己回忆整理自己的梦，他连一秒钟之前的吼叫也记不得……。他的梦游小说是我反过去向他叙述的。

老威：关东老师第一次梦游是什么时候？

黎英：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刚结婚3个多月，北平市民几乎都感觉到快和平解放了。关东大学毕业，也没个去处，就暂时住在医院我这儿。解放军进城的头天晚上，我们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因为地下党的学生组织已通知了我们，约好第二天大早去北大集合，夹道欢迎解放军。我对关东说：“你还是合会儿眼吧，还有两个小时就天亮了。”关东体贴地抱住我说：“你也睡一会儿。咱们都不说话了，怎么样。”

我打了个盹，就感觉到天亮了。但是直觉告诉我，不会这么快。我是护士，常值夜班，所以特别警觉。我掀开窗帘，果然满天星斗。身边的关东不见了。我坐起来，喊了两声没回应，就拉灯四处看。终于，我听见厕所有响动，就光着脚溜过去窥视。迎面是关东的巨大背景，他正对着镜子嚓嚓刮胡须。我轻轻唤了两声：“关东，关东！”他不理我，继续刮他的胡须，直到弄光，才无声无息地洗脸，极其缓慢地转过身。他的脖梗上淌着血，两眼直楞楞的，由于个头大，他的目光就从我的头顶越过去。我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就不再敢唤他。因为医护常识告诉我，梦游症患者是绝对不能在进行之中被唤醒的，否则会发生意外甚至猝死。我回到床上装睡。他紧接着过来，弯下腰，抚拍我的脸，见没反应，又吻了我的前额。这些日常动作，在正常情况下是极温柔、极浪漫的，但此时就显得僵硬、机械。我不敢喘气，心里祈祷关东快点回到床上，不料他却军操似的一个后转，直挺挺地向前走去，出了门。

我紧随其后，这条路我们都很熟悉。我怕他顺着这条林荫道绕出宿舍区，进住院部，这就太糟了。我赶紧抄近路去关了后院的栅栏门，这样，他在梦中出不去，就会结束散步回家。

我又错了。关东拢门时只咕啾了几下，就一个转身上上了岔道。那儿根本就没路，而穿过两个花圃就是与传染科紧邻的太平间。我吓得手脚抽筋，但只能跟着他。前面没捷径可抄，叫值班大夫又来不及，我跌跌撞撞地疯跑，才与他保持了5米的距离。来到太平间，见门锁着，我心想这下好，他会回头了，就躲起来。不料门却开了，

原来锁只挂在扣上。

关东在太平间折腾，他从冰棺里把两具遗体扶起来，与它们一起靠墙立正，然后脱下衬衣，撕成3块，一人分一块。他开始张着嘴，不出声地领呼口号，还摇动着冥冥中的小旗。我惊吓交集，急忙去敲收尸师傅的门。那师傅见过世面，在乡下就常给别人办丧事，他听完我的哭诉，就不声不响地从屋角捡了根小棍子。到了太平间，他灌了几口酒，把瓶子塞给我，示意我回家，自己的身体却一下子变得硬梆梆的。他蹭到关东身边，并排站定。这一行4人，又演了一刻钟哑剧，醒者到底趁梦者举臂的瞬间，把小棍插入他的拳头。然后牵着棍子开路了。关东乖乖地紧随其后，回到家门。但见那师傅一缩脑袋，鱼一般滑进夜色里。关东仍然直握着小棍，被无形的力量牵引而入，并在客房拐了个弯，高视阔步上床，在我身边躺下。顿时，鼾声如雷。

经历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我终于身心交瘁，天刚蒙蒙亮时反而睡着了，连闹钟也没惊醒。下午1点，我与关东不约而同蹦起身，叫声“糟糕！”就手忙脚乱地朝外面跑。满世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原来解放军早进城了。我们立即汇入群众的洪流，关东在太阳下笑得非常灿烂。真的，我爱这样百折不挠的男子汉，要不，我那天就悄悄离开他了。

后来，关东悄悄对我讲：“我们怎么可能误点呢？我整夜都在做欢迎解放军的梦。我刮了胡子，穿好衬衣准备上街，却见铁栅门关着。我又绕了条捷径，见两个朋友还在睡，就扶他们起来，在墙根活动手脚。后来通知集合的人来了，我跟着他，却被牵回家里。我想起床，老是不行，脚都抽筋了，眼也睁不开。”

老威：这太危险了，您没告诉他实情：关东老师没在梦游时伤害您？

黎英：他从来没有伤害过谁。开始我提心吊胆，就悄悄向领导汇报，征得同意，就在他的水杯里放几粒安定片，让他不知不觉地在睡前喝下去。而后叫人从外面锁住门。这样，即使梦游，关东也只能在屋里转悠。他是那个粗枝大叶的人，感觉只有点不对劲，但没

深究其中有什么名堂。渐渐我发觉，这梦游同样受环境、周期等因素的影响，一个月中，总有那么几天有病兆，而平时的情绪只要不过分起伏，就没多大问题。关东爱好文艺，新政府接管和改造旧的印书局，合并几家成立出版社后，他就作为思想进步的青年骨干进去了。不料我们刚从医院搬出来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关东瞒着我报了名，要作为一名战士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我知道后，急得火上了房，可又不敢把真正的理由说出来，那对关东的打击太大了。

我只好骗他说怀孕了，他咧着大嘴笑，那年头，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妻子怀孕根本不能成为丈夫不上前线的理由。于是我就找医院拿出病历证明，可院长刚被怀疑有“特务嫌疑”，正关禁闭写交待材料，而解放军代表不太熟悉旧档案。待我死缠活缠，找到当年的主治医生翻出病历档案，已经又过了3天。关东刚随着大部队出发，只留了张条在家里。我急忙赶火车到辽宁沈阳，丹东去不了，要特别通行证。满街的部队和群众，哪去找啊，我只好把关东所在部队的具体番号告诉志愿军总部的一位参谋，而此时，已能隐约感觉到前线的炮声了。

关东在朝鲜干了3个月战地记者，非常出色。他不仅稿子写得漂亮，还能在关键时刻拿起枪来作战，他有射击的天赋，甚至荣立过二等功。可不久，他却被当作“美蒋特务”抓了押送回境，原来，在一次夜间潜伏任务中，他突然从灌木中跃起，丢掉枪，大吼一声。这无异于给敌人报警！枪炮声立即大作，几座碉堡构成的火方网封锁了一切，压得潜伏部队抬不起头。眼见伤亡惨重，指挥员只好报告总部，请求炮火掩护撤退。敌人随后打出了燃烧弹，灌木丛成了一片火海。

关东小腿挨了一枪，被咬牙切齿的战友们反剪着拖了下去。医院提供的病历使他免于上军事法庭，他回到北京，懊悔不已——这几乎成了他终身的心病。然而，如果不是腿上有枪伤，他仍然记不起自己曾经吼叫过。

老威：听到这儿，我替您松了口气。关东老师知道自己的病状，他以后怎么办呢？这是否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黎英：普通人遇到这事，肯定不知所措，并且会埋怨亲人不及早告诉自己。但关东是条好汉，他最关心的永远是别人。他在家喝了几宿闷酒，老是说：“没伤着你吧，黎英？要不，咱们离婚，以免我发病梦游时伤着你。”我拿出护士的能耐安慰他：“你是真心爱我的，怎么会伤我呢？梦是潜意识的反应，你的潜意识也是善良的、透明的。”关东的眼睛直视着我，半晌才说：“你没撒谎，也没敷衍我，从你的眼里能看出来。”接着又叹息说：“那次潜伏发病，不少战友因为我而牺牲了，可我还活在世上受良心的谴责。”我只好绕开这话题说：“关东，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我们都还年轻，你的病能治好。”关东说：“有了你，我也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你听听，这就是关东，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话我仍然牢记在心。

老威：对于这个物欲化的 90 年代，您们的这段经历像是神话。那么后来，关东老师的病治得怎样？

黎英：关东在单位人缘特别好。所以领导器重他，任他到哪儿治病，都答应，都出钱。当时去了上海和广州，也找过苏联专家，均不敢贸然做这种生死攸关的手术。国内医疗条件有限，外国又去不了，没办法，只好拖着。关东为防意外，每晚总是熬夜看稿子，待我睡熟了，才将卧室房锁上，自己住客厅沙发。在休息前，还将室内锋利的东西都藏好，反锁住门，方咕咕灌几两白酒躺下。由于关东的自我防范，所以好几年没出问题，顶多就是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从沙发滚到了地上。

1957 年反右，由于单位内部的同志关系融洽，所以几十号人，只划了几名右派，这显然没达到上级下达的指标。最后一批，又划了两名，但算来算去，还差一名“右派名额”。怎么办？如果不主动上面就会派工作组，帮助大家提高认识。你想，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一个在出版方面政治问题不少的地方，连 10 个右派也数不够？可领导就是狠不下心来整人。他甚至当着大家的面说：“实在不成，只有我老刘去凑这个名额。因为出版的终审权在我这儿，一差半错的责任都是我。”关东一听急了，说：“不行，你家里四世同堂，出了右派，拖累家人咋办？还是让我上，我光棍，没负担。”领导说：“你老婆会同意吗？”关东说：“以前我治病，你什么都答

应。现在有这么好一个报恩机会，我两口子高兴不过来呢。”领导又说：“你没反党言行啊。”关东说：“我马上就当着大伙说些反党言行。如果还不够格，我就承认在做编辑部主任期间，许多右派作者的稿子没送终审，因为我那时不知道这些人后来会成右派。”

老威：关东老师太棒了。

黎英：只棒了几分钟，就付出了 20 多年的代价。当了右派不久，我们就下放到河北农村。临走时，关东到单位大院去告别同事。没料到相隔两月，大家就忘记他是怎样当上右派的了，纷纷躲避。从前一个关系挺好的女同志，一见他弯下高头大马一般的腰，竟惊慌失措，失脚踏进臭水沟里。关东天真无邪的笑容凝固了，回到家中，喝了半宿白酒躺下，一会儿就起来梦游了。这一回，他破窗而出，到野外喃喃练拳。天亮时，有人在一棵树下发现了。这次意外令他十分沮丧，下乡后，他白天拼命干活，晚上临睡前，总要用绳子把脚捆在床上，打成死结——这个残酷的习惯保持了很多年，直到 70 年代末回到北京。

老威：你们没有孩子吗？你们感情那么好，有孩子一定挺聪明。

黎英：开始治病没顾上要，后来他成右派，我随他下放到河北某县医院工作，又遇 3 年天灾人祸，就不敢要了。

老威：现在的医疗条件不错，出国治病也容易，关老师的病根挖了吧？

黎英：关东不肯花这钱，他说死血块在脑袋里呆了这么些年，一下子掏出来，颅腔会不会感到空？这是什么话。70 岁的人了，还像孩子似的，不过，经历了若干风风雨雨，我们也看透了。外面这个小院，虽然巴掌大点，把门锁上，关东也梦游不到哪儿去。这两年，不扣房门，他都不去外面了，顶多在下半夜起床，刮刮胡子，坐进书房看看书。有一次，我悄悄起身，溜到门口窥视，不料他竟开口问：“黎英，你在那儿干吗？”把我吓了一跳，原来他没梦游。

前不久，他半夜读一份科普刊物，欣喜若狂地摇醒我说：“南美的这个小国有个梦游村，这儿的村民晚上工作，白天梦游。当旅

行者在中午进去时，太阳昏黄昏黄的，许多人在街巷间直挺挺地出没，却没有一丝声响。两人狭路相逢，眼看要撞一块了，却又奇迹般地同时侧身、弯腰，如穿梭的鱼。这儿到处都游荡着眼睛血红的狗，长长的舌头有时也拂过树下倒垂着的人脸……只有过了黄昏，村里才渐渐热闹，鸡开始报晓，铁匠铺传出叮叮当当声，人们伸着懒腰从屋里屋外爬起来赶集，到了午夜，灯火灿烂，马戏班子进村，街上就挤得水泄不通了……”

老威：这个故事我也读过，关东老师想去旅游吧？

黎英：他不认为是故事。他现在正到处收集有关资料，说有生之年要去拜访一次。他说：“那是梦游之乡，不梦游的人就不正常。我怀疑马尔克斯去过，要不他的《百年孤独》怎么像梦话一般？一定是打着瞌睡写出来的，我曾尝试在梦中写东西，不成，明明写了许多惊人之语，可白天一看，写字桌上还是白纸一张。”

老威：看来，梦游症之于关东老师，既是祸，也是福，至少，梦游使他对这个混沌的世界保持了一种距离，一种恍若隔世感。他是应该进天堂的那种纯粹的人。

黎英：他一直生活在天堂里。

25 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

采访缘起：1994年9月2日，我随女朋友宋玉回了一趟江油，在去风景名胜窦团山游玩途中，经人介绍，认识了年近古稀的李长庚先生。

李长庚祖籍河南，虽离乡背井多年，但仍依稀残留着中原的发音，他身板硬朗，比一般的四川人要高半个头，他说吹唢呐是一种力气活。

李长庚的黄金时期早过了，但他还凭着一股拗劲要跟上时代。这种传统精神令人心酸。

老威：老人家，您做这行多久了？

李长庚：47年了，我18岁就已经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吹鼓手了。以后断断续续干了这些年，为乡里乡亲操办红白喜事。改革开放以后，我又时来运转，红火过一阵，可现在，人们讲究新事新办，请我吹唢呐的人家越来越稀少。

老威：咋会呢？您这行当是永远不会失业的。

李长庚：原先我也这么想，可时代不同了。城里刮什么时髦风，乡下很快就会下什么时髦雨，年轻人看多了香港的录像，就跟里面学。当然，农村没举行西式婚礼的条件，但至少可以免去花轿坐花车，一个电话打到江油，披红戩绿的轿车队就租来了，那排场，比吹吹打打迎孚的旧俗要风光多了。

老威：拜堂呢？拜堂还是要唢呐闹一闹吧。

李长庚：移风易俗嘛，许多地方不拜堂了。搞婚宴时，就顺便推举一个节目主持人，笑一笑，闹一闹，父母、亲戚、朋友都可以上台讲，学学做领导。

老威：也不完全是这样，结婚请吹鼓手的人家肯定有，只是不太时兴而已。可办丧事呢？灵堂辞亲、孝子开路、夜半招魂都离不开唢呐，因为这种乐器悲调比喜调更动听。小时候我在农村呆过，

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李长庚：先生您是内行，可不太懂市场经济。我们这个乡，离江油才 20 多公里，交通又方便，哪家死了人，只需打个电话，搭灵棚的班子一会儿就赶来了，包括租花圈，请乐队请歌星、送葬开路……一条龙服务。死人也是热闹的事，过去要请和尚念经做道场，吹鼓手陪伴孝子；现在兴开音乐晚会，大唱通俗歌，亲戚朋友也争着为死者点歌。通俗歌曲内容五花八门，只要歌星出口时随便改改词，就赢满堂彩了。至于送葬，也用不着孝子扶棺，有车队呢，有西洋管乐队呢，大喇叭一放，十里开外都晓得死人了。

老威：既然形势这样严峻，您的生计咋办呢？

李长庚：只有远离城市，到山里面乱撞找活儿。这很难，因为谁家的红白喜事，也不会先打招呼。唉，人老了，出趟门也不容易。

老威：您没收徒弟么？

李长庚：过去收过好些徒弟，都改行了，现在风气变了，没人学唢呐。

老威：可惜离得太远，要不我就跟您学。老人家，您能不能讲讲您的故事？您春风得意的时候？

李长庚：我从来不编故事。不过春风得意的时候不少，虽然已很遥远了。年轻人，吹鼓手在以前可不是下贱的行当，纨绔子弟瞧不起我们，是因为肤浅无知。其实这一行的祖师是孔夫子孔圣人，他早年为了供养母亲，不仅为人吹唢呐，还给死者披麻戴孝、扶棺嚎丧。所以吹鼓手的家里都供奉着孔圣先师的牌位。

老威：这样说来，吹鼓手不光是吹吹唢呐，也要嚎丧？

李长庚：当然。

老威：这咋可能？您自己的亲人又没去世，怎么嚎得起来？

李长庚：这是一种职业，就像演电影，演着演着就人戏了。电影有台词，嚎丧也有曲调。我刚学吹鼓手才 12 岁，唢呐调和嚎丧调，师傅都逼着反复练习，有了基本功，临场发挥才会惊天动地，样子做得比孝子还真。那些年，国共两军打内战，难民如潮水一般

涌，可我们与难民不一样，那里死人多就往那里去。我是河南人，你从我的口音能否听出来？唉，变了，什么都变了。我 16 岁就到四川了。四川比中原好，没打什么仗，红白喜事办得漂亮，没多久就出名了。与九十年代一样，那时候也兴搭班子，我爹是班主。他原是唱河南梆子的，而我师傅是吹唢呐的。中原连年烽火，民不聊生；劫道土匪、散兵游勇太多，谁也没心思听戏，所以我师傅就在我爹走投无路之际，建议两个班子合并，因为活人可以不听戏，但死人不可能不出丧。我爹同意了，两人原是结义兄弟，啥不好说？再说合并了的大班有十儿人，结伴谋生，胆子也大一些。我爹不吹唢呐，但嗓门刚猛，平地吼一腔，数里外也能听见，再说唱戏的，要记那十几种嚎丧调，简直小菜一碟，比戏文容易多了。

老威：哪些嚎丧调？

李长庚：《送魂调》、《追魂调》、《安魂调》、《唤魂调》、《辞亲调》、《大悲》、《小悲》、《封禧》、《渡亡》、《陪葬》、《下葬》、《回头》、《撕心裂肺调》、《呜呼哀哉调》。这些调式都是前人经过千锤百练，一代代传下来的，哪高、哪低、哪哑、哪扬、哪该干嚎、哪该湿嚎，哪该全身哆嗦出不来声，都很讲究。一般的死者亲属，一见尸体就控制不住，大放悲声，没几下就坚持不了，痛极攻心，还会昏迷、休克。而我们一入情绪，就收放自如，想嚎多久就嚎多久。如果场面大，收入可观，还能临场发挥。

老威：您最长嚎过多久？

李长庚：两天两夜吧。唢呐把开场调一吹，我们全班十儿人，就全都扔下家伙，披麻戴孝，齐刷刷地向死者牌位三拜九叩，分作两、三轮，哭、泣、嚎。乱作一团。其实表面乱，只要有心，细细地旁观个把钟头，就能看出不乱的门道。比如你泣我嚎，相当于你休息我劳动，而哭只是过渡，准备劳动或者准备休息，嗓门是我们这行的本钱，哪怕猛一声撕心裂肺，也绝不会蚀本的。

老威：你们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哪有假孝子压倒真孝子的？

李长庚：唢呐也罢，丧调也罢，都是调动情绪，造气氛的。人与人之间的喜怒哀乐就像传染病一样，很快就蔓延开了。当然，孝

男孝女是主角，但他们经常是一动真情就软下去了，往往到后来主角都退场了，配角好像才刚刚入戏，说白了，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假孝子。过去不像现在，灵棚一搭，几桌十几桌麻将就摆开了，守灵的人一心想着赌钱，连表面的哀悼文章都忘了做。

老威：过去也不可能一嚎到底吧？那不把人弄昏过去？再说现在人的居住密度大，你的响动搞得超过了别人的承受能力，四邻就会提意见，噪音污染嘛。

李长庚：可见人心不古，过去就没这一说。连 80 年代，也兴通宵打围鼓，唱的都是鬼戏。

老威：不错，观众也不少，那时一次丧仪就是一次群众集会。

李长庚：我们这个班子也得学唱川戏，总之，要把丧事从头办到尾，才有竞争力。刚才说到嚎丧……为啥我反复对你讲到嚎丧，一是因为它的难度比吹唢呐、唱戏更大，是表演又不露表演的痕迹，二是它牵涉到这班人能否生存，挣钱多少都得看它的效果。从收殓、最后告别、封棺到下葬，每次众亲属与死者相见都是高潮。我置身事中又是旁观者，我瞟一眼就晓得有的人是真想扑过去抱住死者，有的人是做做扑的样子。这时，我们不仅要卖力气地哭嚎，而且要充当保镖，一次次地拖住别人。待他们都告别完了，我们就上前延长这悲恸的气氛，按规矩，封棺之前，我们当中至少有五、六个人扑棺三遍，被其他人死死拖住，待盖子一扣，大铁钉崩崩下去，才暗自松口大气。

老威：你们中也分主唱与伴唱吧？

李长庚：主嚎与伴嚎，对，有些选拔赛的意思，一次丧事就是一次选拔。事后，大家会聚一块，认真地评比，嗓门大还不行，还得会处理，吟诗都讲究起承转合。收、放、脸、手、肩膀都重要，全身都重要，节骨眼上的转弯更重要，从“你的一生勤劳俭朴哟”到“苦日子熬到头你却去了哟”，大伙几乎每一句都要提意见，以便改进。

老威：你说你们的班子解放前就入川了，不知怎样站稳脚跟的？按理说，四川人办红白喜事是很讲排场的，传统的民俗也不少，一

个外乡的吹鼓班子……

李长庚：我晓得你的意思，开始是这样，人们习惯请本地的丧事班子。大户人家，还一边请人打川剧围鼓，一边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成都呆不住，我们就一路撤下来，途经绵阳，也不行，连江油也呆不住，只好离城 20 里地，在这个破乡场上扎营。为了活命，我们先分头找活儿，不挣钱，只图一日三餐。48 年，这地方发生过一场瘟疫，路边都能见着死人，这瘟疫救了我们。生病是不分贫富的，再加上本地的吹鼓手都是子承父业，一脉单传，有人请，他就夹上唢呐去了，这就难以抵挡人多势众的我们。况且，北方人个头大，气血足，唢呐也吹得比本地那些痨病鬼精神。长期下来，我们几乎包揽了江油周围的红白喜事。

老威：你们的势头这般猛，为何不重振旗鼓，再进城发展呢？

李长庚：当地有袍哥组织，惹翻了就三刀六洞，哪个敢与他们挤生意？光地皮税你就交不起。

老威：乡下没有袍哥么？

李长庚：当然有。被我们抢了饭碗的本地吹鼓手曾联合找到袍哥的红旗老五，他在青莲镇上开茶馆。红旗老五叫手下人传话，要么滚出江油地界，要么被打断腿扔出去。幸好我们在这一带已有了一定名声，有一个信佛的地主，雅号张员外，出面为我们求情，并垫付了 20 块大洋。于是龙头老大才发话，让双方一对一公平较量。我爹问：“没死人怎么较量？”老大回答：“这好办。”第二天早晨，一个叫化子就横尸在我们门口。于是只好把乞丐当王爷，隆重收殓。寿衣寿材置办好，抬到乡场上，双方才按事先协商好的搭台。本地吹鼓手、职业嚎丧户和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惜血本，凑足银元到外地请来名头响亮的高手，准备决一死战。不过半天，台搭好了，两台高耸并立，足有十丈高，而敞开的棺材就搁在两台之间。这阵式惊动了方圆百里，自从盘古王开天地，吹鼓手打擂台在当地还是头一回。先是比赛唢呐，曲子一样，都是《大悲调》，腿尺之外的看台上，分几排坐着袍哥大小管事，乡长保长，各方乡绅名流。我年轻好胜，要先登台比试，不料被师傅拉下。那阵，他老人家已

50 多岁，长得虎背熊腰，但见他一身漆黑孝服，孝帕在阳光下白得耀眼。他口咬喷呐，噌噌几下就上了云梯，站在台顶，与此同时，对手也上了台顶。看台上白旗一招，喷呐就双响了，简直像大刀在人们脑袋顶乱砍。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高手，斗了半个时辰仍不见胜负，激烈之处，眼尖的人甚至能瞅见喇叭口喷出的口水和血丝。但是我爹还很镇定，因为他晓得我师傅不仅底气足，而且脾气拗，老人家的小名叫“二蛮子”，有股宁死不认输的劲。斗了一个时辰，对手就只有喘着吹的份了，眼看胜利在望，不料师傅的喷呐嘎地断了。看台上白旗又一挥，这下完蛋了。只见我师傅满嘴鲜血，原来有人用弹弓暗算他。我人小反应快，来不及多想，就已攀上高台；我爹也向上爬，台子撑不起这么多人，摇晃起来，我急忙喊：“师傅快下！”全班的人都守在台边，爹上不来，就急得跳脚。喊：“小狗日的，找死嘛！”话音未落，对手又上台了。这次是比嚎丧。对手猛一擂胸，嗓门粗得如牛叫，台下喊好声不断。可我想的是，这回完蛋了，师傅受了伤，失去了帮手，爹也支撑不住。离乡背井跑这么远；为多少活人笑，为多少死人哭，但自己却落得如此下场！受欺负的日子何时才有个头？况且，这只是为了个叫化子，就搞得班子要散了。散了咋办？哪里去谋生？当不了吹鼓手，就只有要饭，说不定哪天 and 台下的叫化子一样下场……就这样越想越丧气，越想越不想活，就哭起来。向天，鼓着两只牛眼睛，满眼太阳晃也不眨一下。我啥也不晓得，啥也听不见，嚎得不成人形，还一拳一脚地乱打，像要和老天爷拼命。弹弓又瞄准我了，啪啪几下，挨一下脑袋轰一下，我尽量把脸朝上，只要脸不出血……。就这样，台下我胜的白旗已招摇几回，可我就是看不见。后来我才晓得，对手早哑了，我独自一人多嚎了十几分钟，搞得满场黑压压的哭成一片，连袍哥们都抹泪了，连连叹息说：“我们也把外乡人欺负得太惨了，上头娃儿太惨了！”

老威：真是惊心动魄！老人家，您也算是从少年英雄过来的。

李长庚：英雄谈不上，既然做了这一行，就只有背水一战。唉，好不容易挣来的地盘，总不想随便让，全国解放那年，爹亡故，埋骨异乡，不久，我相了亲，入了当地的户，就走不了了。

老威：这么多年也没回家探亲？

李长庚：回去过好多次，老家有一大堆亲戚呢。不过我已经变成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了，这方山水养人，虽然时代变了，现在我们这行走下坡路了，但是这几十年苦中作乐也算有滋有味。

老威：解放后你改过行没有？比如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中，你还能干吹鼓手？

李长庚：没有改过行。只是改过调。迎解放，扭秧歌，我们的丧事班子就摇身一变，唢呐齐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也一样，发动群众，少不了文艺演出。领导定什么调就吹什么调，艺人嘛，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哪有那么多不满情绪。告诉你，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一片接一片，我也照吹天下太平调，孝子当多了，人就没啥心肝，这世道，千万来不得热血奔腾，今天大鸣大放，政治宽松，该你“奔腾”，好了，“奔腾”够了？劳改去吧，尾巴一夹就是几十年。所以，为人就是要没心肝。

老威：你们的班子也散伙了？

李长庚：51年就各奔东西了。以后口子就像本地吹鼓手一样，平时在家务农，方圆几十里有红白喜事，人家自会找上门来请。因为我有名气，一年四季总不会断了财路。曾经有人建议我重新拖个班子，到处找活儿，我仔细琢磨，认为不要，因为这也算个民间组织，它归哪儿管呢？没部门管的组织，在中国就是非法的，非法的下一步就是反动，我可不沾这个边。

老威：老人家，您是人精。我自愧不如。另外，我还想向您打听一件事。

李长庚：请讲。

老威：小时候在农村，我曾听爷爷讲过吆尸人的传说，是否真有其事？

李长庚：你爷爷咋讲的？

老威：他说吆尸人在过去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就是受人重金托付，把客死异乡的尸首从百里或千里之外搬运回家。

李长庚：对，过去是有专门的吆尸人。他们一般是晚上赶两人结伴，一前一后，像抬轿子一般牵引着尸体，行走如一路还发出嗒嗒的吆喝。

老威：死人也走路么？

李长庚：看上去，死人与活人步调完全一致，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惯性节奏。如果你走夜路，与吆尸人不巧碰上，就只能闪开，要不，他们就嗒嗒地迎面撞过来。这种三位一体的走法不仅别扭，而且不能转急弯。

老威：您亲眼见过吆尸人吗？

李长庚：白天见过，晚上没见过。49年，本地的一位客商，在江西做生意时被乱兵打死。那时，水陆的交通都极不方便，他的朋友又不忍心就地处置，只好重托吆尸人。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尸体果然被吆回家乡，并且面容如生。

老威：没有腐朽？简直是神话。

李长庚：这位客商姓陆，经我的手出的殡，因此绝无半句虚言。吆尸人都是白天睡觉，我们年轻好奇，舔破窗户纸去看，黑咕隆咚，只闻鼾声如雷。而到了晚上，他们就已经没影了。我们班中的小伍，想把吆尸的棍子偷出来看看，因为大伙都猜测棍上有魔法。不料刚一动门栓，里面呼地一个黑影扑过来，定睛一认，原来是只黑猫！吆尸人随行都带着猫，上路时，他们像取门板一样，把靠墙而立的尸体搬出房外，前后夹定，放猫在尸体上溜几遍，叫“过电”。过完电，三个人还要如练操一般，原地踏步一会儿，方嗒嗒出发。

老威：您这段经历，算虚实掺半吧？老人家，您可谓见多识晚辈佩服。

李长庚：你到了我这把年纪，比我更见多识广。你的嗓音不错，很适合做这一行呢。

26 李敖读者李老皮

采访缘起：36 岁的李老皮对李敖不满久矣！但一直找不到机会发泄。

“这世道，泼皮也能出大名。”他感叹道。

我认为李敖是痞子味很重的传统文人，可还没降格为泼皮。

泼皮俗称“滚刀肉”。李先生金丝眼镜，西装革履。他都这样子，你李老皮怎么称呼？

老皮答：我是正规的流氓，脏水也能喝，清水也能喝，家在鞋子里，而精神上，横着一道迈不过去的门规。李敖无门规，谓之“泼皮”。泼皮从文，小人得志，搅屎棍被当作栋梁材了。

我闻之掩鼻。其时夕阳西下，北京地坛公园遍地黄金。我校正钟表，为 1999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5 点 31 分，天气晴，有微风。

老威：据报载，台湾文人李敖最近正积极准备竞选总统。你觉得奇怪吗？一个文人突然对总统宝座感兴趣。

老皮：李敖玩什么我都不奇怪，因为他是个混混，一辈子的终极目标，就是变着戏法吸引公众的注意。假如脱裤子能惊动世界，他不仅马上脱，而且要站在最高的地方脱，还要立个功德碑，上刻“李敖到此一脱”或“天下第一脱李敖”。这是他做人做文的主流。他把这种赤裸裸叫做道德力量。如果有人不同意，或者脱裤子的动作慢一点，李敖就瞅上了，两眼贼亮贼亮地，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

老威：把自己赤裸裸地交出来有啥不对？我看，至少台湾民众喜欢李敖式的坦率和真实。台湾新闻真相网曾花两年时间，播《李敖笑傲江湖》，有 400 多集呢。李敖自己的评价是：“这是唯一说真话揭真相的节目，天下只有李敖方能为之。”

老皮：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说了 400 多集“真话”，你相信吗？看电视节目上瘾的人，一般来说智力都比较低，因为电视的节奏使人不可能更深地思考问题，长期不思考，脑子就报废了。如果说，

李敖这种所谓的“每日真话”都能麻翻全岛、信口雌黄到底的话，台湾人就太弱智了。李敖如果在大陆这边，只能算三流文人，文革中打派仗的骂阵文章，哪一篇不比他有气势。

老威：你有偏见。

老皮：我承认。但我在偏见之外，能认清自己的流氓本色。不像李敖，总是不断变换知识分子和流氓的角色，以挑逗的姿态媚俗。现代社会讲多元，什么花样没有？国外有裸体海滩，只有怪物才穿裤子进去；台湾本岛也有裸体登场明星，据说引起轰动，警方都出动了。读李敖的文章常令我想起街上地痞的口头禅：“这几十百把斤全交给你啦！”你不要也得要，否则就不够义气。作为读者，要什么、怎么想，是我的权利，你凭什么强加于人？其实，这种绑票式的“坦诚”也是一种商业运作，在运作中，脱，脱到哪一步，都有讲究，都有利润，同知识分子的真正毫不沾边。李敖的欺骗性在于他披着社会良心的外衣，却把裸露灵魂和裸露器官混为一谈。敢脱裤子的人就坦诚真实吗？那《花花公子》和《龙虎豹》上的脱星，个个都称得上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还要大学干什么？还要精英和瑞典皇家科学院干什么？直接把所有的文化机构建在妓院里不就行了。

我手上有一本李敖著的《中国性命研究》。你听听下列篇目：

《〈易经〉中的性交文字》

《〈战国策〉记性交姿式》

《佛经中的性交文字》

《政治与生殖器》

《头大、头大、两头大》

《屁股、屁股、翘屁股》

《国民党与私窑子》……

咋样，满目皆性吧？这就是说，李敖看人看物，万变不离其宗，就一个字：“操”。这自然非常快活。但对于一个正常的人，哪能无时无刻都“操”？又不是铁打的鸡巴和钢铸的阴道。就算是铁打钢

铸，还有个时间和金钱问题。李敖先生操了几十年，现在一大把年纪了，依然生猛，真非凡也。非凡过分了，就成了一种病态。现代科学研究证明，20岁左右，性欲发展到巅峰，鸡巴向上斜刺，日日交合也游刃有余，自此开始走下坡路。男人一旦过了40岁，鸡巴纵然勃起，其坚硬度也大不如前。而更年期之后，一个月能够自然勃起交配三次，就算合格。李敖一个60多岁的老花痴，还有多少灯油可熬？除非用药，用传统的按摩术，使自己处于假性亢奋状态。

老威：啥叫“假性亢奋状态”？

老皮：意淫，以嘴上功夫代替实践。李敖有句著名的格言叫“国民党手淫台湾，意淫大陆”。

老威：同许多传统的文人一样，李敖被逼急了，只能以性作为武器去抨击国民党的专制。他坐了好几年牢，在坐牢期间，情人又离他而去。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当自由被随意剥夺，文人就剩下嘴和笔了，李敖又不可能拿枪杆推翻政权。

老皮：世上坐过牢的知识分子不少。他们往往把专制的牢房当作一种修练、一种苦难的功课。捷克总统哈维尔通过坐牢，写出了《无权势者的权力》。在他看来，坐牢，也在行使一种无形的权力，也在“发言”。他与作家昆德拉有一次著名的争论。昆德拉认为，历史是由少数人通过讨论来决定的，只有挤到圆桌边，取得了所谓凌驾于公众之上的资格，才有讨论历史的权利。简言之，历史就是争夺发言权的战争，没有公正可言。正是透过这种历史虚幻，昆德拉创作小说，获得一切灵感的母源。而哈维尔站出来说，昆德拉没坐过牢，他不懂什么叫具体的历史。在牢里，饥饿、毒打、侮辱，什么都能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被人遗忘，被你为之坐牢的崇高的目的所抛弃。这就叫历史吗？有人在大墙外，在面对媒体发言，你的苦难倒成了他谋取名利的素材和资本？哈维尔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哪怕是小人物，也有参与历史、并从这种历史中获得尊严的权力。我再以犹太作家威塞尔为例。他从纳粹集中营里逃出来，在长达几十年中，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证人、一个苦难记

忆的保存者。他在《大屠杀之后的艺术与文化》中，引了一个叫玛莎的小女孩临死前写的诗：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
我没有钱可节省；
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
足够我支持很长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
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风暴肆虐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里，有那么多需要的，
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
这些东西我都缺少。这些我一定要节省。
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
我将多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失去了它们。”

我不想再引证下去。我觉得谈李敖的时候引证这些是一种亵渎。李敖身上，有一种中国文化中最糟糕的东西，即把苦难当作资本，并用这种资本去赚取名利、女人和永垂不朽的幻觉。其实坐牢本身，并没有厄运之外的任何附加值。世界上的犯人岂止百万，如果每个出狱的人都要以“曾经失去自由”为借口，向社会疯狂索取、报复，这地球早乱套了。李敖自己声称，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国民党关了他，也成就了他。至于怎么“成就”的，请读他“二进宫”时写的诗：

隔世的没有朋友，
别做那隔世的人，
隔世别人就忽略了你，
象忽略一片云。
离开你了棗柔情媚眼
离开你了棗蜜意红唇

什么都离开了你，
只留下一丝梦痕……

三流通俗歌词，让人一读就起鸡皮疙瘩。李敖把这叫做他的“坐牢聚散哲学”。我看他是除了胯下的，只懂得哲学。这不是骂人，因为李敖除了器官，不懂得女人。他对付国民党和对付女人用的是同一根，在它的支配下，还能找到所谓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吗？蒋介石的口头禅是“娘希匹”，而李敖也从“娘希匹”里，演变出“鸡巴学”、“鸡巴中正”、“屁股功夫”、“性交诗”、“从小就舔女人”之类。你比较一下，李敖是不是他所攻击的老蒋的孙子？他是不是在坐他爷爷的牢？专制政体是骂不垮的，李敖也不想骂垮它。因为，他就靠骂国民党起家，如果国民党垮了，李敖的政治抱负、文史理想、交配哲学都将一文不值。

老威：为了采访你，我也读了《李敖回忆录》。虽然层次不太高，但他对朋友、对情人，还是有特别人性的一面。大陆、台湾隔绝这么多年，也许你我对台湾人的心理还缺乏了解。李敖表达情感的方式……

老皮：李敖是个可怕的实用主义者。他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当他要博取台湾名影星胡茵梦的欢心时，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
又漂亮又漂泊、
又迷人又迷茫、
又优游又优秀、
又伤感又性感，
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时，
一定不是别人，是胡茵梦。

老威：这不是琼瑶小说里的女主角吗？

老皮：李敖斥骂琼瑶粉饰现实，看不见劳苦大众。而他自己除了骂架，还不是琼瑶那一路的货。回想一下，这 20 年大陆从台湾引进了些什么？开始是台湾诗歌，痲弦、商禽的，算上了些档次。

轮到余光中和郑愁予，就有些疲软了。郑愁予的“你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你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曾红遍大江南北。跟着是野性而纯情的三毛。再跟着是柏杨的“酱缸文化”。到了琼瑶和李敖，就已经惨不忍睹。琼瑶是李敖的另一面。一个稍微有点脑子的人，看了那一系列美女如云的小说和电视剧，不仅激发不出欣赏或审美的乐趣，相反会涌起一种破口大骂的冲动。因为，这老太婆在糟蹋美女，让美女一说话就抽筋，就流泪。在《还珠格格》中，把公主赴刑场演成了婊子逛超市、搔肢弄首接受愚众崇拜。琼瑶的电视剧能把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变成李敖，满嘴想“操”；而李敖，下意识地却把琼瑶当作教母，学写滥俗的歌词：“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不看你也爱上了你/忘了我是谁”之类，并四处猎取被这种廉价感伤煽得潮乎乎的弱智女孩。两人都酷爱猎艳。琼瑶是为了表演、赚钱。李敖是为了交配、炫耀。一旦失去了炫耀的价值，李敖就弃旧艳如破鞋。被他以琼瑶笔法粉饰过的十全美神胡茵梦，竟成为“缺乏真知、走火入魔，终落得脸蛋满分、大脑零蛋”的白痴。

老威：男女之间的事很难讲清楚。

老皮：但这能说明一个人的心性。

老威：这是档次，不是心性。李敖写的诗和情书文化品位的的确非常低下。我也承认这 20 年没从台湾引入多少好的东西。但这并不能借此否定李敖的一切。他对他早年的启蒙恩师严侨，一直非常尊敬，不管严侨入狱也好，落魄、遁世也罢。他痛惜严侨晚年“误信了邪教（佛教）”，并写下《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纪念他。严侨死后，其妻生计艰难，李敖又从与辜振甫打官司赢来的钱中，分出 10 万台币送给“严师母”。李敖说：“她收下了……人间绝无仅有的李敖式的正义。”

老皮：好一个李敖式的正义！他打着“为恩师算二、三十年的旧帐”的道义幌子，从辜振甫手中索到 200 万台币，却只分给求告无门的师母 20/1！这是一个暴富名人对穷人的施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蒋介石的孙子，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因脑溢血沦为植物人后，李敖为他捐款 700 万元，并借此打广告：“刚才捐出的

700 万元，证明我李敖多么爱蒋介石的孙子，现在发表的这部书，证明我李敖多么恨章孝慈的爷爷。”章孝慈有权有势，既不缺钱治病，也不差钱办学，因其开明，邀李敖上了大学讲坛，李敖就借此炒作自己。章先生一出事，李敖即出巨资，把自己的前程与台湾最大的两个名人捆在一块，其名利回报率起码上涨 10 倍；而救助一个默默无闻的严师母有啥回报？请你记住：10 万与 700 万，一个是无偿帮助过青年李敖的恩师遗孀，一个是替新闻人物李敖打开学院大门的权贵伯乐。孰轻孰重？正义也是一种权衡啊。

老威：你的眼光太毒了。李敖给了钱，还留下这么多话把。假如他一分钱也不给严师母，谁能拿他怎样？

老皮：那道义的前提就被取消了。李敖活学活用了一句中国古话：“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名妓和名人都这样。我读《李敖回忆录》，发觉此人为传统关系学中的人精。他的主攻方向为蒋氏父亲和国民党。为了保证自己长期公开叫阵，他骂遍天下，却很少骂媒体、骂趋炎附势的俗众。因为，传媒是他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竭力张扬自己与胡适、钱穆、殷海光等思想泰斗的私交，甚至连一张便条、一个签名都适时公布。在这种边拉关系、边攀比的低劣文风中，还不时夹杂一些自吹自擂的评语。意思是：我李敖这种天才，20 多岁就看得比胡适那样的老朽更深、更远；钱穆浅薄到没看出国民党是奸党，我李敖早看出了。李敖学过法律，知道什么叫一面之词和死无对证。反正胡适等人早已作古，不可能从土里拱出来指出书本的谬误。任何人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我有李敖那大把年纪，我还可以说胡博士去台之前，向我请教过台湾的英文拼法。你说我胡扯？拿出证据来，拿不出？就法庭见。媒体一炒，又是借名人抬自己的免费广告。

李敖的书，本本都是广告。广告的基本要素就是：老婆卖瓜，自卖自夸。我建议，大陆所有的广告公司都停业整顿，直接把李敖请来讲课。李敖以骂人出名，但仔细一看，不是骂人，而是骂人的性器官。按西方人的观念，所谓“操”是对人的赞美，是说明男人阳刚、女人有魅力。若你口口声声“操你妈”，纯粹是对对手母亲的极度称赞。她的年纪比你大几十，还勾得你那么冲动，真是天仙

下凡或者宝刀不老了。除了攻击性地赞美专制的器官，李敖的词汇就太贫乏了：什么“鞭蒋介石之尸”、“谬种流传”、“加速打倒蒋家余孽”、“奴才”、“荒唐”、“笑话”等等，与大陆的文革语言如出一辙。我刚断奶时，母亲抱我去参加群众批斗牛鬼蛇神的大会，但见几千颗拳头起伏，大家齐喊：“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某某！”、“刘少奇的奴才某某！”、“绝不让反革命谬种流传！”等等。直到现在，骂人的伎俩还在中国民间发扬光大，分晕骂和素骂、拐着弯子骂和捶胸顿脚骂、骂人不露脏字和满嘴脏字又不是骂人，早突破了李敖千篇一律式的性骂。如果台湾人民需要，等实现了“三通”，尽可以从大陆这边引进成千上万个超级李敖。或者互通有无，让李敖来大陆讲授广告，兼拜师傅，60多岁还不太晚。李敖上的第一课，就是改“操”的职业化叫法为“屁儿虫”。这比“操”的学问高深。屁眼儿为何生虫？你猜。

老威：留着你自己猜吧。其实李敖的自我推销术已相当深入人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读者，并不记得李敖是如何“祸台”、如何研究、在文化、政治甚至社会、经济方面有哪些成绩、私生活怎样等等，却忘不了他为《独白下的传统》创作的广告词：“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却为我供了牌位。”

老皮：一般认为，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所以《易经》中的谦卦，爻爻都吉利；《道德经》里也有“满遭损，谦受益”的劝诫；而西方人以自我张扬，解放内心为美德，所以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到现在，都有当众演讲的传统。人们以这种尺度观李敖，自然尊他为反传统的勇士，以为这种口喷白沫的疯牛形象，会如自由神，带领人民踏过旧世界的废墟，进入民主大同。人们忘了完美的社会除了浪漫，还有法律和理智。其实在“谦虚为美”的正统之外，中国民间历来有成王败寇、“人不要脸，鬼都害怕”的说法。而历朝皇帝，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子天下第一。原来李敖自吹自擂的狠劲，依然没有跨越传统的雷池。他反专制的一切手段都源于专制。正因为这样，他习惯于用武断的语气论事、论物。恐吓、威胁、利诱等潜台词都隐伏在貌似正义的句子中。一些读者认同此

类语言暴政，或把语言暴政等同于硬汉精神。吹牛能成为英雄吗？肯定能。当某个特定环境，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大伙就需要李敖来领呼口号，来把个人的自吹自擂扩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吹自擂。于是，希特勒就出现了。李敖广告词的走红与卷土重来的文革热，源于同一母体。劫难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劫难的阴云笼罩着，专制的基因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血流淌着。这肉体掩蔽下的血，有一天会不会泼溅论敌的脸？李敖骂蒋介石“强奸民意”，他却比老蒋更变本加厉。谁为他“供了牌位”？一旦被供了牌位，这尊能吃能拉的家伙就成菩萨了，免费享受公众的供奉。这就是需要我们日日上供的李敖菩萨。如果他有一天登基当总统，会比蒋介石更专制得随心所欲。台湾的监狱要扩大十倍才够用。

老威：我是在一张地摊小报读到李敖的“惊世广告”的。在他之前，真还没人这样自吹。当时，我有种本能的反感。后来，这种搞法多了，我连反感都麻木了。感谢你今天刺醒了我的神经。

老皮：李敖在大陆传人无数。继他的“前三名李敖、李敖、李敖”后，出了一大把诗人和小说家。首先是伊沙，见一再大炒特炒仍市场疲软，就干脆将自己与鲁迅、李敖并列，加上一句“不读伊沙你可惜了”，其无耻的程度堪称“李敖第二”。接着，又是以写小诗著称的《他们》群体，先后在《黄河》、《北京文学》等杂志发表多篇对话，称《他们》是“天才聚集”的地方，“庞德、乔依斯、卡夫卡全在这个圈子里”。《他们》“灵光照耀，与李白杜甫灵光照耀是一样的”。令人觉得《他们》深得李敖师傅的真传。《他们》主将于坚肥硕且口齿不清，是云南省文联的专业创作员。当被台湾诗人黄梁问及，为什么以“民间立场”的身分、又要在官方杂志发表作品时，于坚答：所有的官方杂志都是厕所，我需要排泄，发作品相当于排泄。这种典型的李敖式作秀，令李敖的同胞大吃一惊，进而肃然起敬。众所周知，于坚的许多同行在官方杂志工作。他们出于对朋友坚持写作的尊重与信赖，编辑、发表其作品、评论，为于坚挣名、挣利，却不提防成了于坚的茅坑。亲近的是他的肥臀、而不是头脑。《他们》另一主将韩东聚一帮江南小才子，开记者招待会称自己已写出“中国最好的小说”。进而有先锋小说家借媒体发

誓：“中国作家没得诺贝尔奖是因为西方的偏见，是语言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前三名李敖”的吹牛变体。跟风的自然是新潮中国报刊。于是，十大作家、本世纪中国五十名杰出诗人、四大期刊、“《大家》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摇篮”之类的搞法，充斥文化市场。企业界也不甘落后。几大老板、点子大王、“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高峰会议”、亿万富姐、中国首富、“骗得惊天动地”等标题擂鼓上阵。诗歌大国成了吹牛大国，李敖应该申请专利。

老威：老东西，你这张嘴够损的，也应该申请专利。

27 被收容者李明凯

采访缘起：2003年5月17日下午5点，我正在家中上网查看已传得颇为热闹的“孙志刚受虐致死事件”，不料门响了，跟着闯进个不速之客——好几年不见的瘦小的行为艺术家李明凯。

“电话里老是忙音，于是我就直接上来了。”他凑到电脑面前瞅道，“又是孙志刚？当然，这一晌除了非典，只能是孙志刚。”

我关上电脑，沏茶待客。接着，有备而来的李明凯讲述了他在四年前的那段被收容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比较道，“成都的警察比广州的要温和、狡猾些，认准了敲钱，往往不会意气用事，象整孙志刚那样。人一咽气，不就人财两空了么？”

但是，李明凯的父亲却受不了儿子出事的刺激，积忧成病，在半年后死于绝症。

从古至今，做中国人都需要铁丝的神经，钢板的皮肉，百毒难侵的心灵，方能善始善终。所以，作为蹲过大狱，并多次出入公安机关的过来人，我安慰李明凯道：“日子还长。”

并且，国家在进步。1997年，全国人大废除了暗无天日的收容制度；今年，因为孙志刚，虚拟世界里有几百万喉咙在怒吼，所谓收容遣送及《暂住证》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再过一些时候，由于某个契机，就该轮到践踏人性的户口制度吧？然后，再轮到……

不知道还要“进步”多少年，不知道现在四、五十岁的人还能不能看到比较顺眼的结果——脆弱的神经，敏感的皮肤，童言无忌的心灵也勉强能够在这儿存活并且生长。

李明凯：你还记得吧，老威，大约四年前，你像条猎狗，撵着访谈我？

老威：我当然记得你的反复无常，分明约好时间、地点，事到临头又变卦，害得我屡屡扑空。不过，我不怪你，也不怪其他甩了

我若干次的访谈对象。

李明凯：我当时没心情，甚至有些反感你，因为你有文字窥阴癖。别人的伤口已经在淌血了，你依旧刨根问底，唯恐伤口撕裂得不够大。我记得你属木，木性人是最冷酷的。

老威：木性人最冷酷？那金、木、水、火、土的天下五行中，冷面人占五分之一喽？

好啦，我不争论，不辩解，因为我这辈子，越辩越黑的时候太多了。《易经》之困卦曰：“有言不信。”意思是被认定有罪的人无法自己为自己辩诬，所以才有律师这一行当。

李明凯：看你扯哪儿去了。我晓得卜卦是你的强项，但也犯不着趁机卖弄嘛。

老威：对不起，失言了。今天的话题应该是你。

李明凯：非典时期，我在家里憋了十来天，感觉上过了十来年，差点疯了。昨天，试着给几个哥们儿打电话，约喝茶，都推有事。在成都×报上班的老汪，已被隔离到龙泉驿的度假中心，每天上下午都准时学习“三个代表”，众志成城抗非典。目前成都的新闻单位都两班倒，一拨人马上班，另一拨人马隔离学习15天，以防全军覆没，报纸瘫痪。

约不上人，我只好自个儿上街逛，路过磨子桥一家网吧，见里面空荡荡的，几十台电脑，才两、三个不怕死的铁杆网虫，就贼眉鼠眼地进去找个位置。

打开邮箱，通过无名氏寄来的最新代理服务器上了动态网，然后遍逛海外各大反动网站，嘿，真出事了。

老威：又是伊拉克战争又是非典，当然出大事了。

李明凯：我说的是孙志刚事件。他是个工科大学生，刚去深圳打工，在一家服装公司任设计师。今年3月17号晚上，他和我，和许多内心骚动、渴望聊天的他乡网虫一样，没带任何证件就出门上网，结果在大街上走着就被治安警察当作“三无”或闲杂人员抓了。紧接着，又从派出所转到广州收容站，最终被警匪一家，齐心

协力用乱棒活活打死！

老威：我读过有关的评论，孙志刚在三天中，挨了许多场打，尸体作解剖时，背部皮下淤了一大片黑血。幸好有互联网在，所以《南方都市报》4月25日一曝光，立即引起全国性的连锁反应，因为此类事件多如牛毛。不瞒你说，我刚出狱回成都，就因没办《暂住证》被警察在深夜从父母家抓走过。

我在白果林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补办了《暂住证》之后，才放出来。我当时一再强调，我在自己的父母家是长住，不是“暂住”，我生长在自己的家乡，大约在其他地方才算“暂住”。但“警察”充耳不闻，照章办事，“无《身份证》、《暂住证》和正式工作单位的闲杂人员必须接受收容遣返。”“闲杂人员”一词是李鹏在八九学潮期间发明的，一直沿袭到现在。

李明凯：可人家孙志刚是三证齐全，只是没随身带着而已。更恐怖的是，因为“顶了嘴”，警察不准孙的单位和朋友出证明出钱保释，直到扔出一具死尸。目前，专家、学者都钻出来写文章，要求追究真凶；网上一片叫骂，我也敲了个千把字的愤青帖子，狂贴十几个地方，我还在东海一枭发起的“关于取缔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的呼吁书”上签了名。

老威：你是兔死狐悲吧。

李明凯：还是要绕回几年前的老话题？好嘛，趁孙志刚的冤魂给我的勇气，就讲一讲。

我和他一样，来自农村。1993年，20岁出头，考上了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二时，与美术系学生密切接触，爱上了观念艺术，并参与成立了人民艺术公社。97年毕业，本来分配回甘肃老家教中学，我不干，就同成千上万应届毕业生一样，自己入社会闯荡。先是在文化公司打工，拉广告、当写手、装修设计，什么都做；后来，积累了两万多块钱的小资本，就同海南籍的两个同学搭伙，做水果汁生意，即把从海南岛运来的热带水果兑水机榨，定点推销给酒楼。半年之后，生意逐渐兴隆，我就在肖家河的居民楼里租了三居室，融办公、存货、寝食、会客于一体。当时，在此出

入就两类人，一类助销小姐，一类行为艺术家，男女都长发披肩，这肯定引起居委会老太太的注意。

老威：成都的行为艺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吧。

李明凯：同诗歌一样，很热。媒体作了大量报道，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还拍了专题片。美国在华投资的贝特·达蒙西还出钱与艺术家们合作，在府南河搞“水的保护者”。我很热衷，在生意的同时，弄了大量作品，如果不是后来出事，我还会在艺术的大道上不歇气地狂奔下去，直到人生有一个结果。

老威：行为艺术赚不了钱，你能物质、精神两手抓，两手都硬，真不简单。我还欣赏过你的环保作品“抽刀断水”，整整三天，你举一把菜刀不停地砍都江堰的急流。

李明凯：看不出这是果汁公司经理吧？

老威：看不出。

李明凯：警察叔叔也看不出，所以他们在居委会和联防的带领下，于1999年一个夏日深夜，上门来了。插门声象爆炸一般，把我从梦中惊醒，裤子都套反了，在我边答应边调整裤腿时，外头已抬出电动切割机弄开了防护铁栅门。

脑子一片空白，屋里一下子闯进来十几个警察和联防队员，象水缸似的，哗哗满了。出于应酬的本能，我拉开办公桌抽屉拿烟递过去，脸熟的户籍却挡开，厉声喝问：“《暂住证》？”

我松了口气，因为除了“三证”，其它的工商、税务卫生、消防等证照皆齐全。我为此花了1万多，几乎跑断了腿，图的是个保险。我打开文件柜，把七、八种证照批文都摊开桌上，还包括我的大学文凭、鉴定、人才交流中心的通知书等等。警察绕到桌后坐下，挨一查验，末了，抬起头，仍直戳戳地把手伸过来：“这些破烂没用，我们只要《暂住证》。”

我只好又在抽屉里翻找，浑身汗如雨下。我终于从一本书里找到，有两个，去年和今年的。按他们的规定，一个《暂住证》管一年，但半年登记一次，交一次钱。我如释重负地把这救命宝贝双手奉上。警察再一次仔细验看，然后宣布：“全部过期了。”

我争辩说：“没过期，今年才办的。”

警察一字一顿地说：“你下半年还没进行延期登记。”

我急忙说：“明天一早就去。”

警察又是一字一顿地说：“已经晚了。”然后当众把《暂住证》内页夹出来，撕得粉碎。联防受了警察示意，几间屋窜来窜去地搜查，水果踢得满地都是，鲜榨汁和助销的镀银盘子也踩烂了。我心里着急，就根据有限的法律知识，指出不能毁坏私人财产。警察说：“我们依法搜查罪证。”还命人把我的VCD机和一箱光碟全抱走。

他们还搜出了50盒避孕套，于是我看黄碟、卖淫嫖娼的嫌疑更大了。

老威：你用得了50盒避孕套么？

李明凯：你这口气跟警察差不多。本来“三无人员”就该直接送收容站的，那晚上，成都市拉网清查外来人口，肖家河出租房多，属重点，所以居民楼下，四周都停着警车，警灯跟夜总会的彩灯一样，闪个不停。后来听说，光肖家河一带，就抓了几百，面包车不够用，就弄了几辆公共汽车。天快亮了，才颠到郊外多宝寺。警察个个干劲十足，这是绑肉票啊，抓一个没《暂住证》的，要赎回来，至少500元。少了这个数，就得继续在里头挨打、挨饿、干苦力，直到油水榨得差不多了，才“降价处理”。我太倒霉了，平常受到居委会的严密监视，一举一动都汇报到派出所，什么“小姐和嫖客频频出入，是个大白天也卖淫的窝点”啊，什么“毒品交易”啊，捕风捉影。其实，小姐卖果汁，艺术家搞行为，各干一行。

老威：你的避孕套与他们有关？

李明凯：放你娘的臭屁。我是艺术家，要做作品。我原准备亲口将500个避孕套吹胀，在车辆最密的傍晚，拿到春熙路旁边的天桥上去放，我将留在原地，观察人群和车辆的反应……

老威：你想制造交通事故啊？

李明凯：许多哥们儿都这样问。人群混乱还没啥，怕的是司机们突然见这种东西降落前窗，一走神，就撞一串，那艺术的性质就

变了。所以我这名为“人欲横流”的妙作，只得因现实的难度而暂时搁浅。

老威：你可以拿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搞。

李明凯：行为艺术是互动的，没有受众的反应，还不如一个人躲家里煽嘴巴——我也曾这样对警察解释，他们的回答是：那你就当众煽嘴巴，看我们有没有反应。我不动，他们就找来个小偷，与我面对面站着。小偷又瘦又脏，可还在警察的鼓励下对我呲牙裂嘴地笑。这下热闹大了，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都过来围观，警察说，艺术家优先，动手吧。我羞愤交集，浑身都哆嗦了，却不提防小偷恶狠狠地甩过来一耳光，脑袋嗡地一声，炸开了。我本能地挥起右臂，要回敬，围观者却鼓起掌来，只听警察笑得气喘吁吁说：“劳动人民先动手？没教养。”

我突然想起耶稣的至理名言：“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凑上去。”

于是就听天由命地放下手臂。小偷劈劈啪啪煽了我 20 多个耳光，见我仍不还手，竟被激怒了。扑上来，揪住我的长发，兜两圈，就按趴在地下拳打脚踢。我晕晕乎乎的，一会儿抱头，一会儿抱腰，实在受不了，就往围观者的腿上滚，许多双脚把我踢出来，小偷已累得气喘如牛，最后干脆坐在我的背上，揪住我的脑顶盖，一下一下往地上磕。

围观者打着哈欠散开了，都说：“捶一头死猪，莫趣莫趣。”此时派出所长装模作样地过来制止小偷，并演讲了一通依法治国、严禁刑讯的官话。我在派出所呆了一天一夜，他们仍然审不出“避孕套的真实案底”，就丢下一句“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掌握我嫖娼卖淫的证据，派出所出动警力，传讯了我手下全部的助销小姐，无结果，只得将我作为三无人员，与打我的小偷同锁一副手铐，送进收容遣送站。

老威：他们没有释放你？

李明凯：乔石任内修改《刑法》，取消了收审，警察失去了无限期地关押嫌疑份子的依据。幸好收容遣送制还在，24 小时破不

了“案”，警察就可以将你从公安机关“释放”到由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共同管辖的收容所。这里形形色色，无所不包：妓女、嫖客、赌棍、上访人士、民工、下岗工人、乞丐、无照经营者、底层文人。总之，品种齐全，社会上有的这儿全部有。我一进去亮出身份，大伙都笑了，问：艺术家？画画、写诗还是唱歌的？我说搞行为。大伙说，那叫啥艺术家？我们都搞行为。

三层楼，20多间屋都关满了，我被塞进顶楼2号房，进门就一大马桶。

我在看守人员的一再吆喝下，好歹背靠马桶坐下去，下巴正好搁在别人的后颈窝上，一转脸，又碰上了另一人的鼻尖。不过几分钟，我就被臭哄哄的热气给蒸熟了，衬衣粘在累累伤痕上，疼得我丝丝抽气。就这样磨了一会儿，有人划船一般从屋子另一头过来屙尿，我只好站起，待那人瞄准马桶颈方便毕，企图坐回原位，不料地盘已消失。

万般无奈，我垫脚上了马桶，高僧一般俯视众生。我总想在下一个屙尿的光临时，夺回座位，可人太瘦小，臀部不丰，屡屡败北之际，还饱尝了阵阵老拳。坚持到天晚，我已沿马桶上下了十几次，幸遇开门领饭，众犯列队而出下三楼，才透了口气。

晚饭是两个夹生馒头，塞进嘴里粘牙，无法下咽。汤桶立在院子当中，我四处寻碗，没有，就问身边犯人，那人指出一个窗口，我去领，却被告之一个土碗五块钱。我搜遍裤兜，有十几元钱，买了碗去院中舀汤。我闭眼硬灌了三碗，烂菜叶味直熏鼻腔——由于肠胃不敌这种猪狗食，当夜我就拉了三次，第二天大早，竟奇饿难忍。

我在顶楼号子里蹲了三天，与几十人一道苦撑苦熬，不刷牙洗脸。这世界上最臭的就是沤在一块的人肉，久了，连虱子也受不了，往颈窝、下巴、肩膀等明处爬。管理员每日早晚两次，收电话号码，通知外头来交钱赎人。市话一个5元，长话在原价的基础上涨5倍，暂记账上，待解脱之日一次性结清。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递电话条子，所以三天后，号子渐渐松了。

户口在本市的，走得较快，特别是嫖赌犯，进来就喊爹叫妈，顶多熬一宿，就不惜血本，也要让外头来赎人——干这勾当，警察高兴昏了，尽量把罚金往高处抬，1万到3万。我觉得成都的警察比广州的要温和、狡猾些，认准了敲钱，往往不会意气用事，象整孙志刚那样。人一咽气，不就人财两空么？前两年，《南方周末》曾登载一篇报道，重庆的水上警察为了逼良为娼，增加收入，曾把两位误抓的良家女子扣押三天，调戏拷问，注射毒品杜冷丁，使其上瘾。

老威：你在里面待遇如何？挨打没有？

李明凯：同派出所相比，我的待遇还是有改善，至少没刑讯。孙志刚是学工科的，脑筋转不了弯，嘴硬，激怒了警察。我做了多年行为艺术，见过些场面，要油滑些。不过，整整三天都没人来赎，我还是慌了。在外头，我的朋友都是艺术家，穷，听说要出几百上千赎我，就有些迟疑。无奈，我一咬牙，双管齐下，也把甘肃老家的电话提供了，——这是个令人后悔终身的致命错误！

熬过7天，有点门路的几乎都走了，剩下的多是盲流。管理员说，政府没钱遣送诸位，你们得自己挣路费。过两天，就分期分批集合去搞基建，要么挖地基，灌钢筋混凝土；要么运鹅卵石，学做砖瓦。如此劳动三个月至半年，就免费遣送回原籍。

老威：这是法律么？

李明凯：不晓得，也千万别提法不法，否则哪天成了孙志刚第二，你还蒙在鼓里。总之，我的运气不算太坏，因为收容站里大队人马转移去做苦力时，我被留下来，看管法轮功分子。其实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挺老实，不用“看管”。底楼的号子比顶楼大许多，按照二比一，一个法轮功由两个人犯贴身守护，不准闭眼，不准动嘴，不准打坐。一见有盘膝的趋势，两人就一左一右，将法轮功的大腿掰开。我是文化人，还兼有高声朗读《人民日报》的重任，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都是钦定反邪教的狗屁文章。

咽喉都冒烟了，但法轮功们挺顽固，哪怕四五个人轮番读报也难干扰。半夜三更，乘人打盹，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坐起来盘膝抱掌。此时困得不行，也就由他去，可一旦被管理员发现，我们就得挨电

棍受罚。

老威：法轮功也关这儿？不可思议。

李明凯：都是由北京遣送回川，据说是在天安门聚会，演示法轮大法时被抓的。其中还有教授、编辑、高级工程师等等。他们被关在这儿，等着单位领导来交钱领人，订保证。这有些象行为艺术，比如一察觉某个老头嘴唇颤动，我们马上就凑上去，贴耳朗诵《邪教头子李洪志》，直到他意乱神迷，停嘴睁眼，脸色熬白——这相当于美国对付伊拉克军队的噪音炸弹。

老威：你还干得上瘾呢。

李明凯：没人赎我，不上瘾，我怎么活？在收容站熬了 11 天，最后都怪罪爹妈不该生我了，才被一个助销小姐弄了出去。她花了 600，我还了她 1000。这娘们同我耍了三个月，曾哭着要嫁给我，我没干，怕失去单身的自由和乐趣。

这个小赵人不错，她不计前嫌，还为我父母安排了食宿。重逢的那一幕就别提了，经历这场惊吓，父母死活要我跟他们回甘肃，我却私下打定主意去北京漂几年。

老威：故事就这样结尾了？

李明凯：大约半年以后，我爸爸得了胃癌，住进兰州××医院。我变卖了所有的东西，筹到 8 万块钱，赶回去尽孝。我在病床边守了三个多月，一言难尽。

老威：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李明凯：爸爸他活了 56 岁，在这 56 年中，大约只有这 3 个月，才算父子有了真正的精神交流。我们这代人都这样，自我中心，不屑于了解父辈的内心世界，却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艺术家”。

妹妹告诉我，自从出了事，家里就一直提心吊胆，父母更是吃不香，睡不着。他们在天祝那样的穷县，教书育人几十年，除了自己的孩子，什么都奉献给社会了。我考上大学，父母高兴坏了，以为这下子苦出头了，却没想到……

当地观念保守，这种事还不敢张扬，爸爸肯定积忧成病。因为

以前他的身体一向健康，为供我上学，他甚至背着母亲，悄悄去卖过几次血。在老家，由于地薄人穷，四周的农民都卖血成风，但中学教师卖血，就不是啥光彩的事。

老威：我似乎读过有关卖血村的报道，据说从 60 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了一种卖血传统。

李明凯：对，没有其它挣钱法子，不仅农民，连县城里的一些居民也卖。人长到 18 岁没卖过血，在乡下会招人笑话。也许在内地，人们认为卖血养家或供学是多么凄惨，可在天祝县，稀松平常，一星期卖两三次，只要不把人抽得爬不起来，就稀松平常。

老威：一次能得多少钱？

李明凯：抽 400—600 毫升，得 150—200 元，除了给疏通关系的血头百分之十的劳务费，统统归己。另外，卖血当时还能混免费午餐，得一包白糖、奶粉之类的营养品。所以农民觉得划算，甚至下馆子吃酒也付血钱。小时候，爸爸为了激励我发奋苦读，总是说：“没出息，将来就只有卖血糊口。”

孩子能回报父母的，只有“学而优则仕”，我的高考成绩在县上名列前三位，却仕不成，爱上了不中用的观念艺术。幸好挣了几个钱，能够体面地为父送终。

老威：你父亲的医疗费该报销吧？

李明凯：无论啥病，一年至多只能报 5000 元，对于癌症，这只够十几天的费用。父亲只拖了三个月，也算他老人家生前修来的善果。假如拖一年，莫说 8 万元，就是 18 万也不够用。医院太黑了，爸爸整夜呻吟，杜冷丁、吗啡，什么毒品都用了，每次只能管一小会儿。后来，他比划着，拍床，盲目地在半空指指点点。我知道他想回家，他心疼钱，我对他说：“我有的是钱。”他不以为然地摇头，含混不清地说：“用一个少一个。”

老威你看，是我害了爸爸，我不出事，不刺激他，怎么会得绝症呢？爸爸他虽出生苦寒之地，但家族中没有癌症基因。他不抽烟喝酒，更没有不良嗜好，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这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医院一心整钱，明明所有的药都没用了，还一瓶接一瓶往身体里灌。手背扎不进针，就改脚脖子；脚上也倒流了，就直插大腿根的股动脉。爸爸他一次次扑腾，要拔管子，扯氧气面罩，我都抱住他。他给我的遗言就一个字：“忍。”我大声回答：“爸爸，我会忍了，我不会出事了！”就泣不成声。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28 同案犯李齐

采访缘起：我曾在长篇纪实《天劫》之开篇里写道：

“1990年3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反革命案件，案犯均为中国民间颇有影响的先锋派诗人，他们是廖亦武、万夏、刘太亨、李亚伟、巴铁、苟明军和摄像曾磊。而在重庆、成都、涪陵、乐山、南川、北京、深圳、上海、十堰等十余城市，二十多位文化人由此受到株连，被收审、拘留、传讯，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次年11月，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因涉嫌此案，被中方以‘间谍罪’驱逐出境。”

历经长达两年的错案复杂的侦破、审理，除首犯廖亦武外，其他人先后被“教育释放”。而廖因在八九天安门惨案之夜创作并录制配乐诗歌磁带《屠杀》，以及创作、主演、组织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2003年3月2日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同案犯”。我下楼赴约，却见一个红光满面的大胖子走进社区大门，老远就向我张开双臂——此人的确是为《安魂》剧组跑过龙套的前诗人李齐，目前的职业为二渠道书商。

昔日的翩翩少年已荡然无存，嗟叹之余，顺便致歉，因为在《天劫》里竟忘了提到他。“无所谓，”他笑道，接着又谈起若干同案犯的近况。“发小财的居多，但也有意外，例如×××，还住在县城，娶了个吸白粉的老婆，瘾一发，就闹割腕，最终整得家徒四壁，成了你老威的访谈对象；还有×××，十年中死了两任老婆，只得醉死梦生打发日子了。”

“那么你呢？”我问。

41岁的李齐哑了一杯酒的功夫，方恢复常态。

李齐：我们有近10年没有见面了吧？

老威：对，大约 94 年，我刚出狱一两个月，我去重庆找过你。就象做贼似的，我俩站在你家巷尾说了几句话，你就突然塞给我 200 元钱，然后借故匆匆离开。

当时我很沮丧，坐十几个小时火车从成都过来，你居然不请我进屋歇口气，喝口水。

李齐：你的记忆力真好，老威。

老威：这是我几经折腾剩下的本钱。不过我不明白，你们为啥要躲着我？你我好歹还见了，××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李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咋还像个怨妇似的。告诉你老威，我们虽然是同案犯，但谁也不欠谁的。

老威：我没别的意思。

李齐：该知足了，拍一个片子，这么多哥们垫背坐牢，就你一个人当首犯出名。

老威：如果在 10 年前听这话，我准和你打架，你晓得六四血案死了多少人？

李齐：莫唱高调，莫说你背后站着成百上千的冤魂……不要打断我！那是历史，是文学，是该放在永垂不朽的文章里去大书特书的。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这个，而是一桩反革命案的内幕，也许永远不为人知的内幕。你是首犯，走完了整个司法程序，有罪名，有判决，虽说关了四年，但值得呀。六四迟早得翻案，那时你有当英雄的凭据，有为了自己的苦难向国家进行道义和物质索赔的凭据——这个未来多诱人，想想都过瘾！然而我们这些同案，关押了两年、一年、几个月，遭一样的罪，却被“教育释放”，没结果，没凭证，也就没未来。

老威：这不是我能选择的，没人愿意为一两首诗去蹲四年嘛。

李齐：我为啥？

老威：我都莫名其妙。当时拍《安魂》，我从你那儿借了几件“戏装”，还有，你捐献了几百元钱，并陪我们一道去四川外语学院舞厅物色女演员。

李齐：我连正式的剧组成员都算不上，顶多在外围跑龙套，却因此被抄了家，进了收审所，一关大半年，吃尽了苦头。

老威：除了被正式逮捕的6位同伙，我真不晓得还株连了多少人。

李齐：监狱里的情景，你比我更熟，所以就不用多嘴。总之，我被轮番审讯了十几天，还吃过承办人的耳光。我彻底交待，写了一沓有关你的揭发材料。我一心想早点出去，收审所太恶劣，虽是政治犯，不走“手续”，却睡在马桶边，惹了一身虱子。当时，我的孩子刚一岁，老婆正需要人照顾。唉，倒霉的事接二连三，现在理起来，也一团乱麻。

老威：像你这种境遇的，多如牛毛，我身边好几个，都因为领呼口号，鼓动学生上街等等进去“受教育”。按警察的说法，书呆子血热，降降温。川师教授高尔泰叛逃，他的学生也受株连，关押数月，放出来连工作都找不到。我估计，因六四进局子接受短期审查的，在全国有几十万。

李齐：本来在人的一生中，有点这种体验不算坏事，可我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老威：听说晓晓和你离婚了？

李齐：90年10月25号我出狱，已秋凉了，之前，我曾托人带信给她，并通知了几个好友，准备聚一聚。我想，虽然自己不是什么英雄，但至少没做亏心事，应该因受难赢得大家的尊重。我记得当警察打开铁栅门，喊“李齐，收拾东西”时，我的腿都抽筋了，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是笑。我连说：“不要了，啥都不要了！”出大门爬了一个坡，就来到大街，太阳明晃晃的，汽车穿梭一样，弄得人头晕眼花。过街时我像个大山来的傻农民，一溜小跑，到了对街，还站着喘了半天气。我找了个公用电话打到晓晓的百货公司，让她回家等我，她居然说：“我还在上班。”我生气的命令说：“请假，马上回家。”她迟疑了几秒钟才说：“好嘛。”我没有意识到有啥不对，晓晓很温柔，结婚三四年，家里都是我作主。

我挥手打的，可好几辆出租车都一踩油门过去了。终于拦住一

辆，拉开副驾门，司机却让我坐到后面去。此时才醒悟自己青面獠牙，还刮了个大秃瓢，标准吃牢饭的。

拢家，进屋拿车钱，狗日的司机还跟到我。付帐关门后，晓晓抱着孩子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我走过去，想弯腰亲亲她的脸，她却站起身，指着旁边的换洗衣服吩咐：“你先洗澡吧。”

我木偶一般进了卫生间，在牢里温习过若干遍的久别重逢的激动场景顿时化做泡影。不过，几个月没洗热水澡，泡一泡，搓一搓，我的挫折感就缓解了。我以为晓晓在赌气，丈夫这么久没在家，她带孩子太难了。

晚饭没吃出啥滋味，我的眼睛隔着饭桌，贼溜溜地盯着她不放。我太想抱她了！太想亲热了！一个久憋的囚犯最大的渴望就是彻夜搂着老婆，不停地性交，不停地诉说衷肠，可是晓晓始终平静，不起一丝波澜。每当我妄图越轨，她就把孩子挡在胸前，像圣女贞德不放下自己的盾牌。

老威：我记得原来孩子是在你岳父母家。

李齐：我教书，她上班，没空带孩子。80年代工资偏低，也请不起保姆，所以孩子断奶后，就让他外婆带。后来我晓得，她是故意把孩子领回来对付我的。当夜深人静，她没有理由再磨蹭时，就只好上床了。孩子已睡熟了，我低声说：“把兵兵弄回小床去吧。”她却回答不，并把孩子放在两个大人中间。

我几乎就趴下来哀求了，她依然回答不。熄灯躺倒，孩子在腋下，犹如一道战壕，隔开了硝烟四起的肉体 and 灵魂。我一次次伸手，摸她的头发，挽她的脖子，她却躲躲闪闪，并说：“莫惊动兵兵。”终于，我忍不住起身，越过“战壕”，压住她。两人无声地搏斗，从床上滚到地下，孩子惊醒了，大哭着要妈妈，她却在我的身体下一再叫唤：“兵兵莫哭，乖儿，莫哭嘛。”

我欲火攻心，啥也不顾了，我扯开她的衣裤强行顶入，她起不来，就掐我，骂我流氓，她还哭了。他妈的，床上床下，孩子闹大人哭，败兴透了。我真没料到重逢就像地狱，充满罪孽。草草完事，我就扎扎实实煽了自己两大嘴巴，吼道：“我有啥子错？有啥错？！”

晓晓说：“你没错，是我和孩子错了，我们拖累你，让你干不成大事。”

我解释说：“我也不想坐牢，不想离开你们嘛。”

晓晓说：“我已经受够你们这些诗人了！我庸俗，我市侩，我见钱眼开，我想过平静的日子。你如果看不惯，就马上走。”

我说我死也不走。我赌咒发誓，这辈子追求的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还日了你老威的祖宗八代。天亮时，我见她情绪缓和下来，就趁机求欢。这次晓晓没挣扎，而是如一块木头，任我搬来搬去。刚完事，她就立即推开我清洗去了。我太傻了，还跟前跟后陪笑脸，惹得她转过头说：“一点感觉都没有，你真可怜啊，李齐。”

老威：她在故意刺伤你，唉，晓晓咋会变成这样！

李齐：都跟你有关系。还记得六四以后我俩的通信吧？

老威：不太记得了。

李齐：你受了刺激，简直疯了，不仅把《大屠杀》的磁带拿到我家放，而且在信里骂共党，号称要用世界上最高最粗的烟囱去操邓××的屁眼儿。你还说要逃跑，宁愿抹一把锅灰充黑奴，被卖到非洲砍甘蔗；也不做耻辱的中国人——后来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包括你用整页信纸画的一根冲天大鸡巴都到了警察手里。

我栽进去没话说，可晓晓也受到牵连，蹲了十来天牢房，几乎每天都接受审问。你想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人，读大学，受文学熏陶，嫁我后，几乎天天写爱情日记，但一夜之间，梦全毁了。关进女号房周围都是妓女、贼、皮条婆和吸白粉的，折磨起新犯来，比男人更不择手段。什么火烤阴道，筷子夹乳头等等，把个晓晓吓得整日以泪洗面，差点成了精神病。

经历这一劫，她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她恨我，更恨你这祸根。女人这种动物真是难以捉摸，她居然动了改造我的念头。首先，她把我过去当诗人穿的奇装异服统统搜出来，处理掉，然后领着我去百货公司买西装、领带加皮鞋，如此从上到下装扮起来，我浑身不自在。说实话，打出娘肚子，我就没有这么光鲜过。更无法忍耐的，是她把一顶打了蜡的假发扣在我的光头上，骇得我虚汗直淌，却不

敢摘下来，只好皱眉毛。晓晓却极为认真地拉我到穿衣镜前，端详半晌，满意地笑着说：“这才有个正常人样。”

老威：你太惨了，李齐。

李齐：当时没觉得惨，因为我欠晓晓的。接着，我就一身虚假去学校，方知被除名了。教书饭碗砸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去街道派出所查找户口，兼办临时《身份证》。户籍警向我当众宣布政策：每月来派出所报道一次，汇报思想动态。

老威：凭啥？你又不是罪犯。

李齐：我认了。这就是六四后的社会环境，没鲜花，没掌声，没游行和口号。眨眼间风向转了，人们把一切忘得干净。晓晓约我回娘家，亲戚们都来了，岳母弄了一桌子酒菜，大家就在饭桌上开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帮助我，什么：“李齐，你已是30岁的人了，汲取教训，好好过日子吧。”什么：“你老婆多不容易，自己受委屈，还拉扯着孩子等你回来，换一个势利的女人，早趁机攀高枝了。”还有什么：“读书人聪明，肯定能发，咱们为未来的富翁李齐干一杯！”

我一个劲地灌酒，终于趴下来。大伙把我扶回床上，朦胧中还听谁在说：“翻过这坎，轻装上阵，把你写诗的机灵用在挣钱上嘛。”

老威：这倒言中了，你现在算成功的书商。

李齐：逼良为娼嘛。

老威：80年代文学，90年代商业，这也是大势所趋。

李齐：对，六四一开枪，惊醒了众多梦中人，这国爱不起，思想和文学也爱不起，只有钱能够超越祖国、阶层和文学，可以尽情地爱。

老威：听你的口气，还有点愤世嫉俗。

李齐：谁都不是生来就充满铜臭。开始，我找不到工作，九一、二年，人们观念没有这么开放，一听说有动乱背景，就不敢要。我费尽口舌，解释“冤情”，人家就说除非公安机关出介绍信。重庆这地方，有地下党的传统，人们喝酒时，你一杯，我一杯显得耿直，

但真要把酒话落实到行动上，就谨小慎微了。这样磋磨了大半年，晓晓建议写东西赚钱，因为我过去写诗投稿，有些老关系旧名声。于是我分别给全国各地二、三十家报刊去信联络，结果许多当年的编辑还没挪窝，其中一些还混成了副主编、主任什么的。

昏天黑地的写手生涯就这样拉开序幕，我化了七、八个笔名，利用过去写诗训练出来的文学功底，写各种文章。起先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字斟句酌，并限定在文化范围内，例如抒情散文、思想随笔、书评、短篇小说等等。一个月顶破天写两三篇，万把字，还吃力不讨好，屡遭退稿。晓晓提意见说，你别老盯着纯文学刊物，那是赔本买卖，你呕心沥血，一千字才三十元，这样下去，孩子没长大，你就累死在阵地上。我说自己就这本事。晓晓说，你编时尚故事嘛，给滥杂志写嘛，时装、化妆、男欢女爱、撕心裂肺一齐上，只要给钱。我说这活儿干不了。晓晓不愧我的启蒙老师，当晚她就一口气创作了三篇一两千字的化妆文字，什么“我为什么不担心岁月流逝？”“对付皱纹的12条秘诀”“香水与情绪的调动”之类，令我惊叹不已。按如此一日三篇的造文神速，干三年我不就大发了？

但是，这种粗制滥造的激情只持续了几个月，我就受不了了。进帐倒快，因为滥杂志比纯文学稿费高两到三倍，我一个月能挣七、八千。93年的七、八千相当于现在的一两万了。

老威：那你的小日子应过得相当不错了。

李齐：晓晓也对我改变了态度，并且一再强调，我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我读了那么多书，完全可以把书中的内容改头换面，再加些时尚的佐料；并且还该把一稿三投弄成一稿十投、二十投。记得92年底邮局征订杂志时，她就专门跑一趟，把征订目录买回家，划了一夜的勾。

老威：你就按即定方针办吧，据说武汉的《知音》和广州的《家庭医生》都是千字千元。

李齐：我不是机器，我他妈烦了。那时，我和你一样，内心还残存着一些精神的东西。我追求了多年的纯文学，读了数不清的名

著，还为梵高和高更的艺术经历流过泪。我晓得什么是垃圾，我一下笔就是垃圾，我已表达不了我自己。

老威：你别逗了。

李齐：你居然不相信？

老威：我不相信，你现在也没回头是岸嘛。就像××，多优秀的诗人，而今已做了近十年的写手，在成都买房定居，封妻荫子了。人家把码字叫做劳动，很坦然。

李齐：我不是××，一手造垃圾一手写诗。我试图逃避，就同晓晓商量换环境，把孩子丢给岳母，一起到成都打天下。因为成都在80年代被称作“现代诗的延安”，有几代著名文人，积淀比重庆深厚。我们在磨子桥一带租房，一打听，方知这延安也不是圣地，诗人们百分之百下海了。办公司、开夜总会、做书、行骗，可谓各显神通。晓晓很快就在《商情咨询》找到工作，干得春风得意。这是一份由第三代诗人任主编和副主编的半月刊，内容除了各类时尚就是信息和广告，其编辑部就设在同样由第三代诗人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大音棚夜总会里。这是本市最早的大型娱乐场所之一，以鸡多客少而臭名远扬。

老威：晓晓在里面你能放心么？

李齐：从90年10月出狱算起，她已支配了我三年多，这次她编刊物，第一约稿对象自然是我。至于放不放心，提都别提，免得惹翻河东狮子。

老威：又为老婆打工了？

李齐：我已烦了。经常一个人出去喝闷酒，并且骗晓晓说，要调整心态，挣更大的钱。她追问咋挣？我随口就敷衍：“弄电视剧。”我记得她笑咪咪地出门前，还夸我跟得上潮流。

我歇笔彷徨了一个冬天，睡懒觉，读文学名著，渐渐，有了创作的冲动。

我开始写我坐牢的经历，因为出来这么久，我还是不踏实，连做梦都在号子里。老威，我虽然不是主要被告，但内心的刀痕比你

们深。你们是注定要入文学史，至少是诗歌史，将来提到六四的文学，《屠杀》《安魂》是绕不过去的。可我，大半年的牢白坐了，自己不写，就没人注意了。

老威：这是历史恐慌感吧。

李齐：历史就是湮灭大多数，留下几个人，但人人都有折腾的权利。弄一本书留下来，给儿孙看，说不定将来一畅销，我就成为历史中的一段不可缺少的插曲了。

老威：向上之心可贵啊。

李齐：我觉得自己挺悲壮的，都啥年月了，还像耗子一样躲在地洞里描述监狱，为六四鸣冤叫屈。

老威：我在你的书中是啥货色呢？

李齐：一个裤裆燃火的疯子，把鸡巴当作机关枪无目标地乱射。审讯时，承办人把你描绘成老谋深算的反革命，认为你有多高的组织领导才能，我都听得傻了。你有领导才能？那我就可以当部长了。

老威：这么丑化我，倒值得本人认真学习。

李齐：你学习不成了，稿子已经毁了。

老威：可惜可惜。

李齐：我写了一个半月，近六万字，晓晓都没察觉。她早出晚归，一副职业白领的派头；而我蜷在家中，洗衣、拖地、做饭，成了标准的家庭妇女。她偶尔也问电视剧弄得如何，我都答正在编个多集的。她说能不能让她看一下，鉴定有没有卖相；我说弄完了再看。她见我神神鬼鬼，就指着电视中正在热播的王朔的连续剧（好像是《过把瘾》）说，如果哪一天你成为王朔第二，我就呆在别墅里当李太太。

坐过牢的人处事小心，那一段时间我每天 11 点起床，随便吃点东西就开写，直到下午 4 点半钟，才收拾稿纸，锁进抽屉里，接着做家务。也活该出事，那天我居然忘取抽屉钥匙，就下楼买菜了。碰巧晓晓提前下班，进屋环视一周，就直扑书桌。她大约怀着发现新大陆的激动打开抽屉——我的违禁文学立即被家庭警察查获。记

得我提着一刀猪肉和各类蔬菜进屋时，稿纸已满天飞舞，落了一地。“这就是你的电视剧？！”她歇斯底里地大叫，震耳欲聋，充满金属质感。“你这个骗子，害我还害得不够？”

她像个小女孩，一屁股坐在那些乱纸中，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一声声拖得极长。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悲惨这么绝望的哭声！我六神无主，像个罪犯一般跪下去，求她宽恕；她却推开我，随手抓起一页“罪证”揩眼泪和鼻涕。她反反复复地念叨：“晓不晓得，警察要上门了，要上门抓你了，晓不晓得？”

一闹就是深夜，晓晓站起来，到梳妆台前擦脸补妆，然后要提包出门。我急忙抱住她，无论怎么打怎么踢都不松手。她说：“我们离婚！”我回答不离。她说：“我怕你了，李齐。”我一咬牙说：“烧了！”其实内心想的是：“我藏起来不行么？我挖个洞把稿子埋了不行么？”

老威：你真烧？

李齐：真烧。晓晓守在卫生间，盯住我一页一页地点，然后把黑灰搅进抽水马桶冲走。一百多页啊，我两眼血红，面部肌肉在抽搐，但是我爱晓晓，这个暴君。我这辈子真的完了。接下来的许多天，我心如死灰。晓晓不跟我说话，只是把一个个时尚题目扔给我，限时完成；而我满脑子都是销毁的原稿，飞扬的纸灰像癌细胞一样沾满我的脑髓，所以写不了别的。晓晓说：“你要自食其力。”我点头。她说：“点头顶个屁用，你得劳动。”

老威：这日子怎么过？

李齐：不晓得。

老威：还记得《王子复仇记》里的著名台词么？

李齐：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老威：离婚，还是不离，这是……

李齐：不用思考，我不离。

老威：活得像条狗。

李齐：别那么斩钉截铁，你没爱上过谁么？你不明白一旦爱上

一个人，所谓脸面、自尊、理想都狗屁不值么？

老威：这不是一码事，既然相爱，你就应该给晓晓解释清楚：第一，绝不拿出去传播或发表；第二，只是对那段经历的回忆、记录；第三，六四是抹不去的，会有许多人在私下干同样的文字活；第四，仅仅写作不会有麻烦，因为不构成犯罪。其实在互联网上，现在有关六四的文章已多如牛毛，其中最突出的，当数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搜集的死难者家属及目击者的证词。

李齐：93年还没有互联网，我也不懂电脑。况且，女人横起来，就不听任何解释。糟糕的是，我明明知道她已变了，俗了，我还爱她，我对她的欲望日益强烈。

老威：受虐癖。

李齐：我有受虐的资格倒还好了，整整一个月，我们没有一次性生活。我像一头狮子在房里乱转，巴不得她找我岔子，抽我一顿。有个下半夜，我又憋醒了，就忍不住把手伸进她的被窝……可晓晓突然拳起一只腿，顶住我下身……两人终于撕打着翻下床，我扯烂了她的衣裤，强行……

老威：够了。

李齐：是够了，完事后，彻底无话可说了。接着分居两个月，协议离婚，财产和孩子都归她，我按月付抚养费。就这样，我光棍一条，分文不名地流落到江湖上。

老威：你现在还爱她吗？

李齐：感情是有极限的，翻过这极限，世界就变了。

老威：你是变了。

李齐：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十八般武艺无所不精。我给书商写了一年多，赚足两万块，就自己试当书商，很快亏光了本钱。接下来就借钱，连我妈的养老金也连骗带借，老人家一悔悟，竟追出门来，在大街上找我一下午，幸好没出车祸。

我第一本赚钱的书是关于印度粤修的，发了七、八万，那钞票来得猛，淹死人啦！此书号是著名老诗人××帮我搞的，他是我的

恩师，从 50 年代到而今，出了几十本诗集，因此同出版社形同鱼水。那天他打电话约我晚饭后去他家洽谈，不料我一进门就是乌烟瘴气下的两桌麻将。××头不抬，眼皮不翻，只随口问声：“来啦？”又继续搓他的牌。我站在一旁，端茶倒水陪着笑脸，直到长夜将尽，东方既白。

××伸个懒腰，与麻客们一一道别，剩我一人在客厅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得硬着头皮拽住欲进卧室的××，道明“正事”。

××不耐烦了：“再说嘛，下午给我打电话。”

我一身酸痛地回家，心里把×的十八代先人日了个遍。可出乎意料，书号顺利到手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老威：你现在钱也挣够了，还有写回忆录的打算么？

李齐：我感到离那种东西越来越远，就像一个孩子，把心爱的玩具丢在水里，漂走了，再也捞不回来了，但这个孩子依旧站在岸上，或沿着岸边跑着，追着。当然，我不会如小孩说哭就哭，但灵魂的痛，摸不着的无处不在的恐惧带来的痛，依然是坐牢和离婚。今天对你说出来，也算一种缓解或释放，因为二渠道没人相信这个。

老威：二渠道书商嘛，就是你欠我的，我欠他的。

李齐：等以后我谁也不欠的时候，我再隐居，学习写字。目前呢，我除了数钱啥都不会——这大约也是前妻晓晓最愿意看到的吧。

29 色情狂梁寒

采访缘起：梁寒看上去一点不病态，说他是“色情狂”，是针对他曾经干过的几件荒唐事。“这个世道，有几个人没干过荒唐事？”他狡辩说，“只是有的被发现了，付出了代价，而有的至今埋在我们的生活中，像定时炸弹。”

这篇采访做得相当艰难，从文字的滞塞上，读者也许能感受出来。我与梁寒最后一次聊天是 96 年 7 月 29 日，气候恶热。其时他从劳改释放已两年有余，铁胆功练到了一定火候。

梁寒：这是我们第八次见面，真有耐心。

老威：我喜欢故事，这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梁寒：你从小就有窥阴癖吧？

老威：窥阴和窥阳有啥不一样？现在是开放时代，裤裆里的那点货已经不叫隐私。

梁寒：你的脸比城墙倒拐还厚。

老威：脸皮不能与你打交道？这年头，色情是大众，至少是部分较年轻的大众的追求，要不，三级黄碟通街泛滥，政府拉网清剿了几十上百回，也断不了根。如果在西方，这也叫问题？也值得你我一次又一次津津乐道？隐私的内涵变了，贪污啦，走私军火啦，政治丑面啦，逃税啦？出身不详啦，变态啦，或许能成为“隐私”，那么，窥阴在当代早进入传媒休。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代表作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主人托马斯不到 50 岁，就同 200 多个女人做过爱，没有谁觉得这家伙不道德。而我国活了 130 多岁的古代药王孙思邈，在书中指出自己的长寿之道就是经常与上女性交，“采阴补阳”。你呢，长期滥交，快 40 了。还这么精神抖擞，有啥性生活秘诀？

梁寒：听口气，你也是个老淫棍。

老威：意淫罢了。

梁寒：我没啥书本知识，就是长年累月练铁胆功。

老威：啥叫铁胆功？

梁寒：俗称卵蛋操，就是在每天睡觉和起床前，左右手各搓捏卵袋三百回合。手法类似武林高手玩健身钢球。刚练时，不能急于求成，缓缓地旋转，手劲不宜太大，否则会引起发炎，阴囊疼痛，严重时小便都困难。这是磨铁棒的功夫，练一两年，四五年都有可能。依我现在的状况，用最大的手劲搓，捏下身也没知觉，躺在床上，做功时仔细聆听，真能感觉两颗卵蛋在嗡嗡摩擦，如钢似铁。

老威：这功夫在哪儿学的？

梁寒：在监狱里。我刚蹲班房时，骨瘦如柴，一身灾病，完全一副掏空了的花痴空壳。有一个中医，50多岁，仍然细皮嫩肉。他一见我，就用娘娘腔开玩笑：“嗨，到监狱治病来了！”我一下懵了，因为当时我完全万念俱灰，觉得这辈子能活着出去就算老天有眼了。

这位中医就是我的卵蛋操师傅。据他讲，人身上所有的毛病都源于胃，所谓病从口入，一个花天酒地的人，监狱就是他的疗养院，因为这儿是特殊兵营。食物简单，起居都服从命令，叫你站你不敢坐，叫往东你得朝西，长此以往，曾经被撑坏的胃就恢复了正常的功与人动物一样，应该时常保持一种饥饿感，一种生理性的警觉。接下来才是性，所谓食色性也，讲的就是胃和肾的关系。肾气充盈，则心明眼亮。所以好色之人，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想主义者。像我的师傅，一把岁数，依然全神贯注地把许多时间花在对付下身上，他的手法不像我这么单一、死拔，他搓、捏、拍、掐、提、拽、抹、顶，搞得血胸喷张。可以说，小小一被窝，就是他的袖里乾坤，他不玩个尽兴不罢休。

老威：什么铁胆功？手淫嘛。

梁寒：差不多，但不能射，一射，就前功尽弃。

老威：那关键是火候，手淫与练功就相差那么一点点。

梁寒：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论，成王改冠都相差那么一点点。有一次，我搞得手忙脚乱，师傅见不行了，就拉开被窝，示范给我

看。不料一柱香亮的手电光当头直下，罩定那玩意。原来是哨兵，他大喝一声：“站起来！”？

我与师傅都提着内裤站在炕上。哨兵训斥说：“你们竟敢在号子里耍流氓，违反临规！”我刚咕哝了一句：“自己的东西，摸两把也犯法？”就被师傅暗捏一把。是啊，没法解释，中国传说中医学太博大精深了，一万张嘴也对小小哨兵说不清，只好甘心接受处罚吧。

老威：你为啥坐的牢？

梁寒：这个嘛，嘿嘿。

老威：看你这骚劲，肯定与女人有关。

梁寒：我学的是儿科，长期耳濡目染，对带小屁娃的少妇有深厚的感情，勾搭成奸的事时有发生，双方的身心都舒服了，也捅不了啥漏子。这样越搞越胆大，终于被院长夫人察觉了。这位尊夫人短发、高个、浓眉大眼，35岁，正处于精明强悍的欲望巅峰。有一回，我与她同值夜班，她房都不查，一门心思，粘住我讲黄色笑话，出于对院长的敬畏，我一再回避，拒不接到了下半夜，这母老虎支开护士，要我吹口琴，来点情调。我板着脸说：“医院不是音乐厅。”母老虎却说：“你是啥人我还不清楚？”我心里一凉，暗叫“糟糕”。她却等不及了，竟绕过桌子，大踏步过来将我拦腰抱起就亲。我双腿悬空，乱蹬了两下，就被那对滚滚汤的大奶子给憋熟了。没办法，只好让她把我抱到里屋，在刮胎的手术台上草草日了一回。

老威：你这么无辜？

梁寒：我他妈的对天发誓！我比你矮半个脑袋，又是她男人的下级，从生理与心理，我都丧失了制控权。这婆娘干劲十足，把我抱着，居然还能腾出一只解我的裤带，抱我的鸡鸡。我还没回过神，就已叉腿倒在手术台上，滑稽地做流产的姿势。我忙起身，直叫“弄反了”，她却来了个泰山压顶式的倒插，轰轰轰，一顿电闪雷鸣。

此后我有一种丧权辱国的感觉，就千方百计躲她，有院长在，她也不敢过分张狂。我还是个30来岁的未婚小伙子，顶多儿女情

长的小打小闹，像《红楼梦》里唱的“银样蜡枪头”，哪见过如此横刀立马的巾帼英雄？虽不至于魂飞魄散，但也被吓得产生了尽快成家立业的想法。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我还没来得及浪子回头，有一个深夜，却在楼道里和冤家狭路相逢。当时我与女朋友看了场日本电影，又挺纯情地将人家送拢家门，吻别，然后再一个人返回。不料刚上了三层楼，喘吁吁的黑影子从背后袭来，我动弹不得，可马上意识到咋回事，我嚷叫：“干啥干啥，都是知识分子！这是干啥！”

“干啥？”她浑身都在大起大落，“梁医生，没多少机会了！”

我说：“我下个星期就结婚！”

她一咬牙，把我抱进门说：“所以逮你一回算一回。”

说时迟，那时快，好疯的婆娘，进门就把防盗门反锁，冲过来三下五除二，把我的衣裳裤子全刚了。我按住内裤不让动，她一爪就撕成两片。我的绝望化作了愤怒，就拳脚相加，冲她一顿暴打，她不还手，裸体被捧得青一块、紫一块还笑。我更被激得跳脚，疯牛一般朝厨房冲，想去抓菜刀砍人。她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抓住我的两胳膊，足足有半个钟头，才开口问：“平静了没有？”

我说：“你这么蛮干，我咋可能与你发生性关系？”

她说：“那我温柔一点。”

我说：“再温柔也没感觉。”

她说：“你我都是学医的，要互相理解。”

我说：“你在自己家里关押野男人，就不怕丈夫和儿子突然回家？”

她说：“院长出差开会，要耽搁一个多星期，儿子我已送去住读了。”

我说：“你已经骚得丧心病狂了！”

她说：“随你咋个骂，我爱，我无怨无悔。”

我说：“你这是犯法。”

她说：“你也晓得法？你乱搞的有夫之妇还少么？你娃算盘太

精了，只准男人有要求，就不准女人有想法？”

我说：“我喊人了。”

她说：“你喊！你敢喊一声，老娘就敢喊十声！你夜半三更闯进来，你这强奸犯。”

我说：“你才是强奸犯！”

她说：“哪个相信？”

我一下子垮了，叹气说：“是没人相信。我这是虎落平阳遭犬欺。”

她闪着大奶子过来美美地亲了一个嘴说：“好，好，我是狗，是母狗，那你就拿出虎威来，欺一欺我这条狗。我把灯光弄暗点，放点音乐，我们不忙上床，你放松点，以平常心仔细看一看，嗅一嗅，我这模特身材，虽然生过孩子，可腰一点没粗，臀部也不松垮，这儿的毛一绺一绺的，我一想你，它们就湿了，摸嘛。”

我说：“既然你这么自恋，完全可以找与你与般配的性伙伴嘛。”

她说：“你的确其貌不扬，但有情调，有知识，特别是那个长得好，比我们家院长的要大很多。”

我这人有个致命弱点，怕别人夸我私处，恨归恨，东西却不争气地上弹。只好搂着见缝插针。有了一，自然有二，接着就是一泄千里。直到第二天中午才从噩梦中醒来，慌慌张张地找东西穿，却啥都寻不见，原来，那骚货把我的衣裤统统藏了。

深秋天气，我抱着光膀子，起不了床。除了洗澡，她不让下地，饭菜都是她端上床。我吃不惯这北方大姐弄的狗食，就自己披毯子下厨。唉，人间地狱呵，整整三天三夜！我与她都光头屁股，在三间房里出入。她想要就要，从不管我的情况，以至于形成了条件反射，一上床，就要阳痿，离床，鸡鸡往往出乎意料地弹起。有一次炒菜，差点戳翻油锅。而她一门心思围着我这儿转，一见动静，马上扑过来催火，一场战争下来，我就云里雾里，站不稳了。最后一次，我感到油快熬干了，就趴在她身上，昏昏欲睡。她掐一把，我才双手攀住床档，向前耸一下。这样耗了一个半小时，她的奶子已

磨得朝两边分散，皮肤粘在一块，隔一阵，吱地撕开。她在下面问：“还不射？”我说：“除了血尿，我啥也射不出了。”

我终于赎回衣裤，拖着通体鳞伤，上到六楼。开了锁，倒头便睡。再也不想醒了，可非醒不可，有护士敲门催上班了，还告诉我，国庆节期间，我的女朋友上医院找了好多次，并且声称，再不见我，就要去公安局报案。

院长夫人悄悄送来很多补品，我统统扔了。我晓得，此类雌虎是难以满足的，除非我离开医院。这种失去自由的沮丧心态，再加上女朋友突然之间提出分手，使我变得歹毒起来。这一次，是我主动勾引那骚货，并在水杯里下了药。她被麻翻手，我就把一两花椒全倒入她的阴道，麻就麻个够！然后，把那惹祸的臭水沟用手术线密密缝了。扬眉吐气，伸了个自由的懒腰，然后万念俱灰。投案自首吧，没办法，这是命。

老威：你咋能干这种事？

梁寒：你说该咋办？

老威：告她性虐待。

梁寒：证据呢？

老威：这个，当然没法取证。也好，坐牢对你或许是种解脱。

梁寒：我判了8年，坐了7年，97年回归社会，这世道可比当初要乱多了。我走在街上，亮晃晃地一片茫然。汽车横冲直撞，我兔子一般逃窜着过街。唉，没多久，我母亲就死于车祸，接着，是暗恋着我的一个表妹。我一下子懵了，感到人生失去了支撑。坐过牢的人都清楚，今生今世，惟有母爱最靠得住。当你在牢里呆上许多年，妻子离了，儿女散了，同辈人将你彻底遗忘了，能记住你，坚持到狱中来探望你的，就剩下白发苍苍的母亲。

老威：太可惜了，你还没来得及报答她。

梁寒：我亵渎了她的亡灵，我在守灵时沾了女人。

老威：我不明白。

梁寒：我对自己也不明白。我呆坐在灵棚里，其它人都要打麻

将，昏天黑地的。于是我一个人走出棚，在大街上荡。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我感到一种空虚，没有一种东西能够抓得住，这房子，这汽车，这些醉生梦死的人，都会在某一天，说没有就没有。没办法，真的，我路过一家发廊，两点多钟，没有一个理发的顾客，可里面还是生意兴隆。小姐迫不及待拉我进去，问我按不按摩？我笑起来，这一笑，小姐啥都懂了。在里间的按摩椅上，小姐拽下内裤，拉起裙子坐上来，牵出我的家伙，在她的洞门若即若离地擦，然后侃价。我随口就出 50，这是通价，这种档次的发廊，定价基本上是工薪阶层，几个月几百元工资，可以消费两三次。成都是全中国娱乐配套设施最完善的城市，高、中、低阶层都能找到自己堕落的好去处，在发廊之上，是夜总会，商人、黑社会、腐败官员与各种掮客、部分白领，都喜欢在这儿出没，勾兑一位小姐，得上千，有时好几千，而在发廊之下，有城乡接合地区的小 OK 厅，等而下之的，还有面向打工仔的暗娼，以擦皮鞋作掩护，做皮肉生意，一般二、三千元即可成交。

小姐见我是老油子，就说自己长得好，性感，所以 50 元太贱。接着就哥哥、心肝的乱叫，我一反常态地充阔佬，价格一路飙升。那一夜，我一次又一次干那小姐，小姐受不了，想跑，我倒拖着她的双腿骑上去，冲锋陷阵，干得她满屋子乱爬。最后，我突然觉得心酸，就搂住小姐哭起来，我说我怕死，我想整个变成根鸡巴，藏进你的身体不出来。她也哭了，说你这种客人多遇几个，这条小命就没有了。表面上，你给钱大方，其实一个人起码抵五个人。我怀疑你是藏民，我的身体亏大了。我说我有钱，都给你，我还想在你的奶子下面躲个几天几夜，我怕死。小姐一听，吓得发抖，说先生你是不是黑社会派来收摊子的？你既是床上杀手，就要讲江湖道义，冤有头，债有主，老板娘下个星期一回来，你要日，就去日她。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姐说，那我混不下去，只有回乡下种地。

老威：你这样乱搞，早晚还得回到牢里去。

梁寒：里面比外面环境还干净些。人一入狱判刑，反而踏实了，环境改变不了，你不捱也得捱。劳动强度大，至于饭食，就是劣质的米面，南瓜和土豆，是主要的下饭菜，乱刀一顿剁，赶上锅煮烂，

丢把盐，泼两勺浮油，我们一样吃得香喷喷的。在牢里肉吃得少，性欲也就一般，营养跟不上，就用睡眠补充。我的鸡蛋操师傅说了，胃是人的大脑，一饱一饿，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从牢里出来，首先想的是满足人的胃，然后是色，然后是胡思乱想。比如一个环保主义者，就会紧锁双眉指出：我们喝茶的环境太肮脏，脚下一条臭水沟，说不定茶水也与臭水沟有关，而在十年，或十五年前，这条沟是小河，有孩子在河中摸鱼捉虾。无处不在的污染，空气、水、土地，甚至我们的每一寸肠子，火葬时，我暗暗担心母亲在天堂找不到干净的地方安息。

我自私、我脏，我在妈妈的守灵之夜乱搞。这是个开头，我只有一路逃跑下去，直到有一天被死亡捉住，我的下身还在前倾。

老威：你结过婚么？

梁寒：没有。

老威：你的消耗一定大吧？经济来源呢？

梁寒：我开了个小诊所。

老威：又他妈重操旧业？

梁寒：我原则是不搞病员，我这种小诊所，成都每条街都有。烂馆子、发廊、诊所，这是每条街不可或缺的配套服务，酒足饭饱，到发廊按摩，枪按走火了，就到诊所打“淋必治”或“疣克星”。

老威：你算是以性养性吧？

梁寒：这话说得没档次。

老威：你的档次有多高？

梁寒：虚无，虚无使人疯狂。为了赎罪，明年我准备到西藏朝拜，为妈妈的亡灵转经超度，然后，找一个藏族姑娘睡觉，在世界屋脊上彻底累垮自己。据说，在藏传佛教里，这也是一种超度。生生不息的欲望与繁衍。在高潮时，我一定放血，喷地一下。这种冲动，每次交配都有，但我担心压力不够，血喷不远。

30 老知青廖大矛

采访缘起：1998年11月3日，天气晴朗，我在四川成都北巷子24号“亦龙牙科诊所”采访了个体牙科医廖亦龙先生。他当了几年知青却没有“青春无悔”的悲壮情结，正好投合了我的某种平常的还原历史的想法。

廖亦龙现年45岁，90年代初去深圳不久，即由内地名医转为特区名医。他曾用名廖隆隆、廖亦农、廖亦龙、廖奕龙，从姓名的变化中可以牵连出一系列的时代迹迁。不过，他叫得最久的还是“廖大矛”，这是乳名，从出生到现在到将来都会有人叫。

廖大矛从母姓，这是因为父亲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而母亲是城市贫民出身。他虽然没从这种改名换姓的投机取巧中沾多少光，但在那个年代，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也很需要。

老威：你能讲讲你下乡的经历么？

廖大矛：这个题目太大了，不知从何讲起。你晓得我下了12年乡，从1966年到1978年。开始是与一伙干部、知识分子子弟一道，在原五七干校的原址上，组建知识青年垦殖农场，到68年底，上山下乡在领袖的号召下，形成大规模的运动，农场就解散了，我们重新单独插队，我被扔到盐亭、剑阁、南部三县交界的一个地方，离公社所在地石牛还有20多里地。

老威：你参加过红卫兵吗？

廖大矛：参加过，还串连到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我是在垦殖农场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叫“大有作为战斗兵团”。我是高小毕业就因为家庭背景不好被迫下乡的，如果赖在城里，我肯定没资格参加文革。

老威：限于时间，我们这个访谈不是你整个人生经历，那得用厚厚的三大卷来描述。从某种程度说，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个人史，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社会背景的产物。所以，希望你绕开一

些时尚话题，说一些特别个性化的段子。要不，就没多大意思，你已经看到了，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30 周年，各报各刊都炒作了好多特没意思的东西。

廖大矛：就依你吧。我是牙科医生，靠技术而不是靠那段经历吃饭，今天我们就随便聊聊，谈些不太入流可又记忆很深的事。

老威：正合我意。

廖大矛：刚才我说了，我落户的地方极其偏僻，生产队长在一座破庙中间砌了墙，一半我住，另一半是保管室。我一点也没感受到贫下中农的温暖，只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就成天睡懒觉。开始，队里的领导还做做面子，招呼几顿伙食，后来就不管我了，连出不出工也不过问，仿佛老天降了个瘟神下来，他们能避就避，能忘就忘。“广阔天地”，毛主席说得一点不错，这穷山沟再来一百万知青也填不满，至于能不能“大有作为”就不一定了。我睡了一个月的懒觉就软得受不了，爬起来练二胡，“扬鞭催马送公粮”，你说巧不巧，对面山腰上，也有一个知青在练二胡，像我的影子。我们隔着一道深沟喊话，他是射洪知青，叫谢红宝，19岁，我17岁。我们隔着两县交界的大沟，绿林好汉一般互相拱手，联袂共奏一曲《赛马》。那舞台可够大的，奏完《赛马》，双方的盛情也升温了，他喊我去串队，我马上行动。这下不打紧，我得下坡、绕过沟底的大水库，再喘吁吁地爬坡。一眼能望穿的距离，却要半天功夫才能过去，耍不了一会儿，又得花半天功夫回来，所以临走时，我提议每天都带上干粮下水库游泳。我们游了一个夏天的泳，水库下面有稻田，我们还捉了不少青蛙吃。

老威：这是世外桃源的生活嘛。

廖大矛：我们太年轻，心花花的，过啥世外桃源生活？再说挣不了工分，口粮也打折扣，家里也寄不了多少钱来。在队里窝着也罢了，可年轻人需要社交活动，大家混一块解除寂寞。所以到后来，赶场、串队都成风。当然，这么多人，不可能某人掏腰包，为了维持原始共产主义，大家都偷。我敢说，凡是当过插队知青的，都有过偷的经历，小至跳丰收舞，洗劫整片菜地，大至偷鸡鸭，偷猪羊，

打狗。知青中当扒手的也不少，只不过现在大伙都 40 多岁，成家立业了，也就不重提昔日的丑事。谢红宝的绝招是蹲在树上钓鸡，我与他配合，抓一把包谷把大群鸡娃引诱到林子里，然后撒在地上。让鸡们欣喜若狂地啄食。蠢鸡当然不晓得其中有颗包谷是作为诱饵粘在鱼钩上的，一旦进口，上嘴壳就被牢牢钓住，只有扑打翅膀的份了。“渔翁”在上缓缓收线，精神和胃口都娱乐了。

老威：被农民发现咋办？

廖大矛：我在明处，谢红宝在暗处，被发现的首先是我，其实那年头，鸡是农民的命根子，灯油盐巴肥皂全靠鸡下蛋换钱买，所以知青一过路，大家都提高了警惕。我在书包中塞团报纸，鼓鼓胀胀，引鸡入林后，又鬼鬼祟祟，让贫下中农到处堵我。假贼掩护真贼，假贼的工作量大得多。

老威：这也不是长远之计。

廖大矛：除了每次招工招兵，每个知青都懂得从县里公社到大队上窜下跳地活动走后门外，我们就没有长远之计。有一次，成都一伙知青在赶场时行窃，被当场抓获，激起了众怒，乡民们红了眼，挥起扁担、木棒，一见知青就打，我们只好抱成团，抢回同伙，退到一家饭馆里闭门死守，我稍微慢了点，就挨了一扁担，我蹦起来，正好裤兜里揣着一个刚顺到手的大苹果。顷刻间，苹果就代替我的腿被砸得稀巴烂。失控的农民兄弟很快掀翻了门窗，我们只好又撒退到楼上，与他们争夺楼梯，眼看快被扯过去了，两个孙二娘一般的女知青，竟抬了一桶酱油，当顶浇了下去，这一下，更捅了马蜂窝，楼梯是抽上来了，但农民们开始在下面叠桌子，并黑压压一片喊：“打死！”楼上是饭馆的贮藏室，啥都有，于是我们又倒了一桶菜油，把首批的三个进攻者浇成油人，站立不稳，啪地一声滑下桌子。农民们前赴后继地爬桌子，滑下去一个，就被人围殴地接住。最后，进攻者干脆不爬桌子了，直接被若干条粗胳膊举起来，我们举空桶做了个倒的动作，敌人吓得一缩一抖，就摔下去了。

知青里的中学红卫兵占绝大多数，因此一玩这种防御游戏，就本能地亢奋，武斗时，个个都是干将嘛。可到后来，农民们全都丧

失理智，竟抱来麦草捆，要点火烧房子，吓得饭馆主任跪在地上给大伙磕头，并悄悄派人去公社找领导。还好，农民们没真点火，可形势险恶，楼上该倒的已倒完了，而农民们把所有的桌子全叠起，还从外面搭梯子准备上房。

我们撒到房顶，揭瓦片乱打满街人流，只闻一片鬼哭狼嚎；而农民们也用土豆、石块，甚至用菜叶裹了粪便回敬。我们招架不住，就在房顶喊话，要求公社安置办出面调停。可是直到太阳西沉，农民大军终于攻上房，把我们五花大绑，准备游街接受众人拳脚和唾沫时，公社书记才出现。

这次事件惊动了县里，一位副书记还专程下来，为知青们开办学习班，每个人都写了检讨，我因为作战主动灵活，被回乡心切的叛徒私下出卖，记了大过，再加之家庭成分不好，我感到要通过招工招兵回城，肯定遥遥无期。而知青间的勾心斗角，更让我厌倦绝望，特别是在上山下乡后期，同一批的知青都离开了，而新来的彼此又谈不拢。

老威：和贫下中农关系也紧张吧？

廖大矛：开始紧张，后来就相安无事了。山区农民朴实善良，一点小恩小惠就收买了。不，有时不用小恩小惠，只要态度对人家好些，他们也会受宠若惊，知青毕竟是秀才呀。倒是知青办的人难于对付，社会上的一套，他们都搞懂了。我们公社有位知青，下乡五年，好不容易捞到个招工机会，还是他妈所在的单位。招工方指名要他，当然没问题，而公社知青办主任卡住不放，扬言要再看看政治表现。啥表现？这不是递点子让你快送大礼么？这位知青家里穷，一急，就急出个缺德主意。他找了两个茅台酒罐，灌了尿，原装封好。这份厚礼一出手，政治表现马上就好了，填表、体检、到县里，手续齐备。临上车时，公社那位主任拧着两罐“酒”气极败坏地撵来了，但生米成熟饭了，倒霉的是我这类后继者。

老威：你就没给他来点“真表现”？

廖大矛：我家境贫寒，母亲长年打零工，爸爸又在学习班里交待历史问题，他老人家对我唯一的援助，就是买了套理发行头，要

我为贫下中农服务，自谋生路。我的小脑反映快，根据乡下特点，无师自通了三种发型：锅铲式，全部剃光，天灵盖上留撮毛，电影里的儿童团员都是这种发型；光头，当然不是刀刮，我还没学会呢；马桶盖，齐着耳朵横扫一圈，使浓发盖子一般扣住白生生的头皮，电影里的汉奸都是这种发型。我的优势是价廉动作快，一个生产队，百把颗头，我一天就弄完了。我也给公社知青办主任理过发，由于功利目的强，心里紧张，竟咬牙切齿地绞住他一块后颈皮，他狼狗般窜了两丈高，那倒毒的吃血推子却没从脑壳上掉下来！这种“真表现”的结果，我又“大有作为”了好几年。我被那狗日的盯上了，本来我剃一颗头才五分钱，可那厮硬要撵着我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后山穷水尽，我就卖掉理发头，到处窜队混饭吃。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们一伙知青在乡场上撞见一个江湖牙医摆地摊，就近前看稀奇，大家一时手痒，就恶作剧地偷了她几把牙钳，这可是人家谋生的命根子。她不顾一切揪住我们求情，可越这样，大家越觉得好玩，她丢的东西就越多。后来，场都快散了，牙医一见自己的工具箱里几乎空了，就抱住一位知青的腿嚎啕大哭。我不忍心，劝大家拿出脏物还她，她才抽抽嗒嗒地收摊子。我过去帮忙，顺便问她是否经常受到知青的骚扰？她默默点头。我就灵机一动，提出跟她学手艺，她扫视一圈，识时务者为俊杰，只好答应。

我师傅脸黑眼大，身板壮实，浑身上下除了胸部和臀部，没一点像女人。可她的为人的确不错。我跟她跑了一年多的摊，还到了平武县我姐工作的伐木厂。下了这么多年乡，我首次有丰衣足食的感觉。我是徒弟兼保镖，使师傅少受知青和地痞的捣乱，因此她只字未提拜师费。出师后，我在姐姐的支助下，选购了必备的牙科器械及各类药品，开始无照行医。经济上独立了，人也扬眉吐气了些。这时，我弟弟二矛也来了，他在家没人管，就到乡下给我煮饭；爸爸曾让我教他镶牙，可这东西是家中四子妹中最蠢的，只会捅漏子，没法教。

老威：看来你的生活转机开始了。

廖大矛：的确。那时拔一颗牙五角钱，我一赶场，弟弟二矛就

在人流里乱钻，傻乎乎地专盯别人的嘴，一见里面有缺，就急忙赶到茶馆来报告；这种兄弟情感染了在场的知青，经常全体出动，为我满场拉客，搞得我一阵接一阵忙乱，像屠宰师傅。当然，拔完牙，洗完手，我得招待大伙进馆子。有一次，大鱼大肉刚端上桌，一个迟到的知青急匆匆地跨进门嚷嚷：“外头有个缺牙巴！”我本能地甩下筷子，提起药箱冲出门，身后却爆发哈哈大笑——原来被涮了一回。

老威：那时一口假牙多少钱？

廖大矛：满口 28 块，若要镶金，价格另算。单颗的又分固定和活动牙。农民不喜欢漱口，一般都要固定牙，还往往在门牙和犬齿上包金，这样一笑，就开口露富了。当时的钱值钱，对于山区农民，20 多块要存好几年，因此牙科医生很让人羡慕。

老威：山区的卫生条件那么差，你没出医疗事故吧？

廖大矛：还真邪，按现在的医疗常识，一次只能拔两颗坏牙，可我挣钱心切，最多一次拔过八颗牙，把那嘴拔得成个血洞，依旧没有大出血，现在回想，真有点后怕。二矛更恐怖，我给病员注射了麻药，又用钳子敲了敲，确诊牙根松动后，就招呼他近前实习一回。不料这厮一挽袖口，还没瞅清口内情况就一钳子下去，活生生地把病员从椅上扯起来。见人家已手舞足蹈了，他还不肯松手，硬要把人家牵着在院子兜半圈。我冲过去，一个砍掌，才缴了他的械。原来，他把牙拔错了。

老威：你这个弟弟适合当兵。

廖大矛：他做了诗人。现在我明白了，诗人就是经常把别人的牙拔错的那种人，你让他拔大牙，他就拔门牙。那次事故后，我就“废”了他。他才 12 岁，就对做缺德事有种冲动，比如有年冬天，我们想吃狗肉，就把猎手张三爹的撵山狗逗进屋里来，二矛顺手把门拉上，兴奋得在外面引吭高歌。我骂：“你这猪，唱个逮！”他回答：“我在唱戏掩护你呢。”冬雾弥漫，一臂之外看不清自己的手指头，我用绳套拴住狗。这狗平常与我感情很深，在我家进进出出惯了，可这次，它却把我喂它的肉吐出来，夹着尾巴退缩，呜呜的

哭泣惨不忍闻。我几乎下不了手，不料二矛在外嚷嚷：“快下手哟，人要来了！你平时拔牙，屁眼儿好黑！你就当拔牙！”我说：“万一锄头敲不死咋办？”他说：“你先把它吊起来嘛。”嘿，原来这闷猪不闷，只是心思没有在正道上。

我把绳头抛过房梁，迟疑再三，还是不忍心拉，二矛在门外催命，我就把绳头从门缝塞出去。好家伙，只听嗖地一声，狗就悬空了。我打开门，见二矛小小年纪，竟像个拉大船的纤夫，把绳子背在肩上，脑壳几乎要点地了。我让松一点，他说不；我说狗都上了梁了，他把绳子绕在腰上，才回头看，狗全身都在抽动，但既没叫，也没挣扎，却见两行泪滚落下来，这是比人生动百倍的眼睛，它们听天由命，完全没乞求的意思。我让二矛放了它，二矛耍横：“那不行，它都成这样了，放下来也不得活。”我说：“哪咋办？”二矛说：“还没断气，狗有九条命呢。你找把锄头敲它的鼻子，两下就完了。”我没料到自己的弟弟这么酷，但想了想，也只好这样，就替他把住绳子。那12岁的刽子手迈进门就结束了。我们放下死狗，趁势剥皮，连肉脏一块，包一块大石头沉入大粪坑。而此时，狗的主子还在山下吃丧宴，在孝子们的哭泣中喝得醉醺醺的

老威：你是猫哭耗子假慈悲，还不如你弟弟来得干脆。听你讲了这么多故事，我觉得好像同我们习惯了的知青生活对不上号。

廖大矛：你觉得什么才是知青生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田坎上休息读《毛选》？我不否认有的知青这样干过，或者读书、反思文革、传抄手抄本小说及违禁歌本，等等。还有种种先知先觉的情结，给本来灰暗的生活镀了一层金。但是，我没有，我既不知，也不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在忙于生计。生活的艰辛给人生打下如此深的烙印，以至今天还有影响。知青下乡，完全是自己教育和改造自己，可对于无辜的农民来说，知青带给他们的是一种灾难，一股祸水。知青文学，现在听上去多浪漫啊，可知青有什么可以称作“文学”的东西？我给你讲一件送礼的故事。那时候，知青们为了早日回城，一旦风闻招工，就送礼成风。这当中还出了不少女知青被强暴的事，但是她们为了今后前途，也只能忍了。我穷送不起厚礼，加之父亲一直坚持重在表现、绝不走后门的老一套，所以我

只能靠自己攒钱去县里活动。记得天擦黑的时候，我敲开县知青办主任的家门，那贪官老婆从门缝里瞅见我只提了几瓶酒，脸马上沉下来，义正辞严地“拒腐蚀”。我哀求半天，才被不耐烦地“恩准”留下薄礼，待他们吃罢晚饭后谈事。我在门外楼梯下等呀等呀，大约过了两个多钟头吧，好不容易听到二楼传来涮锅的声响，就急忙冲上楼。当时心都快跳出来了，感激的话也挤满了一嘴。岂料随着门响，一阵被灯光照亮的洗锅水竟兜头泼来！我浑身湿透了，而心却燃烧起来，我冲进去就抄了把菜刀。那婆娘见祸惹大了，急忙声明“不是故意的”。我最终还是被那一屋人劝住了。为了出头之日，什么都要忍。唉，今天的人，当然不晓得挨洗锅水是啥滋味，这种奇耻大辱，谁都不会忘记。然而事隔多年，找谁算这笔帐？整我的那个人已老了，不成人样了，我见过他，没有恨，只有可怜。时间已经替我报复了他。这些人，当官时架子比谁都大，一下了台，连条狗都不如。

老威：你刚才讲的都是很好的创作素材吧。

廖大矛：什么创作素材，这是一个人的历史，当然，时过境迁，再苦再难堪的经历，也可以当故事讲。这不是忆苦思甜，因为我们没理由让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孩子去接受我们那时的荒唐，那时的贫穷和幼稚。比如我下乡时，耍了个女朋友，大家在一起搭伙。可二矛看不惯，老同她发生冲突。有次我出门，他们就在家干起来，我女朋友拿锅盖打二矛，这小子一闪过，操起锅铲就飞了过去，击中对方的头。我回来问清情况，轻轻打了二矛两下，给女朋友下台阶，不料他却怀恨在心，整整憋了半年，才在我们一块回家过春节时，向姐姐飞飞告密。我气不过，敲了他一筷子，惹得飞飞勃然大怒，一耳光扇过来，还又骂又哭：“我们家的日子这么不好过，你还在乡下学坏，交女朋友。你是坏蛋，还怕二矛揭发你？”我只好向姐姐认罪。你看，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的传统教育。而现在，中学生耍朋友已是平常事，许多家长还为自己的男孩早熟，几岁就喜欢女孩骄傲呢。

老威：廖先生。谢谢你给我讲这些好玩的东西，我计划中要采访一个老知青，但进行了几次，都失败了。我一捉摸，还真让已故

作家王小波说中了：“知青明星”们都缺乏平常心。把真实的经历经过一番处理，就成人物了，就认为有资本同九十年代讨价还价了。随之而起的，还有种种以知青命名的商务及文化活动。

廖大矛：我一个牙医，同这些没多大关系。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了。

31 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

采访缘起：经老右派冯中慈的撮合，我又回头来采访了廖恩泽先生，他俩能成为好友，体现了另外一种“国共合作”。

还是西门车站附近的“杀牛巷”，我进进出出不知多少回了，我有如此强烈的亲近老人的愿望，是否说明我的心理也老了？

1997年10月1日，世纪末的秋天，世上又在流行1999人类劫难的预言，却忘了已处在劫难之中。老军人廖恩泽呢？他在想什么？

老威：老人家，听人说您的经历非常曲折复杂，能否给我这个晚辈介绍介绍？

廖恩泽：说啥子呢？从国共两朝走到现在的人，一上了岁数，经历都复杂。我把我的履历都写在纸上了，你可以拿回家看。

老威：好吧，不过我担心这种履历看不出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您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现在，似乎各大城市都有“黄埔同学会”，你经常参加同学会的活动吗？

廖恩泽：前两年，还定期参加组织活动，主要是政府要抢救文史资料。因为黄埔同学中，绝大多数已迈过80门坎，精力不济，记忆力也衰退，再过一些时间，就逐渐成废人了。大家聚会时，一可以活跃气氛，二可以互相提醒、补充，使历史更接近真实。

老威：您认为历史不真实？

廖恩泽：这是个敏感话题。总之，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真实”，你我都无能为力。我这儿有一摞油印材料，都是80多岁的国民党老人的回忆录，没有文采，也没有政治观点，是就事论事的东西，你要都拿去，至于我，才疏学浅，淮海战役那年还不满30岁……

老威：所以您就没写？

廖恩泽：没写。这两年，抢救文史资料的劲头要淡些了，活动也就不那么定期。但在端午节、孙中山先生诞辰，形式上还是要召

开座谈会。我喜欢在家里练字，别人来通知，我就去。每次去，都要少那么几个人。我没戴助听器，我的听力还好，但大多数都戴助听器了。

老威：您的身板还挺硬朗，看您这坐姿，腰直，背也不驼，双手挺胸，似乎前面还竖着一把无形的指挥刀。据说您从不坐车？

廖恩泽：去外地当然必须坐车，日常生活中可以不坐车，步行有益健康。这是张群先生的养生秘诀，他说：“日行五千步，夜眠七小时；心中常喜乐，口头无怨声。”所以他活了一百多岁。我不想活这么长，但沧桑之变我还是想看。

老威：我从您的身上就能感受到沧桑之变。现在我想问，您为什么要去报考黄埔军校？您是黄埔 14 期，1938 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了。您是否和那时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出于爱国而投笔从戎？

廖恩泽：抗战为我们这种出身平民的青年，提供了一种报国的机会，然而，当时的四川是大后方，南京沦陷后，连首都都迁重庆了。我和大哥恩山被父亲送到一家药铺当伙计，也没料到自己日后会从军。那家药铺老板特别自私，不准我们到街面上去看学生们的抗日演说和游行，他的信条是，生意人就是一心弄钱，至于国家大事，自有政府出面去打点，因为老百姓是交了税的。我记得即使已进入抗战状态，成都的市民生活还较富足。城隍庙一带小吃百花齐放，月饼拿在手上，油能浸透几层纸。只有防空警报一响，大家紧张那么个把小时。在这么一种社会小环境下，不当兵也没啥，只要响应政府号召，向前线捐款捐物就行。而我大哥恩山受不了，常说：“国难当头，谁能安心做生意？”这话被药铺老板听去，告到父亲那儿，恩山被按住打了板子，从此记恨老板。有一天，老板的儿子见了他，就讽刺说：“抗日英雄快去抓付补药孝敬少爷。”恩山气得怒火中烧，可还是咬牙忍了。少爷见这伙计居然不理自己，感到脸面下不来，就拧起柜台上的算盘砸过去。恩山一把接过，他是学过武的，想都没想就把算盘回敬转去。少爷满脸鲜血，哼都没哼就倒下了。

当时我以为出人命了，手脚哆嗦。还是恩山厉害，拉起我一口气跑出郊外，在北较场参军，刚领到两块大洋的军晌又开小差，这一下子，就搭车去重庆。恩山说：“当个大头兵有啥意思？我们去投黄埔军校！正正规规地学军事，将来才有出息。”民国 27 年 1 月到 28 年 3 月，我们学业期满，各奔东西。恩山出川，调 41 军，在襄樊一线与日军作战，由于战功卓著，几年之间，他就由少尉排长升到上校团长；而我留在重庆卫戍部队，曾随大部队到贵州打昆仑关战役，后调五战区 22 集团军总部做少校参谋。

老威：你们闹出人命，一跑了之，不拖累家属么？

廖恩泽：不跑才拖累家属。其实那少爷没死，不过是鼻梁被打塌了。

老威：您的大哥恩山还健在么？

廖恩泽：不晓得。

老威：您们从黄埔军校出来，又见了几次面？

廖恩泽：也就两、三次。45 年日本投降，我军挺进平汉线，接受敌寇 115 师团和 13 独立警备旅的投降，在郑州至信阳的铁路上，与恩山相逢。互相约定，过两年天下太平，就回家长聚。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乐观。我俩共同给父母亲大人寄了信，还捎去了一百块大洋和 20 匹阴丹蓝布。岂料天有不测风云，46 年我调汉口，任上校参谋，参加国共两党的和谈，而恩山的部队在和谈期间，就与解放军打起来了。联合政府的构想一破灭，天下太平也就成了泡影。内战期间，我们兄弟俩南征北战，过着昏天黑地的戎马生涯。恩山升得很快，到淮海战役前夕，他已是孙元良兵团的一个师长。时年 32 岁。徐州会战时，我率 372 团守徐州南线的禹娃山一带，被切割包围了 40 天，终于在 49 年 5 月 10 号，在肖县永城地区被虏。

当时我不满 30 岁，对蒋介石死心踏地，就在天黑趁重新被解放军整编时逃跑。我的勤务兵也跟我逃跑，这小子早就私下为我准备了一套老百姓衣服。我们来不及换，就一口气跑了 30 多里地，刚歇下来，就听见后面连连鸣枪。我的勤务兵急中生智，就将我推

下深沟，一个人继续朝前跑。就这样，他被抓了回去，而我换了衣裳，辗转千里，回到了四川老家。

当时成都虽然没有解放，但周边地区的川军已纷纷起义，在南郊武侯祠，我和恩山倒底见面了。兄弟俩都成了光杆司令，乱世相逢，难免悲从中来，相与抱头痛哭。恩山说：“西南在历朝历代都是大后方，国军连西南都守不住，可见大势已去。弟弟，你有啥打算？是不是想到西昌去投奔胡宗南，收编一些散兵游勇上山打游击？”我回答说：“胡宗南是蒋委员长的爱将，绝对要直飞台湾的，你是少将师长，或许有资格搭飞机离开。”恩山说：“从淮海及其它中原战场上溃退下来的将校级军官多的是，哪有那么多飞机？况且，你我是凭战功晋升的职业军人，本该如委员长训示：‘不成功，则成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既然还苟活于世，哪有脸面去台湾？离乡背井的耻辱咽不下去呀。”我问：“那你的意思是留在大陆？”恩山惨笑说：“我很想留下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脑袋就保不住了。”我又问：“既不留，也不走，莫非你想寻短见？”恩山摇头：“我想扮成客商，入云南，从边境过泰国，到金三角。现在还有部分国军驻扎在那儿。弟弟，如果你相信大哥，就一起去，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沉吟片刻说：“不行，故土太难离了。这次不比上次我们去投黄埔军校，还有个盼头。这一去，天晓得啥时才回来？”恩山见我迟疑，急得抓住我吼：“万一被抓住，你就死定了！呆子呀呆子！”我的拗脾气也来了：“国土这么大，我就不信没有我的藏身之地！如果我被共产党抓住毙了，也是命，我认了！从民国 27 年到现在，小日本投降了又接着打解放军，原来以为，仗会很快打完，打完了之后，我们就衣锦还乡，耀祖光宗，过上普通的太平日子……。可是，这仗越打越没止境。你是师长我是团长，都是管上千人的，可是兵呢？一个也没剩下。我晓得，你天生就是做将军的料，只是时运不济，才落到这地步。可我，小日本投降不久就想脱下军装了，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被一种职业推着走。现在，老天爷自动解除了我的军人职业，我再不愿意漂泊了。我想隐姓埋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成家立业。唉，这个结局，虽然比原先想象的大红大紫坏得多，但还不是最坏。我们毕竟都从战火中爬

了出来，也没缺胳膊少腿。”

恩山听完我这番慷慨陈辞，不禁潸然泪下说：“弟弟，记得刚从家里跑出来时，我们不过是 20 来岁的人，一晃，已经打了十多年的仗了。在这十多年中，除了黄埔一年多，我兄弟相聚的时间加起来才几天。可这一别，啥时才能相见？今生我们注定了要天各一方么？”我也泪流满面，但还是安慰说：“只要都活着，就还有相见的日子。说不定过两年，国军借朝鲜半岛局势，以及美国的援助，反攻大陆，你很快会从泰国回来。”恩山顿脚叹息：“命矣命矣，以后的事谁能说清？弟弟呀，长痛不如短痛，今日我们兄弟就此长别罢了！”

生离死别，从没见过两个从血盆里抓饭吃的军人流过这么多泪，终了我们兄弟立下誓愿：“无论再过多少年，只要一方还活着，就要寻找对方，活要见人，死要见坟。”

老威：老人家，你们兄弟一去一留，根子都永远扎在故土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手足故事。后来呢？大陆和台湾一隔就是几十年，这是历史呢，还是一种宿命？

廖恩泽：这当然是一种宿命，历史是大人物们创造的，而对无法支配自我命运的小人物，只是一种宿命。我曾经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恩山走后，我也出川了，原来准备到甘肃天水麦积山，找个庙出家。可和尚不敢接纳来历不明的人。于是我又一路来到西安郊区住下来，恰逢当地发生了瘟疫，再加战乱，一个村没剩几个人。我就趁重新登记人口时，伪造姓名和履历，报上户口。两年后结婚。53 年，西安铁路工程学院恢复，我顺利考取。毕业后，分配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任技术员，半年后，晋升为桥梁工程师。1957 年，我在视察一个桥梁工地时，被正在劳动改造的犯人认出，那个胡子拉碴的野人冲过来，一个立正敬礼，我定睛一认，原来正是自己的勤务兵。

我不等东窗事发，就自己拧着铺盖卷到公安局自首了。我已有儿子，将来还会有孙子，我不怕了。自己的历史自己负责，要不，迟早也是心病，我幸好没扛着假名字过一辈子。我以历史反革命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甘肃的一座监狱。这下踏实了，坐就坐吧，我有文化，自学过英语和德语，在监狱里也没吃啥子亏。1975年，熬到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我出狱，回到了家乡成都。父母是见不着了，只有二姐和七妹还在。政府发给工资，安排住处。我喜欢清静，就一个人搬到西郊，租农民房种花卖花，儿子和儿媳带上孙儿，也来住了一段时间。

我出狱时 57 岁，而离家投军时还不满 20 岁，37 年的风风雨雨，眨眼之间也就过了。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梦想都成旧话，我满世界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好像哪儿也没去过。当然，这种暮年遗老的叹息，你们年轻人是听不懂的。

老威：您找到大哥恩山了吗？

廖恩泽：我今生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寻找恩山。“活要见人，死要见坟”，不负当年生离死别之约。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关系开始解冻，实行三通。于是我就写信给台湾国防部，以一个老兵的名义，恳求他们帮忙寻找兄长。国防部很快发来封公函，称逐年封存的阵亡将军档案里没有廖恩山的资料；我马上又给有关方面写信，并投书彼岸报界，详细讲述我们兄弟诀别的情形。但半年之中，人家的回信都含糊其辞，也没说死，也没说活，只称“失踪”。我想，人家也是一片善意，害怕伤害我这风烛残年的老人。既是“失踪”，就还有一线希望，而且，恩山是个闹轰轰的脾气，冷冷清清，客死他乡不太象他的为人。

世事难测，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要不断打听。后来，台湾老兵一批批回大陆探亲，久别重逢的好戏演了一幕又一幕，可这一幕呢？只要碰见台湾来人，我就想方设法赶去。我觉得石沉大海并不可怕，只要确有石头在海底。

老威：恩山将军不是说经泰国到金三角吗？听说那是个三不管地区，被国民党军队的后代把持着，您没法从这个方向……

廖恩泽：关于金三角的传闻很多，但很少有人到过那里。恩山如果在，已经 80 多岁，叶落归根的意识应该更浓。最好能够去泰国旅游时，顺便到一趟金三角。香港的《明报》有毒品巨枭昆沙的

报道,连那么神秘的人物也曝光了。他的部队将领中,华人占多数,其中是否有恩山的后代?难说。你看出来了,我的身体不错,我练气功,练书法,食欲好,走路比年轻人都快,为了啥?恩山会出现的!会的!这墙上的诗是我凭记忆敬录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绝笔:“葬我于高山之巅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唯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巅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世难忘!/天苍苍,水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我是十几年前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当时悲不可抑,竟失声哭了。我还以为心里已经麻木了,可一听右任先生以诗的形式留下的遗嘱,仍然感到震撼,不晓得恩山会不会有同感?

老威: 苍天不负有心人吧。但愿你们兄弟团聚时,能通知我一声。最近,一家报纸登载了一对五十年前的有情人,在五十年后终成眷属,男方已近七十,也是国民党老兵,48年去的台湾。这老兵挺怪,居然为了一纸婚约,几十年没娶老婆。一直到去年,方打听到自己的未婚妻的详细情况,马上越洋赶来相会。这种事,对您也是个鼓舞吧?

廖恩泽: 当然。

老威: 我现在发觉,我这次访问有点偏离原定话题。我曾设想把重点放在战争时期和您的狱中生涯,可顺着谈下来,却围绕着你们兄弟的生离死别在打转。您似乎在一生中只做了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也没完成。

廖恩泽: 人生由许多阶段组成,在这个阶段,抗日是人人都必须参与的大事;抗日胜利了,载入史册,另外的大事又来临了。现在回头看,人在特定环境中是无法自己选择的。其实,我们兄弟相见在大千世界里的确算不了啥,但没办法,人得守信。

老威: 我最后提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你在狱中耗掉了近20年大好光阴,感到后悔吗?怨恨吗?

廖恩泽: 那些年月,无论在哪里,都做不了啥子事。有毛主席领导,有阶级斗争路线,再有本事的人都不可能有所作为。我们那座监狱,除了关国民党外,也关了许多共产党的忠诚干部,大家都是

囚犯，混熟了，也能互相照应。而在外面，再混得熟，也不可能互相关心，亲不亲，路线分，为了“真理”，连娘老子都敢造反。邓小平有本事，在毛主席手里，也只好明哲保身，发誓“永不翻案”，否则，下场和刘少奇差不多。唉，算了，我扯远了，过去我哪敢这样乱说。

总之，我从心底感谢监狱，感谢共产党押我，保护我。要不，我早就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32 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觉

采访缘起：1999 年月 24 日清晨，国民党老兵廖恩泽突发脑溢血，经抢救，终不治而亡，享年 79 岁。

天上飘着毛毛雨，我接廖家侄儿通知，前往吊唁。面对家徒四壁中的廖恩泽遗像，内心涌起阵阵寒意。打仗，坐牢，穷途，落寞，这就是一个曾经有抱负的中国人的一生么？

全国还有多少命运相似的黄埔老人？谁也没作过统计。一个时代淹没了另一个时代，只有一些历史的残片留了下来。明天，能够证明廖恩泽存在过的或许只有几张照片，几张探监时私传的字条。

不知为什么，此刻我耳边突然响起一首日本人的歌：“你就是你/你不可能变成我/就连你在那里拼死地挣扎/我也只有远远地注视。”

愿他的灵魂在歌声中安息。

老威：老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廖觉：前天医院停止了抢救。不，根本谈不上抢救，因为上两天上午送到医院时，四舅已深度昏迷。医生检查了瞳孔，已经放大。但当时，他的心脏还跳动着，一人高的氧气瓶立在床前，管子插在鼻孔里，抽得呼啦呼啦地响。医生说，四舅是脑溢血，一下子发作，颅内所有血管都炸了。不信，你过来看看眼睛，红得刺人，耳心和鼻孔不停地渗血。我过去，替四舅揩掉了脑壳的血斑，但又有新的血往外渗。四舅的血太浓了，滴不下来，在枕头四周堆着。他的额头熊熊燃烧着，嘴半张开，似有什么话想说。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

老威：老先生的心跳靠氧气延长了两天？

廖觉：是。

老威：可他的脑已经死了。

廖觉：他的亲生儿子在郑州，我们打了电话，就只能等。医生

建议拔管子，推进太平间停两天，但是我们坚决不同意。医生就在四舅脖子上动刀，直接把管子插进呼吸道。他的儿子终于风尘仆仆地赶车来了，不到 50 岁，看上去比四舅的皱纹还多。四舅没对我提起过他。接下去就是办丧事。四舅家徒四壁，把破床和破桌子一撤，几平方米的空间就出来了。妹妹、表姐和宋玉最后一次为他收拾屋子，英汉字典、黄埔老人的一沓打印的回忆录，袖珍收音机的天线已经锈了。细心的宋玉发现了一叠旧照片、旧信及一些泪迹斑斑的文字残片，我都收捡在这儿。四舅的书法已练得炉火纯青，现在人去了，笔和纸还摊在桌上，他正抄录《陈立夫回忆录》上的一段话。我没有哭，但心里隐隐作痛。今年 2 月，他参加了我的婚礼，他是我母亲家族唯一参加我婚礼的亲戚。当时他想不出送我什么好，他太穷了。我说四舅你能喝我的喜酒，我就太高兴了。父母也说你平常对二毛好，讲啥子礼？实在过意不去就写几个字吧。四舅果然用大红纸录了苏东坡的诗送来了。

我差点说四舅你早送过了。几个月前忠忠爸爸突然弃世，我带着你的挽联去奔丧，你的大字一撑上灵棚，真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劲：“哀鸿东去，父魂西归；天柱南倾，地维北绝。”横幅是：“限哉命乎。”这种联是写给普通百姓家的么？

也许大喜的日子我不应想到死亡的场景，但是我结婚才三个月，四舅也走了。我蹲在地上，仰视着他的遗像，宋玉和妹妹在旁边，挺虔诚地烧着纸钱。唉，我们与四舅的孙子形同陌路，与他却有一种斩不断的血缘，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支配或捉弄这一切的主宰？

老威：我与老先生是忘年之交，他有健康的身体和意志力！真没想到！“限哉命乎”？这是写给别人还是他自己的？

廖觉：他的血稠，不该喝酒，也许连我的喜酒也不该喝。

老威：你别毫无道理地自责了。

廖觉：上午，我们两辆车十多个人送他到火葬场，父亲的年纪大，都没让他去。刚好下了点雨，空气湿润，火葬场的坝子显得空旷。进炉子前，妹妹和表姐他们隔着栅栏与四舅永诀，我和宋玉，

还有四舅的一儿一孙进到里间。一溜五个死者，四舅排在第三，第四具尸体已有异味，并滴滴哒哒的，地上湿了一片。四舅的儿子掀开布，宋玉为他们照了像。我最后上去，看见四舅身着中山装，很安详，只是白发下的红嘴唇，显得非常艳，像柜窗中的模型。炉工身着白大褂，将肩头插向我们之间，这是一道永远的墙，宋玉拉着我从墙边朝后退。四舅从板上翻到传送带上，嘣地一声。我没料到尸体会这么硬，一刹那，四舅早年的铁血生涯涌现出来，在阵阵雾状的硝烟中，我们目送着传送带沿轨道横行，过了三个炉口，然后直行。刺耳的铃哇哇响着，炉中的大火映红了四舅的头，这个老兵，义无反顾地俯冲进去，一了百了。墙不断地增高增厚，我们败退着，太阳出来了，四舅飘动在天空中。我们还要走多久，才能抵达墙的另一面？

老威：你是个诗人。

廖觉：这不是骂我么？

老威：你别误会，经历了亲人的死亡，谁都可能在此情此景中变成诗人，像二战时期一位即将进毒气室的犹太小姑娘写的：“地上的野花呵/明天我就不能看见你的微笑了。”？

廖觉：我读过你对四舅的采访，我晓得他老人家为啥喜欢你了。其实他的真名叫廖岳中，这份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名录中，有他的签字，这张合影你看，在成都的黄埔军人都在上面，这是我四舅。

老威：你给我看过的材料中，有一张老先生早年的情侣照（也许是蜜月照），还有一些特意裱糊的字条，人也险恶，他竟把这些爱情信物珍藏了这么多年。唉，可惜我上次的采访没能涉到他的感情生活——他似乎不愿意谈。

廖觉：那是与铁窗生涯联系着的一场灾难。据我母亲讲，四舅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之后，四舅母一个人带着孩子，无望地等待了好几年。那是饥馑而屈辱的几年，作为历史反革命的家属，她三天两头都要去派出所报到集中，然后与一群阶级敌人一道，被押往各种场合接受批斗。

她甚至还陪过杀场，与死刑犯同时跪下去，目睹一个接一个的

天灵盖被枪弹崩地掀翻，脑浆与血像鞭子一般喷起来，然后朝下落到她的身上。她惊叫一声，只一声，嘴就被捂上了。此后许多年，她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话。

她依旧去探监，外面成片的饿死鬼。在西北的好些地区，饿死了小孩经常不埋，就丢在路边、荒郊。在寒冬腊月，有人恶作剧，把冻僵的尸孩当路标，隔十来米立一个。行人居然见惯不惊，还冲尸孩路标撒尿。四舅母探监要走很长一段这种路，她把不晓得用啥方法换来的食物藏在内衣里面，直到在雪雾中望见监狱的墙，才慢慢朝外拿。可就这样，她还被饥民抢过两回，那些瘦得像鸡爪的手直接从领口伸进去抓馒头。四舅母滚在雪地里挣扎，向监狱方向呼救，在拉锯战中，馒头刹那变成粉，撒在雪里，那些大小的人形动物，都趴在地上，手嘴并用，吱吱地寻觅、舔食、争抢着。

这张字条是四舅写的：“这床被面是我们的见证。见着被面，会使我忘不了当初的爱情，永生的痛苦。”另一张是四舅母的笔迹：“深切的悲痛使我哭不完痛不尽；眼睛里真的不是泪了，而是血！这多可怕啊，这张手巾里就沾透了我的血！”

老威：这近四十年以前的爱情残片，似乎还有体温呢。

廖觉：但是它们注定被埋葬，孤零零的，没有更多地东西来补充和完善。二姨妈早去世了，父母又不愿多讲。四舅的人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大的空白。几十年在我们手里，就只有几张照片与字条，他曾经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军人啊。

老威：老先生有你这种后辈，应该算幸运的。这世上没有失败者的地位，甚至没人能记得住他们的姓名。若干年后，太阳依旧照耀，人却全换了，谁晓得你曾经活在世上？

廖觉：四舅母终于改嫁了。现实太残酷，她不得不带着孩子，随后夫迁到郑州，斩断了与过去的一切瓜葛。听说她嫁了一个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孩子长大成人，也沾光进了锅炉厂。她的命运似乎是改变了。1975年，四舅随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回乡后，曾去找过她。

可时过境迁，当年的生离死别的恋情已随岁月而淡化。这儿的

三封信，是已入晚境的四舅母写给四舅的，称呼仍旧是“四哥”。第一封信开头这样：“15日来信并粮票肆两，工业券壹张及布证柒尺肆寸收到，只好替你享用了。庆幸你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当你呼吸着家乡的清新空气，置身于景色宜人的蓉城时，它会荡涤你一生的辛酸，那些忘不了的回忆也会增添愉快，这是一个游子心情的人对你的祝福，愿您在家乡享尽天年。”

接下来是不少极为现实的生存建议：“你要找个工作增添补差，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成都待业青年众多，哪有什么合适的工作等待你去。即使找到工作，（也）受人歧视……发展养殖业，如养蜂、养鸡、兔是较为有前途的……不依靠人，而且对自己是一种锻炼，开始小本经营，逐渐发展……起居有规律，对健康有好处。养花也是时髦，收益大，不妨试试。”

接下来就谈“晋级考试”，四舅母此时已是个外科医生，她叹息自己：“没福气的人，就这个劳碌命。”

老威：老先生接受了她的建议么？

廖觉：他真的在金鱼村附近租了农民房子，篱笆圈了块地，开始种花卖花。父亲退休后，有此雅兴，就经常去交流种花心得。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他稍微宽裕，就将孙儿接来，亲自培养。看起来，他是叶落归根了，但他心没死，仿佛在与命运较劲。在第二封信里，四舅母终于对他剖白心迹：“我因大半生在惊恐中过来，对什么事从不敢多越一步，心有余悸啊。”话已说到这份上，四舅他能咋样呢？这信写于1980年4月，好像在这前后，两岸开禁，许多流落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掀起一股股团聚的热潮。四舅此生最大的心病被触动，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大舅的消息。有段时间还走极端，想从福建海域买通渔民，偷渡过台。他说即使找不到大舅，也可以当面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讨个说法。退到彼岸的老兵几十年来还有个旧时的家，还有绵绵不绝的思乡病，还有实现团聚梦想的这一天，有的甚至与当年的爱人重归于好，一下子就有了完整的家庭。但留在大陆坐牢的老兵的家在哪儿？成了阶下囚，注定了妻离子散。同是为党国效力的军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老威：老先生可以去台湾寻亲啊。

廖觉：没钱，哪儿都去不了。四舅特救回来后，除了去郑州见四舅母，就一直在成都呆着。后来他没养花了，就搬到西门车站附近这所旧房子里。这条巷子，一下雨，就像个泥塘，东跳西窜地过去了，那楼口又如一条巨蟒的食道，黑咕弄咚迎向你。大白天，摸着在里面绕几圈，才拢右边四舅的住所。两间屋，十几平方米，四舅与他的孙儿各住一处。厨房两平方米，在过道对面。厕所在楼梯拐角处，大家合用，一户人一把解手钥匙。

四舅在这样的环境中拉扯他的孙儿，此外就看书写字，偶然翻译一些英文资料。除了在我们家与表姐国蓉家走动外，他的社交圈仅限于在成都的黄埔老人。这两年，黄埔老兵们纷纷去世，四舅收集了不少讣告和未完成的打印回忆录。

孙儿读书之后工作，经常不回这个阴暗的家。四舅大部分日子怎么打发的？我也不清楚。有一天，他到白果林来，与父亲默坐一会儿，突然说：“我这辈子，就打仗与坐牢，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既没敌人，也没朋友。”父亲说：“你有亲戚呀。”就把我从北京带回来的《陈立夫回忆录》送给了他。

老威：老先生出事时，他孙儿不在家？

廖觉：他已习惯独居了。他邻里关系很好，居委会要写个什么“安民告示”之类的东西，只要在楼下吼声“廖大爷！”就行。他爱卫生，手脚也灵便，楼道与厕所的清洁几乎由他承包。出事那天他照例起个大早，下厕所倒痰盂，这么短的楼梯，居然一去不回。

厕所门敞开着，旁边丢了把断腿椅子，他歪在椅子上，整个地塌了下去。居委会发现后，二话没说先送医院，然后进屋找到桌子上的电话本。我接的电话，并与妹妹急匆匆地赶到医院，人已不行了。居委会的婆婆大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廖大爷的死因，说肯定被哪个下楼的冒失鬼给撞了，要不咋会在厕所外，还坐在一把断腿椅子上？

妹妹也说，四舅长期步行，身板硬朗，不是随便能够撞垮的，哪个狗日的不晓得用了好大的劲。有人插话说：“脑溢血说来就来，

也许廖大爷没吃降压药，一弓腰就出事。”表姐反驳说：“不可能！一发病，哪有力气去坐椅子？绝对是狗日的撞了人，原想扶起来坐一会儿就没事，不料祸闯大了，赶紧溜之大吉，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

我说，那就报案吧。婆婆大娘表示赞同，但觉得先要分析一番，有眉目了再报案。结果弄了半天，想不出四舅有啥仇人。“廖大爷那么好，那么受人尊敬，谁也不可能对他干缺德事。”

老威：老先生享年多少？

廖觉：七十九岁。

老威：这是 1999 年，他没翻过这个坎，只能解释为天意。这下子他完整地归属逝去的旧时代了。

致友人岳建一的信

亲爱的老岳：

当我们在电话里交谈的时候，在我的心里，却用另外一种语言在同你谈话。你推荐我主编了这本《沉沦的圣殿》，虽然我廖胡子的朋友看起来很多，但除了你和周忠陵，恐怕就没人推荐我来主编这本书的。我的身上有一种许多人不能接受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我的存在是这个时代的耻辱，正如你的存在也一样。仅管你的人缘比我好，可从人们的交谈中，你更多是算命者，在这个人类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迷惘的星球，你似乎在尽你所能，给朋友们指点某种遥遥可及的东西，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天道在个人生活中的某种变量。你太善良，太智慧，犹如世俗的先知，人们依赖于你，却并不想知道（或并不关心）你的命相如何——不，不，老岳，我虽然也迷信你的神算，但我更看重的是你的尺度，你温和，但这从未动摇你多年恪守的灾变（或救世）的原则，对人们认定上，你是从来不管世俗社会怎么看、权威文化界怎么看的，你私下的谈话和公开的“布道”一致——这从你对诗人马佳的评价上，老鬼的发掘上，以及多年来对我的认定上，就能得出结论。马佳过于孤芳自赏，这种天性排斥了许多工于心计的同代人，甚至排斥了这个依赖于操作和传媒的混乱的社会。

2月27号下午4点多钟，正当我江油举行回门婚宴（招待我妻子宋玉的亲戚们）时，国家安全局的十几名警察抓走了我，还有另一位被切除了一个肾脏的本地诗人也受我连累，一起被拘禁了24小时。你猜这是为了什么，老岳？这是为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不知他们是在哪里得到的情报，所以在大街上“人赃俱获”。

对于我，这是家常便饭，自出狱之后，我就成了中国与警察打交道最多的文人。94年3次，95年3次，96年12次，97年1次，98年2次，这是正式传唤，还不算他们数不清的登门拜访及相约谈心。然而，我的“底层访谈”和这些有啥关系？凭什么我做的任何一件文化方面的事都要接受审查？当时，我和他们吵起来，接着，

是同警察互相折磨：夜 11 点，审讯笔录完毕，凌晨两点，搜查、宣读《传唤证》，录像的戏演完了，警察们打着哈欠，要睡觉了，可我不想睡觉，我刚从战壕里退下来，一安静我就会疯。于是不准他们关灯关电视，我要通宵达旦地看“凤凰卫视”，并且把音量放得震耳欲聋。关电视和开电视的拉锯战持续了半个多钟头，警察毛了，要打人。我巴不得别人打我，把我踩得稀巴烂，我的皮在痒，血也在痒，谁打我就是帮我。你打我，我就有借口从三楼跳下去——我观察过，下面有一棵塔松，摔不死人，但效果很好——但警察又放下了拳头，他们退到床边坐下说：“廖亦武，你不想休息，为啥子？我们谈谈。”我说：“谈就谈。我问你们，我犯了哪一条？凭什么老缠住我？他妈我成了专门为警察写作的文人。”警察说：“的确，你写的文章我们都很熟悉，诗啦，小说啦，信件啦，散文啦，包括这次这个‘底层访谈录’，我们这行也有专家，专门研究这类东西。说实在的，你的文章比好多民运分子的文章有趣、生动，有的段子还非常黄色，我们喜欢看，因为可读性强。私底下认为，你才华过人，说不定，将来某一天你还能得诺贝尔奖，你自己也这样认为吧？要不，咋老写这么多发表不了的东西？可我作为警察，作为职业，又不能不闻不问你在干啥，你的东西太有损国家形象了。失察就是失职，廖亦武，不管你，我们这碗饭还吃不吃啦？”我说：“去年出版了那么多你们认为反动的东西，干啥不去管？李锐的东西你们看过么？”警察说：“李锐是李锐，你是你，人家是什么级别？你是什么级别？”

这是一次令人丧失信心的谈话。快天亮的时候，我不得不用被子蒙住头，我怕警察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眼泪。我写了 20 年，从一个穷孩子，一个极其单纯的底层文学青年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就是为了给警察写作，并接受他们的迫害？我们全部作品都在安全部门的档案柜里。90 年 3 月，当我拍完电视片《安魂》，背着 80 年代的绝大部分手稿准备逃亡时，十几名警察一拥而上。接着是抄家和没收房产。这就是写作多年的结果！而其中多数内容与政治根本不沾边！接下来是 1995 年 10 月 10 日，我与朋友约好上京的前夕，警察突袭我家，搜走了《活下去》卷一《汉人》、卷二《黑道》、

卷三《天劫》的手稿，以及狱中诗歌、散文、大量的通信，等等，约 100 多万字吧。我不得不用两年的时间，重写《天劫》，每写几页，就复印和东塞西藏，其情其状，像自我虐待的疯子；再接着是书店被搜和《知识分子》事件。当我忍耐不下去的时候，我总是想，这是一个人的宿命，是孟子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会有一个最终结果的！老岳，你也一再对我说过！天不绝我，因为我的头脑还，因为被搜去的东西总还有另外的一份，虽然重复整理耗掉大量时间。廖胡子不再快乐了，不再什么也不在乎了……我孤立无援……没有谁能帮我……

老岳，我没有这么软弱过，我在看守所自杀过两次，但我不软弱，软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我感到我没有朋友，因为所有的朋友都和警察一样，知道一个人的价值却人为地伤害他，埋没他，知道一种东西的价值却让这种东西长期不见天日。他们无意识地在罗织一个蜘蛛网一般的无形的阴谋，他们宁愿让若干年以后的后辈去猜测，挖掘这种东西，形成一种所谓的时过境迁的热点。对于顾准，对于或许比顾准埋得更深的“累累的文化白骨”，他们的同时代人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承担一个时代的遗忘，有的只有追忆文章，并通过追忆来抬高自己，让作者本人又成为道义的化身和可歌可泣的热点，因为死者的荣光通过追忆聚焦在活人身上。在这个沦丧的时代，政治家和文人谁更无耻呢？

如果在目前的诗坛或文坛进行问卷调查：“廖亦武是干什么的？”我敢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会说：“他是政治的，或不同政见的，然后才是诗人。”言下之意说：“我才是艺术的，探索人类精神的，不屑于靠政治出名。”倒是一些警察不这么看，他们在私下里，“法外施恩”，给我不少的提醒。最起码他们清楚地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在干什么，我与其它民运分子的区别在哪里；倒是我的众多民运朋友认为我“诗人意气”，对政治“不内行”，徐文立与我是好朋友，可他对我最高的礼遇，就是与他的妻子贺信彤一起，驾车邀我上香山，在孙中山先生的衣冠陵旁吹箫。那我是我多年以来，最放浪形骸的一天，老徐用录音机把我的箫和啸音录了下来，并且洋洋得意地加介绍：“这是我生日的这天，我的朋友亦武先生，

为我在《高山流水》处，吹奏的……”

我不清楚这个时代谁是诗人、警察、民运分子，还是我的同行们？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归宿在何处？何以为友？何以为敌？直到警察释放了我，我回到家里，按民运分子的常规写了一份《请愿书》，我对那一套词汇已非常熟练了。接下来，开始咨询律师，为进一步打官司做准备——但我的内心在说“不”，在说“我蔑视这一切”。

老岳，我原打算这封信至此为止，可我还是忍不住继续往下说。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我，我最老的朋友唐晓渡上了中央电视台，在读书节目里充任嘉宾，与叶延滨一直谈论新时期诗歌。其实这没啥了不起，此前韩东、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等等都上过，可我当时打了一个冷战。别人我毫不在乎，可晓渡他？！就在我被抓起来的时候，他？！这种不平衡是不对的，我是不是有点病态了？

晓渡太苦了，他忍了这么多年，可从未放弃过内心的坚守，作为人，我为啥不对他宽容一点呢？他和芒克千里迢迢来成都参加我的婚礼，他灌得酩酊大醉，他呕吐得不象话了，可还在说：“我非醉不可，要不我对不起亦武，我只有醉，只有醉……”想起这些，我应该为这与我不相干的事，一百次原谅晓渡，他有他的活法，他同醉心功名的韩东他们是不一样的。可我还是给他打电话，若干次，我疯狂地找他，我觉得这种伤害深及骨头：连晓渡都这么做了，世间还有啥可相信的？在电话里，晓渡给我解释了很久，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太自私了吗，老岳，自私得不近人情？如果这个世道再这么延续五年、十年，人心就麻痹下去了，从精神上，从尊严上，我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历史永远被歪曲，被变形，我们党永远是稳操胜券者。

时间是最无情的子弹。

再次感激你和周忠陵促使我与《沉沦的圣殿》联系在一起，虽然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但通过它，我触及到了那段历史的另一面。说实话，这本书本不该由我来编的，有资历、有能力、有人缘来编此书的人太多，可这么多年，它就是没出来！

已经有点晚了。

有你这样的朋友，我不应该绝望，对吗？

你的朋友：亦武

书评会部分专家发言纪要

时间：2001年3月4日下午

地点：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

主办：北京某文化单位

整理：陈帅夏榆

雷颐（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学家）：《中国底层访谈录》是我最近读到的极具震撼力的一部书，它虽然不是按照所谓问题或者焦点组织起来的，但有一个追问在里边，比如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不断的通过对一些社会底层人命运的描述试图求解，但是它又无限敞开并不作答案。

从历史学的意义上看，你和社会下层或者说社会底层的人，无论是乞丐还是妓女，当你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作家的身份或研究者的身份，有意识的带着采访机或摄像机去采访他们的时候，只要面对录音机摄像机，他们谈的很多东西就会不真实，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现在口述史学很重要，但对着录音机的谈话总会有修饰的成分。而这本书的写作不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因为它的作者本身是身在江湖和他们血脉相通，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和他们在一起共同的生活。所以他能够以自己的真实获得被访者的真实。

这部书写的都是最底层所谓的芸芸众生，记录他们最平常最日常的状态，也是生活最本真的状态。这是很难得的。我始终有个观点，就是说很多发生过的事情如果不形成文献就很难成为历史，因为历史学的规范是只有成为文献，才有人记录，才会成为历史。当没有成为文献的时候整个生活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所以从为历史留痕这个意义上看就很重要了。这部书为历史留下一个活生生的记录。这是个人的历史，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我总觉得我们前从的史学只是关注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大的运动，而这部书更加注重日常的生活，比如一把胡椒的价格，一张招

贴画，这种东西被记录下来，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当你作为外来者正而八经的去采访的时候，他给你说的都未必是真实的，但你跟他天天朝夕相处就不一样，很多内心最隐秘的最私人的东西都会讲出来。

从学术的意义上说这部书也是有意义的。我们以往只有社会的历史，没有个人的历史。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的意义，同时也让我们从个人的历史看到社会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

我看了这部书感觉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曾经也做过好几年的知青，经历过多年的底层的生活，跟农民一样去扒车往返家乡，那时候的盲流都是坐货车流动。随着自己后来的命运的改变跟底层就有了相当的距离了。而这部书又让我看到小人物的生活，看到他们的悲哀他们的欢乐和不幸。

也许有人会批评：这部书没有一个重点，没有一个焦点。我却认为这就是这部书的特色，它不像那些焦点访谈的节目或者报纸杂志围绕一个焦点问题，围绕一个社会问题，哪怕是一个社会底层的问题来展开。这部书不是，它是全方位的，反映社会底层，反映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就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一种生活，一种状态，一种经历，里边有牢骚、有欢乐、有痛苦，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来自沉默的大多数自己的声音。

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喜欢回忆历史，我在《乡村老教师黄志远》中看到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我是搞历史的，看到这些就比较敏感，黄志远作为中学教师，当年因为将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讲得好，到文革开始就因此而遭难，其实不经历过那种年代的人就很难想象，没有办法理解这些。实际上当初中学课本选的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还是不错的，写得极有文采，很容易讲得声情并茂，但这就成为一个罪状。另外，他讲到看电影的时候，每一次看电影都是新闻简报。我多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看到这个细节就激活了过去的记忆。当时有很长时间就是这样，我们还真是没电影可看，每一次都是新闻简报，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叫做“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后来到 72、73 年像拍样板戏一样拍了一些样板电影，比如《战洪图》、《青松岭》、《艳阳天》、《火红的年代》等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放电影就是新闻简报，我觉得像这样的很小的生活细节都很有价值，这些细节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

这部书还有一个特点，它没有角色的预设，不管是学者、记者或者任何的外来者，作类似的谈话不可能没有预设。包括费孝通，还有其它一些人类学家到一些地方考察，例如到印度尼西亚等等荒僻的地方，一呆多少年，但还是无法成为那其中的一分子，别人也始终不能把你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你自己也不能完完全全的融入其中，始终隔着一层。但老威不搞研究，如果说有追问，他只针对细节，这样，它就为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后代，提供了正统历史所回避的鲜活的时代文本，人性的文本。我的印象里，还有第二本书采取彻底解构作者身份的态度，这一点，使它成为一个“见证性”的孤本，而进入历史典藏文库。

丁东(作家·当代民间思想史家): 每个社会有底层就肯定有中层、上层，另外还有江湖，与江湖对应的还有庙堂。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有话语权有写作能力有发表机会的人，总的来说都是在上层，或者说在中层，在庙堂这个环境里生活或发言。高踞上层或者中层或者庙堂的知识分子写底层社会的生存实况的书每个时代都有，从二十世纪初就有，五四时期建国后各个时期都有。但是在上层的知识分子在写下层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带着上边的观念，上边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是从上往下看，是一种居高临下，一种俯瞰的姿态。

老威的这本书就不一样。一个事变把他从文化精英浪漫诗人的立场打下去了，打下去之后你别无选择的身在江湖，你就可以进入底层了，你自己的江湖身份、江湖的体验再和江湖的人打交道，然后就可以对话了，这种对话我觉得你既是了解对方的命运，同时也是反观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我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访问就获得了一种平视对等的交流。不管是小偷、妓女、

囚犯、吸毒者还是流浪诗人、民间乐手，作者他不是居高临下的跟他谈。而是平起平坐，我觉得这种状态比较重要，要没有这种状态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对话。没有办法听到真实的声音。

从我个人来说，我没有那么长的底层经历，但我以前也插过队，和这个比插队不能算底层，但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比插队应该就是底层。我在插队第二年头上，有一回我和两个同学扒车，扒火车想出去玩，结果给漏下了，让人给关到收容所里，从河南押到新疆，又从新疆押到长治，这一个月你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你周围的人都是要饭的、小偷、盲流，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这样的生活只有一个月，但这一个月的感受和我五十年的人生感受就不一样了。因为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一看到这样的底层经历就把记忆唤起来。

王小波有一个说法叫“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说不管底层也好江湖也好，这个群体在中国属于大多数，他们在总的人口所占的绝对数量相当大，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入现代传媒和社会公众的视野。就是说你确实是感到是他们在说话，这确实是很难得的。在这样一部书里这些从来没有话语权利的人获得了表达和言说的权利。这些从来没有发出过声音的人现在发声了，我觉得这是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现在写底层老百姓的书我们也看到过，就像《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他写的也挺多，但是你能看到记者本人的影子，你感到他的姿态和那个焦点访谈那个拿着话筒采访的没有区别，就是说他自己作为一个采访者充满了自信，他觉得我是代表公正的，我来报道你，我来说你。另外，就题材来看，这些东西在别的作家那儿其实也有，比如冯骥才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张辛欣写的《北京人》等等，但这个我觉得还不能体现这部书的特色，我说的特色还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平视的眼光。不管是张辛欣也好、冯骥才也好，他始终有那个作家的架子。他那个架势背后蕴涵着一个什么呢，就是人应该怎样生活，历史应该怎样前进，社会应该怎样建设，这个在他那里是有一套的，但是这一套在社会底层的这些吹鼓手啊、招魂士、算命的等等全不一样，他们那一套跟你知识分子的那一套根本不是

一回事。但老威就把这些架势全都不要了，就是我和你一样。就是说我和你是一样的人，这样他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他的独特性，我觉得要是不讲出这一点，光说他表现了底层，或者说写了别人没写的没注意的东西还不能说明什么。人家都可以举出例证说他写的什么东西，人家哪儿哪儿也写了。不一样我觉得就在这儿。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你要光会底层这一套你也写不了，因为老威还有过去精英文化那一套想法。有了那个再被打下去之后你看人看问题就不一样了。

就过去的历史而言，还没有来自底层的声音，没有来自江湖的声音。最近河北省政协有一个《文史精粹》杂志，他们编了一套史料丛书，挺大的规模，有中国禁烟史料、土匪史料、娼妓史料，但是他们都是由各省政协系统征集的文史资料，都是由各种专业工作者回忆整理的，在这些史料里你可以看到当年的数据，当年的情况，但你就是不知道当年这些人他们怎么说，只有别人按照某一个理念或者某一个历史的价值观总结他们，评判他们，概括他们，你听不到他们自己个人的声音。

我觉得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的东西。

唐晓渡（诗歌评论家）：我知道作者八十年代是个相当有影响的先锋诗人，我跟他多年的朋友，这本书的写作我知道得很早。作者老威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确实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自己在序里面也谈到了，从向往精英到追求精英式的这种立场把目光转向了底层，这很多人都知道了。我想谈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这个工作也有连续性。关注诗歌的人都记得作者在八十年代写作过长诗《死城》、《黄城》、《幻城》三部曲，这里面，包括他的写作方式，现在回头去看，实际上也蕴含了他现在的这种转向。怎么去看这个“底层”，从社会的这个阶层，从他们的身份，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都是一种说法。可是，我们来看这本书呢，也不尽然如此，里面也涉及到很多文化人、诗人，包括他们先后的转变。刚才丁东先生也讲到了，“底层”是相对于中层、上层，也

是相对于“庙堂”，但在我看来，从我对作者的了解，或者我愿意看到的作者的变化来看，那么我更愿意把“底层”理解成是生命的真象，这种“底层”实际上我们人人心中都有，我也相信，也正因为如此，不同身份的、不同层面的读者，他们读到这样一本书才会产生一种共鸣。从生命底层，从人的欲望、本能，一种没有经过意识形态语言组织过的现实，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的真象，这是我理解的“底层”的含意，我觉得作者老威是从这个角度进入底层的生活，进入底层人的灵魂、内心、情感。这也是一个诗人的工作，一个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没有经过意识形态组织过的，和我们在报纸、电视节目等各种媒体背后，被他们所遮掩的遮蔽的，以至于在我们生活过程中被遗忘的，或者故意遗忘的这些生命真相，把它们揭示出来。也可以说作者把他作为诗歌世界的对个人的内心的关怀，生命状态的关怀，投射到了社会层面上。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这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裂变、转折，另一方面也有它的连续性。八九十年代之交之后，应怎样选择自己的方向？这种选择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然的，必须如此的，但确实在这多种多样中，有一种准则、维度，那么作者老威是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不想把它说得太严重，但他确实有一种下地狱的心态，就是在精神上自觉沉到生命最底层去，也只有这样才会做出这样的事。一个普通的记者，因为工作需要也可以做这样的事，但一定做不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本书，我称之为生命的丛林，尽可能揭示了它原生的状态——丛林状态，这个工作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这本书也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记忆，包括雅文化的东西，这儿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我就不多说了，我就是想强调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工作，一个诗人的情怀，这样的关注，既有他断裂的一面，也有他连续的一面。

摩罗（学者）：老威先生这本书我非常有兴趣的在读，这几天一边读一边在跟朋友们聊。但我得先说一个意思，老威最打动我的还不是这本书。大概在一年前，我得到一本老威先生自编的东西，那是一些书信，他在一个特殊环境里所写的书信，还有一些诗歌，也是在特殊环境里所写的诗歌，我看了觉得非常的震撼，觉得老威

先生在一种非常独特的境遇里，对非人存在的痛苦，对人的这种境遇的体会，或者说是一种绝望感吧，非常深地打动了。前几天又听了老威先生不是文字的创作，是关于他吹箫的录音，这对我比看他自编的小册子又有着更深的打动。所以我觉得读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更多还是从这些文字背后去体会老威先生所要表达的东西。他要表达的比他文字所表达的要多得多，这个访谈录虽然很丰富，采访了这么多人，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中一篇采访狱霸田洪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我的打动就像看他的诗，听他的箫一样。这个田洪在监狱里，刚进去的时候受别人欺负。那是一个大约住了二十多人的牢房，最后他成了头，他成了头后对待别人跟当初别人虐待他没有什么变化，一模一样。就像我们看历史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循环，重复，即是说，被压迫者感到不平、造反，造反以后自己也变成压迫者了。在这儿我想跟读者介绍一个细节，书中写到一种刑法，就是用一根线，把你的身体某一部分缠起来，慢慢地缠，一道一道地缠，缠了之后，你的肌肉发生变化，线就完全嵌进了肉里面，让你周身疼，当缠你的手时把它叫作一道什么菜，如果你要反抗的话，就缠你的生殖器。你的生殖器在软的时候就开始缠，缠好之后有人帮你搓得发热，涨起来，一涨起来线就更深地嵌进肉里面。这是狱霸折磨人的方法之一，而书里还介绍了很多别的折磨方式，也很触目惊心。我觉得这样的篇章写出来，可以很深入地揭示人内心里比较阴暗的东西，恶的东西。当然，一个人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步，我们可以说其中有非常客观的原因。就像卢梭所反复强调的，每个人只要自然地发展，就是一个好的人，人之所以变坏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是社会扭曲了人，使人变成了坏人。但是社会又是谁做出来的？又是谁依据什么东西做出来的，我觉得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出来的，在人诞生之前没有这个社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自己做成了这个社会。人是根据自己对自己的理解，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做成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社会既体现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也同样体现了人性中罪的一面，恶的一面，黑暗的一面。尽管是社会扭曲了人，使人变坏，受到伤害，但社会在我看来它不是原因的原因，它虽然在扭曲人的时候是原因，

但它同时也是结果。它是谁的结果？它是人性的结果。特别是我们生存在这个环境下，可能对一些好的东西觉得自然，不太去关注它，比如我们每分钟都呼吸空气，但我们没注意到空气的存在。但只要憋气十分钟，你就会感到这种环境对你的迫害，对你的摧残。我们对好的东西感觉要轻淡一点，对罪恶，黑暗的东西感觉要强烈一点。所以，我们对社会中罪恶的东西感觉强烈，但我的意思是，仅仅从社会的层面上来了解人受难的根源，可能不够。同时还要从人的内心来找。我觉得人的很多苦难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我们对庞大的社会无能为力，可是在那么一个二十多人的牢房，一个二十多人的小社会，每一个人都占了二十分之一，占的比例很大，可是这二十分之一就没想到要来改变这个牢房的现状，改变这个牢房里自己加给自己的凌辱，纵是你想到，可是你没有力量来把它做成，所以人就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不断伤害自己，这是我的一种体会。我们要摆脱人所承受的这种苦难，这种不幸，仅仅从社会层面找答案，做努力，可能不够，我觉得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本身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社会创造来解除人自己的苦难，恐怕还有更多的东西，或者说是更高的东西，对人做一个更透彻的审视，然后获得一个光明的启示来引导人摆脱苦难。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我这几天老是跟我的朋友任不寐先生讨论，但我们都被老威深深打动，我确实是有点儿热泪盈眶了，任不寐先生在这方面比我有更丰富的想法，他表达得会比我更清楚，下面还是让我和大家一起来听任不寐先生接着讲。

任不寐（学者）：谢谢摩罗先生的抬爱，关于这本书，我们确实有很多交流。我首先得感谢作者和出版社给我们献出这样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很像地下室里面的一盏灯，它照亮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在地下室里，我自己也在底层，那么怎样理解“底层”这个概念呢？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谈谈我的想法。第一，这个“底层”——以这本书为个案来讲，显然不完全是政治权力的“底层”，也不完全是经济权力的“底层”，他更像是话语权力的“底层”。这些人并不是边缘人，他是在我们整个这个话语权力世界里面，一直处于无法言说自己的这种生存状态。第二，我觉得这个“底

层”是精神状态的“底层”，这一点刚才唐晓渡先生也谈到了。精神状态从两个层面来讲，它是否是我们这个民族里一种假文化，还是一种普遍的存在的精神状态，这完全是可以探讨的，也许它并不完全是假文化，可能内在于它，来自于底层的，受伤害的，被伤害的痛苦。被伤害人对社会、对自己的敌意，那么可能内化于我们的灵魂中。另外从这个民族的精神层面或者说从知识分子层面来讲，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在人类精神的体会上就是处于“底层”，我们的主观自由，我们的精神自由，是不是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是不是唯物主义的博大精神，已经成为了我们灵魂的全部的内核，吃饭的幸福是不是构成了我们精神追求的主要目标。追求安全而不是自由，是不是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精神是不是处于一种未开化的状态。在白银时代俄罗斯有很多知识分子反省本民族的精神状态，他们意识到俄罗斯知识的精神状态跟欧洲相比还处于一个“底层”状态。这是我对“底层”的理解，非常希望大家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再就是我想谈这本书对我的启示。这种启示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叙事方式上来讲，我感觉到它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那么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是否是我们的真实状态，或者我们言说的状态是否是我们真实的状态，那么通过这本书，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中国，而那个中国离我们并不远，我恰恰就在其中。同时这本书还照亮了历史的真象、现实的真相。大历史的叙述不仅掩盖了历史的细节，而且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第二点启示是，在这本书里，对“底层”人话语权力的剥夺彻底被解构了。这一方面是口述史的言说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底层人物的言说来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第三点启示是一种“底层”关怀。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对“底层”关怀这个问题，由于两种言说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混乱，一种是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说方式，一种是所谓“激进主义”的言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言说方式也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们对启蒙话语的批判，对弱者的关怀提出一种警惕，说这种关怀有可能导致一种救世主的情结。那么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激进主义”倾向，恢复传统的倾向，他们对“底层”的关怀，给弱者送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像打了一张欠条，

这在毛泽东时代已完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困境，弱者显然是存在的，他们无法，或者无力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进行自我帮助。我们是否因为害怕“救世主”的情结而不去关怀，如果我们关怀了是否就因此成了所谓的救世主？这个问题在当下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在我看来，这确实需要一种新的精神资源，这也是我和朋友们在一起经常探讨的一个话题。好，谢谢大家。

白桦（中科院文学评论家）：这本书和我们过去看过的类似的访谈录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过去看到的这类书，作者多少带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或者是正常的人去访问另类，或者是文化人访问非文化人，总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那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作者老威的叙述态度不是这样，他完全是深入进去，深入到采访对象里面去，跟他们平等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交流，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真实。这种赤裸的真实一方面是采访对象原生的生活状态，还有就是很本真的生活态度。里面最打动我的是谈胡风狱友的那篇文章，我由此也看到”社会底层“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了社会底层，我觉得胡风就是。当时胡风得了很重的病，每天都很痛苦，有一次在小组领饭时从台阶上摔倒了，还被几个犯人痛打一顿。书里还写到胡风话不多，经常在院坝上站着发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真是为我们中国一流的理论家、评论家感到悲哀。从这本书所写内容来看，我觉得我们社会的某个时期对个人生命的摧残，也许仅一次，但这个生命也许永远也翻不了身了。随着历史的向前，我们可能把这个个体生命都遗忘了。而有些人可能现在还在承受被摧残过去的伤害。看了这些，对我心灵确实很有触动，我们真是要反省我们这个社会，怎样把个体生命当生命来对待。另外，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各个行业变化都很大，没有变化的就是新闻。我是去年十月去了一趟美国，我对那片土地最大的感受就是精神空气充分自由，只要你能想到的就可以说。我在纽约的时候，看见电台在采访克林顿，有一个记者去捏克林顿的脸，我问旁边的朋友怎么回事，朋友说是记者在替克林顿纠正口音。记者可以捏总统的脸，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现在

的新闻没法看，新闻联播三分之二是领导人开会，去哪儿考查，全是一些没用的正确废话。也不调查一下我们真实的感受。国内的报纸也基本上是关注怎样过好小日子，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很难看到我们国家真实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威的这本书真不仅仅是一本书，非常值得广大读者去阅读，特别需要新闻工作者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态度，把真真实实的新闻、真真实实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作为公民来讲，我们都有知情权。但事实是，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情，所以我对作者表示敬意，对出版社表示祝贺。

岳建一（出版家）：我感觉这本书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地狱的澡堂里，然后有一群各种各样的灵魂，这些灵魂都是裸体的站在这个镜子面前，非常逼真，我是这么一种感觉。看这本书以后，我的评价是，如果我们的新闻环境，我们的文化生态，如果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环境的话，这本书能够，也必然会影响中国新闻写作，以及纪实写作的形式和进程。我觉得这本书的写法，它的意义超过了这本书本身，它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采访这些底层人时，把新闻采访者的身份，全部拿掉了，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与被采访者对等的，而且是平民化的，很关注对方的，和对方嬉笔怒骂，同时在这种采访中透出一种犀利的眼光，一种智慧，一种直逼灵魂的拷问，你不能不回答。被采访者通过这种采访，也感受到了自己对采访者的一种信任，一种毫无顾忌的，不讳言的，把自己最隐秘的，最精神的，最生命深处的经历表述出来。另外，我认为这本书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它在书中流露出来的民间记忆的品格。这种民间记忆恰恰是我们现在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所需要的品格，刚才朋友们也谈到了现在新闻的索然无味，和对它的真实性的怀疑，那么这本书恰恰以它民间记忆的方式还原了生活的真实，社会的真实。而我们现在多是在一种统一的叙述、纪实，统一地记忆，没有个性，苍白，圆通，只说好，不说坏，缺少生动，缺少对于事物的、生活的、社会的直逼本质的那种拷问，而这本书的作者做到了。我想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我们的学者，通过这本书的启示，应该意识到我们要恢复民间记忆的伦理、民间记忆的品格、

民间记忆的禀赋、民间记忆的常识。什么叫民间记忆？我认为民间是一切历史记述，一切新闻记述的灵魂，民间记忆是具有血性的，具有个性的、灵性的，尤其是具有品性和骨质的，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力，任何金钱不可代替和更改的。民间记忆它本质是自足的、自尊的、自立的、自强的、自由的，它是个性化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它是丰富的。因为有了民间记忆这种精神，我想才有了老威的这本书，民间记忆只要还活着，它就意味着我们社会的良知还活着。因此，我感谢作者老威。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最近三个月我闭门不出，这会儿突然来到人群当中就变得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人的心经常是被各种各样的东西遮蔽的。我读了这本书觉得它最有意义的是它把一部分被遮蔽的声音给显露出来了，我们听到了。我是研究历史的，我们过去的历史从来是写大人物的历史，写英雄人物的历史。而从来不写普通人的历史。我们写历史从来都是写大的历史事件，而不写个体生命。比如我们谈反右怎么怎么，但就不谈某个具体的右派分子，他的个体生命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写历史只写事件，不写人的心灵，人的心灵是看不见的。那么这样一种历史观，使很多个体生命的声音，普通人的声音，特别是他内心深处的声音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是看不见的，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就被遮蔽了，但有些人是被剥夺了发出声音的权利，我们更加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我觉得老威的可贵在于他关注到了个体生命，他写了一个一个个体生命的历史，而且是一种心灵的历史。看了这本书后我想，假如我去采访，我是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就是每个人是不是能够把他内心的声音说出来，也很难。因为中国人已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有很多面孔，只要把录音机一放到他面前，说出的就是大众需要的语言，或者是某种意识形态需要的语言，而把自己的声音给遮蔽了，而下层人的谈话，流浪儿的谈话，他们都还是按着游戏的原则说话的，不把真实的话说出来。不仅我们知识分子是这样，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所以很不容易。不完全是外在的原因，我想还有内在的原因，使我们内心真实的话说不出来了。所以我要说，大家读

老威的书也别上当，书里人物也不完全把自己内心的声音说出来了，这个真实是有限的。第一，被采访对象本身就没把真实的话都说出来，很明显有所保留，读也读得出来，很多保留，很多话没说。另外，老威在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一些声音。看了这本书，我们不能老实的说这就是真实的声音，只能说部分的真实。但说实话，在中国有这样一个部分的真实也非常不容易。说得更深一点，人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的内心都说出来，这有更复杂，属于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所存在的一些内在矛盾。即使在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人也不完全都想把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说出来。所以，时时刻刻，我们的声音总是被遮蔽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读老威这本书受到最大的启发也在这儿。

余杰（学者）：老威的这本书比他的第一个版本更加全面更加充实，我重新看后受到很大的震撼，我今天想谈两点：第一点我想从地域文化这个角度来切入，因为我跟老威都是非常亲近的老乡，都是四川人。我从这本书里读到很强的地域文化的色彩。就是从这些人物生长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那些山山水水，到他采访的这些人物的言谈举止。因为这是一本口述实录的书，所以，我从这些人物谈话的语言中，可以发现四川方言中很特别的幽默感，他的这种语言的丰富性是其它地方语言没法比拟的。他突出的地方语言的特点，使我想起去年获诺贝尔奖的高行健，他获奖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灵山》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这种中国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到今天已成一种腐败的、衰亡的状态，所以，他想去发现一种更有生命力，更有想象力，更接近于人性的自然状态。所以，高行健在 80 年代中期到中国的西南西北，特别是西南地区，像湖北神农架，湖南湘江、四川阿坝，彝族的、藏族的、苗族的居住区……这个思路 and 老威这本书的思路有相似之处。第二点，我想这本书可以放到三个坐标系中去探讨，一个是文学的坐标系，一个是历史的坐标系，一个是新闻的坐标系。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有为小人物立传这样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一直被主流话语所压抑，比如在先秦诸子的一些著

作中能够零散地看到，在《史记》中我们能够看到，在唐人的笔记中也有一些，然后到了晚明，然后到了晚清，晚清是个笔记谓为壮观的时候，在这种笔记中有很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但不幸的是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由于一种宏大的历史观，这种东西越来越少了，零星的，像郁达夫是一个典型的写底层、写小人物的作家，到四九年以后，这条根就被拦腰斩断了。所以我觉得老威是把这条中国传统很细的命脉结连上了。从历史来看，尽管中国有很深远很丰富的史学文化传统，但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没有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我看过法国一位汉学家谢特耐写的南宋的日常生活，他的书做得非常细，虽然是一个学术著作，但是非常可读，比如他研究南宋当时杭州的人民生活是怎么样，他们的厕所是怎么修的，他们地下水的系统是怎么样的，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普通人家的日常开支，根据很多史料来发掘，这样的著作是我们现在缺乏的，因此，老威这本书对我们正统的历史学也非常有启示意义。第三个层面，就是把它作为新闻来看待。前段时间我把这本书送给一位新闻界的朋友，他是卢跃刚先生。卢跃刚先生是当下中国做新闻最好的一个记者，不论是从他的知识结构还是从他的人格魅力来说。当时卢跃刚先生看了这本书后跟我有一些交流，他对这本书有不同的评价，我觉得他们两位的表述都可以称为新闻，只不过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比如卢跃刚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大国寡民》，是通过陕西民女的一个案子来剖析中国乡村的黑暗，从古代以来的宗法体制跟现在的这种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相结合所构建的一个暗无天日的事件。我觉得卢跃刚先生只是把所叙事件作为一个引子，背后想谈的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他想对中国社会结构做一个深入的分析。而老威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深入，他关注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本身，他没有把他作为社会事件来分析和研究。我就谈这么多。

姚仁杰（北京大学教授）：刚才有朋友谈到个体生命所负起责任的问题，我是搞生物学的，最近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科学成就，就是把人的基因图谱描绘出来了，从这个公认的成果来看，人在自

然禀赋上的差异是极小极小的，我们人类东方的黄种人跟西方的白种人或非洲的黑种人互比较来说，自然给我们的差异不到万分之一，也就微乎其微了，就是在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面前，我们可以说，人是平等的。但社会学上很难实现这个人是在生而平等的。我觉得关键问题在这儿，所以刚才大家提到的问题也好，就新闻所关注的，和新闻所缺失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社会造成的，要是我们把社会的结构想象成一个金字塔，那么统治者是高高在上的，塔尖下，不同受压的人是在不同层次，要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只是统治者的喉舌，你怎么要求他去描述底层人的生活？有个定位的问题。所以在一些讨论会上，一些搞社会科学的朋友，他们说有些问题反而你们搞自然科学的人敢说我们不敢说，什么道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换饭票不是靠红头文件，而是靠我们的学术和我们的技术，而人文科学，包括新闻记者，他饭票本身就是要靠喉舌去换得。这个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刚才有人也谈到说真话的问题，从自然禀赋来说，从基因的遗传基础来说，人没有说假话的习性（听众掌声），之所以要说假话是社会逼迫他这样做的，他的生存状态要求他这样做。所以要改变说假话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不能从自然科学方面去寻求，去寻求改良，或者说它缺失了什么东西，我增加一点东西（听众大笑），一定要改良我们的社会，取消压迫人，叫人不敢说真话的社会因素，而不是自然因素，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就是这位作者是我昨天刚认识的。他是我老乡，并且很有幸，我们中学是一个学校。刚才有位朋友说，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来，因为他个人的命运曾经就沦入底层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要说明作者的可贵，还在说真话。我也下过底层，所以我同意“底层是流动的”这个观点。特别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流动性在知识界是非常大的。一朝是座上宾，一朝就可能变成阶下囚。而变动以后，要是能够有所觉悟，社会就会更快地进步，要是到了底层，只是怕了，而不是觉悟了，或者反过来，像书中写到的，自己在牢房被欺压的地位变成可以欺压人的小组长的时候，而不是觉悟：人不应该欺压人。那么社会永远不能进步。那只是走马灯一样换一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我觉得书的意义

在于，不管你怎么说，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人是杀不绝的，总还有后继者，为什么？因为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生活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你剥夺光，但是，人们依旧活过来了，耻辱地活过来了，还要说话，舌头还没有被割掉。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的朋友，特别是青年朋友，不管做什么事，读一本书，写一本书，或者科研发表一篇论文，希望能够促进整体社会的进步。我是搞自然科学的，为什么我对人文学科的文学、历史这方面很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当前中国的病不是仅仅科技能够兴国的，必须要有中国整个文化的提升，重新启蒙人民，重新提升人民的觉悟，从素质上提升人民，有现代意识，中国才有希望。

李辉（作家）：我觉得把这本书称为新闻史上的奇迹还不是那么准确，准确地说它含有社会学的工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任何真实都是相对而言的。过去我也做过人物访谈，知识分子多一些。人的回忆，不管是民间记忆也好，个人记忆也好，当进入记忆这个阶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全部的真实。只能说从某一角度可能提供了他愿意告诉我们的那一部分真实。所以每个读者最好不上作者的当。也许采访者与采访者不是故意的，但实际上是这样存在的。当别人在对你谈话的时候，在对你回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必然有所选择。三点是祝贺作者提供这么一本全面认识中国现在，包括过去的，每个阶层的书。但对“中国底层”这个概念，我觉得它缺乏相应的排它性，“底层”的排它性是什么？这还需要探讨。总的说来，这本书在细节上还是相当很大的冲击力。

（未完待续）